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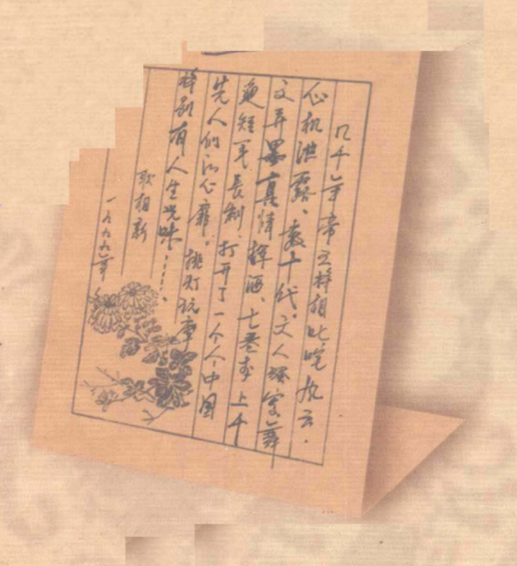
前清卷

主编 苏全有





人民日报出版社



历代帝王将相的内心独白

千古文人墨客的心声私语



ISBN 7-80153-224-4/G · 129

全套定价：105.00元（本册定价：15.00元）

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前清卷

本卷主编：苏全有

撰 稿 者：苏全有　王记录

雷　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耿相新等编.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00.1

ISBN 7-80153-224-4

Ⅰ.中… Ⅱ.耿… Ⅲ.文化-名人-书信集-中国-古代

Ⅳ.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1999)第70753号

书　　名: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前清卷)

策　　划:耿相新

本卷主编:苏全有

责任编辑:方　鸣

封面设计:吴本泓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北京金台西路2号/邮编:100733)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安阳市华豫印刷厂

字　　数:2341千字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5

印　　数:3000册

印　　次:2000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153-224-4/G.129

全套定价:105.00元;(本册定价:15.00元)

前　言

中国人最重感情，最富有亲情，情感世界丰富多彩。

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先人留下了一笔笔彪柄史册的情感史话。他们那激情昂扬的文字，温情绵绵的话语，充满了对国家、民族的顾恋的情怀，饱含着对故乡、亲友的丝丝眷恋。每当我们翻阅这些文字，品尝其间的情话时，无不为先人们的高尚的情怀，充满人生意味的乡情、亲情、爱情、友情所感染。读这些文字，可以激起我们的爱国之心，激发起我们对故乡、亲友的丝丝眷恋。

人是有感情的动物，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正在于此，这种感情是人生的写照，是对社会生活的宣泄，是对枯燥人生的反叛。一个人如果没有感情，就等于行尸走肉；一个人如果抛弃了故乡、亲人的呵护，就等于漂浮在水面上的草萍，无根无源，生活就失去了意义；一个人如果长久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就如同冬天的枯草，凋零死亡，自不待言。生活中不能没有感情，没有感情的人生是枯萎的花朵。

商品经济时代的社会，纯粹的感情消陨了许多，一切都以价值来衡量，一时的快乐难保永久的孤独，今朝有势，宾朋满座，它日沦落，门可网雀。至今，迷途的羔羊们似乎仍没有醒悟，追名逐利。人心浮躁，精神萎靡，社会充满了铜臭气，人的情感正一点点地被蝇营狗苟所蚕食，人的精神越来越变得少气无力。

人是不能没有一点精神追求的，社会不能没有一点正气。

转型的社会呼唤新型的价值趋向，呼唤新的人格魅力，呼唤新的人伦情操。

高尚的精神追求永远是人生追求的真谛。

对现实社会的关注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对国家、民

族的担忧是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对乡情、亲情、友情、爱情的眷恋是传统知识分子一贯追求的目标。生活不能失去目标，人生不能没有追求，美的东西永远是好的。在转型的社会里，我们需要继承传统美德，同时也需要弘扬传统美德。这就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也可以说是生活在当今社会的知识分子对时代的一种精神回应。我们无力建构新的人际关系，建构新的伦理道德，只是想采撷传统中国人的一些高尚情怀，来感悟社会，来教育现实的人们。

传统是一面镜子，可以反照过去，也可以昭示未来。糟粕肯定要清除，精华一定要吸收，这是我们对传统的态度，也是对社会、人生的理解。

中国人的感情世界太丰富了，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蕴藏着中国人丰富的情感世界，我们不能将所有的东西奉献给读者，只能采撷其中的一部分，或许是很少的一部分，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分奉献给关心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命运的人们。

在中国人的情感世界里，书信是最能体现中国人感情的东西。对国家、民族的拳拳之心，对故乡、亲友的眷眷思念，对理想人生的不懈追求，对事业成功的喜悦，对前程失望的苦恼，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对未来人生的憧憬，一切之一切，都充分暴露在用心血、用良知写就的书信里。阅读中国历代名家硕学的书信，可以增添无穷的智慧，可以启迪愚昧的心智，许多书信会使我们读后长叹不已，许多感人的语言能使我们掩面哭泣，这不仅仅是心智的写照，而更多的则是对他们人生品格的敬仰和倾慕。司马迁是一个千秋颂扬的历史学家，他的《史记》不知曾倾倒多少名家硕学，但谁能想到他曾遭受的不幸和耻辱。读一读《报任安书》，你会体会出司马迁内心世界的痛苦，也能感受到一个身处逆境、又不愿甘心沉沦的伟丈夫的对生活充满希望的勇气。汉武帝恼火司马迁替李陵说好话，一气之下对司马迁施以宫刑，宫

刑可以摧残一个人的躯体，但弥灭不了一个人对理想、对正义事业的追求；欧阳修是宋代的大文豪，其人生性耿直，敢于直言不讳，宋代庆历新政失败以后，革新派首领范仲淹被贬，而身为右司谏的平时又号称为范仲淹知己的高若纳连一句话也不敢说，欧阳修是何等的气愤，一气之下写下了《与高司谏书》。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领略到一个伟丈夫的坚持正义、不苟世俗的博大的胸襟，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为正义可以不顾性命，不顾名利仕途。在这些人的书信中，他们是坚持正义、坚持真理的代言人，他们的刚烈正气可以鼓舞人们为真理而奋不顾身。再读读苏轼等人的信，你可以感受到这些文化精英们对事业的执著追求，为了宣扬儒家精神，他们可以隐居山林，淡泊功名，一生探讨学问。他们视富贵如草芥，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孜孜不倦教书育人，辛辛苦苦传播文化，令人深深敬佩。还有大量的书信表现了传统知识分子视金钱如粪土，把国家、民族安危置于生命前沿的气慨，范仲淹的万言书、王安石的政论书信等，无不表现他们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他们对国家的忧虑，对民族的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关注自己的人生荣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何等的气吞山河。在那些名人的书信里，你能感受到做人的原则，可以感受到他们对故乡家园的怀恋，可以领略到他们对祖国山川大河的秀丽美景的讴歌，感觉到他们对乡情、亲情、爱情、友情的真挚的追求，更能感觉到他们诲人不倦的涓涓细流。那温馨的话语，那充满人情味的叮咛，是何等的催人泪下。《傅雷家书》可以开启一代人的心扉，传统名人的书信更是一笔取之不尽的财富，只有埋首于这些无价之宝之中，才能感觉到温情，才能感觉到世外桃园的芬芳。

中国人书信，充满智慧、学识和理想，它们是优秀的教科书，可以教给我们许多东西，可以陶冶我们的情操，可以锻铸我们的意志，可以洗涤我们的灵魂。

每个人写每封信，都有不同的境遇，或言志，或抒情，或写景，或怀旧，只有我们置身于其中，才能品味其中的滋味。

这是我们撰写此书的目的，也正是我们的厚望。

耿相新　郑强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目　录

答赵宽夫

孙奇逢

题解：

这封信是孙奇逢写给赵宽夫的。

孙奇逢（1585—1675），字启泰，一字钟元，河北容城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举人。天启中，阉宦魏忠贤专擅朝政，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等人以党祸被逮，孙奇逢前后奔走，安抚左、魏、周诸人子弟，并募金救助，仁义之声震天下。因孙奇逢的前后奔走，遂激起燕赵慷慨悲歌之士，一时论政救人，掀起风潮。但孙奇逢对腐朽官场没有任何兴趣，当时多人举荐，他都力辞不就。明朝灭亡以后，孙氏归隐。顺治初年，巡按柳寅东、侍郎刘余佑先后以人才举荐，祭酒薛所蕴力赞其学行，比之于元代的许衡、吴澄，孙氏仍坚辞不仕。后因田园被圈入旗地，移居新安，接着又徙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四方学者归之，屡征不起。

孙奇逢治学，出入程朱陆王，他反对做静坐无为的弱者和庸人，提倡做磊落的英雄。他虽未出理学门庭，但气魄豪迈，已不再是理学家的温良。从他给赵宽夫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到，做学问就像剥竹笋，一层一层无穷尽，读书要灵活理解，决不能墨守成规，孟子能发扬光大孔子之道，关键在于他能理解孔子思想而不拘泥于孔子语句。由此我们受到启发：在任何时候，学习都必须层层深入，灵活理解。用孙奇逢的话说，就是：

道原无尽头，学自无了期。

所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

（《夏峰集》卷7）

原文：

接来字回环读之，见迩来用功近里著己，痛除将就冒认之习，真见本来面目。所云去一层，又有一层，此正切磋琢磨之咏，精矣而又觉其粗也，密矣而又觉其疏也。尧舜犹病[①]，到底是犹病；文王未见[②]，到底是未见；孔子何有，到底是何有；颜子之欲从末由[③]，到底是末由；道原无尽头，学自无了期，安得有剥尽之时耶？一味朴实做去，不落掩著，不以意兴气魄搀和其间，独不期慎而慎，意不期诚而诚，无时非天晴日霁之候，无处非鸢飞鱼跃之机，虽与人共在尘世之中，而此心独超万物之表，睟面盎背[④]，所谓充实而有光辉者也。此段趣味全处剥处得力。剥之时即复之时，非两候也。前贤议《论语》语当活看[⑤]，稍一执著，便成滞碍。所读有字书，要识无字理。朱陆异同[⑥]，数百年聚讼。文成效诤论于紫阳[⑦]，至今攻之者不遗余力。忆前番字中，谓新郑所刻之书，驳者云，文成文恭不足徒置[⑧]，此不明于无字理，各伸所见，不足怪也。濂溪为宋之大儒[⑨]，而从祀独后，安得人人尽识姚江哉[⑩]？《明史》未修，儒术尚多可采，老夫尝语同人云，不在五奎聚东井之后[⑪]，此祇可为吾丈道耳。卧病经年，其苦难以告人。所幸者一年之病，得良友数人，乐更甚于苦矣。当世士大夫儒而归禅者，十常四五。如适庵者，食雪山之食，衣雪山之衣，居雪山之居，而精神意想乃专注于尼山[⑫]，千百中无一焉。吾不知有心人，当何以位置适庵也。颜、曾学孔子[⑬]，步趣唯谨，孟子学孔子，离合而与之相究。故先儒云，孔子之道得孟子而大光。意兴气魄四字，再作商量。

注释：

①尧舜：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首领。尧晚年禅

位于舜。

②文王：即周文王。

③颜子：即颜回。

④睟面盎背：有德者的仪态。

⑤《论语》：孔子言论集，为孔门弟子辑录其言论编辑而成。

⑥朱陆：朱熹和陆九渊，或指朱学和陆学。

⑦文成：即王守仁，谥文成。紫阳：即朱熹，紫阳本是安徽歙县一山名，朱熹之父朱松在此读书，后朱熹居福建崇安县，题厅事曰紫阳书室，故后人以紫阳为朱熹的别号。

⑧文恭：即陈献章，谥文恭，明代哲学家。

⑨濂溪：即周敦颐，因其住室取故乡濂溪命名，人称濂溪先生。

⑩姚江：即王守仁。王为浙江余姚人，姚江本为一水名，入余姚称姚江，余姚也因此称姚江，王守仁为余姚人，故以地望称。

⑪五奎：星宿名。东井：星名，即井宿。

⑫尼山：山名，又称尼丘、尼丘山，此处代指孔子。因孔子生于尼山，故称。

⑬曾：即曾子。

译文：

接到来信，反复读了几遍，看到近来的学习能够结合自己，已经除掉了迁就马虎的习气，基本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所说的去掉一层，又有一层，这正是对商讨研究问题的最好表述。非常精细了，还觉得粗陋，非常严密了，还觉得疏漏。尧舜有错误，到底错在什么地方；文王有未见到的事物，到底是什么事物没有见到；孔子拥有众多知识，到底拥有多少；颜子想追随发展孔子，到底在什么地方发展了孔子。道本来就没有尽头，学习自然

就没有结束的时候，一层又一层，哪里有完结的时候呢？一股劲扎扎实实去做，不要落入俗套，不把个人意向气魄搀和其间，不期望达到谨慎就达到了谨慎，不期望达到诚实就达到了诚实。时时都有天晴日朗的征候，处处都是鸢飞鱼跃的现象，虽然与众人一起都在尘世之中，但心灵却超越万物之上，面色光润，身体舒展，内心充实而又闪耀光辉。这样的意趣会从不断深入学习上得出。层层深入学习的时候就是接近真理的时候。前贤议论《论语》，认为应当灵活阅读，稍一拘泥，便不能正确理解。读的是有字书，但要识无字理。朱熹，陆九渊之间的异同，数百年间争论不休。王守仁诤驳朱熹，至今攻击他的人不遗余力。回忆您上次来信中所说的，新郑所刻之书，驳斥他的人说：王守仁、陈献章不应有其位置，这是不明白无字理，各申己见，不足为怪。周敦颐这样的宋代大儒，从祀配享还总是在后边，又怎么能期望人人都了解王守仁呢？《明史》没有修，儒术还有很多可以采用的地方，我曾和同仁们说：五奎没有会聚东井，这些话只能和你说。有病卧床一年，其中苦痛难以告人。让人感到幸运的是，生病一年，交结良友数人，欢乐超过了痛苦。当今士大夫由儒而归禅的，经常有十分之四、五。像适庵这样的人，吃雪山上的食物，穿雪山上的衣物，居住在雪山上，但精神思想却专注于孔子，真是千百人中没有一个。我不知道那些有心人，应当把适庵放在什么位置上。颜回、曾子学孔子，小心谨慎，亦步亦趋，孟子学孔子，分分合合，但都与孔子思想相参照。因此先儒说：孔子之道由于孟子而发扬光大。意兴气魄四个字，我们可再行商讨。

与弟侄

郑日奎

题解：

这封信是郑日奎为读书学习之事而写给其弟、侄的。

郑日奎，字次公，号静庵，贵溪（今江西贵溪）人。生卒年不详。清世祖顺治十六年（1659年）进士，官至工部员外郎，升礼部主事。康熙间，曾与王士祯同典乡试。著有《静庵集》、《格言录》等。

这是一封家书。作者在这里用蚕和桑作例子，向弟、侄讲述读书学习的道理。种桑树是为了养蚕，而不是为了桑树；养蚕是为了蚕丝，也不是为蚕本身。由此可知，读书不是目的。人读书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为此，在学习过程中要做到“取精去粗”、“取神去形”，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胸中藏有万卷书，而又能不拘泥于一字一句。

学习的目的是为了掌握知识，这是大要所在，万不可拘泥于片言只语、一字一句，这是取其形而弃其神，是买椟还珠，不得要领。

（《静庵集》）

原文：

为蚕养桑，非为桑也。以桑饭蚕，非为蚕也。逮①蚕吐茧而丝成，不特②无桑，蚕亦亡矣。取其精，弃其粗；取其神，去其形。所谓罗③万卷于胸中而不留一字者乎。

注释：

①逮：到、及。

②特：只、但。

③罗：搜集，掌握。

译文：

为了蚕而养桑，目的不在于桑。用桑叶喂蚕，不是为了蚕。到了蚕吐茧成丝后，不仅桑叶没了，连蚕也要死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神韵，弃其形体。所谓胸中藏有万卷书而又能不拘泥于一字一句，即在于此。

与平贺堪右卫门

朱之瑜

题解：

这封信是朱之瑜写给他的日本朋友平贺堪右卫门的。

朱之瑜（1600—1682），字鲁玙，号舜水，浙江余姚人。少抱经邦济国之志，当时人期望他位至公辅，成就大业。但因明廷腐败，拒不出仕。明灭亡后，朱之瑜时而日本、安南、暹罗，时而中国本土，为恢复明室而奔波。其间曾与张煌言舟山共事，曾入四明山助王翊练兵，曾同冯跻仲到日本乞师，曾随郑成功入长江北征。最后眼见抗清不会成功，遂亡命日本，在日本讲学二十余年。

朱之瑜流亡日本期间，日本人安东守约钦佩他的学业德行，向他执弟子礼，并说动长琦镇巡，朱之瑜遂留居长琦。其后，日本宰相德川光国请之瑜居江户，待以宾师礼，并亲受业为弟子。其余日本士人受业者甚多。朱之瑜遂讲学授业于日本，宣扬自己的主张，对日本政治、文化的影响很大，这里不妨引录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一段话来说明："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淹贯的学问，极纯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人以莫大的感化。德川二百年，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后来德川光国著一部大日本史，专标'尊王一统'之义，五十年前，德川庆喜归政，废藩设县，成明治维新之大业。光国这部书功劳最多，而光国之学全受自舜水，所以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最有力的导师。"

朱舜水在日本有众多的朋友，其中平贺堪右卫门是一位地方

上管农业的小官，颇有政绩。朱之瑜在信中除表示向他祝贺与称赞外，还出谋画策，期望右卫门能像古代贤人那样，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殷殷之情，溢于言表。从朱之瑜所举邵雍、子产的言论以及枣祗、赵过、杜诗、张堪的政绩来看，朱之瑜深怀经邦济国之志，爱民惜民之心，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政治治理的原则与标准带到日本，影响了日本人。这封信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有两点：其一，为官不仅要勤勉，而且要善于吸取一切好的经验；其二，人活在世上，不在于官职大小，而在于是否有所作为。

（《朱舜水全集》卷11）

原文：

辱惠书问，具悉爱厚。去秋百谷顺成，足下政绩茂著，不辜夙望。前谕弘济生[①]，谓五致书而未达，此邮筩之过，亦所托非人，然雅意已心志之矣[②]。

足下向膺郡命[③]，闻之大为称庆。在政府可谓为官得人，在足下可谓才称其职。其时即欲作书，少竭愚衷，以勷新政[④]。特恐足下莅事之初，求治太速，行之或不以渐，而贵邦积疲之民，积猾之口，彼意所不堪，易腾怨谤，适足为盛美之玷，故宁徐徐耳。今上下已相信矣，竭诚鼓舞，此正其时。旧冬与玄仍吉兄言[⑤]，勿减赋以求悦民，勿增赋而杀媚上，一如旧额，而勤力其中。百姓得其盈余，渐可仰事俯育。倘若有心立异，甚非长策。盖不能安其位，则善政无从得施。康节先生谓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惠[⑥]，其言可深长思也。万一有非时轻用民力，自当尽职力争，不可畏威惕慑。方春一日不耕，则举家终岁不饱。何易于[⑦]以县令执笏牵舟[⑧]，而不敢扰百姓，可法也。井田之法，固后世所万万不能行，而井田之制，沟塗封洫，旱涝蓄泄，制度详尽，则田官所不可不知者也。向亦尝言其梗概已，足下尚能忆之乎？

古者农官方春即舍于郊，岁内即阅谷种[9]、戒农具。如此勤敏，百姓安得不饶裕？衣食足而后礼义生，此教化之厚，不可不留意也。贵邦田多沮洳[10]，水浸则土膏不存，土寒则禾稼不发，而且播种太密，冗杂逼迫，求其畅茂蕃硕，难矣。盖阳多则气蒸，雨之溉之，其苗浡然而秀[11]。种疏则条达，或耘或耔[12]，其禾芃芃而兴[13]。汉《耕田歌》云：深耕概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可征也。惰民妄言土恶，则必不可信。此间土地肥饶，黑坟赤埴[14]，用力省而发生多，远过敝乡。若或久荒久瘠，岂可归罪土田。自非垸埆[15]，必须亲为试验，毋轻听也。

古者二十五家为里[16]，里有门，所谓闾也、闬也[17]。里有正、有胥。耕耘刈获之时，日坐里门，朝则出，民于田，久则入，民而息，如此则游手婾惰之弊除[18]，非僻奸宄之萌杜[19]，法甚善也。今民零星散居，亦可以渐而复否。子产曰[20]：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然则农功之当日夜以思，朝夕以行，可知也已。昔者赵过富其民[21]，枣祗富其公[22]，杜诗、张堪[23]，百姓歌而乐之。惟愿足下追纵古人，先劳无倦，上嘉其功，下歌其德，名垂后世，式布四邻，则丈夫男子之事已。士惟在有为耳，不在官职之大小崇卑也。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注释：

①弘济生：日本人，朱舜水的朋友。

②诔：记，记住。

③膺：受。

④勷：同“襄”，助。

⑤玄仍吉：日本人，朱舜水的朋友。

⑥康节：即邵雍，宋代思想家。

⑦何易于：日本人。

⑧笏：古代朝见时大臣所执的手板，用以记事。
⑨阅：察看。
⑩沮洳：低湿的地带。
⑪浡：兴起，旺盛。
⑫耔：培土。
⑬芃芃：草木茂盛的样子。
⑭埴：黏土。
⑮垅埆：土地贫瘠。
⑯里：古代的一种居民组织。
⑰闾、闬：此处均指里巷的大门。
⑱婾：苟且。
⑲宄：犯法作乱的人。
⑳子产：春秋时期郑国政治家。
㉑赵过：西汉人，汉武帝时任搜粟都尉，提倡代田法，对当时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
㉒枣祗：东汉三国时人。建安元年，以北方连年战乱，生产破坏，建议屯田。曹操采其建议，使生产得以逐渐恢复。
㉓杜诗：东汉人，光武帝时，任南阳太守，发明水排，铸造农具，并广开田地，极有利于当地农业发展。张堪：东汉人，曾任蜀郡太守、渔阳太守等职，劝民耕种，颇有成就。

译文：

承蒙来信问安，尽悉足下厚爱。去年秋天，百谷丰收，足下政绩显著，没有辜负以往的期望。此前询问弘济生，说你五次写信给我，但我都没有收到，这是邮局的过失，也可能是托付的人不可靠。然而足下的好意我已记在心里了。

足下以前接受郡的任命，我听说后大为高兴。对政府来讲，

可以说是为官得人，量才录用；对足下来讲，可以说是才称其职，足堪此任。当时就想写封信，稍稍表述一下我的心里话，以助你施行新的政策。我当时只是怕足下刚涉足政事，求治之心太速，不能慢慢处理政务，操之过急。而贵邦民众积疲劳顿，牢骚满腹，他们一旦不能忍受重负，就极容易怨恨长官，诽谤官吏。如果这样，则恰恰玷污了这件美事，因此宁可慢慢来。如今上上下下都已相信您的能力，正是竭尽诚力，奋力向前的时候。去年冬天和玄仍吉兄谈论，不要靠减轻赋税来取悦于民众，也不要靠增加赋税来博取上级的好感，赋税一如旧额，但要在其中付出更辛勤的劳动。老百姓能得到盈余，慢慢便可控制。倘若有心标新立异，绝对不是长久之计。不能稳定自已的官位，善政也就无从实施。邵康节先生说：对老百姓宽松一分，老百姓就会得到一分的好处。他的话可要深入思考啊。万一有使用民力不是时候的事情发生，自当尽力力争，不可害怕上级的威慑。如果春季一日不耕种，那么全家一年都要吃不饱。何易于以县令的身份手执笏板拉船，不骚扰老百姓，可以效法呀。井田之法，确实是后世万万不能实行的，但井田之制，挖沟修渠，旱涝时节，蓄水排泄，制度措施，详细该备，则是管理田地的人所不能不了解的。从前我也曾大概地说过这些话，足下还能记得吗?

古代的农官春天时就在野外筑房而居，一年之中，察看谷种，准备农具。如此勤敏，老百姓怎么能不富裕?衣足食足，而后礼义就会产生，这是实行教化最看重的，不能不留心注意呀。贵邦田地多处于低湿地带，水浸则土地粪肥不存，土寒则禾苗不发芽生长，而且播种又太密集，密密麻麻，要想使其生长茂盛，粮食丰收，难啊。禾苗接受的阳光多，土地水气上蒸，此时下雨灌溉，禾苗必然旺盛生长。播种时相对稀疏一些，禾苗的茎杆必然茁壮，耘地培土，禾苗自然茂盛。汉代的《耕田歌》上说：深耕土地，依量播种，禾苗稀疏相当，凡不是此种禾苗，一律锄

去。可以证明我上面所说是有道理的。懒惰的人瞎说土地贫瘠，万万不可相信。此处土地肥沃，有黑土，有红粘土，用很少的气力就能收获很多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所在的地方。如果有的人长久使土地抛荒，没有收成，又怎么能归罪于土地呢？土地是否贫瘠，必须亲自试验，不能轻信别人。

古代二十五家为一里，每里有大门，即所说的闾、闬，有里正、里胥这样的长官。耕耘收获的季节，里正、里胥每日守候着里门。早晨出来，民众在田里劳作，时间长了便返回，民众开始歇息。这样，不仅杜绝了违法乱纪的人和事，游手好闲、苟且懒惰的弊病也可除掉，是很好的方法。如今民众居住分散，可否慢慢恢复闾里制度？子产说：处理政事犹如老农种地，日夜都要想着，要考虑它的起始，然后才能取得最终成功。朝夕行动，使行动不超过所思所想。由此可知，从事农业生产，应当日思夜想，朝夕行动。过去赵过使民众富裕，枣祗使主上富裕，杜诗、张堪，老百姓歌唱他们。希望足下追随古人，勤劳不倦，上级会嘉赏你的功绩，老百姓会歌颂你的恩德。名垂后世，成为四邻效法的榜样，是男子汉大丈夫的份内事。士只在有所作为，而不在官职的大小尊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与诸孙男

朱之瑜

题解：

这封信是朱之瑜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写给家乡各位孙儿的。

朱之瑜生平，已如上述。写这封信时，朱之瑜已78岁，年迈多病。信中希望家中孙儿能有一个前来照顾他，并让孙儿向以前的亲朋故交一一问好，思乡念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教育孙儿，决不可因家中贫困就短了志气，“版筑鱼盐，不亏志节”。能种田打鱼，奉养二老，当然是最好的了，如不能这样，百工技艺，自食其力，甚至为人佣耕，都没有什么。但只有那种掳掠民众的贪官，决不能干。如孙儿辈中有做贪官的，决不相认。朱之瑜的话就是在今天也是有启发意义的。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之中，都要有志气，讲气节，害民利己之事，决不能沾染。

（《朱舜水全集》卷4）

原文：

我离家三十三年，汝辈之生也，尚不得知，况能养育成长？汝父教授糊口，前箬里堰杨姓者来云，我孙甚多，食指繁则家道益致艰难矣。然汝曾祖清风两袖，所遗者四海空囊。我自幼食贫，荠盐疏布，年二十岁，遭逢七载饥荒，养赡一家数十口，无有不得其所者。汝伯祖官至开府，今日罢职，不及一两月，家无余人，宗戚过我门者，必指以示人曰：此清官家。以为嗤笑，非

赞美之也。岂但我今日独薄于汝辈？勿怨可也。

我今年七十八岁，衰惫不可胜言，思欲得一子孙，朝夕侍奉。汝父虽无恙，年将六十，不可远行，且又一家资以为生者。汝兄弟中择一性行和顺、举止端谨者来。有才者不可来，留以力养父母，主持家门。年十五、六岁以上即可。汝辈既贫窘，能闭户读书为上。农圃渔樵，孝养二亲，亦上也。百工技艺，自食其力，次之。万不得已，傭工度日，又次之。惟有虏官不可为耳。古人版筑鱼盐[①]，不亏志节，况彼在安平无事之时耶？发黄齿豁，手足胼胝[②]，来亦无妨。汉王章为京兆尹，见其子面貌蠢恶，毛发焦枯，对僚属便黯然销声，我则不然也。为贫而仕，抱关击柝[③]，亦不足羞，惟有治民管兵之官，必不可为。既为虏官者，必不可来。既为虏官，虽眉宇英发，气度娴雅，我亦不以为孙。

凡事但禀命十七叔公，同汝外祖而行，亦须各讨一亲笔书以为验，勿谓我无书，遂不答也。十七叔公及汝外祖姚亲翁，皆盛德君子，敦重温和，理当有寿。十七叔婆无恙为慰，为汝姑娘[④]，数年痛伤，哭泣不已，恐或以此致疾，不可知。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汝外祖与我同年生，若得回籍叙述兴亡，足为一乐。未知有此日否？

祖宗坟墓，托汝亦力不能及，来时须往汝姑娘殡前辞行，直言所往。汝姑娘性至孝，且魂气无所不之，或自随来也。十七叔公书，略则不可，详则恐为渠家累[⑤]，故不为也，即以此书送看。汝来时须得二人跟来，我家旧仆，老者凋零，壮者星散，阿钟、大招、小招虽最小，亦将六十，随行亦自无用，且亦不知在否。闻汝表姑哭汝姑娘，每祭必致哀恸，数岁何能如此。今适谁氏？伯祖尚存否？汝从伯几人平安？往年呼汝二伯，此书曾到否？今来亦不能见矣。姚亲翁家，不待访问，自然知悉。马渚陈四太叔婆尚健否？惟庶出一子，今何如？西门南城下邹元实一

家，此我自幼同窗，其东邻斗东叔公。元实长我一岁，斗东少吾一岁，亦同窗，俱无恙否？东门成我叶年伯讳大受者，其家无恙否？大约住黄山桥园中三亩田头。恕铭先生讳锦者，其家无恙否？其余欲问者颇多，但汝来不宜昭彰⑥，止问此数家最相切者而已。外阁部陈木叔老师讳函辉，原名炜，台州临海人，乃我本房座师⑦，与我最相契。今有子孙否？子孙何如？住宁海亦不可知。礼部尚书吴穉山老师讳钟峦，常州武进人，此我恩贡座师也。我贡札为开国来第一，乃吴老师笔也。今其子孙何如？吏部侍郎朱闻远老师讳永佑，松江华亭人，其子望候，今何如？我欲携其幼子某官来，老师见识不明，而止留得一人，斯幸已。已上三家，汝不能亲往，须汝兄弟一人特去。或不能及待，汝行后问得的确，寄书亦可。常州五六日程，台州三四日，若至松江，顺便问阁部张鲵渊家何如，鲵老张肯堂，松江华亭人，欲与我相亲，我三次拒绝之，是以与我极不相好。然其临死一节可取，不料其能决烈至此。其子张至大无恙否？住松江东门外张塔桥北。胡钟有家何如？令尊号慰余，尚健否？住寿里桥下塘。四月二十一日书此书，本与汝父元楷，旧年有一卢姓者来，云已物故⑧，我虽不信，然五十七岁人，死亦常事，故寄与汝辈耳。

注释：

①版筑：筑墙时用两板相夹，以泥置其中，用力砸实。

②胼胝：指手脚上的老茧。

③抱关击柝：抱关，指门卒；击柝，击木警夜。指守门打更的小吏。

④姑娘：此处指姑母。

⑤渠家：方言，指他。

⑥昭彰：惹人注意，让人都知道。

⑦座师：明清科举的举人、进士，称主考官或总裁官为座

师。

⑧物故：去世。

译文：

我离开家已三十三年了，你们出生，我尚不知，何论养育你们成长呢？你们的父亲靠教授学生养家糊口。前段时间箬里堰一位姓杨的人来我这儿说，我的孙子很多，吃饭的人手多了，家道也就越来越艰难了。然而，你曾祖父两袖清风，什么都没有留下。我自幼受穷，吃的是野菜拌盐，穿的是粗布，二十岁时，遭逢连续七年的饥荒，养活一家数十口，人人各得其所。你的伯祖父官至开府，今天罢了官，不到一、二个月，家里没有一个多余的人，亲戚朋友从我们家门前过，必定指给别人说："这是清官的家。"作为笑料谈论，根本不是赞美。哪里只是今天我对不住你们呢？请不要怨恨我。

我今年七十八岁了，身体衰弱疲惫，不可胜言，想要得到一个儿子、孙子，朝夕侍奉在我身边。你们的父亲虽然身体不错，但年近六十，不能出远门，况且一家人要依赖他而生存。你们兄弟中挑选一个性格温和、举止端庄谨慎的前来即可。有才能的不能来，留下奉养父母，主持家门。年龄在十五、六岁以上就可以了。你们家境贫困，最好能闭户读书。种地、种树、打鱼、砍柴，孝养父母，也是上策。学习掌握各种技艺，能自食其力，稍次一点。万不得已，替人当庸工度日，也还可以。唯有贪官污吏不能干。古人筑墙、打鱼、贩盐，不亏志节，何况你们是在平安无事的时代呢？头发枯黄，牙齿脱落，手脚全是老茧，到我这儿来也无妨。汉代的王章做京兆尹，看到自己的儿子面貌愚蠢可憎，毛焦发枯，便觉脸上无光，对下属便不敢大声说话，我不会这样。为解决贫困而当官，做个打更守门的小吏，也没有什么羞愧的。唯有治民管兵的官，万万不可做。如已做了这样的官，一

定不要前来了。如已做了贪官，虽然眉宇间英气勃发，气度娴雅，我也不会把他当成我的孙儿。

凡事须禀报十七叔公及你的外祖父，然后再做行动。也有必要向他们各讨一封亲笔信带来，以作证据。不要因为我没有给他们写信，就不答应。十七叔公及你的外祖父姚亲翁，都是盛德君子，敦重温和，理所当然应该长寿。十七叔婆如身体无恙，是我最欣慰的。为了你的姑母，她悲伤数年，哭泣不已，恐怕因此而导致疾病，情况我也不知道了。十七叔公今年七十四岁，你们的外祖父与我是同年出生，如能回家乡与他们相叙离别悲欢，足为人生一大乐事。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一天？

祖宗坟墓，委托你们也力不能及，来时一定到你姑母墓前辞行，直接告诉她到哪里去。你姑母非常孝顺，而且魂魄无处不往，可能她会随你们前来。写给十七叔公的信，太简略了不行，太详细了会累着他老人家，因此就不写了，把这封信送去看看就行了。你来时还须再带二个人来。我们家的老仆人，年龄大的死去了，年轻力壮的也四散了，阿钟、大招、小招虽然是年龄最小的，也差不多六十岁了。随着前来也没有什么用，况且也不知道还健在不健在。听说你表姑哭你姑母，每次祭祀均放声恸哭，这么多年怎么还这样？如今嫁给了谁家？伯祖父还健在吗？你从伯父有几人平安无事？从前叫你二伯父，书信不知收到否？如今也不能相见了。姚亲翁家里，不用再去探访了，情况我都知道了。马渚的陈四太叔婆不知是否健康？他们庶出的一个儿子，如今怎么样？西门南城下的邹元实一家，这是我从小的同学，他的东邻是斗东叔公。元实比我大一岁，斗东比我小一岁，也是同学，他们都安然无恙吗？东门成我的叶年伯，名叫大受，他家安然无恙吗？他们大概住在黄山桥园中三亩田头。恕铭先生叫锦，他家也安然无恙吗？其余想问好的人很多，但你来时不宜张扬，只问候一下这几家关系最密切的就算了。外阁部陈木叔老师名讳函辉，

原名炜，台州临海人，是我的座师，和我关系最融洽，如今有子孙吗？子孙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否住在宁海。礼部尚书吴稺山老师名讳钟峦，常州武进人，是我贡举时的座师。我的科考文章号称开国以来第一，就是吴老师所批。如今他的子孙怎样？吏部侍郎朱闻远老师名讳永佑，松江华亭人，他的儿子朱望候，如今怎样？我想携带其幼子朱某官来，老师见识不明，结果只留得一个人，已很幸运了。上面提到的这三家，你不要前去拜访，让你兄弟中一人专门去。如等不及，你来时将情况问切实，寄信给他们也可以。常州有五、六天路程，台州有三、四天路程，如果到了松江，顺便问一下阁部张鲵渊家情况怎样。张鲵渊是松江华亭人，想和我交好，我多次拒绝他，因此和我极不相合，然而他临死一节极为可取，没想到他能那样壮烈。他的儿子张至大是否安然无恙？他们住在松江东门外张塔桥北。胡钟有家怎么样？他的父亲号慰余，还健在吗？他们住在寿里桥下塘。四月二十一日写这封信，本来是想写给你的父亲元楷，但去年有一姓卢的前来，说你父亲已去世，我虽然不相信，然而五十七岁的人，死去也是常事，故将信寄给你们了。

与友人书

朱鹤龄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是朱鹤龄写给一位刚刚科举落榜的朋友的。朱鹤龄在信中以一种别具一格的方式对友人进行了劝慰，使人相信科举不中不但不是坏事，反而是好事。

朱鹤龄（1606—1683），字长孺，号愚菴。江苏吴江人。明诸生。颖敏嗜学，尝笺注杜甫、李商隐诗，盛行于古。鼎革后，屏居著述。初为文辛之学，及与顾炎武友，乃湛思覃力于经注疏及理学。著有《易广义略》、《尚书埤传》、《诗经通义》、《春秋集说》、《读左日钞》、《禹贡长笺》、《愚菴小集》。

朱鹤龄是一位明朝遗民，他采取的生存策略是既不反抗，也不合作。这点颇类似乎于大学问家顾炎武晚年的作风。这种独特的生存策略恐怕也是朱鹤龄对许多事情能够超凡脱俗，作出与众不同的判断的基本原因。故而，当他听到一位朋友科举落榜之后，非但不为之感到遗憾、惋惜，反而鼓掌大笑，欣喜之至。但这决非是出于小人之心的落石下井的幸灾乐祸，而是有着另外一番深谋远虑的思考的分析。

朱鹤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你屡试不第，关心你的人都为你感到难过，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却感到非常高兴。那些为你感到难过的人，必然会勉励你接着再考，就如同古代那些破釜沉舟、务必取胜的人一样。我为你感到高兴，则是因为你在这些无用的八股文上浪费的时间和精力太多了，从现在开始，应该一把火把它全部烧掉。然后，专心致志于文学创作上来。只有这样，你才

能立身扬名。因为凭你的天赋和才华，只要一心一意攻读《六经》以及古人的优秀文学作品，不愁写不出好文章。何必要与那些识不了几个字的“黄口小儿”们争一日之短长呢？所以，你应该避其所短，扬其所长。朱鹤龄在信中还说，听说你最近要到京城里去，那个地方岂是你我这些人去的？干什么都要走门子、托关系。不巴结一、二个权贵，又怎能站住脚呢？要想混口饭吃，有半顷田、三间房就足够了。何必要去巴结权贵呢？还把自己的名声给玷污了。实在不值。

这封信对于汲汲功名利禄的人而言，真是一副清凉剂。路要靠自己走，文章要靠自己写。谁也代替不了谁。但千万不能把希望寄托在那些不可靠的功名、权贵、关系上面。世上的事情，有的当时看起来很大，过后一看则很小；也有的当时看起来很小，过后一看则很大。就看你怎么看了。

（《愚菴小集》卷 10）

原文：

足下之屡困于小试也。爱足下者，必以为唁。仆则闻之而喜。其唁足下者，必勉以败北之余，期于再举。如古之焚舟而济，厉气巡城者。乃仆之为足下而喜，则谓足下向跛踦于无用之帖括久矣，自今当尽举而焚弃之。益专力于诗文之大业，而后足下之学可成，名可立也。夫以足下之才，使得沈酣六籍，浸淫沐浴于骚赋诗歌及古文大家之学而大放厥辞，上可与古人方驾，下亦可抗颜近时作者之林。奈何与黄口小儿争工拙于么膺梦呓之语？此断断不可也。夫贲获之绝力，陆剸犀兕，水殪鲸鲵，而使之搏鼷鼠于穴中，则十不得一。足下之于小试，亦贲获搏鼠之类也。安望其必得乎？且也风趋北阮卜式[①]之近成林，士少季羔鸿都之门[②]如鹜。足下固夙负高世之志者，今若低头就之，汩汩欲

流随牒平近，尤断断不可也。昔卢擕[3]相国文章有首尾，韦岫[4]决其必贵近，王文肃以陈仲醇文有山林气，命之早褫襕襥。今足下之文，纵为韦岫所赏，吾犹愿其处而为陈仲醇，不愿其出而为卢相国也。昨又闻足下将有燕京之游，夫辇毂之地，五方辐辏，金张族处。自非上书金马，谒选天曹，士人鲜或托足焉。足下皇皇然，策蹇而往，将以何为乎？如以为索米长安，则文通半顷之田，士衡三间之屋，足下故自不乏。如将扫齐相之门，候平津之邸，窃恐车如流水，未便校书。目眯黄沙，难求講肄。素衣点于埃尘，白璧轻于求衒，又断断不可也。凡此三不可者，皆俗子之所效爱勉于足下，而仆乃坚持之诚。以足下高览卓识，当求自近于古人所相期者甚大，慎勿狥俗子之爱勉，令仆之转喜而为唁也。某再拜。

注释：

①卜式：西汉武帝时人。以田畜为事。因见武帝连年征战匈奴，上书愿输财助边。后官拜史大夫。

②鸿都之门：即鸿都门。东汉时皇家藏书之所。《后汉书·儒林传上》："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

③卢擕：唐朝后期人。官中书门下平章事。

④韦岫：唐朝人。有知人之鉴。卢擕举进士，陋甚。岫独谓其必大用。乃擕执政，岫始自泗州刺史擢福建观察使。

译文：

足下在科考中屡屡受到挫折。关心足下的人，必定认为不幸。我听说后却感到高兴。认为足下不幸的人，必定鼓励在失败之后，还有希望再次参加科考。就好像古代那些焚舟而济、厉气

巡城的人。但我为足下感到高兴的则是因为足下浸淫于无用之贴括的时间太长了，从此以后，应当把它全部烧掉、扔掉，专心致力于诗歌文章这种不朽的事业，然后足下的学问才能成熟，名声才能建立。凭着足下的才华，假使沉潜于《六经》，深入陶冶于骚赋诗歌以及古文大家的学问，而大放厥辞，上可与古人并驾齐驱，下也可立足于近代作者之林。何必与黄口小儿争巧拙于那些胡言乱语呢？这是万万不行的。贲获的过人力气，能够在陆地上杀死犀兕，在水里制服鲸鲵，如果叫他去洞穴中去捕捉鼷鼠，那么，抓十次也抓不住一只。足下之于小小的科考，也就如同贲获去捕捉老鼠之类的东西。怎能指望你肯定会成功呢？况且，风趋北阮卜式之进成林，士少季羔鸿都之门如骛。足下向来怀有远大志向，现在如果低头俯就，像那些流俗之辈随大流，这是万万不行的。从前卢携文章有头有尾，韦岫预测他必定会飞黄腾达；王文肃认为陈仲醇文章有山林气味，断言他早晚归隐。现在足下的文章，纵然为韦岫所赏识，我宁愿你像陈仲醇那样隐居，而不希望你像卢相国那样做官。昨天又听说足下将要到燕京去。华盖之地，五方云集，金张族处。如果不上书朝廷，谒选权门，读书人很少能够有站住脚的。足下匆匆忙忙，策蹇而往，将打算怎么办呢？如果是为了到长安混饭吃，那么，有文通的半顷田地，士衡的三间房屋，足下完全可以够用。如果为了到齐相之门去求官，到平津的官邸去谋职，我认为车水马龙，是不便于校书的。目眯黄沙，难求讲肄。洁净的衣服为灰尘所玷污，纯洁的玉石为求衒所轻视，这是万万不行的。凡这三不可的，都是俗人们之所以要求足下，而我坚决反对的。凭着足下高见卓识，应当像古人那样有一种远大的志向，切莫拘泥于俗人的眼光，让我由欢喜而变为悲哀。某再拜。

与曹秋岳书

傅山

题解：

这封信是康熙二十年（1681年）傅山因介绍僧人圆璧前往借书版而写给曹秋岳的。

傅山（1607—1684），字青主，山西阳曲县（今太原市）人，明末诸生，少聪颖，读书过目成诵，性格豪侠，爱打抱不平。明亡，变换服装，头戴黄冠，居住土室。清廷统治天下，始以黄冠出与客接，间有向他问学的，则说自己学本庄子、列子，不懂什么仁义道德。他四处行医，为一代良医。形同遁世，但志在济世，不屑为空言。

傅山在文学艺术上有很高成就，其诗歌迈越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其绘画讲性灵，讲神似，反对刻板点画。

傅山虽未出仕，但交游甚广，世俗之人不论，即便佛、道中人，也有很多朋友。他的思想染习佛、道，讲空灵法界，不滞著于外物，与他交接佛、道中友人是分不开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清廷初开博学鸿儒科，拉笼汉族知识分子入仕。作为一代大儒，傅山自在荐举之列，但他无心入仕。从他与曹秋岳的信可清楚看出这一点。另外，傅山向曹氏推荐圆璧，其意殷殷。圆璧与傅山交情很深，多次在傅山困难时相助。如今圆璧想搜罗书版，刻印一套书以便翻阅，傅山写信恳请曹氏提供方便，恳切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我们想到：人生在世，互相帮助，至为重要。友谊的根基是相知相识。

（《傅青主霜红龛全集》卷38《外编》）

原文：

以七十四岁老病将死之人，谬充博学之荐①，而地方官府即时起解。篮舆就道，出乖弄丑，累经部验，今幸放免，复卧板舁归②。从此以后，活一月不可知，一年不可知。先生闻之，定当大笑，乃复有此蒲轮别样③。因便敬候兴居，使知此况。

来僧圆璧，其人颇解读书。山出门时其敦逼狼狈④，不可告人，且病噎不食，璧为煮粥煎药，将护之情，不能已已！乃妄闻山之病死燕市⑤，复瓶钵来看。见山生归，欲复南游募书册，藏一部以其便于展阅，欲下智慧根子。山感此至谊，闻此板即在贵府阿兰若内⑥，愿先生悯此白学⑦，为之开缘。一册一函莫非佛事，此似亦易为力，纸笔贵贱，总难悬度，彼若至诚，或当如愿。载归之时，山若未死，当南向跪诵《金刚经》一卷⑧，以当报恩。枯木堂力疾草此，求恕不恭，寒温套语，不敢作诳。秋翁先生菩萨，傅山顿首顿首。

注释：

①博学：此指康熙十八年初试博学鸿儒科。

②舁：抬。

③蒲轮：古代纳贤，为示尊重，常以蒲草裹车轮，载贤士入京。后以蒲轮代称礼贤下士。

④敦逼：催促逼迫。

⑤燕市：春秋战国时燕国的国都，此处代称北方。

⑥阿兰若：梵语。义译为寂静处，或为无详地，指寺院。有时省作兰若。

⑦白学：僧徒服缁，称世俗为白，世俗之学为白学。

⑧《金刚经》：佛经名。全称为《金刚般若经》或《金刚般若

波罗蜜经》。

译文：

我以七十四岁老病将死之人，被人举荐为博学鸿儒，地方官府当时就簇拥起程。用竹篼抬，用车子推，就上了路。出乖露丑，累经衙署检验。如今幸运地被放免，又躺在板上被抬了回来。从此以后，能否活一月，自己不知道，能否活一年，也不知道。先生听说后，一是会大笑，竟然又有这种以蒲草裹车轮迎接贤士的事情。顺便问候生活起居，使你知道这件事。

僧人圆璧，是个颇善读书的人。我外出时，催促逼迫，狼狈不堪，其间辛苦，无法告知于人，且疾病在身，饭食不能下咽，圆璧为我煮粥煎药，护惜之情，无法一一说清！还听说谣传我病死在了北方，又持瓶托钵来看望我。看到我活着回来，便想再次南游，广泛征求图书书板，藏一部以使人们便于翻阅，想除掉智慧根子。我被他这种至情至义所感动，听说他所要的一部书板就在贵府寺院内，希望先生悯惜好学之士，为他提供方便。每册每函都是有关佛事的，这似乎也容易取得成功。纸张笔墨的贵贱，总是难以推测出来，他若有至诚之心，或许会如愿以偿。他载书归来的时候，我如果没有死，一定南向跪诵《金刚经》一卷，以当报恩。枯木堂中匆匆草此，不恭之处，敬求宽恕，问寒问暖的套话，不敢诳言。秋翁先生菩萨，傅山顿首顿首。

致云间同社诸子书

吴伟业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吴伟业写给云间同社成员的，祝贺大家相会，并引经据典对同社成员的才华加以赞赏。

吴伟业（1609—1672），清初诗人。字骏公，号梅村，太仓（今居江苏）人。师事张溥，为复社成员。明崇祯进士，官左庶子。入清后官国子祭酒。其诗多寓身世之感，也有些篇章揭露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榨取。早期作品风华绮丽，明亡后多激荡苍凉之音。尤善七律和七言歌行。《圆圆曲》、《楚两生行》世篇较有名。也工词曲书画。有《梅村家藏稿》等。

复社是明末江南士大夫组成的一个政治集团。神宗后期，政治腐败，社会矛盾激化。崇祯时，在农民起义的压力和清军进攻的威胁下，一部分江南士大夫继东林党而起，组织团体，主张改良政治，以谋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太仓人张溥和张采等合并江南的若干文社，称为复社。崇祯六年在苏州虎丘举行大会。南明弘光时曾受马士英、阮大铖等打击。清军南下，复社人物吴应箕、陈子龙等参加抗清，顺治九年复社被清廷取缔。

吴伟业在这封书信中，谈到了复社成员之间由于缺乏联系，而消息不通。并叙述自己也很长时间不与人往来，对世事变迁孤陋寡闻。接着，吴伟业对复社的代表人物的文学才华作了高度的评价。然后感慨万千地说“十年师友，两地人文。”但一想起往事，张茂先、陈元龙等人的音容笑貌便历历在目。这就好比，东汉虽然灭亡了，但人们仍然记得郑玄这位大学问家；也好比，南

梁虽然亡国了，但毕竟还有任昉这样的人才。所以，即使像袁粲、扬雄那样一辈子没有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但仅凭自己的学识才华，也足以使那些达官贵人肃然起敬。最后，吴伟业真诚地希望同社成员能够团结起来，同心同德，不要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争吵不休。因为这样既有伤和气，又使外人议论纷纷，说三道四。如果同社成员之间能够相互理解的话，流言蜚语就会不攻自破。所以，吴伟业表示，这是我最愿意听到的好消息。

这封信文笔极佳，是一篇优美的小品文。用典深奥，排比有力，很有文学价值。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作者在信中所抒发的那种超凡脱俗的政治远见。这对今天的知识分子也是一个鼓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知识分子应该把学问做到政治上去，通过对现实政治的批判，来推进民主政治的改革。

（《梅村集》卷 39）

原文：

伟业顿首：世事隔阔，书问缺，然猥辱嘉招，敦我朋好。集南皮[①]之冠盖，倾北海之樽罍，欣此良辱，幸陪末座。祇奈鄙人固陋，久谢知交。方凿坏而闭门，将离群而索处。岂可玷名品藻，滥迹追随？敢布短缄，聊抒积愫。夫张茂先名德至重，羽翼六经。陈元龙[②]才气无双，搜扬百代。十年师友，两地人文。坛坫斯存，典刑具在。汉室虽迁，犹识郑玄[③]之子弟；萧梁[④]已往，尚留任昉[⑤]之故人。学擅渊源，才经成就。即使门户凋零，有同袁粲[⑥]；身名隐约，不异扬雄。而华轂之彦，过白屋以下车；兰台[⑦]之英，见布衣而握手。道在是矣，又何疑焉？若夫旷代逸群，后来特达；少年遇乱，总角知名。仲宣[⑧]即才动中郎[⑨]，子瞻[⑩]且文齐永叔[⑪]。当与耆旧共推此生，庶几声华总归。吾辈焉能置璠玙[⑫]而弗气，弃骐骥而别乘哉？况乎器识乃人伦所重，而道义则友分。宜先今有才具，通明风裁，朗扳方腾，茂实雅负重

名，而能后己先人，推贤乐善。黄叔度汪洋莫及，庶几近之。乐彦辅恬雅不群，于今复见。于是积学通儒，高才贵胄，共相钦挹，咸许襟期。慨自雅道陵迟，名流零落，何图今日再遇此贤。有大道为公之心，申久要不忘之谊。誓诸皦日，往莅骍旄，而其间有侨札班荆萧朱刎颈，偶因汝颖之辨，几致洛蜀之争，勉进苦言，同归旧好。夫意气总千秋共许，而才名均四海所知。初既彼此齐驱，今岂后先分歃。愿披悃愊，尽释猜嫌，从此同心，永消浮论。此伟业翘首而观，耸心而听者也。诸君子以二陆名邦，三江重望。远则野王读书之处，遗迹风流；近则海叟避迹之乡，名贤唱和。主持大雅，奖识同人。结集篇章，勒成卷轴。九峰之月观风亭，赏心乐事；三泖之莼羹鲈脍，旨酒嘉宾。真升平之胜集，江左之巨观矣。伟业因风溯德，临纸怀人。书不尽言，可胜翘企。

注释：

①南皮：曹丕《与吴质书》云："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此处喻指吴氏同云间同社诸子之诗文唱和往来。

②陈元龙：清康熙时人。工书。编《赋汇》。授文渊阁大学士。

③郑玄：东汉末人。今、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遍注群经。著述甚多。

④萧梁：即指梁武帝萧衍建立的梁朝。

⑤任昉：南朝梁时人。善诗文。藏书万余卷。有著作《地记》等四百卷。

⑥袁粲：南朝宋时人。好学有清才。官至尚书令。著《妙德先生传》。

⑦兰台：东汉时的皇家图书馆。

⑧仲宣：王粲，字仲宣，东汉末人。"建安七子"之一。与

曹植并称“曹王”。有“七哀诗”等作品。

⑨中郎：即徐干。“建安七子”之一。官五官中郎将文学。著有《中论》。

⑩子瞻：苏轼，字子瞻。北宋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多才多艺。诗、词、文、字、画均为一流。作品甚多。

⑪永叔：欧阳修，字永叔。“唐宋八大家”之一。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

⑫璠玙：亦作“玙璠”。两种美玉。

译文：

伟业顿首：世上的事难以把握，书信又常常不通。但承蒙你们看得起我，把朋友们召集起来。汇集了南皮一般的名流，注满了北海那里的酒杯。荣幸地受到邀请，来叨陪末座。只是因为我这个人素来疏于礼节，和那些朋友们早就不来往了，闭门不出，离群索居。怎么能玷污那些名人的招牌，附庸风雅呢？我只能写下一封短信，以表情怀。张茂先德高望重，精通《六经》；陈元龙才气过人，名扬四海。十年师友，两地人文。过去的东西依然如故，音容笑貌更是记忆犹新。汉室虽然灭亡，仍然可以认识郑玄的子弟；萧梁虽然过去，但还保存有任昉的家人。学问在于渊远流长，才能有所作为。即使是门户败落，就如袁粲一般；即使是默默无闻，就如同扬雄那样。但是，那些有学问的权贵，经过读书人的房子还要下车；那些朝廷里的清流，见了不做官的读书人还要握手。这就是道德人心所在，又有什么可怀疑的呢？那些旷世不群之才，后来居上的才子，少年得志，年纪轻轻就出了名。仲宣的才气使中郎感到惊讶，子瞻的文章同永叔相媲美。应当与前辈名人一起推荐这个人，这样才差不多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我这样的人怎么能扔掉璠玙而不珍视它，舍弃骐骥而去骑别的马呢？何况器识是人们都看重的，而道义则因义而宜。宜先才

华横溢，见识超人，朗板方腾。茂实名气很大，但却能先人后己，礼贤下士。黄叔度汪洋莫及，差不多可以比得上。乐彦辅恬静淡泊，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人。于是，博学通人，高才显达，共聚一堂，开怀畅谈。感叹世道衰微，名流零落，如何能够像今日这般躬逢贤达。存有大道为公的信念，保存永恒的友谊。誓诸皦日，往莅驿旌，如果这里面有侨札班荆、萧朱刎颈之类的人，偶尔因为汝款的辩言，而导致洛蜀那样的争论，不妨请苦心相劝，同归于好。意气由千秋来评价，才名由四海来认可。开始既然彼此都一样，现在岂能分出先后？希望去掉误会，扫除前嫌，从此之后，同心同德，永远消除无聊的争吵。这是我翘首以待、拭目以观的事情。各位君子都是来自于二陆名邦，三江重望。远处的有野王读书的场所，风流犹存；近处的有海叟避乱的地方，名流辈出。主持文坛，奖拔同仁。编集文章，纂成书籍。在九峰之月去观赏风亭，真是赏心乐事；用三泖之尊来烹调鲈脍，为的是旨酒嘉宾。实在是太平之日的优美文集，江南之地的宏伟篇章。我触景生情，睹物思人。书不尽言，聊表心怀。

与陈乾初论学书

黄宗羲

题解：

这封信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于康熙十五年（1676 年）就心性问题向好友陈确（字乾初）商榷而写给陈确的。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余姚人。明末清初伟大思想家。在明末清初的激烈变动中，黄宗羲反对封建腐朽势力，具有强烈民族意识。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名士，因多次上书揭露宦官头子魏忠贤一伙的罪恶而被害。崇祯即位后，黄宗羲袖藏长锥，入京颂冤。在刑部会讯阉党许显纯、崔应元时，黄宗羲出庭对簿，当场拔锥刺击许贼，震惊朝野。

清兵南下时，黄宗羲与其弟宗炎、宗会召募家乡子弟数百人组成义军，号称“世忠营”，后又与余姚县令王正中所部会合，共有三千余人。浙东沦陷后，黄宗羲率五百余兵转入四明山结寨固守。后又随鲁王辗转海上，任左副都御史。失败后回到家乡，多次遭清政府缉捕，历经艰险。

在清朝政府的统治稳定之后，黄宗羲拒绝出仕，专门从事讲学著书。康熙六年（1667年），他在绍兴恢复由其师刘宗周创办但中断二十余年的“证人书院”。康熙七年，又在鄞县举办“甬上证人书院”，与浙东学子讨论得失，争鸣学术，贯彻他的“治学必以六经为根柢”的主张。此后，他长期在语溪、海昌、会稽等地转辗讲学，其声名大振。他反对空谈误国，倡导学以经世致用的新学风。与顾炎武等人一起，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物。

陈确是黄宗羲的好友，也是当时思想界的著名人物。两人论学辨难，切磋学术，交谊至深。康熙十五年（1676 年），黄宗羲在看了陈确《性解》这本书后，充分肯定了陈确治学的独到见解，但就心性问题，他也提出了与陈确不同的看法。在人性本体是善还是仅仅表现于善的问题上，陈确认为人性是善的，但必须扩大充实、表露于外才能看到；黄宗羲则认为人性本善，不管是否扩大充实、表露于外，都是善的。在天理人欲的问题上，陈确强调理欲统一，人欲恰到好处就是天理；黄宗羲则认为人欲乃一人之私，与天理是矛盾的。在居敬存养问题上，陈确只承认居敬存养的功夫，而黄宗羲则认为居敬存养是功夫，但这功夫与本体之性善是统一的。总之，黄、陈二人观点有异，但都不失为有理有据之论。这封信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看问题要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决不可人云亦云；第二，争论问题须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态度平和。

（《黄宗羲全集》第十册《南雷诗文集·书类》）

原文：

自丙午奉教函丈以来[①]，不相闻问，盖十有一年矣。老兄病如故时，而弟流离迁播，即有病，亦不能安居也。况得专心于学问乎？唯先师之及门，凋谢将尽，存者既少，知其学者尤少，弟所属望者，恽仲昇与兄两人而已。此真绝续之会也。今岁因缘得至贵地，窃谓得拜床下，剧谭数日夜，以破索居之惑，而事与愿违，尚在有待。幸从令子敬之得见《性解》诸篇[②]，皆发其自得之言，绝无倚傍，绝无瞻顾，可谓理学中之别传矣。弟寻绎再三，其心之所安者，不以其异于先儒，而随声为一閧之辩；其心之所不安者，亦不敢苟为附和也。

老兄云：人性无不善，于扩充尽才后见之[③]，如五谷之性，不艺植，不耘耔，何以知其种之美？恻隐之心，仁之端也，虽

然，未可以为善也。从而继之，有恻隐、随有羞恶，有辞让、有是非之心焉，且无念非恻隐，无念非羞恶、辞让、是非，而时出靡穷焉，斯善矣。夫性之为善，合下如是[4]，到底如是，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增也，即不加扩充尽才，而非有所减也。不为尧存，不为桀亡[5]，到得牿亡之后，石火电光，未尝不露，才见其善，确不可移，故孟子以孺子入井呼尔蹴尔明之[6]，正为是也。若必扩充尽才，始见其善，不扩充尽才，未可为善，焉知不是荀子之性恶[7]，全凭矫揉之力，而后至于善乎？老兄虽言惟其为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无不善也。然亦可曰惟其为不善而无不能，此以知其性之有不善也。是老兄之言性善，反得半而失半矣。

老兄云：周子无欲之教[8]，不禅而禅，吾儒只言寡欲耳。人心本无所谓天理，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无天理之可言矣。老兄此言，从先师道心即人心之本心，义理之性即气质之本性，离气质无所谓性而来。然以之言气质言人心则可，以之言人欲则不可。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公共之物也。人欲是落在方所，一人之私也。天理人欲，正是相反，此盈则彼绌，彼盈则此绌。故寡之又寡，至于无欲，而后纯乎天理。若人心气质，恶可言寡耶？“枨也欲，焉得刚”[9]。子言之谓何[10]？“无欲故静”。孔安国注《论语》“仁者静”句[11]，不自濂溪始也[12]，以此而禅濂溪，濂溪不受也。必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则终身扰扰，不出世情，所见为天理者，恐是人欲之改头换面耳。

大抵老兄不喜言未发[13]，故于宋儒所言近于未发者，一切抹去，以为禅障，独于居敬存养，不黜为非。夫既离却未发，而为居敬存养，则所从事者当在发用处矣，于本源全体不加涵养之功也。老兄与伯绳书[14]，引朱子“初由察识端倪入[15]，久之无所得，终归涵养一路”，以证察识端倪之非。弟细观之，老兄之居敬存

养，正是朱子之察识端倪也。无乃自相矛盾乎？则知未发中和之体，不可谓之禅，而老兄之一切从事为立脚者，反是佛家作用见性之旨也。老兄之学，可谓安且成矣，弟之所言，未必有当，然以同门之谊，稍呈管见，当不与随声者一例拒之也。

注释：

①丙午：丙午年，康熙五年，公元 1666 年。函丈：古人称尊敬的人为函丈，后专用为弟子对老师的敬称。

②敬之：陈确长子陈翼，字敬之。《性解》：陈确的著作，分上下篇。

③扩充：扩大充实。

④合下：即时，当初。

⑤尧：传说中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以圣明贤良著称。桀：夏代国王，以暴虐荒淫著称。

⑥孟子……明之：此语见《孟子·公孙丑上》。

⑦荀子：战国时思想家，名况，主张性恶论，认定人性生来是恶的。

⑧周子：指周敦颐，宋代思想家。

⑨“枨也欲，焉得刚”：见《论语·公冶长》。枨：申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申党，孔子的学生。

⑩子：指孔子。

⑪孔安国：西汉人，字子国，孔子十一世孙。汉武帝时任谏大夫、侍中博士、临淮太守。曾整理《古文尚书》。

⑫濂溪：指周敦颐。其住室以故乡“濂溪”命名，人称濂溪先生。

⑬未发：理学名词，指性善尚未表现出来的状态，或称性善之本体。

⑭伯绳：刘伯绳，思想家刘宗周之子。

⑮朱子：指朱熹，南宋思想家。

译文：

自丙午年（1666年）聆听你的教诲以来，互相不通音信，已十一年了。你的病情还和从前一样，而兄弟我流离失所，就是有病，也不能有一个安定的居所。何况要专心致力于学问呢？先师的及门弟子，都快逝世完了，活着的已很少了，深察先师治学旨趣的就更少了。兄弟我寄希望最大的，只有恽仲昇和老兄你两个人了。这真是续绝学的机运会集到一起了。今年因有机缘到达贵地，私下思考要去拜访你，畅谈上几日几夜，以破除离群索居所带来的种种学问上的迷惑，但最终事与愿违，只好等待下次了。所幸从令子敬之处看到你所著《性解》各篇，所阐发的都是自己的独立见解，一点也没模仿，一点也没抄袭，可称得上是理学中的又一传续。我反复琢磨你的见解，凡所同意的，不因为和先儒不同而替先儒辩护，凡所不同意的，也不敢随声附合你的见解。

你说：人的本性是善的，在人们向外发展、展现才能后就能看到。就像五谷，不种植、不培土，怎么能知道种子的优良呢？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尽管如此，还不能认为是善，跟随而来的，有恻隐之心，接着有羞恶之心，有辞让、是非之心，况且有想法就有恻隐，有想法就有羞恶、辞让、是非，时时出现，没有穷尽，这就是善。性之为善，当初是这样，最后还是这样，扩大充实，不会有所增加，不扩大充实，也不会有所减少。不因尧而存在，不因桀而消亡，等到一切约束解除之后，情感似石火电光，没有不显露的，这时才看到所谓善，确是不可移异的。因此孟子用一个小孩子跌入井中呼叫，你听到后会吃惊不安来说明这个道理。如果一定扩大充实才看到善，不扩大充实就谈不上善，岂不是荀子所说的人性本来是恶的，全凭矫正之力，而后才能达

到善吗？你虽然说只有为善，然后才无所不能，由此可以知道人性无所不善；可是也可以说只有为不善，然后才无所不能，由此可以知道人性也有不善的。由此可知，你所说的性善，得失参半。

你说：周敦颐无欲的理论，是不入禅的禅，我们儒生只将其称为寡欲。人心本来没有所谓的天理，天理正是从人欲中才能发现。人欲恰到好处，就是天理。如从来没有人欲，也就无所谓天理可以讨论了。你的这番话，是从先师所谓道心就是人心的本心，义理之性就是气质之性，离开气质就无所谓性这些话来的。可是，用它讨论气质，讨论人心是可以的，用它讨论人欲就不可以了。气质人心是浑然交融在一起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人欲则是一个具体事物，是一个人的私心。天理和人欲，是一对矛盾，这个增长，那个就消减；那个增长，这个就消减。故而使人欲少之又少，以至于达到没有欲望，然后天理才能达到至纯。至于人心气质，怎么能说会减少呢？“申枨欲望太多，哪里能够刚毅不屈？”孔子说这话是指什么呢？“没有欲望才会宁静”，是孔安国注《论语》“仁者静”的句子。可知无欲的理论，不自周敦颐开始，说周敦颐入禅，周敦颐本人也不会接受。一定要从人欲的恰到好处去寻求天理，那么人终身为世情骚扰，跳不出世俗的圈子，所见到的称为天理的东西，恐怕就是人欲的改头换面罢了。

大概你不喜欢谈论性善之本体，故而将宋儒所谈话的接近于性善之本体的言论，全都抹去了，认为是入禅的障碍，独于居敬存养，不以为非。既然离开性善之本体，而从事居敬存养，那么所致力的修养应当在善的外在表现上，而于善的本源不再下涵养之功了。你在写给刘伯绳的信中，引用朱熹“开始时从察识端倪处进入，时间长了没有体会，最终还要回到涵养这条路上”，用来证明“察识端倪”不对。我经过仔细研究，你的居敬存养，正

是朱熹的察识端倪。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可以说性善中和之本体，不能称之为禅，而你从事一切修养的立足点，反倒是以佛家从外在表现以见本性为宗旨的。你的学问，可以说自成一家，我所说的话，未必确当，然而以同出一师的情谊，将我的一管之见呈上，应当不会和那些随声附和的人一样遭到拒绝吧。

答郁仪臣论学校书

陆世仪

题解：

这封信是陆世仪写给其好友郁仪臣的，信中主要阐述了他对学校重要性的认识。

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江苏太仓人。明末诸生，以道义自励。他不是一个独坐书斋的书生，而是抱有康平天下之志，因此他对于古今政治制度因革源流，兵农礼乐及乡国利害，莫不关心。明清易代之际，天下颇不太平，关外有满洲叩关，关内有农民起义，于是他又究心研究兵事战守、形势阵法。明朝灭亡后，他隐居不出，从事讲学，受业弟子甚众。当局屡次推荐他出仕，均力辞不就。

在探讨封建政治体制方面，陆世仪最重视封建、井田、学校这三项内容。他写给朋友的这封信，实际上就是一篇论述学校制度的论文，较为集中地讲述了自己对学校的认识。他将国家治理方式分为“儒治”和“吏治”，认为这种治理方式的变迁，则完全在于学校的兴废。他提倡道德治国，认为提高人们的道德素养，可以达到天下太平。如果我们抛弃陆世仪的一些迂腐言论不提，我们从这封信中还是可以受到很多启发的。学校教育是提高人们知识水平、道德修养的重要手段。国家要达到繁荣昌盛，学校就要向人们传授繁荣昌盛之道。教育是国家昌盛之本，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社会制度下，都是不容置疑的。

（《陆桴亭先生遗书》卷1）

原文：

儒治之所以不同于吏治者，只为一起手便不同。儒治从教化上做起，吏治从刑政上做起。秦以前儒治也，秦以后吏治也，其原本只在学校之兴废而已。今夫人有欲为梓匠轮舆者[①]，则其父兄必使之从游于梓匠轮舆之师，学为方员平直，而梓匠轮舆之师，亦俨然执规矩准绳而告之。告之以孰为方，孰为员，孰为平直，三年而学就，然后离师而游，执器而运，则梓匠轮舆沛如也。学校亦然，欲使之修己治人，则必使之学为修己治人之道。若何而为格致诚正，若何而为修齐治平，然后使之居得为之位，抒平昔之学。三代以上之天下[②]，所以久安而长治者，此道得也。

自秦夷灭先王学校之制，有欲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后世相沿，虽制度代有变更，究不出吏治二字，则亦行秦之法而已。至于三代之制，则未有能复之者，使天下何由而睹作人之盛哉？况于制度之变更，则尤有可慨者焉。秦制学法令者以吏为师，秦时法令不善耳，若法令而善，则学而后入政，犹孔子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也。至汉则不然，虽有学校而无学校之制，听天下自为学术，而上之人从而举用之。故汉治最杂，有用儒治者，有用黄老者[③]，有用申韩刑名者[④]，然彼虽未尝以学校教人，亦未尝以教法坏天下之人才也。晋唐以后，则又不然，治天下初未需文章词赋，而教人学作文章词赋。至于学成而售矣，则又使之委而弃之，而用吾所谓居官之法律。是学校之制，三代善教，秦不善教，汉不用教，而晋唐则又教坏人才而后用之也。呜呼亦可慨矣。然则欲复三代之治，非致力学校亦何以哉？所以弟向作《治通》，只推原《孟子》封建、井田、学校三大旨，而尤以学校为致治之本，正与仁兄同意。而仁兄《思治录》则又准今酌古，使末世亦无不可行，尤为近里著己，拭目速成，以慰饥渴。

注释：

①梓匠：木匠。

②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③黄老：指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时期，黄指黄帝，老指老子。汉初黄老之学特别盛行。其学说兼容并包，政治上则主张“无为而治”。

④申韩刑名：申，指申不害；韩，指韩非，都是先秦时期法家人物。其学说申韩并称，有时又申韩刑名并称，均指以法治国的法家。

译文：

以儒治国之所以不同于以吏治国，是因为从一开始便不相同。以儒治国从教化开始，以吏治国从刑法政令开始。秦以前是以儒治国，秦以后是以吏治国，而其根本原因则在于学校的兴废。如果有人想成为木匠，那么他的父亲、兄长一定会让他拜木匠为师，学习方圆平直等木匠技艺，而木匠师傅也俨然手持画圆画方测量画线的工具向他传授，告诉他什么是方，什么是圆，什么是平直。三年学成功，然后离开师傅，四处揽活，拿着工具制造车床桌椅，俨然一位熟练的木匠。学校也是这样，要使人们修己治人，则必须使人们学习修己治人之道。像什么是格物致知、诚心正意，什么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然后使人们身处在应该身处的位置，发挥平日所学。三代以上之天下，所以能长治久安，都是因为懂得这个道理。

秦废除先王的学校制度，有想学法令的，拜官吏为师。后世沿袭，尽管制度屡有变更，但都逃不出以吏治国，也不过是推行秦法而已。至于三代的制度，则没有能将其恢复的，使天下之人

又怎能目睹作人的盛况呢？何况制度的变更，又有更让人感慨的呢。秦朝规定想学法令的人拜官吏为老师，秦朝的法令不完善，如果法令完善，学了以后从事政治治理，就是像孔子所说的用政治来诱导人们，使用刑罚来整顿人们。到汉代就不同了，虽然有学校，但却没有学校制度，听任天下人自己从事学术，上面的人据此荐举任用。所以汉代的治理方式最为杂乱，有用儒学治国的，有用黄老学说治国的，有用申韩刑名学说治国的。汉朝虽然没有在学校中教育培养人才，但也没有用教令法术损害人才。晋唐以后，就又不同了。治天下并不需要文章词赋，却教人学作文章词赋。至于学成以后需要使用时，则又将其弃之一旁，而使用我们所说的居官的法律。由此看来，学校制度，三代善教育人，秦不善教育人，汉代不教育人，晋唐则将人教坏然后再使用。呜呼，也真是让人感叹呀！要想恢复三代之治，不致力于学校又能做什么呢？正因为此，我以前作《治通》，只推求《孟子》所讲的封邦建国、井田、学校三大旨意，而尤把学校当作达到天下大治的根本，这一点和仁兄您的思想正好一致。仁兄正在作的《思治录》，准今酌古，即使末世也能推行，尤其适于今日。拭目以待，盼望速速写成，一睹为快，以慰饥渴。

答颜孝嘉

张履祥

题解：

这封信是张履祥有感于交友、治学等问题而写给颜孝嘉的。

张履祥（1611—1674），字考夫，号念芝，学者称杨园先生，浙江桐乡人。自幼家境贫寒，但刻苦励学。1644年，至山阴（今浙江绍兴）谒见大学者刘念台，并拜刘为师。明清易代，他回乡隐居，以教授弟子为业。他是清初著名学问家，其学说开始时依归王阳明，后来阅读《近思录》，感到有许多体会，等到拜刘念台为师后，遂致力于程朱之学。他还重视研究经邦治国之学，经常让学生阅读唐代陆贽、宋代李纲的奏议。他还种了十余亩地，亲自播种，亲自收获，他认为“能勤于播种收获，就不会求人，不求人，就能立廉耻。知道耕种之艰难，就不会轻易求人，不轻易求人，就能兴礼让。有了廉耻和礼让，人心就会纯正，世道就会发达。”他重视实践，学术纯正，一生著作不断，有《愿学记》、《读易笔记》、《读史偶记》等。

张履祥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际，此时人心浮动，世道混乱，人人以求自保。张履祥在给朋友的信中并未涉及这些。他只是讲了交友和为学的问题，说明他能于动荡之中保持内心平静，不为世俗所扰。这封信所讲的道理是深刻的，简直可以置之座右，经常阅读。在交友方面，他谈到，交好朋友和坏朋友对人的一生影响很大。与君子相交，自己也会成为君子，与小人相交，自己也会变成小人，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人们必须学会择友而交。要亲君子、远小人。要选择那些温柔敦厚、严肃公正、好

学深思、直谏其过的君子做朋友，要尽力疏远那些凶残浅薄、屈膝谄媚、自暴自弃、导人以恶的小人。在为学方面，他谈到，年轻人可塑性很大，容易受外部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赌博酗酒之类的东西，人们尚能分辨其为恶，但作诗、写字、游玩、读杂书，人们却往往不能意识到它们的危害。这类东西容易使人丧失志向，对于真正的学问，会产生不良影响，这些，都是人们所应注意的。这些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人们来说，不正是所需要的吗？

（《杨园先生全集》卷13）

原文：

人不可以无友。非不可以无友也，不可以无贤友也。君子小人并生于天地之间，存乎人之自取而已。吾所取君子也，其过日闻，其德日进，其势不容于不君子。吾所取小人也，其过日多，其德日损，其势亦不容于不小人。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又曰，泛爱众而亲仁。又曰，毋友不知己者。示人之意可谓深切矣。自家人骨肉而外，无在不为朋友，交接之际，先须辨别君子小人。大都温而厚者必君子，残而薄者必小人；严正者必君子，柔媚者必小人；好学者必君子，暴弃者必小人；告我以过者必君子；导我以慝者必小人。辨之即审，与君子日亲，与小人日远，其于学也殆庶几矣。若清浊不易太分，必也尊贤而容众乎。《记》曰[①]，师无当于五伦[②]，五伦不得，弗亲，唯友亦然。

少年血气未定，无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奕饮酒之类，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诗写字耳目玩好，以及间杂书等，此于学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丧志，不可不远。先儒论举业曰，不患妨功，惟患夺志。夫举业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进身，尚犹苦其夺志，他可知矣。扬子云曰[③]，孝子爱日。陶士行曰[④]，大

禹尚惜寸阴[5]，吾人当惜分阴。龟山先生曰[6]，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独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

注释：

①《记》：《礼记》。

②五伦：封建时代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伦理关系为五伦。

③扬子云：指扬雄，字子云，西汉著名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

④陶士行：即陶侃，字士行（或作士衡），东晋时大臣。以勤慎吏职为人所称。

⑤大禹：传说中的古代人物，以治水著称。

⑥龟山先生：指杨时，字中立，号龟山，程颢的学生，宋代哲学家。

译文：

人不能够没有朋友，不是不能够没有朋友，而是不能够没有贤友。君子和小人同生于天地之间，完全看你结交的是些什么人。我结交的是君子，每天都会听到朋友指出自己的过错，道德学识每天都有进步提高，这种形势不容许你不成为君子。我结交的是小人，过错日日增多，道德学识天天损减，这种形势也不容许你不成为小人。孔子说，使自己有进步的是众多朋友，损害自己的也是众多朋友。又说，博爱大众，亲近有仁德的人。又说，不要和不了解自己的人交朋友。为人指点迷津，可谓用心良苦。除自家人、亲骨肉之外，就是交接朋友了。交朋友的时候，首先需要分辨君子和小人。一般来讲，温和而敦厚的一定是君子，凶残而浅薄的一定是小人；严肃正直的一定是君子，曲柔谄媚的一

定是小人；好学深思的一定是君子，自暴自弃的一定是小人；告诉我我的过错的一定是君子，引导我走向邪恶的一定是小人。将其清楚地分别开来，天天与君子亲近，与小人疏远，对于学业的进步也就差不多了。如果不想将清浊分得太清楚，一定也要尊崇贤人、容纳众人。《礼记》上说，师和五伦不能相当，五伦处理不好，不要和他亲近，交朋友也是这样。

年轻人的心血气性都还未定型，什么事情都能使其动心。赌博、下棋、饮酒这一类事情，明智一点的人都不会去做。至于作诗、写字、耳目玩好，以及读些乱七八糟的书，等等，这些都与学者的日常生活最为接近，往往免不了沉溺其中，这也足以使人丧志，不能不远离。先前的儒者在论述科举考试时说，不怕妨碍功名，就怕丧失志向。朝廷以科举考试的形式来取士，士人通过科举考试进身，尚且害怕丧失志向，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扬雄说，孝子热爱时光。陶士行说，大禹尚且珍惜每一寸光阴，我们应当珍惜每一分光阴。杨时说，今日不会再来了。由此想来，不仅有些事情不能去做，也没有时间去做。

与潘次耕札

顾炎武

题解：

这封信是顾炎武写给潘耒的。

顾炎武（1613—1682），初名绛，字忠清，自署蒋山佣，明亡改名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十四岁为诸生，与挚友归庄共入复社，耿介不混俗，有“归奇顾怪”之目。自十六岁至二十七岁，科场角逐，累试不第。崇祯十二年（1639年）秋闱被黜，遂弃绝科举帖括，退而读书，开始撰辑《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1644年明亡后，翌年南明弘光政权亦即灭亡。顾炎武出入戎行，参与抗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弃家北游。尔后二十余年间，频繁往来于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各地，饱经忧患，至死不仕清廷。

顾炎武一生，著述甚丰，除上面提到的两种外，最能代表其思想见解的是《日知录》三十二卷。顾炎武为学，博大通达，而归于崇实致用，他以一生的学术实践，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代汉学先路，拓展一代学术门径，成为一个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大师。

潘耒，字次耕，江苏吴县人，是顾炎武一生中唯一一名弟子。顾炎武和潘耒的通信很多，这封信的写作却有一个历史背景。康熙二年（1663年），湖州庄廷鑨史狱案发，牵连达70余人，潘耒的哥哥潘柽章及同郡友人吴炎因参与撰作《明史》，也被牵连，分别被杀。潘柽章、吴炎与顾炎武友善，二人被冤杀，顾炎武极为悲痛，曾写《书吴、潘二子事》、《赠潘节士柽章》、

《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以示纪念。潘柽章死后，潘耒数次投书顾炎武，要求拜顾氏为师，以承其学。顾炎武一生不收弟子，但念于与潘柽章的情谊，加上潘耒本人好学上进，所以最后才收下潘耒。潘耒亦不负师望，帮助校刻《日知录》，阐发乃师学说。

在这封信中，顾炎武向潘耒讲述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批评了自明以来学者治学为名为利的歪风，二是阐发了自己的为学宗旨，即治学要经邦治国，以生民为指归。并鼓励潘耒要立志高远，刻意自励，其后必有成就。

从这封信中，我们会得到很多启发。首先，要想取得为后人认可的成就，必须戒除为名为利之心。其二，无论做何种工作，必须以国计民生为第一要求，要提出利国利民的主张。其三，要立志高远，能从庸俗繁杂的现实生活中超然拔出，直追先人，结交志向高远的师友，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成功。

（《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余集》）

原文：

接手书，具感急难之诚，尤钦好学之笃。顾惟鄙劣，不足以裨助高深，故从游之示，未敢便诺。今以天下之大，而未有可以适道之人，如炎武者，使在宋、元之间，盖卑卑不足数，而当今之世，友今之人，则已似我者多，而过我者少。俗流失，世坏败，而至于无人如此，则平生一得之愚，亦安得不欲传之其人，而望后人之昌明其业者乎？

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不敢

上援孔、孟，且六代之末，犹有一文中子者[1]，读圣人之书，而惓惓以世之不治，民之无聊为亟。没身之后，唐太宗用其言以成贞观之治[2]，而房、杜诸公皆出于文中子之门[3]。虽其学未粹于程、朱[4]，要岂今人之可望哉。仰惟来旨，有不安于今人之为学者，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惟愿刻意自厉，身处于宋、元以上之人与为师友，而无狥乎耳目之所濡染者焉，则可必其有成矣。

注释：

①文中子：指王通，隋代著名思想家，死后，门人私谥为"文中子"。因生于北周，卒于隋，故信中说"六代之末"。

②贞观：唐太宗的年号。贞观年间，天下大治，政治清明，故称"贞观之治"。

③房、杜：指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在唐太宗时共掌朝政，订立各种典章制度，时人合称"房杜"。

④程、朱：指程颢、程颐、朱熹，均为宋代著名理学家。

译文：

接到来信，真切地感受到了你急于求学问难的诚心，尤其钦佩你好学的坚定意志。只是考虑到自己庸俗浅陋，无法给学识高深的人以补益，所以你表示要拜我为师，我没敢答应。如今以偌大一个天下，却没有一个可以谈古行道的人。比如我本人，假使生活在宋、元之间，则渺小而不足提，可是在当今世人之中，和我相类似的人很多，超过我的人却很少。习俗不纯，世风败坏，以至于如此没有人才。我平生所学得的种种心得体会，又怎么能不想传之其人，而期望后人昌明我的事业呢？

如今人们做学问的目的，仅仅是追求利而已，应制科举就是一大表现。人们进入做学问这个行列，从事诸如创作文辞、著书

立说等一切可以传之后世的事业，也只是追求名而已，明代三百余年间的文人都犯有这个毛病。君子做学问，不是仅仅为了利己，他们怀抱明道淑人之心，致力拨乱反正之事，察知天下大势为何会产生如今的流弊，思考奋起而拯救弊端的种种方法。我们不必援引孔子、孟子，六代之末，有一位叫王通的，读圣人之书，终日以天下不能大治、民众无以生计为怀。他去世之后，唐太宗运用他的言论，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盛事业，而房玄龄、杜如晦诸人也都是王通的门人。虽然王通的学说没有二程、朱熹精粹，但又岂止是今人所能望其项背的？承蒙你来信询问，我对今人治学心有不安，所以先告诉你我的志向以便树立做学问的根本。只希望你刻意自厉，和那些学问见解在宋元以上的人结为师友，而不要受周围庸俗之人的濡染，如能这样，一定会有所成就。

与人书

顾炎武

题解：

这封信是顾炎武写给一位朋友的。

顾炎武事迹已如上述。顾炎武在这封信中谈到学习的重要。人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都不能忘记学习，即便像孔子那样的圣人，还要好好学习，何况我们这些普通人？这封信虽然很短，但讲述的道理是深刻的。人要想使自己不断进步，那就必须不断学习。否则就会变成面墙之士，孤陋寡闻。我们可以用信中这句话自勉："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

（《亭林文集》卷 4）

原文：

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城，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其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①。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②，终无济于天下。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夫以孔子之圣，犹须好学，今人可不勉乎？

注释：

①庶几：差不多。

②子羔：人名，姓高名柴，字子羔。春秋时期卫国人，一说

齐国人。孔子弟子。曾做费郈宰。原宪：人名，字子思，又叫原思，春秋时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孔子弟子。传说蓬户褐衣蔬食，不减其乐。

译文：

人们学习、做学问，不天天进步就天天倒退。独自一人闭门读书，没有朋友可以质疑问难，就会孤陋寡闻，难以有所成就。长久住在一个地方，就会受到当地风习的薰染而自己还感觉不到。不幸而处在一个穷困偏远的小城，没有车马可以出行，还要博览群书，认真做学问，和古人争辩，以寻求其是非之所在，差不多也能获得十分之五、六。如果既不出门，又不读书，那就是面墙而立的人，虽然有子羔、原宪的贤才，最终也无利于天下。孔子说："有十户人家聚居的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忠信的人，但不会有像我这样好学的人。"以孔子这样的圣人，还必须好好学习，如今的人能不以此自勉吗？

与王于一

归庄

题解：

这封信写于顺治十年（1653年），内容是归庄介绍顾炎武谒见王于一。由于顾炎武其貌不扬，归庄怕王于一轻视他，故特别强调顾炎武的家风古谊和博学卓识。

归庄（1613—1673），一名祚明，字尔扎，又字玄恭，号恒轩。清初昆山（今属江苏）人。他是归有光的曾孙，又是明末复社成员。曾与顾炎武一同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一度改僧装亡命。善书画，能诗文。著作经后人辑成《归庄集》。

归庄在这封信中首先对万年少的去世表示了哀悼，并对万年少的才学作了高度评价。又说自己这里环境不好，没有朋友往来。接着，归庄对王于一的生活环境表示了赞美和羡慕之意。然后，把顾炎武的情况作了介绍。强调说顾炎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朋友情义，明古人道义，家风极好；二是特立独行，博古通今，有学问，有见识。非一般妄人、腐儒可比。最后，归庄为了使王于一能够对顾炎武有所重视，甚至说他把顾炎武看作是自己的老师。

这封信写的实在感人。感人之处在于，它指出了文人性格中的另一面事实。自古以来，文人相轻。但归庄在这封信里却证明，除了文人相轻之外，文人还能相重。当然，文人相重似乎不如文人相轻来得普遍和广泛。但无伦如何，文人相重的确是客观存在的。相较而言，文人相重仅仅在一少部分文人中存在着。也许，只有对那些真正的文人来说，彼此敬重才是可能的。所以，本质上，文人相重只有在一定层次上或较高层次上才能表现出

来。故而，它就更加难能可贵。相反，倒是那些越是平庸的文人，越是彼此相轻。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提示我们：文人是两极性的，要么是一个平庸的文人，要么是真正的文人。毫无疑问，该信的作者只能属于后者。这尤其值得今天那些自以为文人的人去学习和仿效。

（《归庄集》）

原文：

别后不一月，有一札附万年少[①]告讣之使，计已彻览[②]。此子既丧，淮浦遂无人矣[③]，又地处嚣尘，无高山茂林，可容屐齿[④]，终日闭门闷坐而已。视仁兄居广陵[⑤]佳丽地，日与骚人韵士临风赋诗，登高长啸，声与竹西[⑥]歌吹相杂，岂非天上人耶！

敝邑顾宁人[⑦]兄，德甫先生之孙也。兄间者[⑧]为我言，方杖苴[⑨]时，德甫先生不远二千里遣使致生刍[⑩]，有古君子之风。今宁人亦素车白马，走九百里，哭万年少。家风古谊，不堕益敦[⑪]。然此兄非止独行之士也，贯穿古今，指画天地，深心卓识[⑫]，弟所师事。

弟为言[⑬]仁兄谆谆问其家世，兹南还便道奉访。兄试略其寝貌[⑭]，听其高言，知弟之非妄许也。

注释：

①万年少：万寿祺，字年少。淮阴（今江苏淮阴）人。明亡不仕，常著僧服。善诗。

②彻览：阅读完毕。

③淮浦：即淮阴。无人，没有人才。

④屐齿：指登山。《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常著木屐，上山则去前齿，下山则去后齿。"

⑤广陵：扬州古称广陵。

⑥竹西：本指扬州城西北竹西亭（又名歌吹亭），此处借指扬州。

⑦顾宁人：顾炎武，字宁人，与归庄同乡。

⑧间者：近来。

⑨杖苴：即苴仗，古代居父母丧所用的竹杖。

⑩生刍：新割的草，后指吊丧的礼物。语出《后汉书·徐稚传》。

⑪不堕益敦：没有废弃，反而更深厚。

⑫指天画地：品评天地万物。深心卓识：思想深刻，识见独到。

⑬为言：为之言。归庄曾对顾炎武介绍王于一。

⑭略其寝貌：不以他的相貌丑陋为意。寝，丑陋。顾炎武相貌丑陋，且眇一目。故作者有此说。

译文：

我们分别不到一个月，有一信札附及万年少告讣的事，想已阅读完毕。此君亡后，淮阴也就没有人才了。加以地方杂乱，没有高山茂林可供登山，故终日闭户闲坐罢了。看仁兄居于广陵这样的佳丽之地，每日与文人骚客临风赋诗，登高长啸，声音与当地歌乐相交错。这难道不是像天上人一样快乐吗？

敝乡的顾炎武兄，乃德甫先生的孙子。兄近来曾对我说，家丧期间，德甫先生不远二千里遣人送礼致意，有古君子的风度。而今炎武也赶着素车白马，奔波九百里，哭祭万年少。顾家崇尚古风，这一家传不仅没有废弃，反而更加深厚。这位仁兄不仅仅是独行高士，而且学贯古今，品评天地万物，有真知卓见，弟奉其为老师。

弟曾对顾炎武介绍仁兄恳切询问其家世，准备南下时顺便拜访。兄可以不以他的相貌丑陋为意，听其高见，当会知道弟所言不虚啊。

与毛方伯论遗才

施闰章

题解：

这封信是施闰章就科举考试问题写给一位姓毛的地方官的。该信大约写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

施闰章（1618—1683），字尚白，一字屺云，号愚山，一号媿萝居士，又号蠖斋，晚号矩斋，安徽宣城人。施闰章少时，父母早殁，从塾师刘伯阳受业，并与东林人士交游，深获称赏。明清易代后，其为生计，于顺治三年应试中举，时29岁。之后多次任地方官，与方以智等人友善。施闰章为官廉洁谦守，特别务实，尤其重视文化事业的扶持。他本人在思想上、诗词创作及理论上，都有独特见解，是当时的一位恂恂儒者。

施闰章一生与科举考试有缘，顺治十三年（1656年）奉使视学山东，十七年（1660年）归里二十年（1663年）奉命为河南乡试主考，均掌一地科考大权。也正是因为此，他对科考的弊端认识深刻，对科考的好处也推崇备至。封建时代，科举考试是士子入仕进身的唯一途径，也是国家选拔人才的唯一渠道，虽然其间弊端丛生，但其重要作用也不可低估。顺治时期的科考，因国力匮乏，仕途拥堵，所以有减少录取人数，削除录遗之科等做法。对此，施闰章深为不满，他写信给一位姓毛的地方官，希望他能解决科场供给问题，使更多的士子能由科举这一途径进身，同时也为国家录用大批有用人才。该信从国家利益、士子个人前途两个方面考虑问题，深刻指出科举录取人数不可减少，情真意切，感动人心。由此我们看到，凡有利于国家选用人才的事情，

要多做、做好，相反，则要坚决抵制。唯其如此，国家才得昌盛繁荣。

（《学余堂文集》卷28）

原文：

乡试事迫矣[①]！闻道路口语，有截科举，罢遗才之说。私心惑焉。士子三年一大比[②]，录科之外例得网罗遗才[③]，所以广贤路、鼓士气也。今中式减半[④]，录科数议裁，诚非草野所敢争。乃欲截已录之数，罢垂久之例，窃恐士皆嚣然丧气，非盛世所宜有也。往者科岁两试，各录童子数十人。今童子既不得科入，又裁岁进三分之二，童子废书徙业者无算，既裁进取之额，复隘其闱试之路[⑤]，士之皓首读书何为也！

朝廷混一区宇，再行会试[⑥]，日以鼓进人才为念，其裁中式者，盖缘选途壅滞，以减为通。且谓国用不足，议省廪给也。故事科举有路费，入场有烛、有饮食，皆官办。明末渐减，至今惟录科正数存路费什一，余悉无有。然则即尽罢科举，无补于司农之仰屋也[⑦]。士子知军兴用匮，不敢复望供给。但南闱号房旧称七千有奇[⑧]，犹且添席舍、用筍舆，以补不足，其数近万。今无大费于官，而必欲虚号房之六七阻数千人登进之心，此必当路大贤所不忍为也。解之者曰：功令中式一名，限取科举三十名。中式既减，敢取盈科举乎？夫录科三十，中式一人之例，旧载全书，不自今始也。前此中式百余名，时止录科三千余人乎？宽以收之，严以取之，前辈有同心也。见在录科二等者，皆磨励以须，已取而复截之，其何以堪？《诗》有之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士之翘首闱试者，未必人人国桢，而怀瑾握瑜之士，尝接踵出其间，不若存其已录者，仍酌量录遗，宁约取毋废例令。诸生裹粮而入，上不费公帑，下不沮士气，亦何惜此闱棘尺寸之地，不使其甘心一试哉！

仆待罪齐鲁，录遗至再[⑨]，尚有拥舆号哭者，不得已覆取数十人，直指缪公[⑩]、方伯陈公[⑪]，信其无私，不以为滥，此仆之已事也，顷引嫌，不敢寓书学宪，故以告执事。夫司多士之进取者[⑫]，学宪也。司场屋之供给者[⑬]，方伯也。方伯不苦供给，即监临之直指公，亡不乐引其网罗，况学宪以多士为子弟者乎。惟公采择而力行之，存国家育才之典，昭当事爱士之心。幸不罪饶舌。

注释：

①乡试：科举时代，每三年各省集试子于省城，朝廷选派正副主考官主考，谓之乡试。中式者称举人。

②大比：乡试称大比。

③录科：清代对秀才举行科考，考在一等，二等及三等前十名者，得参加乡试。三等十名以下及因故未试之秀才与在籍监生、贡生等，可以再参加考试，谓之录科。其名列前茅者，也可参加乡试。

④中式：科举考试被录取称为中式。

⑤闱试：即科举考试。考场称闱。会试称春闱，乡试称秋闱。

⑥会试：明清时，凡乡试考中的举人，次年在京城再行考试，称会试。

⑦仰屋：举首望屋，形容冥思苦想之状。

⑧南闱：明清科举时，称顺天乡试为北闱，江南乡试为南闱。

⑨录遗：清代，凡科考未中举人者，可参加录科考试，录科未取及因故未参加者，可以参加录遗考试。

⑩直指：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官员。

⑪方伯：泛称地方长官为方伯。

⑫多士：众多士子。

⑬场屋：科举考试的场所。

译文：

乡试的事情非常紧迫呀！听小道消息流传，有删除科考人数、不再录用遗才等说法。我私下里感到迷惑不解。士子每三年举行一次乡试，录科之外照例要网罗遗才，目的是为了广开选贤之路、鼓舞士子进取之心。如今考中的人要减去一半，数次讨论裁掉录科，这不是普通百姓所敢争论的。至于想删截已经录取的人数，罢除长期以来的成例，我觉得恐怕士人都要哗然，垂头丧气，这不是盛世所应该有的啊。以往每年考两次，各录取年幼士子数十人，如今年幼士子不能通过科举进身，又裁去每年录取人数的三分之二，年幼士子放弃读书从事其他事业的数不胜数。一方面裁减录取名额，一方面又阻塞考试之路，士子们皓首读书为了什么呢！

朝廷统一全国，实行会试，每天都以鼓励人才出现为念。之所以裁减录取名额，原因是参加选仕的人很多，选拔人的渠道不通畅，故而想通过减少人数进行疏通。而且说国家财力不足，要讨论节省国家供给。过去科举考试，政府发给路费，进入考场有蜡烛、有饮食，都是政府供给。明朝末年，逐渐减少，至今只有录科正式录取的人才有路费的十分之一，其他全都没有。可是，即便把科举考试全都废除掉，也无补于主持农业的官员们因财力不足而焦灼不安的局面。士子们知道屡兴军事，国用匮乏，不敢再对国家供给抱希望。但南闱所设立的士子宿舍过去号称有七千多，而且还增添席制宿舍，使用竹编车舆，以补不足，数字接近一万。如今不用官府花多大费用，却想使十分之六七的士子宿舍空着，来挫杀数千士子登仕进身的热心，这是掌握权力的贤人所不忍心进行的事啊。解释这种情况的人说：法令规定被录取一

名，科考限取三十名。录取的既然减少了，科考又怎能取满呢？录科三十名，录取一名，过去的书里都有记载，并不始自今天。在此之前，录取了一百多名，难道当时录科只有三千多人吗？从宽收罗人才，从严录取他们，先人和我们的想法是相同的。那些被录为录科二等的，都是经过多年苦读，已被录取却又删除，他们怎么能承受得了？《诗经》中有这样的话："众多的士子威仪整齐，周文王治国天下安宁。"那些翘首盼望科场考试的人，未必人人都是国家栋梁，但有高贵品德和才能的士子，仍接连不断地从其中产生，不仅在已录取的人中有这样的人才，还酌量录取被遗漏的，宁可少取精取，也不废除例令。士子自带物资应试，在上不费国家任何财力，在下不挫伤士子们的进取之心，为何怜惜考场尺寸之地，而不让他们称心一试呢！

我视学山东，两次录遗，还有拦车号哭的，不得已又录取数十人，朝廷直接派往地方处理问题的缪公和地方官陈公，相信我不是出于私心，不以我的录取为滥，这是我过去的事，不久前引起嫌疑，不敢给主考官写信，故而告诉执事。掌握士子录取的，是考官；掌握考场供给的，是地方官。地方官不以供给为苦，朝廷派来处理事务的官员，没有一个不是乐于网罗人才的，何况考官又以士子为自己的学生呢。希望您有所选择，极力推行，使国家培英育才的制度保存下来，使当权者爱护士人的美意昭示于天下。希望不要怪罪我啰啰唆唆。

答孙生书

侯方域

题解：

这封信时间不详，内容是侯方域写给一位孙生的读书人，谈论文章之道，认为写文章贵在有“气”，而气的养成，又在多读书，不骄矜。并对孙生多加勉励。

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性情豪迈，为复社成员。他与方以智、冒襄、陈贞慧时称“四公子”。入清后，曾于顺治八年被迫应乡试，中副榜，因抑郁而死。为文有气势。著有《壮悔堂集》。

首先，侯方域借马作比喻，来说明作文章贵在养“气”。但这种“气”又非一般人不加磨练和修养的野气、俗气，而是一种文气、元气。这种气非一般人可以具有，更非一般人可以驾驭。它必须是具有特殊的精神和心灵才行。只有此种精神和心灵才能克服野气、俗气之软弱与粗俗。而要想获得这种精神和心灵，则别无它途，唯有多读书一法。但是，光是多读书也不能完全保证产生文章所需要的“气”，还必须以一种虔诚、谦虚的心态去认真读书才行。否则，就会过于浮躁，而无法深入到书的内容里面去仔细体会。这就是侯方域所说的既要懂得方法，又要有恒心。二者缺一不可。最后，侯方域称赞孙生，年轻有为，而且谦虚好学。并主张孙生多向古人学习，这样才能在文章上提高得更快。

这封书信实际是一篇谈论治学的好文章。作者认为，作文的道理和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多向古人学习，那么，不仅会在文章上有进步，而且在道德上也会有所提高。这个见解颇有道

理，值得现代人的重视。现代人偏重科学技术而忽视人文精神，偏重业务学习而忽略道德修养。这是不行的。必须纠正过来。侯方域这封信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壮悔堂集》）

原文：

域附白，孙生足下：比见文二首，益复奇岩有英气，甚喜！亦数欲有言以答足下之意，而自审无所得，又甚愧！

仆尝闻马有振鬣[1]长呼而万马皆喑者，其骏迈之气空之也。虽然，有天机[2]焉。若灭若没，放之不知其千里，息焉则止于闲；非是，则踢之啮之，且泛驾矣。吾宁知泛驾焉之果愈于凡群者耶？

此昔人之善言马，有不止于马者。仆以为文亦宜然。文之所贵者，气也。然必以神朴而思洁[3]者御之，斯无浮漫卤莽之失。此非多读书，未易见也。即多读书，而矜且负，亦不能见。倘识者所谓道力者耶？惟道为有力，足下勉矣。

足下方年少有余于力，而虚名无所得如仆，犹不惮数问，岂矜与负者哉！然则以其有求之于仆者，而益诚求之于古人，无患于文之不日进也。

呜呼！果年少有余于力，而又心不自满，以诚求之，其可为者将独文乎哉？足下殆自此远矣。

注释：

①振鬣：仰首。鬣，马的鬃毛。

②天机：天然的灵气。

③神朴而思洁：古朴的精神和纯净的心灵。

译文：

孙生足下：一见到两篇文章，更加奇瑰迭宕，勃勃有英气。真让人高兴！我本来有几句话想作为对你文章的答复，可自己思量又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只能感到惭愧！

我曾经听说，一匹马如果仰首嘶鸣，那么，一万匹马都会变得鸦雀无声。这是因为它的雄壮豪迈之气势把其它那些颓丧之气一扫而光的缘故。即便如此，其中也有其天然的机缘。如果不把它当成一回事，若有若无，让它奔跑时不知它能跑上千里，平时则把它关在马厩中。要么，又踢又咬，极不容易控制和驾驭。我怎能知道难以驾驭的马就一定比那些平平常常的马更好呢？

这些是从前那些善于相马的人说的话，但也不光局限于马。我认为写文章也是这样。文章之所以珍贵的地方，就在于气。但却必须凭借古朴的精神和洁净的心灵去驾驭它，这样才会克服浮躁粗俗的毛病。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勤于读书，就不能真正明白。即便读书很多，但却骄傲自满，也不能懂得（这个道理）。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修养和工夫吗？只有具备高超的修养，才能获得深厚的工夫。你可要努力啊。

你现在正当年轻有为之时，对于我这样一个徒有虚名的人，还肯移樽就教，这当然不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行为！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来向我请教的精神，去更加认真地向古人请教，还害怕文章不日渐进步吗？

呜呼！如果这般年富力强，才华出众，而又虚心上进，并不自满，以虔诚的心灵去向古人学习，那么，他将来的作为岂能单单局限于文章上面吗？足下的前程远大，不可限量啊！

寄钱牧斋书

柳如是

题解：

这封信是柳如是为规劝钱谦益不应降清事而写给他的。

柳如是（1618～1664），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又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靡芜君，吴江（今属江苏）人，一说嘉兴人。明末名妓，后为钱谦益妾。明亡时劝谦益自杀，不从。能诗画。有《戊寅草》、《柳如是诗》等。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常熟人。明万历进士。崇祯初官礼部侍郎。与温体仁争权失败，革职。弘光时谄事马士英，为礼部尚书。清兵南下，率先迎降，以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博览群书，诗文在当时甚负盛名，与吴伟业、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家有绛云楼，以藏书丰富著称。有《初学集》、《有学集》、《投笔集》，另编选有《列朝诗集》。

红颜薄命，自古而然。但有才女子更甚。作者形容自己的风尘生活，用"如梦幻泡影"味同嚼蜡来概括，极为允当。将那表面的歌舞繁花和骨子里的无聊厌烦都表现了出来。钱谦益脱她于风尘之中，又知音相赏，使她沉醉于"人世尚有此生欢乐"的情爱生活。

然不意河山巨变，明亡清立，钱氏迅速降清。对此，柳如是颇难赞同。她认为钱谦益"富贵已足，功业已高"，不应降清，而应"偕隐林泉，以娱晚景"，表现了她——一个弱女子在民族气节问题上比那些名公巨卿高尚得多的识见。

所谓巾帼不让须眉，在柳如是与钱谦益二人身上，可以得到

充分的证明。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古来才子佳妇，儿女英雄，遇合甚奇，终始不易。如司马相如之遇文君①，如红拂之归李靖②，心窃慕之。

自悲沦落，堕入平康③。每当花晨月夕，侑酒征歌之时，亦不鲜少年郎君，风流学士，绸缪缱绻，无尽无休。但是事过情移，便如梦幻泡影，故觉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之奢靡，食用之耗费，入不敷出，渐渐债负不赀，交游淡薄。故又觉一身躯壳以外，都是为累，几乎欲把八千烦恼丝割去，一意焚修，长斋事佛④。

自从相公辱临寒家，一见倾心，密谈尽夕。此夕恩情美满，盟誓如山，为有生以来所未有，遂又觉人世尚有此生欢乐。复蒙挥霍万金，始得委身，服伺朝夕。春宵苦短，冬日正长。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情事，十年如一日。

不意河山变迁，家国多难⑤。相公勤劳国家，日不暇给。奔走北上，跋涉风霜⑥。从此分手，独抱灯昏。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偕隐林泉，以娱晚景。江南春好，柳丝牵舫，湖镜开颜。相公徜徉于此间，亦得乐趣。妾虽不足比文君、红拂之才美，藉得追陪杖履，学朝云之侍东坡⑦，了此一生，愿斯足矣。

注释：

①司马相如之遇文君：《史记·司马相如传》载汉临邛大富商卓王孙女文君，寡居在家，好音。司马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同归成都。因家贫又返临邛，与相如卖

酒，卓王孙深以为耻，分财产与之，使回成都。

②红拂之归李靖：相传隋末李靖以布衣谒越国公杨素，杨侍婢罗列，中有一执红拂者，貌美，深情瞩目李靖。李归旅店，夜五更，红拂来投，两人相与奔归太原。

③平康：指妓院。唐代长安有平康坊，是教习乐伎的教坊所在，后用作妓院的代称。

④八千烦恼丝：指头发。

⑤此句指清兵入主中原。

⑥此句言钱谦益仕清事。

⑦朝云：宋苏东坡之妾，姓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轼贬惠州，云相随，后卒于惠州。

译文：

自古以来，才子佳人，儿女英雄，相遇合好甚为奇特，但善始善终却不容易。如司马相如遇见卓文君，如红拂投奔李靖，私心颇为羡慕他们。

令我悲伤的是，我因沦落堕入妓院。每当花好月圆、对酒欢歌的时候，也不乏少年郎君，及风流学士，情谊缠绵，无休无止。但是事过境迁，感情游移，便有似梦幻泡影，故觉得味同嚼蜡，情似春蚕。年复一年，因服饰的奢靡，食用的耗费，入不敷出，逐渐负债累累，交游淡薄。所以，我又觉得除了身体这具躯壳以外，都是累赘，几致于要把头发剪去，一意修行，天天食斋，事奉佛祖。

自从相公辱临寒门，我们一见钟情，密谈竟夜。这一夜恩情美满，山盟海誓，乃有生以来所没有的事，于是我又觉得活着竟有这样的乐事。又承蒙相公出巨款，我始得赎身相从，朝夕服侍。春宵苦短，冬日漫漫。冰雪情坚，芙蓉帐暖；海棠睡足，松柏耐寒。此中的情事，十年有如一日。

不曾想河山变幻，家国多有厄难。相公为国操劳，日理万机。北上奔波，披荆斩棘。我们就此分别，孤灯对眠。妾以为相公富贵已足，功业已高，正好隐居林泉，以娱晚年。江南春色正佳，柳丝牵动着船舫，湖水如镜，笑逐颜开。相公徜徉于此情此景之中，也是一大快事。妾在才能、相貌方面虽然难以与卓文君、红拂相提并论，但期望追随左右，效仿朝云侍从东坡旧事，了此一生，就心满意足了。

答黄九烟

尤侗

题解：

这封信时间不详，内容是尤侗写给一位叫黄九烟的朋友，对朋友之间的称呼作了有趣的评论，反映了尤侗对当时士大夫中拘谨迂腐习气所持的讥刺态度。

尤侗（1618—1704），清初文学家、戏曲家。字同人、展成，号悔菴、君斋、西堂老人。长洲（今江苏苏州）人。顺治拔贡，授永平推官，曾因鞭笞满族兵丁而被降职。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历官侍郎。工诗、词、骈文，好为诙谐游戏文字，词采华赡，时称才子。作有传奇、杂剧多种。有《尤西堂文集》。

尤侗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相待，尤其朋友之间更应如此。因为朋友之为朋友，在于彼此心灵之沟通和性情之相契，而不在于称呼之尊贵和语气之恭敬。所以，尤侗认为，朋友之间应该直呼其名，而不必拘泥于什么俗礼。尤侗举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二人为例，他说，杜甫直呼李白其名，李白也直呼杜甫其名。二人并不加避讳。李白对朋友汪伦也是直呼其名。所以，尤侗认为，只要是真正的朋友，不管是叫什么都可以，叫名也行，叫字也行，叫号也行。甚至把他称之为牛或马也是可以的。反过来，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就是称呼他为“先生”、“大人”，那也跟称呼他为“老奴”、“小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称呼完全是一个形式问题，它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关键在于双方的关系到了何种地步。尤侗还认为，人之为人，就在于直言不讳，敢说敢骂。什么都不敢说，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非，那还

算是人吗？最后，尤侗幽默地说，黄九烟直呼他名“尤侗”同李白呼“杜甫”以及杜甫呼“李白”都是一样的。而且，尤侗宣称，他非但不以为耻，反而以此为荣。

这封书信是一篇幽默生动的言情小品文。作者对当时社会的种种庸俗习气作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交友之道在于“诚”，而不在于“名”。只要有诚心，人皆可友；而徒有虚名，则为交友之大忌。这些道理虽然人人耳熟能详，但并非人人都能做到。特别是在今天的商品社会里，干什么都只认名而不认人。人人都想穿名牌、用名牌，人人都想当名人，但都没有几个人去打算以诚待人。这岂不是对人性的讽刺?！故而，仔细品读一下尤侗这篇书信，对于反省今之社会之庸俗流弊，不是没有裨益的。

（《尤西堂文集》）

原文：

辱赠扇头十绝，首云：“今朝喜得见尤侗”。见者无不怪之。仆解之曰：“白也诗无敌”[①]，杜甫诗也；“饭颗山头逢杜甫”[②]，李白诗也；下此则“不及汪伦送我情”[③]，旧人惟有何戡在”[④]，无不呼名者，又何怪也？

不特此也，人苟知己，则行之可，字之可，名之亦可；即呼之为牛，呼之为马，亦无不可。苟非知己，则称之为先生，直叱之为老奴耳；尊之为大人，犹骂之为小子耳。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则其人为何如人哉？

白之名甫，甫之名白，先生之名侗，一也。诚恐先生借仆名押韵耳；苟仆而可名，仆不朽矣。

注释：

①白也诗无敌：见杜甫《春日忆李白》。

②饭颗山头逢杜甫：见李白《嘲杜甫》。有人认为此诗不是李白所作。饭颗山，相传为唐代长安附近的山名。

③不及汪伦送我情：见李白《赠汪伦》。汪伦，李白友人。

④旧人惟有何戡在：见刘禹锡《与歌者何戡》。何戡，唐朝著名歌唱家。

译文：

承蒙你赠给我写在扇面上的十首绝句。第一首写道："今朝喜得见尤侗。"看见这首诗的人无不感到奇怪。我解释说："白也诗无敌"，是杜甫写的诗；"饭颗山头逢杜甫"，是李白写的诗。还有"不及汪伦送我情"、"旧人惟有何戡在"，无不都是直呼其名，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不仅如此，人如果是真正的知己，那么，按照排行叫也行，叫字也可以，叫名还可以。即便称之为牛，叫之为马，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果不是真正的朋友，那么，虽然称之为先生，也只是把他呵斥为老奴；虽然尊称为大人，就好比骂他为小子。至于不敢说行，也不敢说不行，总是什么都不敢说，那么，像这种人应该算是一种什么样的人呢？

李白叫杜甫的名，杜甫叫李白的名，先生叫我尤侗的名，都是一回事。只是恐怕你不过是要借用我的名字做写诗的韵脚（而不是故意直称其名）。如果能够直接叫我的名字，那我就名垂不朽了。

答友人书

吴 绮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吴绮写给一位朋友的，表达了对友人的思念，并对朋友近来所遭受的人生磨难和世态炎凉加以安慰和劝解，劝朋友不要与那般势利小人一般见识。

吴绮（1619—1694），字园次，号听翁。江都（今属江苏）人。五岁能诗，长益淹贯。顺治十一年拔贡生，以荐授秘书院中书舍人。后授浙江湖州府知府，多惠政，不畏强御，湖州人称为“三风太守”，谓“多风力、尚风节、饶风雅”也。未几罢归，贫无田宅，购废圃以居。有求诗文者，以花木润笔，因名其圃曰：“种字林”。曰读书坐卧其中，箪瓢屡空，泊如也。性坦荡，喜宾客。在湖州时，四方名流过从，赋诗达谦无虚日，所作诗词骈体合编为《林蕙堂全集》。诗才华富艳，词最有名，号曰“红豆词人”。又尝著《岭南风物记》。

吴绮在这封信中，首先回忆了他与友人从前的共同经历，称赞他们彼此为理想和道义所作出的不屈努力。并抒发了自己慷慨不平之气，颇有古代侠士之风度。比如，“剑能吐气，时用作歌；酒可消冤，频为就饮”。并用古人管子等典故来鼓励友人不要悲观失望，只要时来运转，有了机遇，不愁不能大显身手一番。并劝朋友不要把那些朝秦暮楚、见利忘义的小人放在眼里。所谓“田文食客，屡有盈虚”是也。相反，应该去可怜那些无耻之辈。因为像他们那样没有气节、没有廉耻，难道还不使人为之悲哀吗？

这封信简练而又含蓄，文笔极美，读起来朗朗上口，不乏振金落玉之声。尤其是信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蔑视世俗利禄之徒的豪气，更是使人回味再三。此信真当为今世之一针砭也。

（《林蕙堂全集》卷1）

原文：

令弟临茗伏承远讯，美人采葛，益厪遐思。见仲智而念伯仁，风期如睹。因惠连而询康乐，云谊时殷。但境犹共于三吴，情已睽于两地。江横衣带，茫茫未足言愁；山拟剑鋩，历历何堪割恨。忆昔南冠受谤，北寺忧谗。先生既无损于激昂，弟子亦共殷于匍匐。王咸[1]慕义，因救鲍以举幡；伟节持危，为抒陈而命驾。然而剑能吐气，时用作歌；酒可消冤，频为就饮。幸风雷之见异，致天日以为昭。邪正之辩既明，荣辱之关立转。夷吾[2]出槛仍拜上卿，杜牧[3]乞麾还分下郡。各缘国事以相縻，莫遂私情而获觏。王程千里，世态万端。每捧北雪之篇，益动南方之感。然而田文[4]食客，屡有盈虚；翟尉故人，尝分贵贱。所当处以大度，付以浮埃。正须矜其可怜，勿复视为足怪耳。悠悠之口，窃有所闻；荡荡之怀，谅无不可。共处患难之后，或无同异之殊，惟先生择而听焉。

注释：

①王咸：西汉末人。曾作为新莽大使出使匈奴。

②夷吾：即管子。春秋时齐国人。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位，成为“五霸”之首。

③杜牧：唐朝人。才高，善诗。有《樊川集》。

④田文：即孟尝君，战国时齐贵族。袭其父田婴的封爵，封于薛（山东滕县南），称薛公。被齐王任为相国，门下有

食客数千。

译文：

令弟临苕从远方来信，如同美人采葛，越发使人产生思念之情。看见仲智便想起了伯仁，历历在目。因为惠连而问及康乐，情义更深。虽然我们呆的地方都在三吴，但也分别在两处。江横衣带，茫茫不足以表达愁绪，山拟剑铓，历历何能割断愤慨之气。回忆从前在南边受到诽谤，在北边受到谗言。先生既不减于激昂之情，弟子也不甘落后。王咸仰慕道义，故而救鲍以举幡；伟节临危不惧，为抒陈而请命。然而，剑能开口，可以时常用来慷慨当歌；酒可去愁，可以经常开怀痛饮。幸而风雷显出异象，故而上天为之昭雪。既然明辨了邪恶与正义之分，荣耀与耻辱的关系立刻扭转过来。夷吾从监牢出来还能被拜为上卿之位，杜牧讨好上司仍然被贬派到下郡之地。这是因为国家大事相互制约，千万不能凭私人关系而获得重用。为了王事而奔波在千里之外，看遍了变化万千的世态炎凉。每当捧读描写北方风雪的诗篇，便更加触动了怀念南方景色的情感。然而，田文门下的食客，经常有多有少；翟尉的老朋友，也曾经分出高低贵贱。应该做的只是宽宏大量，超然物外。只需对此持以同情仁厚之心，千万不要大惊小怪。众人之口，什么话都有；宽广的胸怀，什么事都能容下。一同经历过患难之后，或许可能再没有什么不同之处。还望先生能部分地听一听我说的这些话。

丙寅岁寄弟侄

王夫之

题解：

这封信是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王夫之为处世为人之道写给其弟侄的家书。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薑斋，湖南衡阳人。晚年居衡阳的石船山，学者称船山先生。明亡，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到桂林依瞿式耜，旋桂林复陷，式耜殉难，乃决心隐遁。展转湘西以及郴、永、莲、邵间，窜入瑶洞，伏处深山，而刻著研究，勤恳著述者垂四十年。

王夫之在政治上主张统一，反对分裂，这是他的进步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认为，秦始皇完成中国统一是一大历史功绩，废分封置郡县的中央集权政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即客观规律所决定的。王夫之用历史是有规律的、发展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在封建时代是非常可贵的。

王夫之在政治上还主张改革，有着趋时更新的法后王思想，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规章制度，前代的制度不能适应后代的情况，必须根据当时的实际进行治理，表现了他厚今薄古，反对保守倒退的思想。

王夫之的学术成就很大，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都有所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主要贡献是在哲学上总结、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唯物主义。著作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通鉴论》、《张子正蒙注》等。

王夫之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一些唯心论，形而上学的观点，他反对明末农民起义，1643 年，张献忠曾邀请他参加起义军，被顽固拒绝。这些都是他的阶级地位和所处时代决定的。

王夫之曾自撰墓志铭，说“抱刘越石之孤忠，”“希张横渠之正学”，意思是他要像晋朝的刘越石（刘琨）一样立志恢复汉族地主阶级的统治，要像张横渠（张载）一样实事求是地作学问。这是一个符合实际的自我评价。

王夫之在这封家书中指出，小家也好，大家也好，人与人相处，应和睦团结，互相支持，而不是互相嫉妒，互相拆台。看到对方有不是，不妨当面批评，不要藏在心中，积成怨恨。

过分的谦虚是虚伪，过分的羡慕是嫉妒，真理向前迈一步，就变成谬误。人与人相处，要想长相和好，愈久愈坚，就必须坦荡为人，不可心存芥蒂，否则，日久必生怨愤。

（《船山全书》）

原文：

和睦之道，勿以言语之失，礼节之失，心生芥蒂。如有不是，何妨面责，慎勿藏于心，以积怨恨。天下甚大，天下人甚多，富似我者，贫似我者，弱似我者，千千万万，尚然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凌弱者，何况自己骨肉。有贫弱者，当生怜念，扶助安生；有富强者，当生欢喜心，吾家幸有此人撑持门户。譬如一人左眼生翳①，右眼方明，右眼岂欺左眼，以皮屑投其中乎？又如一人右手便利，左手风痹，左手岂妒忌右手，愿其同瘫痪乎？

注释：

①翳：此指眼球角膜病变后留下的疤痕。

译文：

人和人要想和睦相处，就不要因为言谈话语、礼节等有不当之处，而心生芥蒂。如有不合适的表现，何妨当面指责？千万不可藏于心中，积久成怨。天下很大，天下人也很多，像自己一样富有的，像自己一样贫寒的，像自己一样强大的，像自己一样弱小的，千千万万。我们所要推崇、提倡的是：弱者不可妒忌强者，强者不可欺凌弱者，更何况是自己骨肉至亲呢？看到贫弱的人，应当心生怜意，出手相助，以使他们能够生活下去；看到富强的人，应当心生欢喜，庆幸自己家中有人撑持门户，比如一个人左眼生有疤痕，右眼安好如初，难道右眼就可欺负左眼，用皮屑投入其中吗？再比如一个人右手活动自如，而左手因风痹残废，难道左手就要妒忌右手，希望一同瘫痪吗？

答赵廷臣书

张煌言

题解：

这封信是张煌言在康熙三年（1664 年）写给清廷闽浙总督赵廷臣的拒降书。

张煌言（1620—1664），南明大臣，文学家，号苍水，浙江鄞县人。崇祯举人。弘光元年（1645 年），与钱肃乐等起兵抗清，举鲁王监国，据守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官至权兵部尚书。永历十三年（1659 年）与郑成功合兵，进入长江，围攻南京，他别率一军到芜湖，乘胜攻下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终因郑成功兵败，孤军无援而退。后鲁王政权覆灭，他又派人与荆襄十三家农民军联系抗清。至康熙三年（1664 年），因见大势已去，遂解散余部，隐居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不久被俘，遭杀害。所作诗文，慷慨激昂。有《张苍水集》。

张煌言写这封拒降信时，抗清形势已岌岌可危。当时，清政府为了肃清郑成功、张煌言等人在闽、浙的抗清势力，除集中大军加紧围剿外，还颁布了“迁海令”，妄图以此割断人民与郑、张的联系。清江南总督郎廷佐又下令抄没张家，将其妻董氏、儿子万祺押往镇江下狱。这时，煌言正在宁海县监门村重建军队，他得知此讯，更加坚定了抗清的意志和决心。

张煌言自度力量单薄，不能牵制清军，因此他力主郑成功回师闽南，建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团结、组织他们进行抗清斗争，联合作战。可是郑成功不久就在台湾病逝，紧接着一连串不幸的消息接踵而至，永历帝被俘杀，李定国又病死，南明最后

一个政权宣告覆亡。康熙元年（1662 年）九月，鲁王也去世。对此，张煌言并不气馁。他表示：宁进寸，毋退尺，宁玉碎，毋瓦全。

清廷招抚使王尔禄、闽浙总督赵廷臣利用张煌言的困难处境，极力开展招降，但为张煌言所力拒，其内容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奇情壮采，读之动人。在附诗中，他大义凛然地吟道："赢得孤军同硕果，也留正气在乾坤。"1664 年七月十七日夜半，清军用偷袭的方法，逮辅了煌言及其部下罗子水、杨冠玉等人于悬岙岛上。同年九月初七日（1664 年 10 月 25 日），煌言在杭州官苍口，面对凤凰山"挺立受刑"，英勇就义，终年 45 岁。

煌言就义后，他的友人张文嘉、万斯大等按着他的意愿，冒险将遗体埋葬在杭州南屏山北麓荔子峰下，与岳飞、于谦二墓相望。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张煌言面对难有作为的不利形势，面对清廷高官厚禄的再三诱降，不为所动，英勇赴难。监刑前他还高呼："大好河山，竟使沾染腥羶！"并作《绝命诗》一首：我年适五九，偏逢九月七。大厦已不支，成仁万事毕。"这种视死如归的高风亮节，必将千古留言，万古留芳，世人所推崇，真正可谓万世楷模。

（《张苍水集》第 1 编，《冰槎集》）

原文：

台翰俨颁[①]，殊深内讼[②]！岂仆一切愚忠，尚未足取信于天下耶[③]？

台下清朝佐命，仆则明室孤臣[④]，时地不同，志趣亦异。功名富贵，早等之浮云；成败利钝，且听之天命。宁为文文山，不为许仲平[⑤]！若为刘处士，何不为陆丞相[⑥]乎？倘云"桑梓涂

炭”，实为仆未解兵⑦；仆亦何难敛师⑧而去，但未知台下终能保障否乎？

区区之诚，言尽于此，间使说词⑨，请从此绝！

注释：

①台翰：指对方来信。俨颁：俨，庄重严肃；颁：颁布。

②讼：责备。内讼：指内心自责，意谓还未能把自己的耿耿忠心更加明白地昭示天下，以致于还会收到劝降信。

③“岂仆”句：难道我的耿耿忠心，还没使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吗？

④佐命：指辅助帝王创基立业的功臣。孤臣：孤忠之臣。

⑤文文山：文天祥，号文山，南宋民族英雄，抗元被俘，不屈而死。许仲平：许衡，字仲平，南宋学者，后仕元，官至中书左丞。

⑥刘处士：未详何人，当是宋元易代之一隐士。刘因入元屡辞征召，或近似。陆丞相：指南宋忠臣陆秀夫，元兵攻破厓山，负帝昺壮烈蹈海。

⑦桑梓：古代家宅边多植桑树和梓树。因以代指故乡。涂炭：涂，泥淖；炭，火。此指让家乡人民处于战乱困境。未解兵：没有放下武器。

⑧敛师：收兵。

⑨间使说词：间，更迭。不断派使臣来送劝降书。

译文：

您不断地庄重颁布招降书，使我更加深了自责！难道我的耿耿忠心，还没使天下人都深信不疑吗？

您是辅佐清室创基立业的功臣，我是明室的孤忠之臣，我们

的处境不同，志趣也自然有异。功名富贵，在我看来早已是天上的浮云；成败利蝕，且已付之上天。我宁可做文天祥这样的人，也不愿像许衡那样入仕新朝！如若像刘处士那样屡辞征召，为何不效仿陆秀夫，壮烈牺牲？倘若说我导致家乡人民处于战乱困境，实在是因为我没有放下武器；我又有什么难处收兵而去？只是不知您能否保障大家的安全。

区区此心，话已至此足矣。您此前不断地派人来送劝降书，以后请就此作罢。

示儿燕

孙技蔚

题解：

这封信是孙技蔚为求学事而写给儿子的。

孙技蔚（1620～1687），字豹人，明末三原（今属陕西）人。明亡后只身定居江都读书，清康熙年间举博学鸿词，授中书舍人，不久辞归。是清初重要诗人，有《溉堂集》。

这封信告诉儿子一个道理，藏书必须读书，若不读，便失去了藏书的意义。若为了读书，则不须“惜书”，看坏不妨再买。“旧窑”的比方十分贴切，说明贫家藏书不能像富贵人家那样仅仅装点斯文，而应该务实求知。

买书是为了获取知识，而不是为了收藏。如若担心看坏书而不去读，这是买椟还珠。为了装点门面而买书，结果到头来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溉堂集》）

原文：

初读古书，切莫惜书；惜书之甚，必至高阁①。便须动圈点②为是，看坏一本，不妨更买一本。盖惜书是有力之家藏书者所为，吾贫人未遑效此也。譬如茶杯饭碗，明知是旧窑③，当珍惜；然贫家止有此器，将忍渴忍饥作珍藏计乎？儿当知之。

注释：

①高阁：束之高阁，不去阅读。

②圈点：古书不断句，读书人须自行断句标点。精读者往往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圈示重点，点评文意。这是古人读书的基本功和传统方法。

③旧窑：指年代久远的珍贵古瓷。

译文：

起初阅读古书，切不可爱惜书籍；珍惜书太过，必然导致束之高阁，而不去阅读。所以，看书时必须加以圈点，点评文意，看坏一本后，不妨再买一本。一般说来，有钱的人家为了收藏书而去爱惜书籍，我们贫寒之家不必效仿。比如说茶杯饭碗，明知是年代久远的珍贵古瓷，难道能为了珍藏而去忍饥忍渴吗？孩子你要谨记在心啊！

与子侄

毛先舒

题解：

这封信是毛先舒为努力上进事而写给其子侄的。

毛先舒（1620～1688），清初文学家。字稚黄，又名骙，字驰黄，浙江钱塘（今杭州）人。明诸生，明亡后不求仕进。曾从事音韵学研究，也能诗文。与毛奇龄、毛际可齐名，时称“浙中三毛，文中三豪”。著有《思古堂集》、《音韵通指》、《潠书》、《诗辨坻》、《南曲正韵》等。

在这封信中，作者指出，一个人“年富力强”时如果“岁月虚过，才情浪掷”，到上了年纪，即使想“发愤有为”，也会力不从心，悔之晚矣。年轻人不要自恃年龄优势，须知“日月易逝”，时不我待！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一年之际在于春，一日之际在于晨。人的一生中，青春年少时是最可珍惜的时节，用“一寸光阴一寸金”来形容至为恰当。否则，到了白头时，将悔之晚矣！

（《思古堂集》）

原文：

年富力强，却涣散精神，肆应于外[①]，多事无益妨有益，将岁月虚过，才情浪掷，及至晓得收拾精神，近里着己时[②]，而年力向衰，途长日暮[③]，已不堪发愤有为矣。回而思之，真可痛哭！汝等虽在少年，日月易逝，斯言常为猛省。

注释：

①涣散精神，肆应于外：浪费精力，任意从事一些于身心无益的事情。

②收拾精神，近里着己时：集中精力，想自己做一番事业时。

③途长日暮：路途很遥远，而太阳快要落山了。喻指离事业成功还很远，而年岁已大。

译文：

人们在年富力强时，却浪费精力，任意从事一些于身心无益的事情，多事无益，却妨碍做有益的事，以致虚度岁月，浪费青春，等到打算集中精力，想做一番事业时，已是年老力衰，心力不济，成功却遥不可及，再发愤努力也来不及了。回首往事，令人痛心！你们虽然年龄尚幼，但日月易逝这句话，要时常铭记在心，自我反省。

答张梧书

毛奇龄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毛奇龄给张梧来信的回复，讲述自己近年来四处漂泊不定、年华虚度之痛苦。

毛奇龄（1623—1713），清朝经学家、文学家。字大可，号初晴，又以郡望称西河，浙江萧山人。康熙时，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治经史及音韵学，所撰《四书改错》，对朱熹《四书集注》有所抨击。能散文诗词，并从事诗词的理论批评，有《西河诗话、词话》。其他著作颇多，后人编为《西河合集》。

毛奇龄是一个有学问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但同时，他也是一个摇摆不定、没有独立思想的人。他是官学里面的代表人物。在康熙十八年首开的博学鸿词科中，毛奇龄也一头钻了进去，被网罗进明史馆中。毛奇龄就是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气节的庸人。他不仅没有民族气节，而且也没有学术气节。他一听到朱熹又要得势，马上亲自把自己写的《四书改错》的刻板给毁了。

尽管如此，从这封信来看，毛奇龄也有他自己的苦恼和烦闷。他向张梧诉说他近年来的郁郁之气，从北到南，四处乱跑，居无定所。不言而喻，这种寄人篱下的漂泊生涯对他的学术研究肯定会有较大影响。所以，他也渴望能尽早结束这流浪生活，回到家乡。毛奇龄甚至说“就连三春的红药也不能安慰我这将要离

别的思念，即使中夜白乌也不能阻止我回归故乡的决心”。正因为如此，毛奇龄对陶渊明和孔子的做法有所同情和理解。

这封信是一篇优美的抒情散文，看得出，作者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才能。作者对漂泊生涯的感叹，或许对今天久居于浮华都市中的现代人来说，还可能有着另外一番迥然不同的滋味和含义。

（《西河集》卷14）

原文：

月日信到，违离有年，东西南北未审所在。忽获良讯从长安来，且警且喜。向闻足下已去岭表，年前复时有异闻遥接耳际，两地回皇，四望纡郁。今审无恙矣。仆避人以来，曾走宣城[①]、信宿、良寓。足下岂知之。踰年令嗣君还山阴，复遭仆避人在令兄宅白鱼潭上。夫几年窜足，随地易辙，而必无他人居止可。因此虽途之穷，然亦验仆之所亲，必无有踰于贤伯仲者也。凡此者皆藏之中心，不能通谢。今奔走稍定，终以多所负累，难遽还里。汝南[②]金使君吾所依也，官舍爽垲有似郗公草堂之成，乃过裴冕[③]。但当俟使君迁去，便应南还。顾窃自量，以有用之年消磨殚矣。生世有限，会合无期，是用恫痛，乃反覆来讯，似汗漫天涯，瞻乌未定；室家流寓，棲鸡有待。令兄南士尚滞远道，以情而言，共罹斯苦。夫三春红药不能慰将离之恩，中夜白乌未足阻怀归之志。何则？梓桑之阴向晦，不能冥燕鳦之嘻。凉飚非所改也。是以陶令[④]在官，尚有微辞；仲尼适陈，不无三叹。往者仆尝学操雅，慕楚妃中道悲歌，比踪王豹。今且效庄舄之吟以自好，抚钟仪之操以长思。是岂舍大雅而嗜纤音，尚哀弹者辍豫畅哉？诚以志有所在，指不能违思之所臻，矢口有渐也。然则仆愿足下亦唯听越人之歌，操南人之言而已矣。来讯委曲，因附白答。卑言无当，更须嗣好。某再拜白。

注释：

①宣城：即今安徽宣城县。

②汝南：即今河南汝南县。

③裴冕：中唐时人。官至尚书右、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性豪侈。

④陶令：即陶渊明。晋朝时人。大诗人。曾弃官归隐。

译文：

收到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分别也有几年了。山南海北一直不知道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忽然听到一个好消息，说你从长安来，我既吃惊又高兴。一直听说足下早已去了岭表，年前又听到另外一种说法。两地悬隔，四望纡郁。现在看来你平安无事。我避开人世以来，曾到过宣城、信宿、良寓。足下怎么能够知道呢？第二年让你的公子返回山阴，又碰上我因避开世人而到了你哥哥的家里白鱼潭上。几年流窜，四处漂泊，只有到了没有其他人住的地方才能呆下来。因而，虽然路途穷困潦倒，但也会想起关心我的人，几乎没有超过你们兄弟的。所有这些都埋藏在我的心里，不能表示感谢。现在稍稍安定下来，但又因为麻烦太多，很难马上返回家乡。汝南金使君是我的知交，官舍爽垲就好似郗公建成的草堂，超过了裴冕。只须等到使君搬走，我就可以返回南方。我反省自己，大好时光都给浪费掉了。人生有限，相见无期。是用悯痛，只得反复来信询问，如同浪迹天涯，漂泊无定；举家流浪，栖息难觅。你哥哥南士还滞留在路途上，以情而言，和我遭受同样的艰苦。三春红药不能安慰将要离别的思念，中夜白乌也不能阻止回家的意志。为什么呢？梓桑之阴向晦，不能使燕鳦得到快乐。凉飔永远不能改变。所以，陶渊明做官，也有牢

骚；孔子到了陈国，更是感叹不已。以前我曾学习弹琴，仰慕楚妃中道悲歌，比踪王豹。现在又效仿庄舄的歌声来自我陶醉，弹奏钟仪的琴声来寄托思念。为什么要舍弃大雅而喜欢纤音，喜好悲哀的音乐而扔弃欢畅的曲子呢？这是因为心志所在，而手指不能违背思想要求的缘故。故兴趣渐渐改变了。然而，我则希望足下只听越人的歌曲，弹奏南人的曲子。来信问到许多情况，所以一一解答。我的话没什么价值，还需要好的来补充。某再拜白。

与周处士①书

汪　琬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是汪琬写给周处士的，对周处士的才学加以称赞，同时，又批评周处士不能把自己文章中的缺点一一指明出来。

汪琬（1624—1691），清初散文家。字苕文，号钝庵，长洲（今江苏吴县）人。顺治进士，曾任刑部郎中、户部主事等职。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编修。曾结庐居太湖尧峰山，时称尧峰先生。论文要求明于辞义，合乎经旨。有《钱翁类稿》、《尧峰文钞》等。

汪琬在信中首先通过韩圣秋、刘公勇两个人之口，对周处士的人品学识进行了称赞。汪琬说，韩、刘二人被士大夫公认为是“贤人”，而这两位“贤人”又都一齐称赞了周处士，由此可见周处士也是一位不凡的人物。所以，汪琬希望能和周处士结交。谁知结交之后，汪琬却深为不满。因为周处士并没有向他指出他文章中的毛病。汪琬接着说，三四年前，他凭着自己的心高气傲，专门研读韩愈、欧阳修这样的古文大家的作品，天天揣摸，一边学一边写，时间一长也积累了不少篇章。当心情舒畅时，也曾挥墨抒写，好像真有什么灵感和心得似的。谁知写成一看，却是颠三倒四、前后矛盾，不知所云。所以，汪琬认为自己文章中的毛病比较多。可周处士却不加指教，这使汪琬深感遗憾。汪琬认为，知己之交就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不应该虚情假意，用浮词相搪塞。他说，以前别人称赞他的文章好，他还半信半疑，

回家拿着韩愈、欧阳修的文章一读，才觉得那才是真正的好文章，“其才论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仪论之超卓雄伟”，简直不亚于《诗》、《书》等“六经”。故而知道，那些所谓理解他的人，其实并不真正理解他。所以，汪琬现在希望周处士能中肯地、坦率地指出他文章中的不足之处。

这封信写的极其感人，是一篇情景交融的好文章。作者对文学的虔诚追求真可以说是到了不耻下问的地步。凡是他认为水平比自己高的人，他都想方设法地结交，然后请人家对自己的作品提出批评。如果别人光说好听的，他反而还认为别人不是真正的知己。如此严格要求自已，实乃少见。相比之下，如今的人，凡是混上一个文凭，写上一、二篇文章，或当几回“主编”、“付主编”，就洋洋自得，不知自己是谁了，俨然以“某某名家”自居、自傲。呜呼，当今世上什么都缺，唯独“某某”之类的“名家”不缺。故而，汪琬此简，真可谓当今学界之一良药也。

（《尧峰文钞》卷32）

原文：

自足下初入京师，即闻韩武库圣秋娓娓口足下不置已。复遇刘刑部公勇于邸舍，其向仆称道者悉如武库而又加详焉。仆窃揣此两人者，士大夫皆曰贤人焉。其说必不虚且妄。故愿与足下相见。既见之后，饮酒谐笑，事事动人，而独未尝告仆以古学者之道，何也？仆于词章之学本无深解，三四年以前气盛志锐，好取韩欧阳[2]诸集而揣摩之，日复一日渐以成帙。当其快意之际，舒楮磨墨，四顾无人，亦若浩然自得于胸中者。及其既成而复视之，则后先舛互，首尾断续，而且为之忸怩而心且为之愧悔者，竟日夕不止。盖其可以示人者少矣。集中所存皆忸怩愧悔之余也，不自意为足下所窥见，是宜如何规切教诲之哉？今乃不然，反用浮词相推誉，非仆所望于足下也。虞仲翔有言：得一人知

己，死可不恨。仆交游衰少，然于吴门得计子甫草[3]，于京师得梁御史曰缉，今复得足下，而三不可谓之孤矣。前御史奖励仆过当，仆且信且疑，退而复取韩欧阳集，伏读而深思之，未尝不叹其才识之练达，意气之奔放，与夫议论之超卓雄伟。真有与《诗》《书》六艺相表里者。非后世能文章家所得望其肩项也。于是仆之忸怩愧悔乃不减于往时。益疑御史虽名为知仆，而其实犹未尽也。岂知之而不以告？告之而不以诚邪？抑有所深爱于仆而掩覆其短邪？此未易为足下言也。足下方以灏博之学、旷达之思迥出辈流，又能周旋燕赵齐鲁吴越之郊，所闻听见什伯于仆。仆之待足下言者，与梁御史、计子甫草无异。幸示规切教诲之言，勿更用浮词云云也。

注释：

①处士：古代一般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

②韩、欧阳：韩即韩愈，欧阳即欧阳修。二人皆古文大家。

③计子甫草：计东，字甫草，清初人，有文才，愤世嫉俗，议论风发，被人目为“狂生”。有《改亭集》。

译文：

自从足下刚来到京师，马上听说韩武库圣秋对足下称赞不已。又在邸舍遇到了刘刑部公勇，他向我称赞你的话和武库完全一样，只是更加详细了。我心里想：这两个人既然都被士大夫称作“贤人”，那么他们所说的话肯定不会是虚假的。故而，希望能见到足下。见到之后，饮酒作乐，无不痛快，但唯独没有告诉我古代学者的方法，这是为什么？我对于词章之学本来没有深刻的体会，三、四年以前心高气傲，喜欢取来韩、欧阳名家的文章来学习揣摸。日复一日，渐渐积累成册。每当心情畅快之时，便

展纸磨墨，旁若无人，就好像我胸中有一股浩然之气。等到写完以后再看，则发现前后矛盾，首尾不接，脸色非常尴尬，心里更是羞愧，这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可以拿出来让人看实在是太少了。文集中所保存的都是难堪和惭愧之余而剩下来的，没想到让足下所看到了。你应该如何来指教我呢？今天却不是这样，反而用客气的套话来称赞我，这不是我所希望从你那得到的。虞仲翔有句话："得到一个知己，死而无悔。"我结交的朋友不多，但在吴门结识了计子甫草，在京师结识了梁御史曰缉，今天又结识了足下，而有三个朋友就不能说是孤家寡人了。以前御史过分地赞扬我，我还半信半疑。回到家里拿取韩、欧阳文集，一边读一边认真地思考，没有不叹服他们的才识之高超、意气之奔放，以及议论之精辟确当，真是可以同《诗》、《书》六艺相经纬啊！远不是后代那些会写文章的人所能望其项背的。于是，我的不安与惭愧比较以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越发怀疑御史虽然表面上了解我，但实际上并不真正了解我。岂能知道而不告知于我？告诉我时为什么不说实话？难道是太爱护我了，故而有意来掩饰我的短处吗？这些又很难对足下说。足下刚刚以渊博的学识、非凡的思想超出流俗之辈，又能周游于燕、赵、齐、鲁、吴、越之地，所见所闻十倍于我。我对待足下，与对待梁御史、计子甫草一般无二。希望你能对我讲一些真话，千万不要用虚词浮言来应付我。

寄兄弟书

魏 禧

题解：

这封信是魏禧在康熙十六年（1677 年）写给其兄弟魏际瑞、魏礼的，目的在于劝导他们不可苟且度日。

魏禧，明朝天启四年甲子（1624 年）生，字叔子，又字冰叔，号裕斋，又号勺庭，江西宁都人。明末，魏禧弃却诸生身份，在宁都县西北、金精山十二峰之一的翠微峰上居住，因居所门前有池，他便将其住所命名为“勺庭”。魏禧兄际瑞、弟礼都有文名，时人号称宁都三魏。魏禧还与南昌的彭士望、林时益，同邑的李腾蛟，丘维屏、彭任、曾灿及兄际瑞、弟礼等九人，成立易堂学，倡导古文实学。这九人号称易堂九子，其中，魏禧才学尤高。康熙中叶，魏禧被推举为博学鸿词，但以病辞命，不久病逝。

康熙十五年（1676 年），魏禧避兵，客居于庐陵山中，书信就是这时写的。信中叙述了自己的山居生活，描述了山中清幽的自然景色，抒发了对亲人的思念、关注之情，也倾吐了自己的情操与志趣。家书将事、理、情、景融为一炉，而以情贯串其中，娓娓道来，饶有情趣。

人到暮年，思乡、思亲之心日炽。叶落归根，水流入海，这是一条自然规律。魏禧描述了客居的美丽风光，对于这样一个适合自己治学的环境，他仍然要决心回乡，这一辅衬更加映托出一颗游子心。

（《魏叔子集》）

原文：

别兄岁又八月，弟亦十月不相见，此间并八九月不得家信，未晓兄弟行止及家中人安善。念兄岭外尤兀兀[2]，世儆[3]归，过期不至，恐属有何事。夜来率[4]不天明醒，日晚望山，门阖[5]乃罢，久又自解譬[6]，客中一身，都应万虑不关也。出门无一事可说。日转穷山中辟[7]兵，所住僧屋，先后十有一处。然出门时，非意能有事。三年江闽蠭起[8]，百姓流离死转殆百万不尽数，吾高居翠微峰[9]，目不见奔窜事，何况困苦！勺庭[10]风日清佳，花竹池台，左右映带，读书游卧兼妻妾奴婢之奉，直天上人乐。又兄弟并方岖崎，禧独食饮被服，缓带蹁履[11]，恐薄福无足享受，故力疾触暑[12]，经营[13]他出，聊观时故，亦稍自劳苦，希同患之情[14]以消清福，折灾凶耳。初出家门，路颇难，笋舆绝处[15]，曾接日行九十里，趾堕胫骨跛[16]，是平生未贯也。乃后转徙颇有主人，今住庵老壮僧两个，多空室宏敞，门上左右山翼抱，微似勺庭。直[17]五、六百岁，翠屏横立，杉松千万，积翠色，日日[18]出云。有王生从学古文甚勤，日相向难，说奇赏处，惜儿辈不在。数年来此三月读书为多，亦健作文，庵在万山中，五里先后无人家，鸡鸣狗吠之声不至。王生时家去，两僧日黑上床，吾佣奴镫上[19]放头便睡，禧尝夜独坐至四五十刻[20]，一灯晃晃，万簌寂寥，高诵秦汉人文字，邃谷流泉，若相响答，时亦有虎叫鹿啼。曹子桓言：“年寿有时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21]禧性好文，又伤年纪摧颓，功名不立于天下，后顾孑然，终不有子孙。行践东阿[22]所叹，“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者。转思自效[23]，不为倦厌。

吾兄弟并以文章知名，弟家牵外事，即席不暖，兄好闲多缮[24]群碎书，禧谓宜以时进业也。人一日不学问，则膳写胸间宿

意，文不新鲜。此非必措舍事故[25]，剪碎缀调，用日所新得，但多读古人书，便自沉浸变换，发生不穷，如春时花叶，本着故树，入人眼目，辄增鲜妍。然禧亦自矢[26]：假我六年及七十四甲子[27]，便当绝笔不复作文，优游歌啸翠微之上，以待尽耳。此番归后，亦绝不远出。吾兄弟年迫五十、六十，诗曰：相彼雨雪，先集维霰[28]。死丧无日，无几相见。禧须白齿豁，霰亦已甚，揽镜自照，殊怀悽怆。近为萧小翮叙五十云：孟昉、小翮[29]兄弟二人，孟交游满天下，使天下圣贤豪杰更万辈，欲于其中择一人焉增之为三，则万万不可得，在吾兄弟岂复有四？此往非大不已，终当年岁连着接膝，以怡余年。子瞻[30]《狱中寄子由诗》曰："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来生事有无不可知，且勿草草放过今世也。

禧山居郁陶[31]，辄思一畅生平。出门观览，壮心顿消，故一意读书，且买石田[32]，耕耘吴会，稍足资生理，便为杜门计。波中在事人[33]，颇因缘文字[34]，遥相殷勤，特其风气托地泰大[35]，吾三十年无所屈于世，安能摄衣冠，自执名纸[36]见人乎？宁坐困穷山为侈泰[37]也。

在外旧病幸不作，儆[38]行后，头齿作二三日，寻愈右臂患处时作痛，或因过抄书。比来虽多白须，醒坐席上，性如强虫，好自摸捋，髀尻间[39]颇余肉不似他日削起，面色较恬皙，昼夜看书足自给，或者六十当不无也[40]。

少辈少壮，正好学问。东阿云："禽视鸟息，终于白首"，[41]此徒圈牢之养物。吾既名士，犹名为工为农，农不耒耜，工不利作器用，失其业矣。前还书相诫，谓渠辈恒进锐退速[42]，作止不常，要士于学须如餐饭，日有常数，假设因病绝粒，病止须次饮食[43]，未有因病废食，则岂可因事废学？况面墙倚壁，旋复过日[44]，侪辈谈谑了了昏旦[45]，甚不可也。

寓中竹笋大生，甚思家。乃今更变谋放船，如纔[46]拽脚下翠

微，东西所之，归蚤晚皆难逆说[47]，念之惘惘。兄弟顺时自爱，毋以客人为念。丁巳暮春日，庐陵[48]山中禧白，并示儿童及勺庭门人。

注释：

①兄弟：魏禧兄名际瑞，字善伯。弟名魏礼，字和公，均有文名。

②兀兀：用心、劳苦的样子。当时魏际瑞正在南赣总兵哲尔肯处任职。

③世傚：字昭士，魏礼的儿子。

④率：通常。

⑤阖：关闭。

⑥解譬：指自我宽然。

⑦辟：同“避”。

⑧指康熙十三年起江西、福建一带的农民战争。三年：从康熙十三年到作者写此家书时的康熙十六年春，为时约三年。蠭，“蜂”的异体字。蠭起，纷纷起来。

⑨翠微峰：山名，在江西宁都县西北；为金精山十二峰之一。

⑩勺庭：魏禧在翠微峰的住所门前有池，便将其住所命名为“勺庭”。

⑪缓带踊履：放宽衣服，靸着鞋子，从容自在的样子。踊，指鞋子未穿周正，曳之而行。

⑫力疾：竭力支撑着病体。触暑：接触暑气。

⑬经营：指筹划营谋。

⑭同患之情：指愿意和兄弟患难与共的感情。

⑮笋舆绝处：指无法乘坐竹舆的地方。

⑯趾：脚。胫骨：腿。这句形容行人的极度劳累。

⑰直：仅仅。

⑱前面的“日”字为名词，太阳。后面的“日”字为副词，每天。

⑲镫上：指天黑需要点灯的时候。镫，同“灯”。

⑳古时以漏壶滴水计时，壶上有刻度，昼夜为一百刻（也有一百二十刻者），四、五十刻，指夜半之时。

㉑魏文帝曹丕字子桓，引文见《典论·论文》。

㉒东阿：曹操的儿子曹植，曹植曾封于东阿，故名。引文见曹植《求自试表》。行践，即将成为。

㉓自效：用自身为他人效力。

㉔繙，“翻”的异体字。

㉕措舍：搁置、废置。事故：事情。

㉖自矢：自己发誓，矢，同“誓”。

㉗魏禧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生，此书清康熙十六年（1677年）作，如假其六年，则为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七十四甲子，据《续汉书·律历志》上记载，黄帝臣大挠作甲子，容成造历。黄帝可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左右在世，距康熙二十三年约四千四百年，约相当于七十四个甲子。

㉘霰：小冰粒。

㉙孟昉、小翮：作者的朋友萧孟昉、萧小翮。

㉚子瞻：宋代文学家苏轼，字子瞻。子由：苏轼的弟弟苏辙，字子由。

㉛郁陶：忧思郁积的样子。

㉜石田：贫瘠的田。

㉝在事人：有权势的人。

㉞这句话的意思是：经常因为写作的缘故。

㉟指风气骄倨傲慢。

㊱名纸：名片。

㊲侈泰：奢侈放纵。

㊳倣：作者的侄儿世倣。

㊴摸捋：抚摩。髀尻间：指臀部。

㊵这句话说，也许六十岁的人还应当有这样的精力。

㊶见曹植《求自试表》。原作"禽息鸟视。"

㊷渠辈：他们。进锐退速：学习缺乏恒心，忽冷忽热。

㊸次饮食：指逐渐恢复饮食。

㊹面墙倚壁：面对着、或依靠着墙壁，一无所见，比喻不学习。旋复过日：很快又过了一天。

㊺侪辈：同辈。谈谑：谈笑。谑，开玩笑。了了：终结。昏旦：早晚。

㊻纔：同"才"。

㊼蚤：同"早"。逆说：估计、预先猜度。

㊽庐陵：在今江西吉安县境。

译文：

我与兄长分别一年零八个月，弟弟也是十个月不曾见面，在此期间有八九个月没收到家书，不知道兄弟的行止及家中人是否安善。兄长在岭外辛劳尤加，令人思念，侄儿世倣归去，过期不至，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令人担心。我每天夜里天不明就醒了，天晚了仍在看山，直至闭门方止，时间长了乃又自我宽慰，孤身客居异地，千思万虑都于事无补。出门没有一事可以说的。时常在穷山中逃避战乱，所住的僧屋，先后有十一处之多。但出门时，仍不知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三年前，即康熙十三年（1674年），江西、福建的农民战争纷纷兴起，百姓流离失所，因此而死去的人在百万以上，我高居翠微峰，眼不见奔逃的事情，谈不上什么困苦。我所居的住所叫勺庭，那里风日清佳，

花竹池台，交相辉映，归来读书，游卧，兼有妻妾奴婢的侍奉，可以说是像居住在天堂中的人一样快乐。不过，兄长及弟弟方且辛苦奔忙，唯独我衣食无虞，从容自在，我担心这种福份不足享受，故竭力支撑着病体，冒着酷暑，出去筹划营谋，姑且观察时事变化，同时也稍稍劳苦，希望兄弟之间患难与共的感情可以消清福、折兵凶。出家门之初，道路颇为难行，到了无法乘坐竹舆的地方，曾经连续走了九十里，精疲力竭，这种辛苦劳顿是平生所未习惯的。其后我转赴颇有主人处，今住有庵老、壮僧两人，庵中空屋很多，宽敞亮堂，门的左右，两山合抱，和勺庭有点相似。离庵仅仅五六百步，翠绿的森林一字排列，杉松丛丛，形成了绿的海洋，太阳则每天从云中爬出。有一个姓王的书生，治学古文非常用力，我们每天相互切磋，说到精彩处，实在为孩子们不在场而深感婉惜。数年以来，相比较而论这三个月读书最多，也善作文。庵在万山深处五里以内没有人家，听不到鸡鸣狗吠的声音。王生时常回家，两位僧人天一黑就睡了，我与奴仆们在天黑后倒头便睡。我曾经独坐夜半时分，此时灯火晃动，万籁俱静，我于是高声诵读秦汉文章，山谷中的叮咚流泉，似乎是在应和，此时也不时有虎叫鹿啼声传来。曹丕说：“人的寿命是有尽头的，荣华欢乐止于其身，二者都有必至的常规期限，不如文章无有穷尽。”我生性好文，又感伤岁月不饶人，功不成名不就，回顾孑然一身，终不曾有子孙，曹植曾叹道：“坟土未干，而身名一并消失”，看来这就是我的结果了。转念用自身为他人效力，就不感厌倦了。

我们兄弟三人都以文章闻名，弟因外事纷扰，无闲暇之时，兄长闲来喜好翻阅琐碎闲书，我认为应该努力使学业日有长进啊！大凡人们一日不努力学习，在抒发心中意见时就会落于陈俗。这并非是必须搁置杂事，推敲词句，日日有新知，而是多读古人文章，自然会沉浸于变换之中，层出不穷，有如春来花叶，

附身故木，但在人们看来，往往颇多鲜妍。当然，我也曾发誓，给我六年时间，到第七十四甲子时，我将罢笔不再作文，优游歌啸于翠微峰上，以待寿终。此番归去后，也绝不再出远门。我们兄弟三人年龄快五六十岁了。诗道：雨雪生成，先集冰粒。死丧不日而至，没有几天相处的日子了。我目前齿落须白，命难长久，拥镜自视，伤感之情油然而生。近来我为萧小翩作五十寿叙道：萧孟昉、萧小翩兄弟二人，孟昉交游遍天下，如在天下圣贤豪杰更万辈之中，打算选择一人便增为兄弟三人，就万万不可得。我们兄弟三人难道会变成兄弟四人吗？过去的就算过去了，以后我们应年年住在一起，安享余年。苏轼在《狱中寄子由诗》中说："与君今世为兄弟，再结来生未了因"，来生的事有无不可知，但切勿轻率放过今生啊！

我居于山中，郁积忧思，往往想作一番事业。等到出门游览后，壮志顿然消去，所以一心读书，且买一些贫瘠的田地，耕耘于吴会之中，稍稍顾及生计，便为杜门之计。那些有权有势的人，经常因为写作的缘故，遥相殷勤，风气骄倨傲慢，我三十年都不屈身于世，怎能为衣食地位事自持名片求人呢？我宁愿坐困穷山之中奢侈放纵。

我只身在外，旧病侥幸不曾发作，世傚走后，头齿则发作了两三天，不久即见好，而右臂患处又不时隐隐作痛，或许是因为抄书过多的缘故吧。近来我白须虽然增多，而醒来坐在席上，性如强虫，好自我抚摩，臂部颇满，不像过去那样瘦削，面色比较恬皙，昼夜看书身体无恙，也许六十岁的人还应当有这样的精力。

晚辈年轻力壮，正好治学。曹植说："禽视鸟息，终于白首"。这只是圈牢中的动物所为。我们既然是名士，犹名为工为农，为农人不耕作，为工者不善作器具，将会失业啊！此前你们在复信中相告诫，说他们学习缺乏恒心，忽冷忽热。士子求学如

同吃饭，每天均有正常的数额，假如因病停食，病愈后逐渐恢复饮食，没有因为生病就不再吃饭了，那么，怎么可以因事而不再求学呢？何况面对着或依靠着墙壁，一无所见，很快又过了一天，同辈之间互相谈笑，终了岁月，这断乎不可。

寓中竹笋生长茂盛，思家心切。而今变更筹谋开船，如才找脚夫下翠微峰，东西所至，归期的早晚很难预料，想起此事令人惘然。兄长、弟弟要顺时自爱，不要挂念客居异乡的我。丁巳年(1677年)，暮春，庐陵山中致意，并及儿童及勺庭门人。

临入清宫致冒辟疆书

董　白

题解：

这是一封言情书，是董白写给冒辟疆的。

董白（1624~1651），字小宛，号青莲女史，明末秦淮名妓，金陵（今南京）人。后为如皋名士冒襄（字辟疆）妾，居艳月楼。清兵南下时，辗转于离乱之间九年，病死。辟疆作《影梅庵忆悟》以记其生平。有说她为清顺治帝宠妃，系由附会董鄂妃事而来。

冒襄（1611～1693）清初文学家。字辟疆，号巢民，如皋（今属江苏）人。冒起宗之子，明末副贡。授台州推宫，不赴。明亡后隐居不仕，屡次拒绝清官吏的荐举。能诗文，有《巢民诗集、文集》等。

这封信的真实性虽然值得怀疑，但它所表现的明末清初社会大动荡给广大民众带来的灾难，却是实实在在，屡见史书的。因此，可把它看作一篇具有史料价值的散文。文中的“董白”，可以看作乱离时代妇女的代表。全文以抒发对丈夫的思念为主线，穿插对相亲相爱的难忘岁月的追忆。同时，也记叙了“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王师在途，杀人盈野”的残酷现实，以及人民流离失所，“举家避难”、“潜匿荒村”的惨状。还表达了身为弱女子，不能自主命运的悲怨绝望之情。

人逢战乱年代，最为盼望的是和平与安宁。杜甫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诗中道：“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

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此即明证。董白在那样的年代里，思念丈夫，情深切切，十分自然。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董白再拜致公子左右：记得秦淮画坊，初侍歌筵。乍见目成[①]，旋又别去。诵李商隐“身无彩凤双飞翼”一诗[②]，此身已许公子矣。厥后河房卧病，一息仅存。窃思天上人间，断无相见之日。不意此时公子忽临，病中握手，尚疑是梦。自是始日有起色。然斯时人事变幻莫测，此心虽已有寄托，而此身犹不及相从。积虑丛思，仍难自释。幸有虞山老尚书与公子深交，慨然为之排难解纷，为之偿债脱籍，轻车遣从致之如皋[③]。至是方得被充下陈[④]，奉侍公子。从此抱衾裯子夙夜，偎冷暖者频年。携雨携云[⑤]，靡朝靡夕。犹忆午夜制茗，水绘题经[⑥]；甲字煎香，朴巢订谱[⑦]。凡此一颦一笑之间，皆为予取予求之地[⑧]。“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⑨]

比者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王师在途，杀人盈野。公子簪缨世胄[⑩]，自宜金玉其身，贱妾蒲柳残姿，岂惜葑菲下体[⑪]！自从举家避难，相携潜匿荒村，妾以步履艰难，遂至中途相失。寻寻觅觅，踽踽凉凉[⑫]。忽有游骑过前，目不转睛，视妾遽相问曰：“汝董小宛耶？”颔之，即下骑，以骑载妾而驱至一军次，报曰：“迎得董小宛至矣。”妾此时心中忐忑，不知所以。满拟膏其斧钺[⑬]，即亦不惧。讵意[⑭]不加强暴，载之后车，尤以为与公子有交，亦欣然就道。无何抵金陵，旋有媪婢数人相与迎迓入行馆。渐知有异，觅死不获。第以公子望重当时，贱妾虚名误赚，此亦有所由来也。为公子计，为国家计，皆不得轻子一死以塞责，转恐贻公子之戚。此白之一段深衷，谨披沥于公子之前。

伏念奉侍晨夕，备历春秋。正赋云鬟玉臂之情，忽惊云浮玉

坌之耗[15]。不料千古未来之奇祸，于妾一身当之。公子以妾为已死，妾期公于来生。嗟乎！文姬归汉，知已无期[16]；昭君和蕃，从兹不返矣[17]。临书哽咽，无泪可挥。伏惟珍爱，无以妾为念。

注释：

①乍见目成：一见钟情。目成，以目通意。

②李商隐：晚唐著名诗人。其《无题》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描写相爱中的男女心心相映。

③虞山老尚书：指钱谦益。钱谦益，字牧斋（今江苏常熟市西北）人。官至礼部尚书。脱藉：妓女脱离妓院从良。如皋，今江苏省如皋县。

④下陈：古代有钱有势者堂下陈放礼物、站列婢妾的地方。也借指姬妾。

⑤携云携雨：指男女欢合。

⑥水绘：冒襄的园名。经：指《尚书》、《诗经》等古代经典书籍。

⑦甲字：甲夜，初更时分。朴巢：冒襄之室名。订谱：指编订曲谱。

⑧予取予求：从我这里取求。《左传：僖公七年》：“唯我知女，女专利而不厌，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后指任意取求。

⑨“此情”二句：见李商隐《锦瑟》诗。

⑩簪缨：古代官吏的冠饰，因以喻显胄。世胄：犹世家、贵族的子孙。

⑪葑菲下体：《诗经·邶风·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葑：蔓菁。菲：芦菔。葑与菲的根叶均可食。下体：指根茎。这里用以比喻自己身世的低贱。

⑫踽踽：形容一个人走路孤零的样子。

⑬钺：古代兵器。形似板斧而大。

⑭讵意：岂料。

⑮“云鬓玉臂”句：云鬓：蓬松如云的发鬓。玉臂：女子胳臂的美称。云鬓玉臂之情：指夫妻相亲相爱的感情。云浮玉垒之耗：指战争的恶耗。杜甫《登楼》：“玉垒浮云变古今。”因见云变即知多难。

⑯文姬归汉：蔡琰，字文姬，著名学者蔡邕之女。博学多才，精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夫亡，归居母家。汉末大乱，为董卓部将所虏，后归属南匈奴左贤王，居十二年，生二子。至操当政，将她赎回，再嫁董祀。她写了著名的抒情长诗《悲愤诗》，叙述其坎坷悲伤的一生。

⑰昭君和蕃：汉朝与匈奴和好联姻，宫女王昭君前往，做了呼韩邪单于的瘀氏，号“宁胡阏氏”。

译文：

董白再拜致书公子左右：曾记否，秦淮河上画舫中，初次侍奉歌筵。一见钟情，忽又分手离别。吟诵着李商隐的“身无彩凤双飞翼”一诗，妾身已许于公子了。此后妾在秦淮房中卧病不起，生命垂危。心想这天上人间，断无相见之日。不料就在这时，公子忽然驾临，病中相见，妾还怀疑这是梦是真。自此以后，大病开始日有起色。但那时人事变幻莫测，妾心虽已有寄托，而还不能身随影从。千头万绪，仍难自释重负。幸亏与公子有深交的钱牧斋，慷慨为妾排难解纷，赎身从良，轻车简道来到如皋县。至此方得以身相从，侍奉公子。从那以后，长夜相倚，冷暖相偎经年。翻云覆雨，朝夕欢合。还记得午夜制茗，水绘园中题书经典；初更时分煎茶，朴巢室中编订曲谱。凡此等等的一颦一笑之中，都已至予取予求的地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近来形势天翻地覆，国破家亡，王师在行进途中，杀人盈野。公子乃官宦世家出身，自应保重身体；贱妾出身低微，蒲柳残姿怎可珍惜？自从举家避难，大家相携一起潜匿荒村，妾因步履艰难，以至中途失散。正值四处找寻，孤苦零仃之时，忽然有一些骑兵来到眼前，他们目不转眼地看着妾，遽然间问道："你是董小宛吗?"妾点头称是，他们随即下马，扶妾上马来到一军营，并报告称："迎得董小宛到了。"妾此时心中忐忑不安，不知如何是好。后下定决心，斧钺加身也不惧怕。岂料他们未加强暴，而是车载马随，妾还认为他们与公子有交情，也就欣然就道。不久到金陵，很快有几名婢女接妾到行馆就住。妾渐渐看出情况有异，寻死未成。因公子名重当时，贱妾虚名连累，这也是有来由的。为公子，也为国家，都不能以一死来搪塞，转而担心拖累公子。这是妾的苦衷，谨陈自公子面前。

心想早夕伺从，已历数年。正值夫妻相亲相爱之时，忽传战争惊耗。不料千古未有的奇祸，由妾一身来承受。公子认为妾已作古，妾期望与公子来生相见。啊！蔡文姬回归中原，心知遥遥无期；昭君出塞和蕃，从此未归。举笔就书，喉咙哽咽，而无泪可流。谨望自我珍重，不要挂念妾身。

与门人吴诩书

计　东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计东写给他学生吴诩的，教育吴诩对朋友的赞誉不能言过其实，应像庄子一样，既肯定朋友在学术上的长处，也不要掩盖朋友的缺点。

计东（1623~1675），清代文学家。字甫草，号改亭。少负奇才，自比王猛、马周。顺治十四年举人，后因故除名。于是出游四方，遍览山川名胜，以致客伏而死。有《改亭诗集》六卷、《文集》十六卷。

计东首先在书里对庄子和惠施之间的关系作了评论，认为二人之间的关系最是完美。计东说庄子一生的朋友就非常少，惠施可以说是庄子最好的朋友。庄子在他的书里，不止一处地提及惠子的事迹和思想。或叙述庄子与惠子之间的“学术”论辩，或叙述二人的相互往来。尽管如此，庄子在“天下篇”中却仍然毫不隐讳地对惠子的观点作了批评，而且篇幅还不少。计东说，按照后世俗人的眼光看，庄子可谓是有负于朋友之人。虽说不上是出卖朋友，但起码也是不忠实于朋友。因为中国人素来讲究为尊者谦、为亲者谏。庄子非但不为朋友谏，反而还揭朋友的丑。这岂非为人不端？但计东说，这只是俗人之见，并不能算是真懂得庄子和惠子。因为朋友是朋友，是非是是非，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做朋友在于性情，辨是非在于道理。如果因为是朋友，而不指出其谬误，岂不是误导世人，欺骗社会？如此行径，怎能取信于后人？这只能是庸人之所为。所以，计东希望他的学生能明白这个

道理，然后再去读他教师的著作。

这封信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就是交友之道与问学之道能否并行、兼容。当然，因人而宜。有的人能做到这一点，有的人就做不到这一点。作者认为庄子和惠子做到了这一点，但后人却大都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个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治学与交友也是有益的。要想处理好治学与交友之间的矛盾，就必须立足公心，以真理为重。所谓“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就是这个意思。用在交友上面，则是“吾敬吾友，但吾更敬真理”。今人可以此明鉴。

（《改亭文集》）

原文：

庄子与惠子之交最欢也[1]，庄子平生之交盖少也。惠子没，庄子乃寝谈[2]著书，欲以不死其友[3]也。故于内篇[4]第一篇两举惠子为《庄子》结之，于第五篇[5]亦然。其余或叙惠子为相而己往见之；或叙同游于濠梁[6]之上；或叙己妻死，而惠子吊之，责其不哭；或叙惠子死而己过其墓。凡己所与问答论辨之人，惠子外无几人焉。

乃其卒篇，则盛诋惠子之书，道舛驳而言不中，凡曲叙惠子怪诡之说，数百言不休，且以“惜乎，悲夫”三叹惠子[7]，以终三十三篇[8]之意。

若今人不得其解者，必以庄子毁其好友为负友[9]矣。呜呼！岂知庄子、惠子者哉？夫盛称其友，至溢其实，使不信于天下，不传于后世，此庸人之所为，非所为于長者也！

足下明于此义，则可以读尔师之《钝翁类稿》与《说铃》[10]矣。

注释：

①庄子，名周。宋（今河南商丘县东北）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著作有《庄子》。惠子：名施。宋人。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庄子》等先秦古籍中载有他言行的片断。

②寝谈：闭口不谈。寝：止，息。

③不死其友：意谓使其友永垂不朽。

④内篇：《庄子》分内、外、杂篇。今本《庄子》内篇七。第一篇《逍遥游》，篇末以惠子与庄子对话结束全文。

⑤第五篇：指《德充符》。此篇亦以惠子与庄子对话结束全文。以下七句所及内容，均见《庄子》外篇与杂篇。

⑥濠梁：护城河梁。

⑦"乃其卒篇"后数句：指《庄子》中的《天下篇》，此篇实为古代学术思想的总结。其中对惠子学说的介绍、批评占有很大篇幅。

⑧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书五十二篇。现存三十三篇。

⑨负友：背弃朋友。

⑩《钝翁类稿》、《说铃》：皆计东所作。

译文：

庄子与惠子交往非常亲密，庄子平生交际面很狭窄。惠子去世，庄子就闭口不谈著书，以图使其友永垂不朽。故在《庄子》内篇第一篇两次举惠子的话为该篇的结束语，第五篇也是如此。其余篇章或叙述惠子为相，自己前往相见；或叙说二人同游于护城河梁上；或叙述自己妻子死去，惠子前往吊唁，指责他不哭；

或叙述惠子去世，自己经过其坟墓。大凡与自己答问论辩的人，除惠子外没有几个人了。

《庄子》最后一篇，则大批惠子的书，道理舛异，言不合式，大凡贬斥惠子古怪诡异的言论，洋洋数百言，也不罢休，而且以“可惜啊，可悲啊”三叹惠子，从而结束了三十三篇。

今天的人不了解内情，认为庄子诋毁他的好友，是背弃朋友。唉！难道他们了解庄子、惠子吗？盛赞其朋友，夸大事实，使天下人不相信，不流传于后世。这是庸人所为，非長者所为。

足下明白此义，就可以读你的老师的《钝翁类稿》和《说铃》了。

答友论学书

汤　斌

题解：

这是清代理学家汤斌写给友人的一封信，收信人不详姓名。

汤斌（1627—1687），字孔伯，号潜庵，河南睢阳（今睢县）人。顺治辛卯进士，改庶吉士，授国史院检讨，参与修撰《明史》。他认为顺治初年明臣抗节致命之人，在《明史》中不能以叛逆称之，遭受弹劾，顺治帝特别安抚他，出为陕西潼关道。饥荒之年，发仓储贷民，流民渐归。调江西岭北道。后乞病养亲，跟随孙奇逢在河南辉县苏门山讲学，著弟子籍，同订《理学宗传》。后又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

汤斌一生性甘淡泊，居官不以丝毫扰民，夏天从集市上买苎麻建屋自居，春天地里生长野荠，采来食用。布衣粗食，一生不改。在学术上，他受孙奇逢影响较大，出入程朱、陆王之间。在为学上，他坚持独立自主之学，号召体察圣贤之本原心迹。清朝初年，统治者倾向于汉化，提倡学术，拉笼人心。作为汉人学者，有的抗节高蹈，有的举义反抗，那些望风顺从者大多为八股生徒，除高头讲章外更无学问。汤斌不是抗节举义的一类人，但也决不是腹俭空疏的八股生徒。他笃守程朱，也不薄陆王，身体力行，不尚空论。这在清初显宦中确实是佼佼者。

汤斌的这封信，是他回答友人之问而讲论自己治学体会的。信中讲述了自己治学的门径以及自己的切身体会。信虽不长，但句句据实道来，没有架空之论，有如一位长者在向人们讲述自己的种种感受，循循善诱，给我们的启示很多。其中有两点是我们

必须注意的：第一，读书学习要从根本上下功夫，对于前人的思想成果，决不能浮光掠影一扫而过，而要融会贯通，深刻体会。第二，吸收前人成果，决不能袭其皮毛，要深入其精髓，抓住其本质。注意到以上两点，我们的文化创新才会有意义。

（《汤潜庵集》卷上）

原文：

某少遭丧乱，学无师传。入仕与曹厚庵先生同直史馆①，得承指示，年少心粗，方留意词章，未能穷究根柢，泛滥先儒之说②，时悟时悔。静坐久之，觉喜、怒、哀、乐未发时，真与天地万物同体，日用之间，四端随时发见③，但存养功疏，故扩充无力。濂溪以来④，师友授受，原有真传秘旨，不从本原透彻，不从存养着力，将先儒真切指示之言都作影响浑过，何由融会贯通。近世功利词章之学，陷溺人心，不知天之所与我者何在，徒袭取先儒形貌，妄分畛域⑤，所言非所见，所见非所履，亦可怪也。某日事编摩，心血枯槁，遥企函丈⑥，恐终无缘面觌，为此生缺陷事，更望时惠德音，临风翘瞻。

注释：

①史馆：即明史馆。

②泛滥：水漫溢横流，此处指博览。

③四端：儒家称人所固有的四种德性，即恻隐、羞恶、辞让、是非。

④濂溪：指周敦颐，宋代哲学家。因用家乡之名濂溪命名书屋，故称濂溪先生，其学称濂学。

⑤畛域：界限，区别。

⑥函丈：尊重的人。

译文：

我少年时遭逢丧乱，学习没有师传。入仕后与曹厚庵先生一起在史馆中共事，多承曹先生指教。年少心粗，方留心于诗词文章，不能对学问追究到底，看不到学问的根本，不能广泛涉猎先儒的学说，有时醒悟，有时懊悔。静坐的时间久了，感觉喜悦、愤怒、哀伤、欢乐没有显露的时候，真是和天地万物处于同一体中，日常生活之间，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随时都可流露出来，只是默咏涵养的功夫差，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表现出来。自周敦颐以来，师友授受，原本是有真传秘旨的，不从根本上深入研究，不从默咏涵养上面痛下功夫，把先儒真切指示的言论浮光掠影地看过一遍，怎么谈得上融会贯通！近世功利之学和诗词文章之学，使人心沉溺其中，不知道上天赋予我们的东西在哪里，只是袭取了先儒的外形外貌，胡乱地划分界限，所说的不是自己见到的，所见的不是自己亲自实践的，也真让人感觉奇怪。我每天伏案编纂史书，熬尽心血。遥盼您的身影，害怕最终无缘面见，成为这一生的憾事。更希望经常惠赐佳音，临风翘首，企盼，企盼。

答王天如

李 颙

题解：

这封信是李颙就读书学习问题写给王天如的。

李颙（1627—1705），字中孚，学者称二曲先生，陕西周至人。他自幼清寒，家中贫苦，无法具修脯从师，于是自己读书。认识了一些文字后，便向人借书来读，博览子史，旁及九流二氏之书。遂融会贯通，由博返约，身体力行，年未四十，学业大成，关中人士，多从讲学。常州知府骆钟麟做周至县令，曾造访请业，事李颙为师。康熙九年（1670 年）又将李颙迎到常州讲学，以慰东南士子之望。无锡、江阴、靖江、宜兴争相来迎，听讲者云集，并建延陵书院。李颙回关中后，建关中书院。康熙十二年（1673年），陕西总督鄂善举荐李颙，李颙以身体有病坚辞不从。十七年（1678 年），吏部又以海内真儒推荐李颙，李颙更称自己病重，地方官吏想强行引其入京，李颙拔刀自刺，以刀伤须治疗为名，闭门不出。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西巡，想面见李颙，李颙说："我已经死了！"最终不见，表现出宁折不屈的民族气节。

李颙在清初被称为大儒，全祖望认为，当时大儒，北方则有孙奇逢，南方则有黄宗羲，西方则有李颙，并称他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饥清苦之中，守道愈严，不作违依两可之论，拔地倚天，当时人所不及。

李颙治学，引朱学入王学，但王学末流陷于绝路，不读书不作事而满街都是圣人，李颙看到这一点，于是做了变更，既博极

群书，又关心政治，讲诚心正意，目的在于治国平天下。

李颙在给王天如的这封信中指出，体用并无二致，囿于书本而不知应用是不行的。圣人功业伟大，但靠的是艰苦努力，必须打好基础，将万物之理烂熟于胸中，才能体会到孔孟之学的乐趣。会通古今，将古代的典章制度全部掌握，才能用于现实，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只有学习有用之学，才能左右逢源，运用自如，处理事物井然有条。而所有这些，都必须以刻苦读书学习为基础。由此我们体会到：在任何时候，读书是知识积累的基础，但读书又不是读死书，而是下死功夫读活书，以经世致用为己任，定会在读书中获得乐趣，也定会对社会、对国家有用。

（《二曲集》卷 16）

原文：

来书疑体用之有二致[①]，恐徒求诸文为之末，而不本诸诚明之体。盖以有天德[②]，自然有王道[③]。而唐虞之际[④]，无书可读，皋夔稷契不害其为王佐[⑤]，齐治均平之效卓乎[⑥]，非后世章句书生所能及也。顾今时非同古时，今人不比古人。以孔子生知之圣，犹韦编三绝[⑦]，问礼于柱下[⑧]，访官名于郯子[⑨]，垂老不废研讨。朱子谓盈天地间千条万绪[⑩]，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彻于胸中，将此心放在天地间一例看，然后可以语孔孟之乐。须明古今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治平事业。须运用酬酢[⑪]，如探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若惧蹈诵《诗》三百之失，而谓至诚自能动物，体立自物用行，则空疏杜撰，犹无星之戥[⑫]，无寸之尺，临事应物，又安能中窾中会，动协机宜乎？此不学无术，寇忠愍之所以见惜于张忠定也[⑬]。故体非书无以明，用非书无以适。欲为明体适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否则纵诚笃虚明，终不济

事。

注释：

①体用：即本体和应用。

②天德：天的本质。

③王道：先王所行之正道。儒家称以仁治天下为王道，与"霸道"相对。

④唐虞：即尧、舜。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故有时又称唐尧、虞舜。

⑤皋夔稷契：皋，皋陶，传说为舜臣，掌刑狱之事；夔，传说为舜臣，精通音乐；稷，后稷，周的始祖；契，商的始祖。王佐：帝王的辅佐。

⑥齐治均平：即齐家、治国、平天下。

⑦韦编三绝：相传孔子晚年喜读《周易》，经常翻阅，将穿竹简的皮绳都翻断多次。韦：熟皮。

⑧柱下：官名，相传老子曾为周柱下史，后来就用柱下代称老子或老子学说。传说孔子曾向老子问礼。

⑨郯子：春秋时郯国国君。《左传》记载孔子曾向他询问官名。

⑩朱子：即朱熹，宋代哲学家。

⑪酬酢：应付，应对。

⑫戥：一种秤。

⑬寇忠愍：即寇准，北宋政治家。张忠定：即张浚，南宋大臣。

译文：

来信怀疑本体和应用不一致，恐怕只是从字面上的细枝末叶

来理解，而没有把真诚清明作为理解问题的根本。因为有了天德，自然就有了王道。尧舜之际，没有书可读，皋陶、夔、稷、契不失为帝王的辅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效果卓然可见，不是后来只知道章句之学的书生所能比的。今时和古时不同，今人和古人不能比。以孔子这种生而知之的圣人，还要把连系竹简的牛皮绳翻断多次，向柱下史询问礼，向郯子求教官名，一直到老都不放弃研讨问题。朱熹说，充满天地间的事情千头万绪，都是人事；圣人达到成功千节万目，都是工夫。应当开拓心胸，把基础打大打实。必须将世间各种道理都在心中弄明白，把自己的心放在天地之间来看，然后才可以谈论孔孟的乐趣。必须弄清楚古今的法则规章，用于当今都很合适，然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儒生，从而能够谈论治国平天下的事业。能运用知识应付外部事物，如同囊中探物，永不匮乏，然后资财深厚，取来左右逢源，这样才算真正成为了自己的东西。如果害怕重蹈诵读《诗》三百首那样的失误，而认为只要有至诚之心，自然会推动事物发展，只要本体树立起来，自然会运用于实际，则不免空疏杜撰，就像没有星的秤，没有寸的尺，临到应付事物，又怎么能恰到好处，协调机宜呢？这是不学无术，寇准之所以让张浚感到可惜啊。因此本体没有书本没办法阐明，应用没有书本没办法满足。要想从事明体适用之学，必须阅读明体适用之书，否则纵然真诚笃实、谦虚清明，最终也毫不济事。

与查韬荒弟书

朱彝尊

题解：

这封信时间不详，内容是朱彝尊写给查韬荒，谈论文章写作的一些问题，并对当时的一些作家进行了评论，并特别称赞了查韬荒过人的文学才华。

朱彝尊（1629—1709），清朝文学家。字锡鬯，号竹垞，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康熙时举博学鸿词科，授检讨，曾参加纂修《明史》。通经史，能诗词古人。为浙西词派的创始者。诗与王士祯齐名，时称“南朱北王”，又有“王爱好，朱贪多”之诮。有《经义考》、《日下旧闻》、《曝书亭集》等。

朱彝尊在信中首先对当时的作家进行了一番评论，认为文章妙乎天成，本无一定之规，在今是没有什么公式的。当今社会上，文章写得好的人屈指可数，但谁也不能超过侯朝宗、王于一两个人。但遗憾的是，这两个人也还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全部文学才能就过早地去世了。所以，京城之大，人才之多，但要找出像侯朝宗、王于一这两个人的作家也不容易，更何况要达到古人的水平呢！接着，朱彝尊对查韬荒的文学才能予以了高度评价，认为在同代作者中间是出类拔萃之人。所以，朱彝尊恳切地鼓励查韬荒，不要满足现状，而要不断上进。关键在于要立大志。所谓“士贵立志，志既立而业不成，未之闻也。”一个人只要有了远大志向，再加上勤奋与努力，就不愁不能成功。所以，朱彝尊最后希望查韬荒能够把自己这一派文学风格发扬光大，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这封信是一篇颇有价值的文学评论文章，作者既扼要地谈到文章的特点，又简练地评论了同时代的一些作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对那些比自己年纪轻的后生晚辈的提拔奖誉，毫无做作之态，完全是一片真情实意。非但不嫉妒，反而把他们极力推到前台，让他们施展才华。这对于今天文坛学界的种种无耻下流之风，也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曝书亭集》卷31）

原文：

与韬荒别六月矣。前行至长洲[①]时，曾寓书左右以古文辞相助。不审别后进德修业能直诣古人堂奥否？文章之难，古今不数。仆频年以来，驰驱道途，幸不后君子之教。然自商丘侯朝宗[②]、南昌王于一[③]二子之外，其合于作者盖寡。二子又未尽其蕴以死。仆诚痛之。比来京师，五方之人操翰管而高视者何啻百计。求其若二子者已不多得，况夫与古人方驾者哉！既又自念，天之所以与我者，未尝有靳已，则自弃而厚望于人，非大惑欤？由是日取《六经》诸史及唐宋元明诸家之文读之。惘然若有所遗亡，而恍乎其有得也。虽未敢遽附乎作者，其于二子之文，盖或庶几焉及之。所可憾者，与韬荒相去四千里，无从讨论得失，不知是非果有当于作者否也。《记》曰："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今韬荒方在壮年，又乐于取友。吾党之士可语者不乏，相观而善，以底于成，则惟韬荒是赖。夫天之生才，非必千里一贤，百里一士。棋布而星罗之，盖尝聚于一境之内。孔门四科，远者惟言子一人，其余类皆齐鲁宋卫之士。而庐陵、南丰、临川[④]近在数百里之内，至眉山苏氏[⑤]乃萃于一门。韬荒在吾党，试与二三子相勉无倦。士贵立志。志既立而业不成，未之闻也。然后各出其言，务勿戾于圣贤而有裨

世教，使吾党之文振起一境之内，岂不盛哉！其言之不怍，恃韬荒之助我也。

注释：

①长洲：即今江苏吴县。

②侯朝宗：即侯方域。朝宗为其字。明末清初人。为文有气势。著有《壮悔堂集》。

③王于一：名猷定，字宇一，号轸石，明末清初人。画家。

④庐陵、南丰、临川：庐陵，即今江西吉安市。南丰，即今江西南丰县。临川，即今广东崖县。

⑤眉山苏氏：眉山，即今四川眉山县。苏氏即北宋时号称“三苏”的苏洵、苏轼、苏辙。

译文：

与韬荒分别有六个月了。从前到长洲时，曾写信给你，希望你在古文上面多加用功。不知道分别后，学业道德能不能提高到洞悉古人堂奥的水平？写文章的难处，古今都是一样的。我常年以来，在路途上奔波不停，幸而没有辜负君子的教诲。然而，除商丘侯朝宗、南昌王于一两个人之外，能够称得上作者这个称号的没有几个。而这两个人又没有完全发挥出自己的才华就死了。我实在痛心。等到来到京城，四面八方舞文弄墨而又自视甚高的人何止上百。要找像这两个人一样的人已经不可多得，更何况要与古人并驾齐驱的人呢！我又想，上天之所以生我，未尝有靳已，那我为什么要自暴自弃而去羡慕别人呢？这不是最大的疑惑吗？于是，每天都取出《六经》、诸史以及唐宋元明名家的文章来阅读。惘然好像有些东西被忘记了，同时，恍乎又得到了某些东西。虽然还不敢一下子与作者并列，但对于这两个人的文章，

或者差不多赶上了他们的水平。但遗憾的是，与韬荒相距四千多里，无法讨论得失，不知道是非优劣确实符合不符合作者。《记》曰：“时机过后再去学，那么，即使下了大功夫，也难以有所成就。自己一个人学习，而没有朋友切磋，那么，就会见识浅陋，所知甚少。”现在，韬荒正处于年富力强的时期，又喜欢结交朋友。我们家乡的人中间有不少是有见识的，但看起来最有希望、最有才能的，则只有韬荒一个人了。上天生育人才，并非千里才有一个贤者，百里才有一个君子。就像星罗棋布一样，它也可以聚集于一个地方。孔门四科中间，距离远的只有言子一个人，其余的都是齐、鲁、宋、卫一带的人。像庐陵、南丰、临川近的在数百里以内，到了眉山苏氏，才汇集于一门。韬荒在我们家乡的人中间，可以与二、三个人相互鼓励切磋。人贵在立志。立下志向，而事业不成功，还没有听说过。然后，各人写自己的文章，但务必不要违背圣人的经典，并有益于社会，这样使我们家乡的文章在周围产生影响，这岂不是一件大事！我的话要想不落空，还要靠韬荒来帮助我。

答徐健庵先生书

陆陇其

题解：

这封信是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陆陇其因徐乾学写信问其《明史》可否设《道学传》而回复徐乾学的。

陆陇其（1630—1692），初名龙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早年家贫，以授徒为生。康熙九年（公元 1670 年）中进士，十四年（1675 年）授嘉定知县。十七年（1678 年）举博学鸿儒，未及试，因父丧而归。二十二年（1683 年）补直隶灵寿知县，减役劝垦，岁饥赈民，颇有治声。后又任四川道监察御史等。陆陇其是清初著名大儒，讲学专宗朱熹，以居敬穷理为要。虽多处为官，但仍以学术研究为追求，一生著述颇丰。

清朝初年，为缓和满汉矛盾，笼络汉族知识分子，清政府稽古右文，试博学鸿儒，开《明史》馆，实行一系列文化政策。康熙十八年（1679 年），《明史》馆再开，清初诸大儒围绕《明史》修纂的方方面面展开了讨论。其中，《明史》是否像《宋史》那样设立《道学传》，也成了争论的焦点。徐乾学建议《明史》仿《宋史·道学传》，设立《理学传》，以表彰程朱后学，阳明学派的人则入儒林，或设立《名卿传》将其列入。徐的建议得到一部分人支持，也遭到一部分人反对。其中黄宗羲听说后，就明确加以反对，提出去除《理学传》，只设《儒林传》。对此，徐乾学曾广泛征求意见，陆陇其就是他征询意见的一个对象。陆陇其在回信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史书体例不能模仿，要能反映历史实际。有明一代，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交互发展，扬程朱抑陆王是

不应该的。因此不宜立《理学传》，只设《儒林传》便可。在陆陇其等人的坚持下，《明史》终于没有设立《理学传》，而只设了《儒林传》。

陆陇其的信委婉谦和，信中讲述了他对宋明理学发展的看法，他虽专宗朱子，但在《明史》立传方面，能够实事求是，不囿门户。这封信给人的启示是：为学不能有门户之见，要提倡各种各样的学术，不能抑彼扬此。

（《三鱼堂文集》卷5）

原文：

伏处荒城，惟惧涉奔竞之迹。数年来，不敢以只字入都门，故虽知己如先生，殊觉落落。然高山景行，则固靡刻不在胸臆间也。窃禄一方，无寸绩可道。惟硁硁一念，犹然故我。今已行年六十，头须尽白，将来退老当湖之浒，整理书生旧业，不敢复问当世事矣。

辱赐群书，展卷伏读，珠玑满目，俗吏胸襟，为之一洗。至蒙下询《明史·道学传》，陇其向虽好窃窥先儒绪余，然自汩没簿书以来，久矣茅塞，何足以议此。间尝见张武承《读史质疑》云，《明史·道学传》可以不立，初甚骇其论，潜玩味之，觉此言非孟浪。尝窃因其意推之，史有特例，后人不必尽学。如司马迁作《孔子世家》，所以特尊大成之圣。后世儒者述孔子之道，不必尽到世家也。《宋史》作《道学传》，前史所未有。盖以周、程、张、朱绍千圣之绝学[①]，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故特起此例以表之，犹之以世家尊孔子耳。后世儒者，述周程张朱之道，不必尽列道学传也。

非必薛胡诸儒[②]，不及周程张朱，但作与述则须有辨。道学未明，创而明之，此作者之事也。道学既明，因而守之，此述者之事也。虽其间辟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要皆以宋儒所已明者

而明之，初非有加于宋也。于《明史》中去此一目，以示持尊濂洛关闽之意[3]，亦可以止天下之好作而不好述，未尝窥见先儒之源委本末，而急于自成一家者。且以道学二字论之，道者，天理之当然，人人所当学也。既为儒者，未有可不知道学。不知道学，便不可为儒者。自儒林与道学分，而世之儒者，以为道学之外，别有一途，可以自处，虽自外于道，犹不失为儒。遂有俨然自命为儒，诋毁道学而不顾者。不知《宋史》道学之目，不过借以尊濂洛诸儒，而非谓儒者可与道学分途也。今若合而一之，使人知道学之外，别无儒者，于以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尊道学于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宗。归道学于儒林之内，所以正儒之实。《宋史》《明史》相为表里，不亦可乎？不识先生以为何如？

至以诸儒之学言之，薛胡固无间然矣。整庵[4]之学，虽不无小疵，然不能掩其大醇。其论理气处可议，其辟阳明处不可议[5]。薛胡而下，首推整庵，无可疑者。仲木、少墟、泾阳、景逸[6]，守道之笃，卫道之严，固不待言，然其精纯，恐皆未及薛胡。景逸、泾阳病痛尤多。其于阳明，遂毅然群之，不少假借，然究其实，则有未能尽脱其藩篱者。其所深恶于阳明者，无善无恶一语。而究其所谓善，仍不出虚寂一途。言有言无，名异实同。故其大节彪炳，诚可廉顽立懦。而谓其直接程朱，则恐未也。以《宋史》尊程朱之例尊之，亦不无可商。因承下问，而妄言之，不自揣其非分也。

注释：

①周：指周敦颐；程：指程颐、程灏；张：指张载；朱：指朱熹。均为宋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

②薛：指薛瑄；胡：指胡居仁。均为明代著名理学家、思想家。

③濂：指周敦颐，因其住室取故乡“濂溪”命名，人称濂溪

先生，其学为“濂学。”洛：指程颐、程颢，因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被称为“洛学”。关：指张载，因其讲学关中，弟子多为关中人，故其学被称为“关学”。闽：指朱熹，因其晚年教于福建，故称其学为“闽学。”

④整庵：指罗钦顺，字允升，号整庵。明代著名哲学家。

⑤阳明：指王阳明，即王守仁，因曾讲学于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又称王阳明。是明代著名哲学家，创立“阳明学派”。

⑥仲木：指吕柟，字仲木，号泾野，明代哲学家。少墟：指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明代哲学家。泾阳：指顾宪成，字叔时，别号泾阳，明代政治家、思想家。景逸：指高攀龙，字存之，号景逸，明代政治家、思想家。

译文：

隐居偏僻荒远之城，害怕沾染奔走逐利之习。数年来，不敢携片纸只字进京，因此虽然像先生您这样的知己，也觉联系稀少。然而对您学识道德的钦仰，却一直铭刻在我的心中。为官一方，没有任何政绩可言。只有挂念老友，还像从前一样。如今我已六十岁，须发皆白，将来退休，住在湖边，整理以前所作文章，再也不问当今时事了。

承蒙寄来图书，展卷伏读，字字珠玑；俗吏胸襟，一洗而净。至于您询问《明史·道学传》一事，我以前虽然喜欢研究先儒学术承传，可自从没收图书以来，长久处于闭塞状态，又怎么能讨论这个问题呢？偶而读到张武承《读史质疑》上说：《明史》可以不设《道学传》。开始特别惊异，仔细体会，又觉这话并不莽撞。我曾私下推测，史书有特殊体例，后人不一定都要模仿。比如司马迁作《孔子世家》，目的是推尊圣人，后世儒生记述孔子之道，就没必要都列为世家。《宋史》作《道学传》，这是以前

的史书所没有的。因为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继圣人之绝学，卓然高出于儒林之上，所以特辟此例，加以表彰，就像用《世家》来推尊孔子一样。后世儒生，记述周、程、张、朱之道，就没必要都列《道学传》了。

不是薛瑄、胡居仁这些人赶不上周、程、张、朱，只是作和述必须分辨清楚。道学尚未光大，创立并光大它，这是作者之事。道学已被光大，因袭而固守，这是述者之事。虽然这当中辟邪崇正、廓清之功不少，但都是沿着宋儒已经光大的部分再光大它，并未在宋儒基础上增加什么。在《明史》中去掉这一例目，以示尊崇濂洛关闽，也可以阻止天下好作而不好述，不曾考究先儒源委本末，就急于自成一家的人。以道学二字论之，道是天理之当然，是人人应当学习的。既然是儒生，就不可不懂道学；不懂道学，便不能称为儒生。自从儒林与道学分开后，世上的儒生，认为在道学之外，另有一个途径，可以处置，虽然自外于道，犹不失为儒。于是有了俨然以儒自命，而不遗余力攻击道学的人。他们不懂得《宋史》道学这一例目，只不过是借以尊崇濂洛诸儒，而不是说儒学可以和道学分道扬镳。今若合而为一，使人懂得道学之外，别无儒学，对于提醒人心，功亦不小。将道学推尊于儒林之上，是为了确定儒学宗旨。将道学归纳于儒林之中，是为了确定儒学之真。《宋史》《明史》相为表里，不也很好吗？不知先生您认为如何？

以诸儒之学为例言之，薛瑄、胡居仁为学很是接近。罗钦顺之学，虽然有小疵，但不掩其大醇。他论理气的地方可以讨论，他抨击王阳明的地方就不用讨论。薛瑄、胡居仁以下，首推罗钦顺，这是勿庸置疑的。吕柟、冯从吾、顾宪成、高攀龙，守道笃诚，卫道严密，固不待言，可是他们学术之精纯，恐怕都比不上薛瑄、胡居仁。高攀龙、顾宪成问题尤多。他们毅然抨击王阳明，没有任何凭借。可是考究他们学术的实质，还有很多没有脱

离阳明之学的樊篱。他们厌恶王阳明的就是“无善无恶”这一句话。然考究他们所说的善，仍然不出虚心静修这一途径。说有说无，名异实同。因此其大节彪炳，确能使顽劣者感化，使懦弱者刚强。如果就此就说他们直接二程、朱熹，恐怕就不对了。以《宋史》推尊程朱的办法推尊他们，也是值得商讨的。因您询问，姑妄言之，不揣浅陋。

在南都后宫私寄侯公子书

李香君

题解：

这封信是李香君在1645年为思念情人侯方域而写的一封情书。

李香君，明末歌妓。曾在秦淮河与侯方域相识，力劝方域勿与阮大铖接近。方域下第离南京时，又置酒送行，暗示他应当爱重名节。后巡抚田仰仗势要她接待，她坚决拒绝。孔尚任《桃花扇》，即以其事为题材，并增入骂筵等情节。

侯方域，明末清初人。字朝宗，河南商丘人。明末与方以智、陈贞慧、冒襄齐名，称“四公子”。入清后曾应河南乡试，中副榜；并向清总督出谋献策，企图消灭农民起义军。能诗文。有《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

此柬既是一封情书，又是一篇历史散文。它将主人公对情人的思念之情融于往事的追忆之中。这种追忆又和其它情书的生活悲喜、儿女情长不同。它记叙了明末清初那个特定时代的风风雨雨：既有“天坼地崩”的改朝换代，又有忠臣义士的“望北涕零”；既有南明王朝的草草创立，又有新朝君臣醉生梦死的嬉戏荒唐；更有权奸挟私报怨，败坏朝纲。将南明王朝短命的原由展现给世人。还有对自己身世凄苦无依的哀叹感伤。文辞凄艳，情感悲凉。

感情是毛，它是需要有皮来依附的。李香君的感情所系既有侯方域，又有多灾多难的国家，二者溶为一体，浑然不觉。此时此刻，谁又能分得清呢？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落花无主，妾所深悲；飞絮依人，妾所深耻。自君远赴汴梁，屈指流光，梅开二度矣。日与母氏相依，未下胡梯一步①。方冀重来崔护，人面相逢②；前度刘郎，天台再到③。而乃音乖黄犬④，卜残灯畔金钱；信杳青鸾，盼断天边明月⑤。已焉哉！悲莫悲于生别离。妾之处境，亦如李后主所云："终日以泪洗面"而已⑥。

比闻燕京戒严，君后下殿。龙友⑦偶来过访，妾探询音耗，渠惟望北涕零，哽无一语。呜呼！花缺月残，望夫方深化石之嗟；地坼天崩，神州忽抱陆沉之痛⑧。由甲申迄乙酉⑨，此数月中，烽火蔽日，鼙鼓震空。南都君臣，遭此奇变，意必存包胥哭楚之心，子房复韩之志，卧薪尝胆，敌忾同仇⑩。不谓正位以后，马入阁，阮巡江⑪。虎狼杂进，猫鼠同眠。翻三朝之旧案，党祸重兴；投一网于诸贤，蔓抄殆遍⑫。而妾以却奁夙恨⑬，几蹈非灾。所幸龙友一力斡旋，方免提钦勘问，然尤逼充乐部，供奉掖庭⑭。奏新声于玉树，春风歌燕子之笺⑮；叶雅调于红牙，夜月谱春灯之曲⑯。嗟嗟！天子无愁，相臣有度⑰，此妾言之而伤心，公子闻之而疾首者也。

虽然，我躬不阅，惶恤其他⑱。睹星河之耿耿，永巷如年⑲；听钟鼓之迟迟，良宵未曙。花真独活，何时再斗芳菲⑳；草是寄生，惟有相依形影。乃有苏髯幼弟，柳老疏宗㉑，同为菊部之俦，共隶梨园之队。哀妾无告，悯妾可怜，愿传红叶之书，慨作黄衫之客㉒。噫！佳人虽属沙吒利，义士今逢古押衙㉓。患难知己，妾真感激涕零矣。

远望中州，神飞左右。未裁素纸，若有千言；及拂红笺，竟无一字。回转柔肠，寸寸欲折。附寄素扇香囊，并玉玦金钿各

一。吁！桃花艳褪，血痕岂化胭脂[24]；豆蔻香消，手泽尚含兰麝[25]。妾之志固如玉玦，未卜公子之志，能似金钿否也？宏光二月[26]，香君手缄。

注释：

①母：指鸨母，妓女的养母。胡梯：楼梯。

②崔护：唐代诗人。其《游城南》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来男女相识随即分离，男子追念旧事，"称人面桃花之感"。

③天台再到：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刘晨、阮肇在天台桃源洞遇仙女。

④音乖黄犬：指音讯隔绝。乖：背离，隔绝。黄犬：传说晋陆机有黄耳犬，能长途传递家书。

⑤青鸾：即青鸟，传说中的神鸟。后多借指使者。

⑥李后主：五代南唐后主李煜。宋开宝八年（975 年）占金陵，俘煜入汴。煜由人主而沦为阶下囚，自言"终日以泪洗面"。

⑦龙友：杨文骢，字龙良。明末画家。在浙江衢州抵抗清兵，败退浦城，被俘杀。

⑧陆沉：本为陆地，无水而沉。比喻国土沦陷。

⑨甲申迄乙酉，公元 1644 至 1645 年。1644 年李自成攻克北京，明崇祯帝自缢煤山。1645 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被马士英拥立为帝，是为南明，年号弘光。同年，清兵下江南，广为杀戮。

⑩包胥：申包胥，姓公孙，封于申，春秋时楚国大夫。伍员以吴军攻楚，包胥至秦求救，哭于秦庭七日七夜，感动秦君，出兵救楚，击退吴军。子房：张良，字子房。战国时

韩人。秦灭韩，张良结纳刺客，椎击秦始皇于博浪沙，未遂，逃匿下邳。后辅佐刘邦灭秦建汉。

⑪正位：指福王被立于南京。马：指马士英，明末奸臣。北京陷，立福王于南京，升东阁大学士。与阮大铖勾结，专权昏聩，后为清兵擒杀。阮：指阮大铖，明熹宗时谄附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人。马士英立福王于南京，阮出任兵部尚书，重兴党狱，捕杀复社文人。后降清为虎作伥，引清兵攻仙霞关，死于路上。

⑫“三朝旧案”四句：三朝指神宗、光宗、熹宗三朝。万历间，吏部郎中无锡人顾宪成被革职还乡，倡议重修东林书院，与高攀龙等讲学其中，评议朝政。天启末，宦官魏忠贤专权，东林诸人与之相抗，被目为党人，附魏者造《东林点将录》，谋作一网打尽之计。天启五年杀杨涟，左光斗等人。崇祯即位，魏失势自杀，党禁始解。

⑬却奁夙恨：奁，古代盛梳妆用品的器具，常用作聘礼。阮大铖为讨好东林党人，于是拉拢侯方域，替他出妆奁酒席之资。香君深明大义，严辞拒绝。南明弘光朝阮大铖得势，为报复香君却奁之恨，逼她嫁给漕抚田仰作妾，香君坚拒，血溅诗扇，杨龙友因血点画成折枝桃花。清代孔尚任作《桃花扇》传奇，剧名本此。

⑭乐部：主管音乐的官署。掖庭：宫中旁舍，妃嫔居住的地方。

⑮燕子之笺：即《燕子笺》传奇，阮大铖著。记唐霍都梁与郦氏女飞云遇合事。

⑯叶：“通协”。红牙：乐器名。春灯之曲：即《春灯谜》传奇，亦为阮大铖所著。叙宇文彦兄弟与韦影娘姊妹遇合至成婚姻事。

⑰有度：度，度曲，作曲。此处用为名词，指戏曲作品。二

句意指弘光朝君臣腐朽荒唐，不问国事。

⑱“我躬不阅”二句：《诗经·邶风·谷风》：“我躬不阅，惶恤我后！”阅：容。惶恤：何暇顾及。

⑲永巷：汉宫中的长巷，为囚禁妃嫔之地。

⑳独活：草药名，花五瓣，白色。“花真独活”是用“独活花”之名，双关“独得自活”之意。下文“草是寄生”，手法相同。

㉑苏髯：指苏轼。幼弟：指苏昆生，因其姓苏，故有此说。苏昆生，蔡州人，善歌。柳老：指柳宗元。疏宗：指柳敬亭，柳善说书。

㉒红叶之书：唐玄宗时，宫女韩氏在红叶上题一绝句：“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她将红叶置于御沟，漂流宫外，为应举秀才卢偓拾得。黄衫之客：唐代蒋防《霍小玉传》：霍小玉与陇西李益通好，后为益所弃，小玉抑郁而病。忽有身穿黄衫的侠客挟益至其家，小玉既相见，长恸而绝。

㉓沙吒利：唐朝韩翊与姬柳儿，在安史之乱中走散。柳为蕃将沙吒利所劫，翊以虞侯许俊之计，二人得以重聚。古押衙：唐代小说中的人物，曾舍身救人，成人之好。后来多用为“侠士”的代称。

㉔此句指血溅诗扇之事。

㉕手泽：犹言手汗。兰麝：兰和麝香。

㉖宏光：通作“弘光。”明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时的年号。即公元1645年。

译文：

落花无主，令妾悲痛不已；飞絮依从他人，妾以为这是莫大的耻辱。自从您远赴汴梁，屈指算来，梅开二度，已历两载了。

妾每日与鸨母在一起，从未下楼梯一步。寄希望于您再度光临，人面桃花相逢；刘郎第一次到天台山遇到了仙女，您就不能再来吗？但结果却是我们音讯隔绝，妾日与残灯、金钱为伴；您杳如黄鹤，一去不返，令妾望眼欲穿。罢了，悲伤莫过于分别。妾的处境也如同李后主所说："终日以泪洗面"啊！

近来听说燕京戒严，帝后被逼下台。友人杨文骢偶然来访，妾探询音讯，他只是望北涕泣，哽咽无语。啊！花残月缺，盼望丈夫，正值揪心的嗟叹；地塌天崩，神州忽逢国土沦丧之痛。从1644年到1645年之交的这数月中，烽烟蔽日，鼙鼓震天。南明王朝的君臣，遭此奇变，想来一定存有申包胥哭楚之心，张良复韩之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不曾想福王被立于南京之后，马士英升东阁大学士，阮大铖出任兵部尚书。虎狼之辈杂入，猫鼠之流同眠。他们翻出神宗、光宗、熹宗三朝时的旧案，重兴东林党祸；四处搜查，妄图将贤才一网打尽。而我却因过去曾推却阮大铖替您出的聘礼，致使阮怀恨心中，几乎遭受灭顶之灾。好在友人杨文骢竭力从中斡旋，方才免去被抓拿审问，但仍逼我到乐部，供奉宫中。在玉树上奏新乐，伴春风而歌《燕子笺》；在红牙上弹雅调，伴夜月而谱《春灯谜》。唉！天子没有忧愁，大臣善于作曲，此中情形，妾一说就伤心，公子一听就痛心疾首啊！

话又说回来，我连容身之处都没有，何暇顾及其他？睹星河耿耿于心，在宫中度日如年；听钟鼓声至深夜，良宵漫漫。花若能活下去，何时再展芬芳；草若能生存下来，只有相依为命。乃有苏东坡的幼弟、善歌的苏昆生，及善说书的柳宗元、柳敬亭，类似他们的这类人，同属菊部人员，共充梨园之中。可悲的是，我无处诉说；可怜的是，我形影孑然，愿传得遇佳偶的红叶书，慷慨成人之好的黄衫客。唉！佳人虽遇劫人的沙吒利，义士却逢侠士古押衙。患难中的知己，妾真正是感激涕零啊！

遥望中州，心已飞到您的身边。未裁白纸，心中似有千言万

语；等到举笔书写，又无一语。柔肠翻转，寸寸欲断。附信寄去素扇、香囊、及玉玦、金钿各一个。唉！桃花色已褪去，血痕怎化胭脂；豆蔻香已消去，手汗尚含兰、麝香味。妾的志向本如同玉玦，不知公子的心志，能与金钿相否？弘光二月，香君手书。

与王石谷

恽寿平

题解：

这封信是两位画家心得交流的佳作。

恽寿平（1633—1690），初名格，字寿平，后以字行，改字正叔，号南田、云溪外史、白云外史、东园客、草衣生等，江苏武进人。早年好画山水，后来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超不过王翚，于是改学花鸟，斟酌古今，一洗时习，独开生面。他的画，简洁精美，赋逸明丽，成为清代花卉翎毛的正统。这一画派，被称为“常州派”。他亦偶画山水，高旷秀逸。有人说他的画，宛如李白之诗，非人力所可及。他的作品以斗方尺而最为精妙，大幅巨幛，则欠雄伟，有力不从心之感。

王石谷（1632—1717），名翚，字石谷，号耕烟散人，又号乌目山人。江苏常熟人。少年时就长于山水画，王鉴游虞山，见到了他画的扇面，非常惊异，载与俱归。在鉴的指导下，进步很快。后来，王鉴又将他推荐给王时敏作学生，王时敏对他十分器重，二人一起游历大江南北，饱览收藏家的秘本，在创作思想和艺术技巧上都有了突破。他认为当时画坛的衰微是由于宗派主义造成的，故而把自董其昌以来视为中国绘画史上水火不相容的南北二宗的不同表现手法溶于一炉，赢得了“画圣”的称誉，成为虞山派的开山。康熙时，供奉内廷，奉诏作《南巡图》，康熙看了，非常满意，赐书“山水清晖”四字，因号“清晖主人”。他的画工整艳丽，蹊径深远，在“四王”中，他的成就最为突出。

在这封信里，作者将自己对王石谷的钦佩之情写得极为率

真。特别是一边画，一边念着“石谷”，又一边画，一边想自己的作品可能被石谷见到而迟疑着画不下去等情景，生动有趣。将两位画家之间彼此相知的纯真友谊表现得活灵活现。这在文人相轻的旧时代，殊为难得。

（《瓯香馆集》）

原文：

去足下不觉五日，五日在田舍，执卷据案辄思睡，一无所为。间[①]拈毫构思，拟成文，究无一字，叹闷而已。

弟不到水庭[②]，可以镇日[③]闭门拒俗客，所经营绢素[④]，当更得奇宕险怪之想。然南田[⑤]不在，即得意有谁能称快叫绝者？即有之，想吾兄亦何屑听其妄为评论，使苍蝇声之人声也。

自兄来此，弟素狂不怯人，今乃不能著一笔。间持笔，辄念“石谷”，念“石谷”百遍，稍稍得一两笔。得一两笔后，则又虑吾石谷他时或见之也，复为踌躇久之。弟与兄庶几称肺腑矣，而忍视我坐颠倒想中过五十小劫耶[⑥]？

曹生《洞庭秋帆》小卷[⑦]，设色必已甚丽。曹生去时，正遇洞庭秋风；足下尺幅，乃欲与造化争丽耶？弟画《归棹图》，因诗未成，尚在案头也。董思翁画一幅，送玩[⑧]。曹卷未送，肯付一赏不？

注释：

①间：有时。

②水庭：为石谷居处。

③镇日：整日。

④经营绢素：指作画。

⑤南田：恽寿平的号。

⑥肺腑：喻相知极深的朋友。五十小劫：指极长的时间。劫，佛教用语。佛教认为世界有周期性的生灭过程，它经历若干万年后，就要毁灭一次，重新开始，此一周期称为一“劫”。

⑦“曹生”一句：指王石谷为曹生所作《洞庭秋帆》小幅画。小卷，与后文“尺幅”意同，指篇幅较小的图画。

⑧董思翁：明代画家董其昌，号思白。玩：玩赏，欣赏。

译文：

离开足下不觉间已有五天了。这五天我在田舍中，伏案执卷，睡意很浓，无所作为。有时挥毫构思打算作文，结果竟无一字，仅仅叹息，心闷罢了。

弟不到府上——水庭，兄可以整天闭门，谢拒俗客，作画当心生奇宕险怪想法。但我不在场，即使是得意之作，又有谁能称快叫绝呢？即使有人叫好，想兄也不屑听其妄自评论，使苍蝇嗡嗡一样的声音入耳。

弟平常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而自兄来后，今竟不能挥一笔。偶尔作画时，往往口中喃喃“石谷”，说了不知多少次，才稍稍画一两笔。此后，又虑及石谷他日或许会看见，故又踌躇许久。我们兄弟相知很久了，兄忍心看我长期坐卧不安吗？

兄给曹生作有《洞庭秋帆》小画一幅，下色必十分美丽。曹生离去时，正遇洞庭秋风；足下的佳作，要与造化争丽吗？弟画有《归棹图》，因诗未完成，还存于案头。董思翁画有一幅，送弟欣赏。《洞庭秋帆》未送，肯付一观吗？

寄宋牧仲中丞

王渔洋

题解：

这封信是清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王渔洋在京城写给江苏巡抚宋牧仲的，言述自己年来遭遇，并嘱托牧仲善为保护金陵栖霞寺松树。

王渔洋（1634—1711），清诗人。本名士禛，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死后因避雍正（胤禛）讳，改称士正，乾隆时，诏命改称士祯。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论诗创“神韵说。”所作多写日常琐事及个人情怀，模范山水，吟咏风月。在生前负有盛名。有《带经堂集》等。又曾自选其诗为《渔洋山人精华录》。多有笔记《居易录》、《池北偶谈》等多种。

康熙中期，出现了清朝历史上少有的歌舞升平时期，这即是史书所谓的“康乾盛世”。这个时候，清廷统治已完全稳定。武力镇压和文化怀柔，双管齐下，两手一起抓，两手都过硬的双簧统治策略已初步见效。先是血雨腥风的文字狱，继而是春风化雨的博学鸿词科，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明史馆的的大肆开张，这一切都消解了知识分子心里的仇恨和敌意，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归顺于朝廷。做官的读书人和士子越来越多。有的儒生还青云直上，做到高官。但对专制的认同，以及仕途的得意，仅仅是一个方面。它并不能代表人生的所有内容。它并不能填充人生的所有空虚。即便是对那些过分热衷于功名利禄的人来说，官场也不是安乐窝。做为一个正常的人，喜怒哀乐哪一样都少不了。人生一

世，祸福无常，命运多舛。这早已是妇孺皆知的经验常识。但对于那些素来喜欢舞文弄墨的人来说，命运无常更是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

王渔洋官做的不小，但家庭生活上都连遭不幸。康熙三十二年夏四月，王渔洋的侧室陈孺人死；七月，第三个女儿又亡。俗话说，“中年丧妻，老年丧子”。这些人生巨痛，恰巧都让王渔洋赶上了。所以，他深感命运“奇蹇”。“悼亡之戚”与“伤女之悲”一起降到自己头上。他伤感地说“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所谓此树婆娑，生意尽矣”。王渔洋希望“知己如先生”的宋牧仲能“为我拊膺而一叹”。看来，王渔洋的情绪的确是低落到了极点。尽管如此，但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还是对金陵的名刹栖霞寺近来所遭遇到的变故和祸患，表示了真诚的关心。他希望身为江苏巡抚的宋牧仲能够凭借手中的权力，去保护一下极有可能遭受更大破坏的文化遗产。“六朝松至今尚存”，“宝所名蓝，藉以增胜。”王渔洋在个人身遭不幸的时候，还能关心远在千里之外的佛教寺院，此等精神也确实令人感慨不已。

此文虽为私人书信，但有情有景，描写生动，委曲有致。对人生悲剧的感怀，对宝刹名寺的描绘，皆形象感人。从中透露中国古代读书人对文化遗产的特殊感情和深切体悟。也许，对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人而言，个人的不幸虽然刻骨铭心，但它们无法取代那种纯乎本能性的对文化的关心和系念。或许，这正是文化之为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这也正是文化能够包容不幸、抚摸疼痛的特有价值所在。文化不应该远离人生，更不应该无视不幸。从这篇书信中，我们似乎看到了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

（《蚕尾集》卷8）

原文：

维德人都，备询起居，差慰。外时运奇蹇，四月间有悼亡之

戚[1]，七月中又有伤女之悲。人生至此，天道宁论！所谓此树婆娑[2]，生意尽矣。知己如先生，想亦为我拊膺而一叹乎？仆从来无尺递[3]出都门，兹因栖霞楚云禅师南还，特奉数行左右。栖霞为金陵梵刹之冠，六朝松至今尚存。往者将寻斧柯[4]，楚老本师竺庵和尚上书当事，遂免剪伐。一时名流，形诸篇咏。楚老住山三十年，手植松不下二、三千头，虬龙[5]拏攫，郁为巨观，宝所名蓝[6]，藉以增胜。今楚老将应寿昌祖席之请，虑山中房僧勾连土棍，藉以渔到，不免樵苏。唯先生政暇，眷念胜地，特为严禁，并语以地方有司，同心弘护。法坛功德，与此山不朽矣。盘山拙老，嘱仆奉致新志，想达，典签示之[7]。

注释：

①悼亡之戚：晋潘岳丧妻，作《悼亡》诗三首，后因称丧妻为“悼亡。”

②此树婆娑：《世说新语·黜免》：“大司马府厅前有一老槐，甚扶疏。殷（仲文）因月朔，与众在厅，视槐良久，叹曰：‘槐树婆娑，无复生意！’”原为感慨之语，后用为缺乏生趣之意。

③尺递：犹言“尺书”。

④斧柯：《诗经·豳风·伐柯》：“伐柯如何？非斧不柯。”

⑤虬龙：虬、龙，古代传说中的两种神兽。有角叫龙，无角叫虬。

⑥名蓝：有名的寺院。蓝，伽蓝。梵语寺院之称。

⑦典签：旧时官府书吏之称。典签示之，意谓使书吏写便信告诉我。

译文：

维德来到京城，对我的生活起居非常关心，这使我颇感欣

慰。我近来时运乖舛，四月份时有亡妻之痛，七月份时又有伤女之悲。人活到这个地步，哪里还有什么天道可言！正所谓此树依然，人生无趣。像先生这样的知己，想来也会为我而抚胸长叹的吧？我从来不给别人写信，只因栖霞楚云禅师南还，故而特地写上几行。栖霞为金陵寺院之冠，六朝松柏至今还在。以前有人想用斧头砍伐，楚老本师竺庵和尚上书官府，于是才免去砍伐之灾。当时的名人，纷纷写文咏诗加以称颂。楚老在山里面居住了三十年，亲手种植的松树不下二、三千棵。虬龙拏攫，蔚为壮观，名刹古寺，又添一景观。如今楚老将应寿昌祖席的邀请，担心山中寺院的和尚勾结地痞流氓，砍伐松树，借以谋利。希望先生在政务之余，稍稍顾念一下佛门胜地，并告知地方官员，严禁防范，同心同德，大加保护。这样，护法大功大德，必将与此山而一同不朽也。盘山拙老，嘱咐我把这个请求告诉您。您若有什么想法，请写信告诉我。

答杨同年论学书

熊赐履

题解：

这封信是熊赐履因评论王阳明的学说而写给杨同年的。

熊赐履（1635—1709），字敬修，号青岳，晚号愚斋，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年）进士，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翰林院掌院学士迁内阁学士，寻超授武英殿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十五年（1676年）以票拟错误落职，寓居江宁。但康熙帝一直与他以经义相通问。至二十九年（1690年）再起，为礼部尚书，复官至东阁大学士。

康熙帝喜好程朱理学，熊赐履便以道学逢君，他和李光地一起逢迎康熙，一方面满口道学的仁义道德，另一方面又互相倾轧，言行不一，被后人称为"伪道学"。但不管怎样，熊赐履在学术上信奉程朱，较之明末之空疏放肆，毕竟较为平实谨严。只是他本人甘为康熙附会，因之在学术上没有创新之见。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到，熊赐履对王阳明的攻击不遗余力。他所指出的王阳明为学杂入禅，事功纯是霸等等，确是王氏之失，但熊氏是站在程朱的立场上进行评论，未免有门户之嫌。我们抛开他怎样评价王阳明不论，信中所讲的如何论人、如何论学的内容，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论人要以自己之心推求古人之心，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古人。论学则要严格区别是非，把握标准。这些看法不仅适用于评论古人古学，也适用于评论今人今事。无论在什么时候，宽以论人，严以论事，都是我们不能忘记的。

（《经义斋集》卷9）

原文：

来教云云，弟非敢妄行訾诋，得罪于先达不顾也[①]。况文成文章功业[②]，有明三百年来指不多屈，又岂后学之所敢轻议。但论人，不可不恕而辨[③]，学则不可不严。文清曰[④]，学者论人，宜取其长处。此固长者之言也。然《读书录》中[⑤]，于二氏、百家[⑥]，似是而非，疑同而异之辨，并无一毫迁就，岂文清顾自食其所言耶？墨子之德至矣，汉儒至或与仲尼并称[⑦]，岂漫无所长者？止以《兼爱》一篇昧于理一分殊之义，孟氏推极流弊，至比之于禽兽，而不以为过，岂孟氏之论人较刻于文清耶？诚以学问是非之介[⑧]，道理同异之关，有断然不可假借，不可游移者。虽以邻于持论过刻而不遑恤也。文章功业，圣贤所不废也，而欲专执此以优劣古今之人则大不可。颜、曾有何事功[⑨]？有何文采？而洙泗正传必归之孟子[⑩]。子曰，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又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文成之功业，亦止在管、晏之间耳[⑪]。孟子无一匡九合之功，而顾薄管仲不为天下，后世未闻有疑其妄议其僭者。颜子，亦布衣也。史氏称其有王佐才，或谓与禹、稷同道[⑫]，或谓与伊尹同志[⑬]，当时后世亦鲜不信之。岂儒者顾为是空谈臆说，以欺万世哉？亦信以必然之理，而论其不易之道也。然则学术事功轻重分合之说，亦可以睹矣。文成之学不杂乎禅者也，文成之事功纯乎霸者也。惟其禅也，故霸惟其霸也。故禅霸二者一以贯之也。无善无恶分明祖述告子[⑭]，百余年来，斯文披靡[⑮]，世道灰烬，实文成提宗误人之咎，更复何辞？来教谓文成即悟、即修，恐文成之悟，只是无善无恶之悟，而非吾之所谓悟；文成之修，只是无善无恶之修，而非吾之所谓修也。来教又云，可以自称得手[⑯]，而不可以接引后学[⑰]，此亦不过委曲调停之说，而非大中至正之理也。夫上下一原也，精粗一致也。工夫虽有先后，道理实无彼此。岂有可以自

称得手，而不可以接引后学者？岂有不可以接引后学而可以自称得手者？是又不辨而自明者矣。弟近来兀守遗经，唯从事于寡过之学，坚白同异[18]，不复向人哓哓，空腾辨口。兹即承下问，则又不敢为苟同之论，以欺知己。年兄得无讶其狂悖，不可解耶，幸终教之。《月川集》呈览，《居业录》止有写本[19]，适为满洲一门人借去，俟彼卒业后索回驰上不宣。

注释：

①先达，前辈。

②文成：即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死后谥为文成。明代著名哲学家。

③恕：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

④文清：即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死后谥为文清。明代著名哲学家。

⑤《读书录》：薛瑄的著作，共二十二卷。

⑥二氏：指佛、道二家。

⑦仲尼：即孔子。

⑧介：界线、疆界，此处引申为区别。

⑨颜、曾：即颜回和曾参，均为孔子的学生。

⑩洙泗：即洙、泗二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泗水县合流西下，至鲁国首都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之间，即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世因以洙泗代称孔子的儒学。

⑪管、晏：即管仲和晏婴，均为先秦时著名政治家。

⑫禹、稷：禹为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以善治水著称。稷又称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以教民从事农业生产著称。

⑬伊尹：商初大臣，治国有方。

⑭祖述：师法前人，加以陈说。告子：战国时期著名哲学

家，主张性无善恶。

⑮披靡：草木随风倒伏。引申为不振。

⑯得书：得心应手。

⑰接引：接待、引进。

⑱坚白同异：即离坚白、合同异。离坚白是先秦名家公孙龙的著名论点之一。他认为，一块坚硬白色的石头，用眼看就不见其坚硬，只见其白色；用手摸则不觉其白色，只觉其坚硬。坚和白是分离的。公孙龙承认石是客观存在着的被人感知的对象，承认事物的不同属性要通过人的不同感官去感觉。但他把事物的差异性看成是彼此孤立的，否定了事物的联系和统一性。合同异是先秦名家惠施学派的观点。一切被常人当作相异的事物，如天地、山泽等，在他们看来都是相同的。他们着重指出差异中的同一。

⑲《月川集》、《居业录》：均为熊赐履的著作。

译文：

来信求教云云，我不敢妄自訾议，得罪于前辈于不顾。何况王守仁的文章功业，明代三百年来并不多见，又岂是后学所敢轻易议论的？但凡论人，不能不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从而进行辨解，论学则不能不严格。薛瑄说，学者论人，应该取其长处。这固然是长者之言，然而《读书录》中，对于佛、道两家以及百家学说中似是而非、同异模糊的辩论，并没有一丝一毫的迁就，难道是薛瑄自食其言吗？墨子的德行达到极高的程度，汉代有的儒生将其与孔子并称，难道没有一点长处？只以《兼爱》一篇昧于理一分殊之义，孟子就推论出它的流弊，甚至将墨子比喻为禽兽，而人们不认为过份，难道孟子论人比薛瑄还要苛刻？这确实是因为学问中是非的区别，道理中同异的关联，有断然不能混淆，不能转移的地方。虽然接近于持论过分苛刻也无暇怜悯

了。文章功业，是圣贤不放弃的东西，但要想专用这些来评价古人优劣则万万不可。颜回、曾参有什么功业？有什么文采？但孔子正传一定归于孟子。孔子说，干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辜的人能得到天下，决不干。又说，孔子的弟子没有称道齐桓公、晋文公事业的。王守仁的功业，也只是在管仲、晏婴之间罢了。孟子没有统一天下的功业，但他薄视管仲不为天下，从未听说过后世有人怀疑他讥嘲超过他的人。颜回，也是一个普通人，史学家称赞他有辅佐君王的才能，有的人认为他和大禹、后稷想法一样，有的人认为他和伊尹志向相同，当时和后世也极少有不相信的。难道是儒生故意制造这种空谈臆说，以欺骗万世之人吗？这也确实是儒生以必然之理来论不易之道呀。学术、事功孰重孰轻，其间分合，由此也可以看出来。王守仁的学术杂入了禅，王守仁的事功纯然是霸道。只因为他是禅，故而他的霸道也只是霸道。禅、霸二者是一以贯之的。无善无恶的说法分明是师法告子，百余年来，斯文不振，世道衰竭，王守仁提倡心学，贻误后人，又怎么能推辞得了？来信说王守仁即悟、即修，恐怕王守仁的悟，只是无善无恶的悟，而不是我们所说的悟。王守仁的修，只是无善无恶的修，而不是我们所说的修。来信又说，王守仁可以说自己得心应手，但不能够引进后学，这也不过是一种婉转的说法，不是公正之理。上下一原，精粗一致，工夫虽然有先后，但道理却没有彼此。哪里有自己能够得心应手而不能够引进后学的呢？哪里又有不能够引进后学而自己能够自称得心应手的呢？这是不辨自明的事。我近来独自坚守六经，从事于较少有错误的研究；坚白同异之辨，不再向人说起，空发议论了。如今承蒙下问，则又不敢做苟同别人的议论，来欺骗知心好友。年兄您不要惊讶我的狂妄，感到不可理解，希望您能垂教。《月川集》呈上，《居业录》只有写本，刚好被一位满洲的学生借去，等他看完要回来后再呈上不迟。

寄桐乡钱生晓城

颜元

题解：

这封信是颜元就自己对儒生的认识写给桐城书生钱晓城的。

颜元（1635—1704），字易真，又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颜元的父亲颜昶是蠡县朱翁的义子，明朝末年，因不被朱家容纳，随清兵出关，死于关外，母亦改嫁。颜元寄养朱家，生活清苦，真是生于穷乡，育于异姓，饱经忧患。二十四岁以后，设塾课徒，不辍劳作。五十岁时，曾至辽东觅父遗骨归葬。后南游中州，交其贤豪长者，论学辩道，得益颇多。晚年，应聘主讲肥乡漳南书院，厘定规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规模宏大。

在中国思想史上，颜元是一个强调实践，反对静坐读书的思想家。他抨击理学，反对程朱陆王。他和弟子李塨一起倡导实践，号召身体力行，被称为“颜李学派”。他自号习斋，就是提倡习行，反对那种“口头见道，笔头见道”的凭空议论。他指出，读书如不能无益于世，那么读书是为了什么呢？从静坐读书中讨求知识，他认为如同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指望不得，不仅指望不得，而且简直误事。他还认为，要办天下事只有亲自动手去办，学就是学习办事。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颜元认为书生文人都不是儒生，这些人读死书，所学为无用之学。只有那些学习“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学的人，才是真正的儒生，这些学问才是有用的学问。据此，颜元指出汉儒考据训诂，不问时事，晋人清谈玄理，脱离时事，汉唐之人又流入佛老，无

关时事，都是要否定的。而宋儒兼而有之，其学更是无用。颜元指出，古代儒生从来没有脱离实际而空言心性，后儒没有将此继承下来，结果导致国力不盛，贻误后人。尽管颜元所提倡的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多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学说，而且实行些什么，向什么方向发展，他也是糊涂的，但强调力行，强调行动起来，终究是正确的意见。

由此我们体会到，在我们今天，决不能读死书，要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实践密切结合起来，所学有所用，才会对社会有益。

（《习斋记余》卷3）

原文：

书生文人之非儒也。唐虞之儒①，和三事②、修六府而已③。成周之儒④，以三物教万民宾兴之而已⑤，六德即尧舜所为正德也⑥，六行即尧舜所为厚生也⑦，六艺即尧舜所为利用也⑧。孔门之儒，以四教教三千人而已⑨，文即六艺，行即六行，忠信二者，即记者隐括其六德也⑩。夫尧舜之道而必以事名，周公之学而必以物名⑪，俨若预烛后世必有离事离物而为心口悬空之道、纸笔虚华之学，而先为之防杜者。迨于秦火之后⑫，汉儒掇拾遗文⑬，遂误为训诂之学⑭。晋人又诬为清谈⑮，汉唐又流为佛老⑯，至宋人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⑰、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⑱，而宋人兼之，焉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⑲，烈于嬴秦⑳，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

注释：

①唐虞：指尧、舜。据古史记载，尧为陶唐氏，舜为有虞氏。故而有时又称唐尧、虞舜。

②三事：三件事，此处指正德、利用、厚生。

③六府：府，藏财之处，水、火、金、木、土、谷是货财所聚，故称六府。

④成周：指西周的东都洛邑，此处指东周。

⑤宾兴：周时的一种选举法，自乡小学举贤能而宾礼之，以升于国学。

⑥六德：知、仁、圣、义、忠、和称为人的六德。

⑦六行：六种善行，孝、友、睦、姻、任、恤为六行。

⑧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为六艺。汉以后指儒家六经为六艺。

⑨四教：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称为四教。

⑩隐括：矫正竹木弯曲的器具，又作隐栝。此处引申为修改、订正。

⑪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是封建时代贤明政治家的代表。

⑫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事件。

⑬掇拾：收拾整理。

⑭训诂：考订字音字义的学问。

⑮清谈：魏晋时期远离时务，"谈尚玄远"的风气，又称玄谈。

⑯佛老：指佛学、老学。

⑰禅宗：佛教的一个支派。此处泛指佛教。

⑱乡愿：外博谨愿之名，实与流俗合污的伪善者。

⑲杨、墨：即杨朱、墨子。

⑳嬴秦：指秦或秦始皇。

译文：

书生、文人不能称之为儒。唐尧、虞舜时期的儒，不过是从

事端正德行、物尽其用、使人民生活充裕这三件事以及修治水、火、金、木、土、谷这六种藏财之处而已。东周时期的儒，只是用端正德行、物尽其用、利民便民来教育民众，使他们能举贤能受到礼遇而已。知、仁、圣、义、忠、和就是尧舜所从事的端正德行，孝、友、睦、姻、任、恤就是尧舜所从事的使人民生活充裕，礼、乐、射、御、书、数就是尧舜所从事的物尽其用。孔门之儒，用文、行、忠、信四点教育三千弟子而已。文就是礼、乐、射、御、书、数。行就是孝、友、睦、姻、任、恤。至于忠、信这两个方面，就是记录的人修订知、仁、圣、义、忠、和。尧舜之道一定以事情命名，周公之学一定用事物命名，俨然就像预料到后世一定会有人离开具体事物而从事游谈无根之道、凭空议论之学，从而预先防微杜渐的呀。等到秦始皇焚书之后，汉代的儒生收拾整理遗留下来的文字，于是错误地从事考校文字音义的训诂之学。晋人又捏造事实，从事清谈。汉唐之间，又掺杂进佛学、老学。到宋人这里就更变本加厉了。我曾经说过，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点就足以迷惑世人，欺骗民众，而宋人却兼而有之，这怎么能不昏暗圣道、延误苍生到变本加厉的程度呢！我私下认为，宋人所造成的祸患，超过了杨朱、墨子和秦始皇，每想到此就要叹息流涕，甚至放声痛哭。

与从子贞一书

万斯同

题解：

这封信是著名史学家万斯同写给其侄儿万言的。信中规劝万言放弃古文词研究，而专心从事于经世之学，并阐述了自己的经世实学思想。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学者称石园先生。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少年时极不听话，被认为孺子不可教。其父万泰一气之下，将其关在一间房子中。房中架上有明史料数十册，斯同数日读毕，并将室中所有经书读遍。后来与其兄长谈论学问，语出惊人，其父始将其送入塾中读书。接着便拜著名思想家黄宗羲为师，读书五行俱下，如大海决堤，遂为黄门高足，浙东学派著名人物。康熙十七年（1678年）荐博学鸿儒，力辞不就。十八年，清廷设馆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延聘其入京师，斯同始以布衣参史局，不署官衔，不受俸禄，凡所修明史稿件，皆由他复审。《明史》稿本五百卷皆其手定，后几经删削，其所定内容也几经改窜，但他对《明史》之功劳，后人有口皆碑。

万斯同一生致力于经学和史学的研究，经学著作有《儒林宗派》八卷、《石经考》二卷等。史学著作除《明史》外，有《历代史表》六十卷、《纪元汇考》四卷、《宋季忠义录》十六卷等。成就卓著，蔚为大观。

明自中期以来，治学流于浮泛，空言心性之学嚣然尘上。明清之际，思想界掀起大潮，黄宗羲、顾炎武提倡尊经重史，一洗言心言性之学的流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一时间，实学思潮兴

起。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他继承乃师及顾炎武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倡于民众、国家有所补益的学问，反对脱离现实。他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过理学，但他的学术思想中理学的成分极少，实事求是的精神贯串其史学著作中，体现了健实向上的学风。

有感于当时众多儒生对经世之学的偏见，万斯同写信向他的侄子、当时已颇有成就的万言（字贞一）诉说自己的心迹。信中大致讲了三部分内容：其一，规劝万言从古文词的局限中跳出来，从事经世之学；其二，批判了当时俗儒将学术与经济分为两途的做法；其三，阐述了自己经世之学的内涵，指出经世本来就是孔孟之学的家法，经世决非修修补补，而是要求之于“典章法制”，编以史书，以求今用。

这封信写得从从容容，语气谦和但又不失治学为世的责任感。他规劝侄儿放弃古文词，说理透辟，发人深思。我们从中可以受到很多教益：学问决非象牙塔中之事，要与现实紧密相连。关心民众，学术才有希望。

（《石园文集》卷7）

原文：

旬日不见，梦魂为劳，想同然也。近读何书，作何状？尝叹吾子之才，以为远过乎我，而惜其仅域于古文词也。今天下但知制举业矣。使有一读书好古之士，鄙举业为不足道，而力工诗歌古文以庶几于古之作者①，岂不诚贤。顾儒者当为之事，宁无更进于此者乎？其上者，如身心性命之学，此犹饥渴之于饮食，固不俟言矣。至若经世之学，实儒者之要务，而不可不宿为讲求者，今天下生民何如哉？历观载籍以来，未有若是其憔悴者也。使有为圣贤之学而抱万物一体之怀者，岂能一日而安居于此。夫天心之仁爱久矣，奚至于今而独不然，良由今之儒者，皆为自私之学而无克当天心者耳。吾窃不自揆，常欲讲求经世之学，苦无

与我同志者；若吾子者，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为之才，是可与我共学矣。奈何，专专于古文，而于经世之大业不一究心也耶，夫吾之所为经世者，非因时补救，如今所谓经济云尔也，将尽取古今经国之大猷，而一一详究其始末，斟酌其确当，定为一代之规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若谓儒者自有切身之学，而经济非所务，彼将以治国平天下之业，非圣贤学问中事哉，是何自待之薄而视圣学之小也。

吾尝谓三代相传之良法[②]，至秦而尽亡。汉、唐、宋相传之良法，至元而尽失。明祖之兴[③]，好自用而不师古，其他不过因仍元旧耳。中世以后，并其祖宗之法而尽亡之。至于今之所循用者，则又明季之弊政也。夫物极则必变，吾子试观今日之治法，其可久而不变耶？天而无意于生民，则已耳。天而有意于生民，必当大变，其流极之弊，而一洗甚陋习，当此时而无一人焉，起而任之，上何以承天之意，下何以救民之患哉，则讲求其学，以需异日之用，当必在于今日矣。吾窃怪今之学者，其下者，既溺志于诗文，而不知经济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则以古文为极轨，而未尝以天下为念，其为圣贤之学者，又往往疏于经世，而不知为。于是学术与经济，遂叛然分为两途。而天下始无真儒矣，而天下始无善治矣。

呜呼！岂知救时济世，固孔孟之家法，而已饥已溺，若纳沟中，固圣贤学问之本领也哉。吾非敢自谓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与语此，故不惮昌天下之讥而为是言[④]，愿辍古文之学而专意从事于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烂然于胸中，而经纬条贯实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用则为帝王师，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法，始为儒者之实学，而吾亦俯仰于天地之间而无愧矣。苟徒竭一生之精力于古文，以蕲不朽于后世[⑤]。纵使文实可传，亦无益于天地生命之数，又何论其未必可传者耶。由此力学不为无用之空言，他日发为文章必更有卓然者，又未始非学古文者之事也。吾

子其尚从吾言而无溺于旧学，幸甚，幸甚。

注释：

①庶几：差不多。

②三代：指夏、商、周三个朝代。

③明祖：指明太祖朱元璋。

④惮：畏惧，害怕。

⑤蕲：通“祈”，求。

译文：

十余日不见，魂牵梦绕，想必你也是如此。近来读些什么书？近况又如何呢？我曾感叹你的才能远胜于我，只可惜仅局限于古文词一个领域。如今天下之士只知科举考试。假使有一个读书好古的士人，认为科举不值一提，而致力于诗歌古文的创作，以与古代的作者相抗衡，岂不是真正的贤人！儒生应当做的，不就是要在这方面求取发展吗？其最高境界，比如身心性命之学，就像饥渴之人见到饮食，固然不用多说。至于经世致用之学，确实是儒生的重要事务，不能不经常讲求。如今天下百姓的情况怎样呢？自从有了历史记载以来，还没有像如今这样处境悲惨的。这使那些讲求圣贤之学、而又有万物一体之情怀的人，怎能坐视不管、安居于此呢！很久以来，上天之心传布仁爱，为何到了今天却不这样了呢？这都是因为今天的儒生争为自私自利之学，而不能够克制自已以适应上天之心啊。我不自量力，时时想讲求经世致用之学，只是苦于没有人和我志同道合。像侄儿你，既有好古之志，又有足够的才能，可以和我共同讲学论道。无奈你太专意于古文，于经世大业不尽心。我所追求的经世境界，决非根据现实问题修修补补，比如经常听说的“经济”等等。而是要尽取

古今治国的方法，一一探究其始末，反复斟酌推敲其是否确当，编成一代宏文大典。使今天坐而论道的人，他日能起而行之。有人说儒生自有切身之学，而经济不是所要研究的，他们认为治国平天下之业，不是圣贤学问中事，这又是何等妄自菲薄！把圣贤之学看得多么狭窄呀！

我曾说，夏、商、周三代相传之良法，到秦时全部消亡。汉、唐、宋相传之良法，到元全部丧失。明太祖兴起，刚愎自用而不效法上古，其他方面也不过是因袭元朝旧典而已。中叶以来，即使是祖宗之法也都全部消亡了。至于今日所遵循沿用的，又都是明末弊政。事物发展到顶点就要发生变化，你看如今的治理方法，能长久不变吗？上天不拯救民众，也就罢了，如果上天拯救民众，一定会出现大变动，从而一洗流弊陋习。如果这个时候没有一个人奋起而担当大任，上何以承天意，下何以救民患啊！因此讲求经世之学，以满足他日之用，当然就在今天。我曾私下奇怪，如今的学者，末流人物则沉溺于诗文之中，而不知"经济"为何事。稍微知道振作超拔的人物，则又把古文当作最终追求，而不曾以天下为念。那些追求圣贤之学的人物，则又往往忽视经世致用，不把它当作追求目标。于是学术与经济，被叛然分为两途。自此而始，天下没有真正的儒生，没有有效的治理方法了。

呜呼！他们哪里知道，救时济世，本来就是孔孟的家法。就像饥渴之人，把头伸到水沟中饮水一样，这本来是圣贤学问的根本呀。我不敢说我就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侄儿你的才能志向使我能够与你谈论这些，因此不怕遭受天下之人讥笑而说了上面那些话。希望你放弃古文之学而专心从事经世之学，使古今典章法制烂熟于胸中，条分缕析，纵横贯穿，可建万世之长策，他日能用上，就是帝王师，不被重用，则著书名山，为后世立法，这才是儒生之实学，我也可以俯仰天地之间而不觉得惭愧了。如果

只是将一生精力用在钻研古文上，以求不朽于后世，纵使文章可以流传后世，也于天地性命无补，又何况未必可以流传后世呢。由此看来，致力于学术，不做无用之空言，他日凝结成文章，必定成就卓著，这不是仅仅从事古文所能做到的。侄儿能听从我的话，不沉溺在旧学之中，我也就感到万幸了。

致状元顾晴芬书

云　仙

题解：

这封信是云仙写给顾晴芬的一封情柬。

云仙，俗姓陆，清代余杭（今浙江杭州）人，带发修行。

宗教的禁欲，从根本上违反人性，难以通行。云仙对顾晴芬的恋情，就是一个明证。

此柬的突出之处，就在于极为细腻地描绘了一个“方外人”心存“方内”之想的矛盾、苦闷心理。从宗教的教义看，她应“五蕴皆空”，斩断一切使人“意马心猿”的缕缕情丝；但她又是一个青春少女，大自然那“名花解语，好鸟弄晴”、“清风徐来，荷香清暑”的美好景色，无不使她痴迷沉醉，从而萌生出寻情觅爱之心。恰在此时，她与顾生相识，堕入情网。从而感受到道观门外的幸福，发生“人生至此，不负青春”的欣慰之叹。但她毕竟是道场中人，虽然对佛道“五蕴皆空”不信，以为“云空未必空”，但对自己的忘情仍心存罪感，以为“堕落苦厄障中”。这种理念与情感的搏杀，内心的煎熬，表现出世俗男女恋情所没有的独特个性色彩。

文字优美疏畅，构景清新自然。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筑庵在云栖烟霞之间，一琴一瓢，一炉一钵，亦啸亦咏。春

来名花解语，好鸟弄晴；夏时清风徐来，荷香清暑；秋月明辉，蟾华皎洁[①]；冬日可爱，岭秀孤松。有时引鹤于孤山断桥之畔，凭眺晚晴；亦有时泛舟于柳浪花港之中，倘佯美景。怡然自乐，悠悠忘机[②]。

不期潘岳投闲[③]，携琴湖上，顿使妙常[④]感遇，惊燕帘间。撤帐夜寒，帏灯春暖，人生至此，不负青春。别来经岁经年，伤情伤意。李易安[⑤]词："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一语，可为我写照。以寄左右[⑥]，君闻之，当不知并何感触也。

君廷试以第一人入选，闻之雀跃三百。从来才人，均须经过此一日。此日志高意得可知，然不知经多少日之锻炼而成，始不负此日之举。方外人[⑦]闻之，均为之色喜。要亦有一段情缘在，情缘一结，索解殊难。我非大彻大悟人，于此中三昧[⑧]，放得过，忍不过。近来只觉意马心猿[⑨]，羁勒不住。日在清静道场中，夜永如年，颠倒梦想，不能自已。《经》云："照见五蕴皆空"[⑩]。我说，五蕴皆空，即非五蕴皆空。作如是观，何住应云耶[⑪]？此吾之堕落苦厄障中，君能一度[⑫]否？云栖烟霞之间，一庵如寄，怎禁得风雨飘摇。同是天涯沦落人，青衫泪湿君怀袖[⑬]。蒲团枯寐，垆香琴韵，非复旧时。春秋佳日，啸咏情怀。质之金马玉堂人[⑭]：当如何发付我也？

注释：

①蟾华：月光。传说月亮中有蟾蜍，故以"蟾"为月的代称。华，光辉，光彩。

②忘机：忘却计较或巧诈之心。

③潘岳投闲：潘岳，字安仁，晋代人，美姿仪，后常借以称妇女所爱美的男子、美男子。投闲：乘隙，趁空。

④妙常：姓陈，女尼，与观主的侄儿潘必正相爱，观主发现后，逼潘必正去临安赶考。妙常追到秋江河边，在老梢公

的帮助下，终于追上了潘必正。

⑤李易安：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宋代著名女词人。其《醉花阴》词有“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等语，用比喻和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多愁善感、怀人思远的上层妇女形象，是历代传诵的名句。

⑥左右：对受信人的敬称。

⑦方外人：世外人。僧人、道人被称为方外人。

⑧大彻大悟：佛教用语。指去烦恼，悟真理，破迷妄，开真智。三昧：佛教用语。谓心专注一境而不散乱的精神状态。《大智度论》卷五：“善心一处不动，是名三昧。”

⑨意马心猿：谓意如奔马，心似躁猿。比喻心意不定。

⑩照见五蕴皆空：唐玄奘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五蕴：佛教用语，即色（形相）、爱（情欲）、想（意念）、行（行为）、识（心灵）。

⑪何住应云：《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这里“何住应云”即由“应云何住”变化而来，即怎样压抑约束欲念之意。

⑫度：宗教术语。谓使人解脱人世的苦难。到达仙佛境界。

⑬“同是天涯”二句：白居易《琵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

⑭金马玉堂：汉代有金马门，玉堂殿。后亦以金马玉堂称翰林院。

译文：

在云栖烟霞之间，筑有一庵，一琴一瓢，一炉一钵，可啸可咏。春来名花解意，好鸟舞晴；夏时清风徐徐，荷香清暑；秋月明亮，月光皎洁；冬日可爱，岭秀孤松。有时在孤山断桥旁边看

鹤，凭眺晚景；有时也在柳浪花港之中泛舟，倘佯美景。怡然自乐，悠悠间忘却了巧诈之心。

不料，潘岳乘此时机，于湖上抚琴，顿然间使妙常感怀知遇，燕惊帘中，撤帐夜方寒，帏灯春正暖，人生至此，自应不负青春。分别经年，伤人情意。李清照词道："帘卷西风，人比共黄花瘦"一语，可说是我的真实写照。特寄送于君，君知此后，不知有何感触？

君廷试以第一名入选，众人听罢雀跃欢呼。自古以来的才人，均需经过这一天，这一日的志满意得，可想而知，但不知道要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艰辛努力，才能有这一刻的到来。世外人知晓后，均为此面呈喜色。因为有一段情缘存在，情缘一结，解释极难。我并非大彻大悟的人，对于此中三昧，放得过，忍不住。近来只觉得心猿意马，扼制不住。白天在清静的道场中，晚上则苦渡如年，胡思乱想，难以自已。《经》上说："照见五蕴皆空。"我说，五蕴皆空，即并非五蕴皆空。如此看来，如何约束欲念呢？这说明我已堕落入苦厄障中，君能解脱吗？在云栖烟霞之中，孤立一庵，怎奈得风雨飘摇。同是天涯沦落人，青衫泪湿君怀袖。在蒲团之上孤寐，在垆香旁抚琴，已与过去有异。值此春秋佳日，抒发情怀。请问金马玉堂人：当如何发落我呢？

答周煦春书

陈凤仙

题解：

这是陈凤仙写给周煦春的一封情书。

陈凤仙，清代吴（今江浙一带）人。周煦春表妹，才貌绝伦，后成夫妇。

思念之辞，在相会之后更显得凄艳动人。由此柬可知，这是一个看似纤弱，但在情感追求中却勇敢大胆的女性。她先忆与所爱的欢会，再叙别离所引发的痛苦，最后表达结为伉俪的强烈愿望。用精当的比喻，夸张的语言，赞美对方的才貌，以映衬自己的相思之深。特别是形容自己因思念而情怀落寞，忐忑不安的心情时，对恋人所赠金蟆戒指加以发挥："是岂金鱼金蟆，在吾心之跳跃耶？"极为生动传神。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周郎足下：妾守香闺，一任春色年年，不解着看花眼①。不意天台之洞未扃②，使我刘郎直入，百炼钢竟化作绕指柔矣③。数宵恩爱，一旦分离，使妾落落难言④。念兄之姿貌也，六郎似莲花也⑤；忆兄之才华也，李白唾珠玉也⑥；想兄之笑语也，萧郎吹凤箫也⑦。早知相会倍相思，何似当初不相识。

向者所赠金鱼扇坠、金蟆戒指，然扇坠在手，玉人在心；戒指在指，情人在握。睹物兴怀，心如舂杵；是岂金鱼金蟆，在吾

心之跳跃耶？此虽表记，实作愁端。嗟哉愁乎！梦断巫山岭上云[⑧]；嗟哉愁乎！泪流扬子江中水。妾不知离恨天如此其高也[⑨]！妾不知相思海如此其深也。妾无他愿，苍穹有意，后土有情，两姓有缘，三生有幸[⑩]，使妾得与兄作并头莲、比翼鸟，吾愿毕矣。纸短情长，略抒数语，伏惟心照。荷荷[⑪]。

注释：

①花眼：花心。施肩吾《赠友人下第闲居》："花眼绽红斟酒看，药心抽绿带烟锄。"此句言自己不解春情。

②天台之洞：天台山桃源洞。南朝宋刘义庆《幽明录》载：东汉刘晨、阮肇在天台桃源洞遇仙女。此处"刘郎"指周煦春。

③百炼钢、绕指柔：刘琨《重赠卢谌》："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里指爱情经过艰苦锻炼而成熟。这几句暗含男女欢合之意。

④落落：孤单寂寞的样子。

⑤六郎似莲花：唐武则天的宠臣张昌宗，排行第六，貌美。杨再思奉承他说："人言六郎似莲华，非也，正谓莲华似六郎耳。"莲华：荷花。

⑥珠玉：这里比喻精美的诗文。

⑦萧郎吹凤箫：萧郎即萧史，传说为春秋时人。善吹萧，作凤鸣。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为作凤台以居。一夕吹箫引凤，与弄玉共升天仙去。事见《列仙传》上。

⑧巫山岭上云：宋玉《高唐赋》："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辞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人附会，为之塑像立庙，号为朝云。后称男

女幽会为巫山、云雨、高唐、阳台，皆本此。

⑨离恨天：俗传“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喻男女之情不得通的怨恨愁苦。

⑩三生：佛教语。指前生、今生、来生。

⑪荷荷：怨恨声。

译文：

周郎足下：妾独守香闺，一任春色年年，不解春情。不料天台山桃源洞未关，使我的刘郎直入，百练千锤的钢竟然柔似绕指。良宵数夜，恩恩爱爱，一旦分离，使妾孤单寂寞。念及兄的姿貌，可以说是六郎似莲花；回忆兄的才华，可谓李白吐珠玉；想到兄的笑语欢声，恰如萧郎吹风箫。早知相会倍相思，何似当初不相识。

过去兄赠给妾金鱼扇坠、金蟆戒指，扇坠在手中，玉人在心中；戒指在指上，情人手心握。睹物思人，心跳不已；这难道是金鱼金蟆在我心中跳跃吗？这虽是表征，实为愁绪。唉，愁啊！常梦及巫山岭上相会；唉，愁啊！泪水涟涟，恰似扬子江中水。妾不知离恨天如此之高啊！妾不知相思海如此之深啊！妾没有其它心愿，苍天有眼，后土有情，两姓有缘，三生有幸，使妾得以与兄作并头莲、比翼鸟，妾的心愿终了。纸短情长，略抒数语，谨望心心相印。痛心啊！

与武林某生

潘意珠

题解：

这封信是潘意珠写给武林某生的一封情书。

潘意珠，妓女。清代人，生平不详。

全篇以“冷”字相连，使之成为主旋律。先从春冷开头，写到情人的“携冷襆”、“望冷湖”、“吟冷诗”、“参冷禅”等动态行为，而这些又是从作者思念想象中出现的时令特点，由此，文章又过渡到闺中人的主观情感氛围中来。从“冷凄的闺房”以下，每一“冷”字，都是作者爱恋之情的表露；每一“冷”字，都蕴藏着“热”的情爱。以冷写热，情趣盎然。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入春来殊冷冷。闻足下携冷襆①，入南屏②，望冷湖，吟冷诗，参豁公③冷禅，亦忆及冷闺中人否？小窗冷梅破额，刻下烹冷泉，煨冷芋，期君冒冷而来，说几句冷话。万勿以冷却之也。

注释：

①襆：铺盖卷。

②南屏：山名。在浙江省杭州西湖之南。峰峦环绕若屏，故名。

③豁公：僧正岩，号豁堂，杭郡人，能诗，善画山水，法范

宽、董北苑一派，住西湖南净慈寺。

译文：

入春以来天气极冷。听说足下携带冷铺盖卷，上南屏山，望冷湖，吟冷诗，参豁公冷禅，也记得冷闺中人吗？小窗外冷梅触额，刻下烹冷泉，煨冷山芋，期望君能冒着冷气而来，说几句冷话。万勿以冷为由推却啊！

与凌郎

彩　云

题解：

这封信是彩云写给凌郎的一封情书。

彩云，妓女。清代人，生平不详。

此柬从对方诗画的精妙，引出对他的怀念，通过“焚香”、“煮茗”的具体意想，抒发了自己不能相伴相依的凄凉缺憾。最后提到赠给对方的手帕和诗，即是自己情感的寄托，也有希望凌郎不要忘怀的企盼。文词清丽，情感真挚婉转。青楼女子，送往迎来，命运悲苦。一旦动情，便分外投入。

（《历代尺牍小品》）

原文：

把玩诗画，逸致遥情。诗中有画，画里传诗，令人寻味不尽。先生真摩诘虎头矣[1]！

妾苦命薄，人远天涯，不得追陪巾栉，时一焚香，一煮茗，常侍于风流才子之侧。辗转愁思，唯有对菱花而太息，倚朱栏而神注耳。

手帕一方，漫云琼报[2]，亦谓鲛绡拭目，奉君见之，点点皆妾泪痕也。《春闺》二首，惭非苏女回文[3]，唯情见乎词，知峡上哀猿，夜半声楚，当不忍以章台柳膜外视之矣[4]。短笺莫诉，長漏为仇。书来应郑重，莫作等闲看。

注释：

①摩诘：王维，字摩诘，唐代著名诗人。宋苏轼《书摩诘兰田烟雨图》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虎头：晋大画家顾恺之的小字。

②琼报：以更美好的礼物回报。《诗经·卫风·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③苏女回文：苏蕙，字若兰，前秦窦滔之妻。滔纳妾赵阳台，抛弃苏蕙，蕙织回文璇玑图、诗赠滔，其文回环反复，词甚凄惋，使窦滔回心转意，迎取苏蕙。

④章台柳：喻指妓女。膜外：度外，心意计虑之外。

译文：

把玩诗画，可以陶冶情操。诗中有画，画中传诗，着实耐人寻味。先生真是王维、顾恺之再生啊！

妾命苦福薄，人在天涯，不能追随陪侍，焚香、煮茗。常常侍从于风流才子。辗转翻侧，心愁上涌，唯有独对菱花叹息，倚朱栏而暇想。

手帕一方，奉上漫云回报，也可谓是鲛绡拭目，奉于君前，其上斑斑点点，都是妾的泪痕。愧书《春闺》二首，难与苏蕙回文相比，只是词中见情，得知峡上哀猿，夜半声音凄楚，君当不忍心以妓女而于心意计虑之外相待吧。笺短难尽，日长同仇。回文应郑重其事，万不可等闲而视。

与龚柴文

屈大均

题解：

这封信是屈大均为抒发内心感情而写给龚柴文的。

屈大均，清初文学家。初名绍隆，字介子、翁山，广东番禺（今广州）人。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队伍。失败后削发为僧，法名今种。不久还俗，北游关中、山西，与顾炎武、李因笃等交往。能诗，部分作品揭露清军暴行，感伤时事，诗风明健。与陈恭尹、梁佩兰并称"岭南三家"。有《易外》、《翁山诗外、文外》、《道援堂集》、《广东新语》等。

作者对朋友"日长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的清静生活，以"真神仙中人"称羡之，表面看来，似乎是赞同一种恬淡的田园生活。但联系前面凭吊古战场时所发感叹，则可知诗人是恢复故国不可得而生的一种绝望之情。那"行将归与足下为老圃矣"的慨叹声中，包含了多少难言的隐痛和无奈啊！

（《道援堂集》）

原文：

幕府[①]多暇，出寻武灵、武安战陈之遗迹[②]。恨平生未学古兵法，不得当此黄沙白草，一展所长。徒饮酒赋诗，以送岁月，致千秋之下，以词人目我，岂不伤哉！不如足下闭门灌溉，为於陵仲子[③]之所为，犹得全高士之节。

昔人遭时不偶，则退而为高士。闻足下新家清凉山曲[④]，有

园半亩，种名花异卉，水周堂下，鸟弄林端，日长无事，读书写山水之余，高枕而已。此真神仙中人！

仆劳劳边塞，驰骋无益，行将归与足下为老圃矣。

注释：

①幕府：明亡后，屈大均曾与友人李天生同客代州（今山西代县一带）幕府。

②武灵：战国时赵国国君武灵王。为开拓北方疆土，他提倡向少数民族学习，胡服骑射，颇有作为。武安：即广武君李左车。他曾建议成安君固守井陉，以逸待劳，击退韩信，但成安君不用其计，因此韩信灭赵，并俘广武君。

③於陵仲子：战国时齐国贵族，姓田。他不愿享受富贵，耕作自食。事见《孟子》。

④清凉山：山西五台山的别称。曲：山坳。

译文：

客处幕府，多有闲暇，于是出去寻觅赵武灵王、广武君战斗过的遗迹。后悔平生未学习古代兵法，不能在此黄沙白草之间，一展所长。只好饮酒赋诗，消磨时光，到千秋之后，后人把我当作词人相看，难道不令人悲伤吗？不如足下隐居耕作，效仿於陵仲子，尚能保全高士的气节。

过去的人生不逢时，就隐居起来做高士。听说足下在五台山坳安新家，有田半亩，种植名花异卉，堂外潺潺流水，林中鸟鸣阵阵，闲来无事，读书咏叙山水之余，高枕无忧。这真是神仙生活啊！

在下忙碌边塞，碌碌无为，行将归隐，效仿足下啊。

复 友

诸九鼎

题解：

这封信是诸九鼎写给友人的，内容是描述山水风光的。

诸九鼎，字骏男，清初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著有《乐清集》、《钱庵集》。

此信描写桐庐县严陵一带的山光水色之美。其中“江水综碧”四句，最为精妙。为突出江水的清彻，作者引来两岸“苍崖”，形成比照，又让人乘舟泛游其上，以亲领其“秀色”，此时，更迷人的景象出现了：青山白云，被江水网罗其中，人在船上，仿佛行于白云缭绕的山峰之上。如此诗境，无怪乎作者对友人未能前往深感“惋惜”了。

（《乐清集》）

原文：

省教，知讦士已往严陵[1]。

严陵是仆旧游。江水综碧，夹峙苍崖，人行云影之中，舟在岚翠[2]之里。地比邓林，夙多奇木[3]；人同蒙叟[4]，半住漆园。固是岳内之名区，浙水之渊薮[5]，不独桐君采药，子陵披裘[6]，足堪凭吊己也。

足下未得同行，实为惋惜！

注释：

①严陵：又称严陵滩。在今浙江省桐庐县南，浙江之滨。

②岚翠：青山在水中的倒影。

③邓林：神话中的一个地名，其地多树林。《山海经·地形》："夸文弃其策，是为邓林。"夙：素来。

④蒙叟：指庄子。庄子为宋国蒙人，又曾为蒙漆园吏。

⑤岳内：四方之内，即域内。传说尧时的四方部落领袖称"四岳"，故"岳"亦可指四方。渐水：一名浙江，即浙江。

⑥桐君：生平不详。曾采药求道，止于桐庐县的东山，人问其姓，则指桐。子陵：严光，字子陵，东汉人。少与光武帝刘秀同学。后秀登帝位，召光为谏议大夫。光不从，归隐于桐庐。披裘：《高士传》上："披裘公者，吴人也。延陵季子出游，见道中有遗金，顾而睹公曰：'取彼金。'公投镰瞋目拂手曰：'……暑月披裘而负薪，岂取金者哉？'"

译文：

省教，知讦士已往严陵了。

严陵是仆的旧游之地。江水碧绿，悬崖对峙，人在云影中前行，船在青山倒影之中漂游。其地有如邓林，素来多生奇异树木；当地的人有似庄子，一半住在漆园。本是域内名区，浙江渊薮，不独有桐君采药，且有严子陵披裘，足供游览。

足下未能同行，实在令人惋惜啊！

答薛孝穆书

惠周惕

题解：

这封信是惠周惕就《诗经》中的一些问题与薛孝穆辩论，写给薛孝穆的。

惠周惕，生卒年不详，原名恕，字元龙，一字研溪，江苏吴县人。惠周惕少传家学，特别工于诗与古文辞的创作。壮年时遍游四方，与当代名士交往，文名益著。康熙为笼络士人，举博学鸿词，惠氏在内。康熙三十年（1691 年）中进士，改庶吉士，任密云知县，有善政，死在任上。惠周惕对经学深有研究，有《易传》、《春秋问》、《三礼问》及《研溪诗文集》。其代表著作《诗说》三卷，认为大、小雅是以音区分，不是以政之好坏相别的。认为正雅、变雅是美刺错陈，没有必要分《鹿鸣》以下为正，《六月》以下为变；《文王》以下为正，《民劳》以下为变。凡此等等，其言有据，和中古解诗的人极为不同，从而开近代说诗之先声。

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到，惠周惕研究问题有两点较突出，一是以经解经，二是以考据证实立论，决不像宋明学人立论空疏。虽然他与薛孝穆谈论的都是些具体问题，且非常专门。但我们仍能从信中得到很多启发。我们在研究任何问题时，必须言之有据、持之有故，决不能以狡辩相对。要能抓住问题的根本，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皇清经解》卷 193）

原文：

前致《诗说》三卷[①]，求正足下，足下未阅三日，已了大意，损惠手书，始有称美，继有辨正，盖欲摘其瑕者必先指其瑜，此足下委曲开诱之盛心也。仆于足下之谀，我敢自喜，足下之规，我敢自是哉？然仆立说之旨，惟是以经解经，而反复来书，似与经有相戾者，不敢舍我说而从足下也。足下谓仆之可删者，盖《艳妻》、《鸢鱼》二条其说无大关系[②]，从足下删之可也；谓仆之可商者，其一则《桃夭》、《摽梅》二章[③]，此仆论诗之取兴也[④]。桃之花后于梅，宜兴男女之后时。梅之花先于桃，宜兴男女之及时。而诗言反是，故知不取花而取实也。《诗》之比兴犹《易》之取象，非如今人信口任臆谩取一物，而谓之比兴也。且仆之言固有所本矣。足下乃谓古人以二至之前后[⑤]，或纯阳，或纯阴，不宜于男女之会，会则恐伤阴阳之和，男女有不永年者[⑥]。不知足下据何经文也。以仆所闻九月至正二月，月皆为昏时。孙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杀止[⑦]。"《家语》曰[⑧]："霜降妇功成而嫁娶行焉。"冰泮农事起，昏礼杀于此。霜降者，九月也，冰泮者，正二月也。故《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⑨]。"则九月至正二月，皆为古人昏时。而足下谓冬至，纯阴不可会男女，得无悖于礼乎？不知足下所据何书？而仆何未之前闻也？足下又谓适有此花，其色少好，其叶美盛，而且有实，故诗人以为言。夫桃之始花，未有叶与实也。花、实非一时事。足下比而合之，亦未之致思矣。其一则论《生民》之姜嫄[⑩]，此外辟郑说之妄也[⑪]。足下不然吾言，犹为有据，不如前说之臆造也。然足下所言，昔人已尽言之。仆向时不置辩者，以为不足辨也。今不得不为足下辨矣。足下谓姜嫄配合生子，人道之常，何以名之曰弃，何以置之隘巷、平林、寒冰。仆则谓姜嫄之弃后

稷，盖以不坼不副之异，非以感上帝之异也。郑庄寤生[12]，姜氏恶之[13]；芮司徒女赤而毛[14]，弃之堤下，若此类者亦将谓之有感而生邪？而司徒之女何以亦名之曰弃邪？子文之贤，虎且乳之[15]，则鸟之覆翼，牛羊之腓字[16]，未足为后稷怪也。乌得以郑氏妄诞秽亵之论诬上帝以及姜嫄哉？足下谓疑而未决者，则仆论归宁非礼一条[17]，此系仆之创见，宜足下之骇而未肯信也。然仆据孔子《春秋》以驳左氏，不为无据，足下欲反吾说，亦必证据于六经，而后可与仆合要，今但引仆所驳左氏一语，则仆之所据者《经》，足下之所据者《传》，以传驳经，已为轻重失类，而又无他事可援，则足下为不能举其契矣。且足下亦知左氏之传有自相刺戾而不可从者乎。左氏曰，诸侯之女归宁曰“来”，又曰夫人归宁曰“如某”，则文姜之如齐[18]，得谓之归宁，而文姜之如莒，亦得谓之归宁邪？其言前后反复刺谬如此，此仆所以据《经》以驳《传》也。

仆闻，古人立说，彼此不妨异同，然其要归必折衷于《六艺》[19]，未闻率臆任心，无所证据，如前者云云也。足下规仆，仆藉是以规足下，盖友朋之道应尔，非仆之不能商论下气也。幸思之。

注释：

①《诗说》：书名，惠周惕撰，三卷。

②《艳妻》、《鸢鱼》：《诗经》中的诗句。《小雅·十月之交》有“艳妻煽方处”。《大雅·旱麓》有“鸢飞戾天，鱼跃于渊。”

③《桃夭》、《摽梅》：《诗经》中的篇章。分别见于《周南》、《召南》。

④兴：《诗经》六义之一，是诗歌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先言外部事物以引起所咏之事，兼有发端与比喻的作用。

⑤二至：冬至和夏至。

⑥永年：长寿。

⑦孙卿：即荀子，又称荀卿，战国时期思想家。冰泮：冰融、解冻。

⑧《家语》：即《孔子家语》。该书已佚，今本《孔子家语》为三国时王肃伪造。

⑨《诗》曰：……：《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的句子。

⑩姜嫄：周族始祖后稷之母。神话传说她踩巨人脚印感孕而生稷，模样怪异，将其遗弃，但最终还是抱回养育，故后稷又称弃。

⑪郑说：郑玄的说法。郑玄为东汉经学家。

⑫寤：逆，不顺。

⑬姜氏：春秋时郑武公妻子武姜，郑庄公之母。

⑭芮司徒：指周的司徒芮伯。

⑮子文之贤，虎且乳之：子文，即楚国的令尹子文。据说子文刚生下时，被遗弃在云梦泽边，后得老虎哺育而活下来。

⑯腓字：庇阴养育。

⑰归宁：回家省亲。

⑱文姜：鲁桓公夫人姜氏。

⑲折衷：调和二者，取其中正，无所偏颇。《六艺》：即《六经》。

译文：

此前呈上我所著《诗说》三卷，求您斧正，您看了没有三天，就已了解大意，写信给我，有赞扬，也有辨正，指摘错误之前一定先指出优点，这真是您委婉诱导的一片好心啊。我对于您对我的称赞，心中自是高兴，对于您对我的规劝，我能自以为是

吗？我治学立说的宗旨，是用经解释经，但反复阅读来信，似乎有和经相矛盾的地方，因此不敢放弃我的主张而服从您。您说我必须删去的是有关《艳妻》、《鸢鱼》二条的解释，这二条与主题关系不大，根据您的意思删去也就是了。您认为可以和我商榷的，其中之一就是《桃夭》、《摽梅》二章，这是我论《诗经》的取兴的。桃花后于梅花而开，应该是比喻男女错过了时间，梅花先于桃花而开，应该是比喻男女正赶上时间。而诗中所说的正好相反，因此知道不是取花而是取果实进行比兴。《诗经》中的比兴就像《周易》中的取象，并不是像现在的人信口任意选取一物就可称之为比兴。而且我的话是有根据的。您说古人因为冬至和夏至前后，有的纯阳，有的纯阴，不适合男女幽会，如有幽会恐怕要伤阴阳之和，男女就有不长寿的。不知您根据什么经文这样说。根据我所知道的，从九月到二月，每月都是婚时。荀子说："霜降迎娶女人，河冰解冻停止。"《孔子家语》说："霜降时妇女纺织刺绣完成，嫁女娶妻就开始了。"冰河解冻，农事就起来了，婚娶也就停止了。霜降是九月，冰河解冻是二月。因此《诗经》中说："士如娶妻，等到冰河没解冻。"九月至二月，都是古人婚娶之时。而您说冬至是纯阴，男女不能结合，这不是有悖于礼吗？不知您所根据的是什么书？而我为何以前没有听说过呢？您又说这种花，色泽好，叶子茂盛，而且有果实，因此诗人这样说。桃树开花时，没有叶子和果实。花和果实不是同时出现的，您把它们合在一起说，也是没有认真思索啊。其二就是论《生民》中的姜嫄，这是我驳斥郑玄说法的妄谬的。您不同意我的看法，还算是有根据的，不像前面所讲的全是臆造。但您所说的，过去的人都已说过了。我从前没有辩解，认为不值得辩解，今天则不能不给您辩解了。您说姜嫄感巨人之合而生子，符合人道之常，但为何为孩子取名弃，为何将其放到隘巷中、树林里、寒冰上。我则认为姜嫄抛弃后稷，是因为他是一个肉团，裂不开，又

不像人，不是因为感上帝而怀孕。郑庄公生产时不顺，其母武姜厌恶他；芮伯生个女儿红色有毛，遗弃在河堤下。像这样的也能说是有感上帝而生吗？而芮伯女儿的名字为何也叫作弃？像令尹子文这样的贤才，老虎还哺乳过他，那么鸟用翅膀盖着、牛羊庇阴养育后稷，都不足为怪，怎么能以郑玄荒诞秽亵之论来诬蔑上帝和姜嫄呢？您还说疑而未决的就是我论回家省亲不合礼这一条。这是我的创见，您感到吃惊且不敢相信，也是情理中事。然而我是根据孔子的《春秋》来驳《左传》的，不能说没有根据。您想反对我的说法，也必须以六经为根据，然后才可能与我的观点相合。如今只引用我所批驳的《左传》中的一句话来驳我，我根据的是《经》，您根据的是《传》，用传驳经，本来就本末倒置，而且又没有其他证据可以援引，那么您仍是没有抓住要害。而且您也知道《左传》有自相矛盾、不能信从的地方吗？《左传》说：诸侯的女儿回家省亲叫"来"，又说夫人回家省亲叫"到某地去"。那么文姜到齐国去，可以叫作回家省亲，而文姜到莒国，也叫作回家省亲吗？这其中的话如此前后反复矛盾，这也是我所以根据《经》来驳斥《传》的一个原因。

我听说，古人立说，彼此之间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但他们的根本点则是必须以《六经》为标准和证据，没听说过任意发挥，没有证据，就像前面所说的那样。您告诫我，我也借此告诫您，朋友之道在此，不是我不能虚心接受商讨。所幸您能三思。

与友书

王九龄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王九龄写给一位朋友，称赞他文章立意不凡，骨格奇骏。

王九龄，字子武，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康熙进士，官至左都御史。性格恬静有雅量，才思富艳，擅长诗文。有《艾纳山房集》与《松溪词》。

王九龄在信中首先感谢朋友从城里来看望他，并对自己未能对朋友尽到地主之谊而表示道歉。接着，王九龄对朋友的作品作了评论，认为有意境，有技巧，简直可以让盛唐古文名家退避三舍。与李白杜甫的作品比较起来，也不差上下。故而，王九龄表示希望他这位朋友能对他的诗文给予指点。

这封信写得凝炼、直朴。有的信因要述及数事，头绪纷繁，难得其要领。此信所表述的内容就属这种情况。但作者却叙述有序，条理井然，在写法上足资借鉴。

（《艾纳山房集》）

原文：

前承老先生年台[1]轩车枉顾，缘僻处荒村，离城六十余里，有失倒屣。随厕名诸同人之末，奉邀大驾，又不获趋陪宴笑，弥深耿愧！

昨奉读瑶篇[②]，格律高浑，意旨清深，直令盛唐诸名家退避三舍。迩来古调不弹，虫吟瓦响[③]，争鸣于世；今得老先生李杜文章，振起颓靡，真风雅之极幸矣。膺服何已！不揣效颦，呈削！珠玉在前，自觉形秽，如何？幸直教之为荷！

刻下拟轻舟奉谒，因贱体冒风[④]，而家君[⑤]又以年衰，惮于远出，东道之谊，殊抱歉然。外具微物，聊供一箸，伏冀笑留。家君命笔申候[⑥]。临颖翘切！

注释：

①年台：对同年的尊称。

②瑶篇：对别人诗文的美称。

③虫吟瓦响：喻指低下平庸的诗作。瓦，瓦釜，一种陶制的炊具。

④冒风：染病。

⑤家君：旧时对外人称自己的父亲。

⑥申候：即问候。

译文：

前一段时间，承蒙您老先生乘车来我这里。我这里穷乡僻壤，远离城市有六十多里，实在有失远迎。我的名字有幸附在同仁之后，能够邀请到您的大驾，又没有能够设宴招待，内心实在感到不安。

昨天拜读您的大作，格律高浑，意旨清深，简直可以让盛唐那些大诗人退避三舍。近来古风不振，世上流行的全都是些格调不高的平庸之作。今天得到先生这样的如同李杜文章一般的大作，一扫颓废委靡之文风，真是文学界的幸运啊。佩服之余，冒昧以东施效颦之伎俩，呈上拙文，供以笔削！有您的大作在前

面，我自感惭愧不如。还望先生坦率指教。

本来打算乘小船前去拜访，只因我身体染病，而家父又年老体衰，不愿我离家远出。没有尽到东道主的义务，非常抱歉。另外送上一些薄礼，供先生品尝，望您收下。家父让我写信向您问候。向往之心难以言表。

与曹秋岳先生书

嵇永仁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嵇永仁向曹秋岳谈论他求学经历以及治学心得，并希望能得到曹秋岳的帮助，将曹秋岳的诗文抄录一个副本。

嵇永仁，字留山，别号抱犊山农。无锡人。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作乱。嵇永仁在总督范承谟幕府，同被拘系。范承谟遇害，嵇永仁亦死。康熙四十七年，追赠国子监助教。著有《抱犊山房集》六卷。是集主要为嵇永仁陷狱时，与范承谟及同难诸人唱和诗，另外还有为同难诸人所作小传。

嵇永仁出身贫寒，但一心向学。从这封信中便可看出嵇永仁的求学经历及其中甘苦。他在以诸生身份做幕僚时，偷空研究《汉书》一年、唐宋诸子一年，还准备进一步研读《尚书》。这样才算把古文的家派和脉络弄了个大概，但即便如此，一拿笔让自己来做文章，便又手足无措，不知从何处下手。于是，嵇永仁体会到，古人学问都不是从书本上、书房里死读出来的，而是在大自然中、在社会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所以，光读别人的文章是永远写不出好文章的。嵇永仁说，他自己悟出了这个道理之后，就回到故乡，闭门不出，想把其中的道理进一步弄个明白。无奈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无衣无食，于是，他只好再次为人做幕僚。接着，嵇永仁又对曹秋岳表示感谢，像曹秋岳这样一个前辈能对他表示赏识和关心，这使嵇永仁深为感动。最后，嵇永仁希望曹秋岳能把他的诗文全集借给自己，以便把它抄录一个副本，使之

能够广为流传。

这封信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一个自学成才的学问家的经历，值得人们学习。同时，这封信还昭示出一个真理：不论何时何地，真正的学问永远不属于书本，而属于生活。

（《抱犊山房集》卷 5）

原文：

桑干风沙之内曾邀先生枉顾，拳拳以生事学业为问。诚哀家贫而忧失学也。嗣后某随大叅胡公复过金娄，偷暇读《汉书》一年，读唐宋诸子又一年。王子于一[①]更劝读《尚书》。于是粗辨古文家数。然举笔临文，则又茫然矣。窃叹古人学问有成，类皆牧牛耕犊樵山渔水，于穷困发愤得之。未见有寄人篱下、温衣饱食而能窥文章堂奥者也。某弃而之闾里，思欲究竟此道，坚不出门。奈老亲弱弟衣食不继，不得已复走风尘，为观察祖公所留。公稔某缘养亲而出，为预备父母百年事，恒驰寄菽水[②]。某感其恩遇，条画治河数策。时河苦迁徙，口决运梗。中外惴惴，观察以策上河宪，河宪上大府。各嘉纳报，可不半年功告成。某得抽身还吴。因念江南文衡客岁有伯乐之顾，益急图下帷。恐负知己，乃还。视故乡无一枝可棲为养亲地，又不得不担簦出游冀越中。当路稍润巾缾，归买一亩之宫，卒妻孥、奉高堂，甘旨再出。余赀俾弱弟分半耕读。某亦得不忧饥寒。则三十年以后之心思气力皆可不用之衣食，而专精毕虑于文章。此某生平之荣愿也。某到湖上之日，即谒林铁崖先生。始知先生读书客中，便期趋侍教诲，以足痛，未果。不意先生折节先枉存我之逆旅，何前辈爱士急而怜才切也。夫轩盖声施之地，往往奔走贫士，有同雁鹜，而士之伛偻屈折于其门者，仰伺奴仆意色，求一登堂不可得，岂敢望大人先生之就见哉？某于今窃自幸矣。幸大人先生既不我鄙弃，则必以若人或有一得可节取而造就之，故不惮孜孜汲

引。是以聊自壮也。抑闻先生嘱铁崖先生语须劝勉嵇子读书至谆至切，则又何相见之暂而相期之深，遂相督之严也。某思古人学问要皆有得力亲切之人，如一瓣香。专归南丰者③，事非一二。某待今人诗文颇严，然亦不肯轻恕古人。若时贤中大人先生有类先秦、两汉、初唐者，则又不啻古人之好好之矣。方今海内名硕辄云子云④多而桓谭⑤少。某正谓子云未必多也。不过往来称弟子者，一二虚声，侯芭耳芭。文不见于世，乃以为扬雄之书胜《周易》，殆过谀甚矣。某不尔也。某于当今巨公诗若文，顾亦曾手追成书矣。然每不自量，窃欲厉掌奋膝，以绍禹功。独于先生诗文未获全本。十年之内，或从一箑一笺积累钞录，合诸体不满二三十首。以此为平生憾。常拟负芨蹑跻⑥，不计道里修阻，从先生小胥私乞缣缃，缮写数帙。又苦魏勃无路可効扫门。今幸先生驻此，则某可省梦寐之劳，与风雨邮置之瘁。先生顾何惜尽倾所藏，稍饫调饥，使一介鲰生稛载而归淮水也乎。伏楮待命，可胜发愤。

注释：

①王子于一：即王于一。名猷定，字宇一，名轸石，明末清初人。家江西南昌。善画。

②菽水：豆和水。指普通的饮食。常用以称子女供养父母。

③南丰：即今江西南丰县。

④子云：即扬雄。西汉哲学家。著作有《太玄》、《法言》。

⑤桓谭：东汉初人。经学家。著有《新论》。对谶纬持批评态度。

⑥负笈蹑跻：即蹑跻担簦之意。跻，草鞋；簦，有柄的笠。都是走远路的用具。意指远行。

译文：

桑乾风沙的时节曾经邀请先生相访，只希望能够向先生请教学问。使人痛苦的是因为家贫而担心无法学习。后来我跟随大紊胡公再次路过金娄，偷空研读《汉书》一年，又研读唐宋诸子一年。王子于一还劝我去研读《尚书》。于是，对古文家法门派略有所知。可是，等到提笔写文章，则又茫然无措了。我感叹古人学问凡有大成就的，就好比在山上放牛、在田里耕种、在山上砍柴、在水里捕渔，都是在穷困发愤的情况下获得的。没有见过寄人篱下，吃饱喝足，舒舒服服地去进入到文章的殿堂里面的。我被遗弃到乡下，准备探索这里面的道理，闭门不出。无奈父母老迈、弟弟幼小，无衣无食，不得已只好再次闯荡社会，被观察祖公所挽留。公考虑我是因为养活父母弟弟而出来做事的，为了给父母准备百年后事，便长期地供给我普通的饮食。我感激他对我的知遇之恩，献上了好几条治河的对策。当时，河道变迁，经常决口，影响运输，朝廷内外无不担忧。观察把我的对策呈上河宪，河宪又呈上大府。各方面反应都很好，用不了半年就可大功告成。我就可以借此机会返回吴地。因考虑江南文衡客岁有伯乐之顾，更是急于到那里求学。恐怕辜负于知己，于是返回。看到家乡没有一处可以栖身安居，成为赡养父母的地方，又不得不担簦来到冀越一带。路上稍稍挣了一些钱，回家买了一亩田地，带着妻子和孩子，奉高堂甘旨再出。其余的钱分给贫困的弟弟，让他边耕边读。我也可以不必为饥寒交迫而发愁了。这样，三十年以后的心思精力，都可不必用来考虑吃饭穿衣，而专心致志于写文章了。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我一到湖上那天，马上拜访林铁崖先生。才知道先生读书客中，便希望能够立刻向先生请教。但又因脚疼，未能成行。没想到先生屈尊先来看我，前辈关心读书人的心情实在是太迫切了，而爱惜有才气的人的感情又实在是

太诚挚了。像那些华盖歌舞之地，来来往往奔波的读书人，就好似孤雁，而读书人卑躬屈膝地投拜于权贵的门下，仰着脸察看奴仆的眼色，恳求见一面尚不可能，怎敢奢望大人先生亲自来拜访呢？我今天实在是太幸运了。大人先生既然没有看不起我，那么，必定以为我这个人可能还有一技之长可以培养。所以，不避忌讳地孜孜汲引。这足以使人自得。还听说先生嘱咐铁崖先生要劝告和鼓励我读书需更加认真刻苦，这真是相见虽短但期望甚深，而督导尤为严格啊。我认为古人学问关键都在于能得到真心关心他的人的用心指导，就好像一瓣香。专归南丰者事非一二。我评价现在人的诗歌文章颇为严厉，然而，也不愿意轻意地宽恕古人。如果现在的学者名流中有类似于先秦、两汉、初唐的人，那么，我就会像称赞古人那样去称赞他。当今海内名人大家动不动就说子云太多而桓谭太少。我却认为子云未必太多，不过是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自称子云弟子，虚张声势，侯芭耳芭，没有读过什么书，于是就认为扬雄的著作超过《周易》，这只是过分地阿谀罢了。我不会这么做。我对于当代的名家的诗歌文章，也曾亲自下工夫搜集。然而，我太不自量力，竟然要磨拳擦掌，以绍禹功。唯独先生诗文没有得到全本。十年里面，一篇一篇地抄录积累，合起来不到二三十首。这里我一生最大的遗憾。经常考虑挑着行李，不管道路远近，从先生的仆人手里偷偷乞讨一些，缮写整理。又苦于魏勃无路可效扫地。现在正巧先生来到这里，这样，我可以减省朝思暮想的辛苦，以及风雨奔波的艰难。先生为什么不把您所藏诗文拿出来，稍饫调饥，使我这一介书生满载而归，回到淮水呢？我这里等待您的回答，实在渴望。

上孙给谏书

蒲松龄

题解：

此信时间不明，是蒲松龄写给孙给谏的，劝他珍惜自己为官的名声，提防被无耻小人所利用。

蒲松龄（1640—1715），清代文学家。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人。早岁即有文名，但屡试不第，七十一岁始成贡生。除中年一度在宝应作幕客外，都在家乡为塾师。曾以数十年时间，写成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主要运用唐传奇小说的文言体，通过谈狐说鬼的表现方式，对当时的社会、政治多所批判。又有《聊斋文集》、《聊斋诗集》等。

清初，文网日密，读书人的生活日渐局促。大部分人都忙着去参加科举，少数人则逃隐山林。蒲松龄和大多数人一样，也热衷于功名，但偏是命运不公，屡屡应试，屡屡不第。精神之压抑与沮丧，较之《儒林外史》的范进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五十中举的范进，对于七十一岁才捞得一个“贡生”头衔的蒲松龄来说，已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美梦和极乐之境了。但命运的不公没有打垮蒲松龄的意志，他一边在农村教书，一边写作，写出了中国古代最出色的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同时，他出于一个正直的读书人的良心和道义，对社会上和身边的种种黑暗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和鞭笞。

这封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直接证明。在这封写给孙给谏的信中，蒲松龄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农村社会的种种丑恶现象，对普

通的乡下农民寄寓了深切的同情，并直言不讳地对孙给谏提出批评和建议。在蒲松龄看来，做官而又有名声的，既是好事，又是坏事。所谓好事，就是说做官能为百姓办事；所谓坏事，就是说做官的名声被无耻小人所利用。所以，蒲松龄希望孙给谏：一是“择事而行”。因为凡是当官的手中皆握有权力。这权力既可以用来干好事，也可以用来干坏事。所以，如果不节制自己，谨慎行事的话，就会被小人所利用去干坏事。二是“择人而友”。因为人有各种各样的，有好人，也有坏人。那些有德行的人可以作自己的老师，那些有学问的人可以作自己的朋友，那些爱奉承的人则只能在一块下棋喝酒，而决不能受其所左右。人的本性都是爱听好话，而不愿听诤言的，所以，对于那些谄媚的小人，一开始可能还会厌恶，时间一长，就会渐渐习惯，到后来，还会喜欢听奉承之言。我做坏事，他们也会赞成，甚至还会纵容我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有人批评我，他们也不让我听见。三是“择言而听”。由于人人都崇拜权力，故而，对于权力者发出的指令，人们总是坚决照办，而从不对权力者进行正面批评。所以，一个掌握权力的人要想听到真心实意的话，是很难得的，他应该珍惜。四是“择仆而役”。当官的人大都喜欢用那些听话的人，但这些人也往往是见利忘义之辈。他们经常会打着当官的旗号去为非作歹，甚至做下伤天害理的坏事。这些人还有这些人的亲戚都来投靠当权者，借着当官的权力去吓唬那些无权无势的平民百姓。他们欠了别人的债，犯了王法，都要用当官的这个挡箭牌来保护自己，弄得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反而对当官的恨之入骨。五是“收敛族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当官之人一定要严加约束自己的亲戚、族人，切不可让他们随意打着自己的旗号到外面去欺负百姓。最后，蒲松龄还希望孙给谏能微服私访，来证实一下自己所言是否真实。

这封信写得正气凛然，令人荡气回肠，是一篇极具正义感和

感染力的好文章。作者虽然是一介书生，而且没有丝毫背景，却能如此秉笔直书，仗义直言，对丑恶的社会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实在难得，非常值得今天那些自恃优越的所谓知识分子学习。知识分子需要这种无所畏惧的批判精神。这正是知识分子的良心。但遗憾的是，这个良心早已让狗给吃了。所以，今天读蒲松龄这封信，还能给人以心灵上的震撼之感。且不说他观察之敏锐，分析之深刻，描述之生动，即使就他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勇于批判、为民请命的精神，也足以不朽。

（《聊斋文集》卷5）

原文：

年年落魄，有负故人，自觉面目酸涩，不可以登君子之堂，因而疏节孔多，遂使曩年把臂之交，至不以我为人。古人云："为士者，要使王公大人闻名多而见面少。"某于此处，学得半边圣人，幸知我者勿讶也。所自信者，朋友之情，老而弥笃，可无愧于良友耳。先生铮铮朝宁，真为闾里生光，真为苍生造福！比读闽中闱墨，见月旦中具有深心，乃知河干蹋蹶时，慷慨之心，未尝稍变也。藉藉官声，良惬鄙愿。然而为乡绅者，居官而有赫赫名，甚可喜；居乡而有赫赫名，甚可惧！某欲陈所见闻，又恐听者不我嘉纳，此际徬徨，真与谏臣挑灯属草时，无以少异。顾幸先生能为争臣，知必能容争友。草野之人，不敢谋居官之事，窃以为居乡所当知者，盖有数端，请得而言其略。一曰：择事而行。邑中人惟蠹役宜惩，下此则虽至贱之人，亦无所施吾系辱；邑中事惟利弊可言，除此则虽至微之事，无所容吾招揽。盖居高位者，为善有力，为不善亦有力。我一动齿颊，阶下人将百倍行之矣。苟行所不当行，人受之成我之恶，人不受成我之辱。某每见受者固什九，而不受者亦什一；其什九者皆我所当优容，其什

一皆我所当顾忌者也。某谓先生当今日，不必用自荐之毛遂[1]，为吾争雄；只宜用市义之冯骦[2]，代吾焚券耳。故曰，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人而友。门多士君子，古人贤之矣。德行之人吾所师，学问之士吾所友；至胁肩吾前者，止足供棋酒笑具耳，其言固无足听也。乃初闻之而觉其佞，久而安焉，又久之而而我之腑膈肺肠，渐与鲍鱼俱化矣。每一事出，我未行而百人耸之，我欲行而百人赞之；甚有以伤天害理之事，教我作阴骘行之者。门外之吞声者甚多，但我不及闻也，可畏也！故曰，友不可不择也。一曰：择言而听。凡谓我一行而人必不敢违者，耸我者也；谓我一行而人敢违者，激我者也。耸我之言，细思之而可惧；激我之言，洞察之而可笑也。昔沈文端先生尝有言曰："凡以肤受来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目见；有驾言毁骂主翁者，直笑曰，我不曾耳闻。"只此两语，遂使火盆地狱，化作清凉世界[3]，皇天后土，实共闻之矣。某谓名不可以威成，财不可以怒取，凡以此等事诱我者，皆欲坏我之德，以自便其私者也。故曰，言不可不择也。一曰：择仆而役。每见蠹役贯盈，惧人覆算，遂如中山之狼，借我囊以自庇，不惟众怒难任，且恐豺狼之性，未能忘情于人肉也。且负人债者，冀投我人不敢讨；犯王法者，冀投我而官不敢追。又他家旧仆坏事而逃，借我以抗其主；否则故主失势，又复叛而之他。如此等类，皆来贿我作客，钻我嬖人，啖我以美利，挨身而求进步。究之染指几何？乃使我失同袍之面，而招物议之尤，此惑之甚者也！又其甚者：乡中狡狯，思假我之声灵，以济其暴横，乃夤缘而入，甫得挂名卯薄，即公然肆行于市井，拘讼于公门；且假主人之威令为辞，遂使乡里为之侧目，官长为之枉法。我之左右，皆其耳目，悉锢蔽不令主知；即偶入主人之耳，又复代为解说，以惑主听，因而受害者遂控诉无门矣。抑闻长山邑大夫南公尝语人曰："为令者他气犹好受，惟宦家大腹奴之气难受。"此真经历之语，其中愤、其言戚也。故曰，仆不可

不择也。一曰：收敛族人。凡一人之望重，则举族之人，多窃其声灵，以作威福。力之大者，则把持官府；力之小者，则武断乡曲。甚且族人之奴仆亲戚，亦张我之旗帜，以欺山中之良懦，良可骇叹！况贵族威名，远迩藉甚，即时时收敛之，彼且人人以谏给为名；若稍加阿护，则邑中之太爷公第，无空闲处所矣。凡此者，恶虽出于众作，怨实丛于一人，所当与门下人同一箝束者也。故曰，族人不可不收敛也。凡此数者，皆弟之所目击而心热，非实有其事不敢言，非实有其人不敢道也。弟之言无可凭信，即先生问之他人，亦必以余言为诬。但祈先生微行里井而私访焉，倘有一人闻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者，弟即任狂妄之罪而不敢辞。先生存心何等菩提！乃使桑梓愚民，闻声而股慄，诚不知其可矣。曩者刘孔集自武康归，先生尝谓之曰："姜桂之药，亦宜相人而施。"某之言真辣于姜桂矣！如可节取，则电毕而火之；如其荒谬，即不妨暴之同人，以彰吾过。弟年来无他进益，然能知其非矣。断不敢谬执己见以自是也。临颖不胜悚仄之至！

注释：

①毛遂：战国时赵国人，平原君门下食客。秦围邯郸，平原君到楚国求救，他自荐同往，并说服楚王同意赵楚合纵。

②冯驩：一作冯杖。战国时孟尝君门下食客，曾替孟尝君到封邑薛（今山东滕县南）收取债息，得钱十万，把不能还息的债券烧掉，为孟尝君收买人心。

③火盆地狱，清凉世界：皆佛教言语。

译文：

年年失意，有愧于老朋友，自觉脸上无光，登不了大雅之堂。因而疏于礼节，致使早年结拜之交，也不把我当成人。古人

说："作为士人，要让王公大人多听到他的名声，而少见到他的面。"我在这里，学到了一半圣人。希望了解我的人不要奇怪。所自慰的是，朋友之情，愈老愈真，可以无愧于良友。先生德高望重，真不愧为同里先生，真是为黎民百姓造福！曾经阅读闽中科考文章，见月旦中包含深意，才知即使海枯石烂之时，雄心壮志也未曾有丝毫改变。官声很高，这是一般人的心愿。然而，身为乡村的士绅，做官时而有赫赫大名，这里可喜的；退休还乡后还有赫赫大名，这是可怕的。我打算把我的所见所闻说出来，又担心听的人不高兴。犹豫徘徊，同朝廷里的谏官挑灯上书时，真没有什么两样。幸运的是，先生既然能成为诤臣，所以知道先生也必然能容纳诤友。乡下百姓，不敢想当官的事，只是私下以为致仕还乡者所应当知道的事情，一般有几个方面，请我陈述其大概。一曰：择事而行。乡镇中的人只有那些奸猾之徒才需要惩戒，除此之外，即使再低贱的人，也不能随便欺凌污辱；乡镇中的事情只有利弊好坏是可以说的，除此之外，即使再小的事，也用不着我去插手。因为高高在上的人，做好事有影响，做坏事也有影响。我一动舌头，手下的人就会以百倍的劲去做。如果做的事是不应当做的，别人做了就成了我的罪过，别人不做则成了我的耻辱。我经常见到做的事固然有十之八九，而不做的事也有十分之一；其中的十分之九都是我应当宽容的，其中的十分之一则是我应当谨慎的。我认为先生有今天，不必用像毛遂那样自荐来的人，为我扬名谋利；只应该用像冯驩那样让利的人，替我烧掉债券。所以说，做事不能不选择呀！一曰：择人而友。门下有众多的士人君子，这是古人所称赞的。品德高尚的人是我的老师，学问渊博的人是我的朋友；至于那些在我面前晃着肩膀的人，只可用来陪我下棋喝酒说笑而已，他们的话是不值得听的。刚开始听这些人的话还觉得不当，时间一长则心安理得起来，时间再长一些，我的五脏六肺就会渐渐地与鲍鱼一起腐烂掉。每做一事，

我还没有做就有上百人支持我，我一准备做就有上百人来称赞我。更有甚者，还有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也让我去悄悄地做。门外面的斥责声和唾骂者很多，但我却听不到。这实在可怕。所以说，朋友不能不选择呀。一曰：择言而听。凡是说我一做事众人都不敢违抗的人，是奉承我的；凡是说我一做事而大家都敢于违抗的人，是刺激我的。奉承我的话，仔细想想非常可怕；刺激我的话，认真分析则很是可笑。从前沈文端先生曾经说："凡是以肤受来愬者，干脆一笑说，我没有看见；有驾言毁骂主翁者，干脆一笑说，我没有听见。"只这两句话，就足以使火盆地狱，化作清凉世界。苍天后土，无不耳闻。我认为名声不能靠威吓来获取，财富不能靠恐惧来获取。凡是用这类事情来引诱我的人，都是想败坏我的品德，以便使其有利可图。所以说，说话不能不选择呀。一曰：择仆而役。每见到污吏恶贯满盈，害怕被人报复，于是就像中山狼一样，借我声威以保护自己，不但众怒难犯，而且恐怕豺狼本性不能忘记吃人。欠了人家债的人，借着投靠于我而使人家不敢催讨；犯了王法的人，借着投靠于我而使官府不敢缉捕。还有，他家的老奴办了坏事逃走，借我声名以对抗他的主人；要么因为旧主人失势，而又再次背叛投到他人门下。如此之类，都来贿赂我的门客，钻营我的姬妾，用好处来引诱我，然后接近我并企求提拔。思量得到多少好处呢？却使我在同袍面前丢尽脸面，又招来众人非议，这实在是让人迷惑不解。更有甚者，想借着我的声望，以便去横行霸道。又投机而入，弄得一官半职，然后公开在社会上仗势欺人，再到衙门里打官司。他们以主人的威望话语为借口，致使乡里为之侧目而视，官府为之枉法循私。我身边的人，都是他们的耳目眼线，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欺骗主人，不让主人知道真情。即便偶尔进入主人耳朵，又会曲意解说，迷惑主人的判断。这样，受害人只能是上告无门。又听说长山邑大夫南公曾经对人讲："做官的人，其他气都好受，唯有官

宦之家的豪奴的气最不好受。”这真是经验之谈。有愤慨，有悲哀啊。所以说，仆人不能不选择呀。一曰：收敛族人。大凡一人有声望，那么全族之人，大都会借着他的声望，去作威作福。势力大的人，就会操纵官府；势力小的人，则会横行乡里。甚至，族人的奴仆和亲戚，也打着我的旗号，去欺负那些山中的良民百姓，实在令人吃惊！况且，贵族的声望，远近皆知，即便经常加以收敛，仍然有人打着给谏的旗号。如果稍微加以庇护，那么，家乡的父老乡亲，就无处立足了。凡些种种，恶行虽然出自于众人之手，怨恨则只能汇集于一人之身。所以，应当给手下人都来一个约束。所以说，族人不能不收敛呀。凡此种种，都是我亲眼所见，并仗义直言，既没有实有其事而不敢说的，也没有实有其人而不敢讲的。我的话如不可信，请先生向他人询问，肯定有人会说我的话是假的。但请先生到乡下微服私访，如果有一个人听到孙宅之名而不咋舌咬指的，我立刻承担污陷之罪而不敢推辞。先生存心何等仁厚！但却使家乡百姓，听到您的名字就害怕，真不知这是为什么。以前刘孔集自武康回来，先生曾经对他说："姜桂这种药，也要因人而用。"我的话真是比姜桂还要猛辣啊！如有可取之处，则请雷厉风行，马上实施；如果认为荒谬，则不妨示之同人，以便证明我的错误。我近来没有其他收获，只是能辨别是非而已。但我绝对不敢固执己见自以为是。临颖不胜慌恐之至！

答王瑞亭①

蒲松龄

题解：

这封信时间不详，内容是蒲松龄写给王瑞亭的，一方面祝贺对方的升迁，一方面对官僚们钻营奔走的行径，也有所讽刺。

蒲松龄在信中描绘了自己在农村生活的艰难和辛劳，比如，早晨要操心耕种的事，晚上还要操心织布的事，一天到晚，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这对一个贫寒的读书人来说，实在不易。不过，在蒲松龄看来，这种清贫而又艰辛的生活同官场上那些忙忙碌碌、四处钻营的勾当比较起来，恐怕还是要轻松一些、愉快一些。至少它是劳而有获，问心无愧，对得起天地良心。至于那些当官的上窜下跳地跑来跑去，恐怕就很难得到这份惬意了。蒲松龄又说，在农村，农民们还要卖谷子，买布帛，要交纳各种奇奇怪怪的税，少一样都不行，官府的盘剥实在让人害怕。但这与官场上那种你送我请、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险恶比较起来，还是要舒服一些、所得多一些。或许，正是这种淡泊的心态，使得蒲松龄能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创作出上百万言的《聊斋志异》。蒲松龄在信中，还对农民的悲惨处境寄予了深厚的同情。说今年暴雨成灾，把庄稼都给冲坏了，好一点的也只能收个半成。尽管如此，农民的天生乐观态度，还是会在农闲季节，把该交纳的税交给官府以后，弄点老酒、小菜来互相庆贺一番，以酬这一年来的田间劳作的辛苦。所以，蒲松龄幽默地说，农村虽然没有弹琴的歌姬舞女，但也不乏粗犷的歌声，比起官场上的吆五喝六、大呼小叫来说，还要快活得多。当然，如果田里能长出银子，庄稼上

能结出金印就更妙了。

这封信是一篇很有史学价值的社会风俗画。作者以他那文学家所特有的犀利眼光，逐一观察到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以及农民的悲惨。至今说来，还历历在目。这对于今天人们认清专制制度下人民生活的真实状况是大有好处的。不幸的是，眼前的太平盛世和歌舞升平早已蒙蔽了人们的双眼。这封信可以使人们再次睁开眼睛去认真地观察一下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究竟怎样。

（《蒲松龄集》）

原文：

朔雁南翔，霜台[②]六度，亲家手挥目送于烦剧之乡，风尘劳瘁，悬想可知。然辇毂之旁，卓声易著，窃亲不次之擢，必有匪夷所思者矣。倚杖衡门，伫望殷切！

仆以惫躯拙业，龙钟山村，朝课奴耕，夕问婢织，畚锸薅剌[③]，迄无休时，此与戴星出入，南迎北送之苦，不知孰为劳逸？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此与措置书帕[④]，移东补西之难，不知孰为多少？今岁淫霖害稼，幸吾乡高亢，犹得半收，比时禾稼既纳，瓜壶新登，不免斗酒相劳，虽无鼓瑟赵妇，而歌呼呜呜，较之折腰驿亭[⑤]者，差有余闲；但恨田中不生银艾[⑥]，禾头不结金章[⑦]耳！笑笑！

年前一结手函，未遑裁答，又蒙再惠远音，重以厚贶，感切悚愧，不可已已！快睹佳公子[⑧]风采言论，轩轩霞举，署中有此，亦足散怀。兹因回车，敬候阖潭清吉。附谢不一。

注释：

①王瑞亭，时在都察院供职。

②霜台：旧称御史大夫。清代都察院相当于前代的御史台，

故称。

③畚锸薅刺：泛指农业劳动。畚，草编的盛土工具；锸，铁锹。薅刺，除草。

④措置书帕：指官场上的应酬馈赠。

⑤折腰驿亭：指官场上迎往送来的活动。驿亭，古代官员旅途歇息的地方，迎送客人一般在这里进行。

⑥银艾：官印。

⑦金章：即金币。

⑧佳公子：指王瑞亭的儿子。

译文：

雁子南飞的时节，你在都察院已经干了六年。在官场之中迎往送来的烦琐事物，使人疲惫不堪，这是可以想像的。然而，在皇上身边办事，政绩很容易为皇帝所知，我认为破格提拔，一定会超出常人的预料和想像。我站立在简陋的院门旁，向你表示真诚的祝愿。

我这疲惫不堪的身躯，还在做着不起眼的事情，在山村里打发一辈子。朝晨要关心耕地的事，晚上还要考虑织布的事，除草挖土样样都要过问、照料，简直没有一点休息时间。这些与披星戴月，南迎北送的辛苦比较起来，不知道二者何为轻松一些的工作？卖掉谷子，买些布匹，按照定额去交纳钱粮，然后对照姓名进行注销，无不害怕官府发怒，这些与官场上彼此应酬送礼，挖东墙补西墙比较起来，不知道二者哪个更困难一些？今年暴雨肆虐，毁坏了不少庄稼。幸运的是我这个村地势较高，依然能够得到一半收成。到时候，收割了庄稼，再有些新下来的瓜果，自然免不了要相互庆贺一番。虽然没有弹琴奏乐的赵妇，但仍然歌声不绝，和驿亭上的那些你来我往的官场应酬比较起来，还要闲散自在一些。只是遗憾田地里长不出官印，庄稼上面结不出金币。

一笑。

一年前来的信，还没有来得及回信，又承蒙你再写信来，多次问候，深感不安。看到您的公子风度翩翩，气宇轩昂，官署中有这等人材，也足以让人开心一些了。只因车子返回，写信祝你合家平安。并致谢忱。

与林云翥书二

彭定求

题解：

这封信是彭定求写给好友林云翥的。彭定求和林云翥的书信往来较多。这是他写给林云翥的第二封信。

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号访濂，晚自称南畇老人，江苏苏州人。出身士人家庭，十七岁入学为秀才，三次乡试不中，二十八岁中举，三十二岁会试第一名，殿试又第一名，为翰林编修。其后曾任乡试主考，会试掌卷官。

苏州是著名通都大邑，彭定求生长其间，受其文化氛围之影响，在苏州修建学宫和纪念性的祠宇，刊刻先贤遗书，广泛教育生徒，其事业成为后来毕沅、阮元等兴创文化事业的先导。

彭定求对于传统的经学、史学缺少研习，但他擅长诗文，对理学颇有研究。一生在学术思想上倾向陆、王，但不趋向极端。又曾濡染佛道思想，但不以为主。居官奉职、在家教育生徒、兴办文化事业，是一个典型的端恪恂谨的士大夫。

彭定求生活的苏州，自康熙中叶以后，风俗开始侈佚华靡。定求在乡里，特立独行，不趋时随俗，对于吴中的侈靡浮华之风起了一种矜式和牵制的作用。而且，作为理学家，彭定求对事物见解不同于迂曲的儒生，他对理学不是株守一家之言，也不随波逐流，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的这些见解与他特立独行的人格是一致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从他和林云翥的信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彭定求在信中阐明了自己对“事”、“理”的独特见解，驳斥了那种离事而空言理的做法，并举建功立业须遵循

规律、原则为例，指出成就事业必须顺应社会发展规律，并要有公正无私之诚心。离事而纯言理，是彭定求所不同意的。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要想成就一番大事业，除了自身必须努力勤勉之外，还要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遵循一定的原则，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否则，如果不顺应历史发展，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必然遭致失败。

（《南畇文稿》卷 11）

原文：

足下述友人语云：昔人谓圣贤建立功业绝不费力，豪杰干办事务绝不犯手。诚哉是言也。夫从古功业未有不经勤劳积累而后建立者，何云绝不费力？固非就简趋易一味要享现成之谓。盖功业循理而成，不待矫揉造作，如大禹之疏沦决排胼手胝足三过其门不入[①]，而孟子谓之行所无事[②]，则真绝不费力者矣。世间事务亦有一家非之不顾、一国非之不顾而后干办者，何云绝不犯手，更非和光同尘远避嫌怨之谓[③]。盖事务循理而为，不涉偏私回互，如周公之诛管蔡[④]，夫子之诛少正卯、堕三都[⑤]，岂不最骇人耳目，而及其大害除、大奸戢，心事瞭然，无纤毫无当，则真绝不犯手者矣。若不从此处推勘圣贤豪杰之真心，而徒袭其成语，以为模糊影响之谈，未有不至于依违洪泥而后已者[⑥]，尚何功业可建立，事务可干辨邪？至于论理，还要从论事处打个对同，若泛泛言性言心则不难倾倒先哲之精蕴，而其论事也，又以世俗是非毁誉颠倒错缪之见寓乎其间，此惟目不睹理学之书者，则任之不校而已，岂可以津津讲学而亦出此邪？此仆之所以不得不辨也。圣人之道大抵善善长而恶恶短，夫矜孤恤寡扶弱拯枉固善事也，然一出于贷贿营谋之私，则善事亦为恶也。若恶在一人之身者犹属可恕，恶在一人之身而害及一家之伦常伤及一方之风化，直道在人，锄而去之，若养苗去莠，非刚恶之比。事理之间

固有不容假借不容混同者，非敢尚气争论，正欲从事讲求实学之归尔。

注释：

①大禹：传说中古代部落联盟领袖。他善于治水，在治水过程中，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受到后人称颂。

②孟子：战国时期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与孔子并称孔孟。

③和光同尘：将光荣和尘浊同样看待。

④周公诛管蔡：周成王时，周公辅政，被封在殷都周围的管叔和蔡叔怀疑周公有夺取王位之心，于是发动叛乱，周公东征，诛杀管叔，流放蔡叔。

⑤夫子之诛少正卯、堕三都：夫子，指孔子。少正卯，鲁大夫。孔子为鲁司寇时，以用心险恶等“五恶”的罪名杀了少正卯。三都，鲁国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分别建费都、郕都、郈都三座都城，孔子学生子路为季氏宰，看到三都强盛，将为国害，于是想毁掉它。孔子当时为鲁司寇，命申句须、乐颀伐三都，三都被毁。

⑥淟涊：污泥浊水。

译文：

您引述朋友的话说：古人认为，圣贤建功立业一点都不费力气，豪杰办理事务一点都不受干涉。这真是至理名言啊。从古至今，伟大的功业没有一项不是经过勤劳积累之后建立起来的，为什么说一点都不费力气呢？这当然不是说就简趋易、一昧享受现成。这是因为功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才能建成，不能矫揉造作。比如大禹治水，疏通河道，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孟子却称其好像没做什么事，这才真是一点都没有费力气。世间事

务也有置一家非难于不顾、置一国非难于不顾而努力去办理的，为什么说一点都不受干涉呢？这更不是说好坏混同，远避嫌怨。这是因为办理事务要遵循一定的原则，不要涉及到偏心、回护、私念。比如周公诛杀管叔、蔡叔，孔夫子诛杀少正卯，毁坏孟孙、叔孙、季孙的都城。难道不是最骇人耳目，让人吃惊的吗？然而等到大害被除、大奸被杀，心中坦然明白，没有一点不合适的地方，这才真是一点都不受干涉呀。如果不从这样的角度推测圣人豪杰的真正心思，而只是袭取前人成说，作为混淆视听、捕风捉影的话来谈论，则没有不陷于依违两可、污泥浊水之中的，还会有什么功业可以建立，什么事务可以办理呢？至于谈论理，必须要和谈论事相对应，如果泛泛地谈论性、谈论心，则不难推翻先贤的精蕴，而在谈论事时，又把世俗之中的是非、毁誉、颠倒、错缪等种种见解寓于其中，这只是不读理学之书的人，以此自任而又不加考究而已，怎么可以津津讲学也从此出发呢？这就是我不得不辩解的原因。圣人之道大多对善事进行嘉褒，对恶事进行贬抑，同情济恤孤寡、扶持帮助幼弱、拯救改正虚枉，本来是善事，然而一旦出于收受贿赂、营私谋利这样的私心，则善事也变成了恶事。如果恶事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还可饶恕，恶事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却危害一家人的纲常伦理、伤害某一地区的人性风气，有耿直公正之人，将其铲除，就像为了养好禾苗，必须除去莠草一样。事理之间本来就有不能假借不能混同的地方，我决不敢斗气争胜，目的正是想把研究实学作为治学的归宿。

与宗定九

孔尚任

题解：

这封信是孔尚任写给宗定九的，信中充满了对友人的推崇。

孔尚任（1648—1718），字聘之，号东塘，山东曲阜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康熙南巡，过曲阜，谒孔庙。孔尚任在御前讲经，得康熙的赏识，授国子监博士，来到北京，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被派往苏北治水，往来于南京、扬州等地，亲身体验了人民的苦难和官场的黑暗，结识了许多明朝遗老，加深了他对南明王朝的了解。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他回到北京，迁任户部员外郎，但他已不再热衷仕进了，决心最后完成他构思已久的《桃花扇》。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桃花扇》脱稿，获得了极大成功。但是，也是在这一年，孔尚任被罢官。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他回到故乡，晚景颇为萧条。诗文作品有《湖海集》、《岸堂文集》等。

此书牍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作者在很短的篇幅中描绘场面，勾勒人物形象。宗定九是扬州一位名士，隐居东原。信一开头就展示了一位“高卧东原，独寤寐处”的隐士形象，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超然世外，落落寡合，禀性孤介的人物。但从“一旦命棹百里”开始，作者给人们展示了“另一个”宗定九：他走出静谧山林，入于喧嚣的“花灯萧鼓之场”，诗酒挥毫，淋漓慷慨，“惊才绝艳，肆应百出；虽酒吏歌人，皆劳顾盼，”充分显示了与寂寂高隐截然不同的老名士的风流文采，俊爽青春。再后作者又以

“愈看愈妍”这种出人意料的神来之笔，将他比之于少年公瑾，从而又显示了宗定九富于韬略的智慧胸襟。通过这三方面的叙写，将一个学识渊深、不遇于时的隐者形象活灵活现地描画了出来，文字极为生动传神。

（《湖海集》）

原文：

不见我梅岑者又两月矣。缕缕欲言，一时难理。念足下高卧东原，独寤寐处，不知尘市者久矣。一旦命棹百里，访仆于花灯萧鼓之场，墨渖酒痕，淋漓萝带；香尘花雾，飘拂荷巾[①]。于时足于惊才绝艳，肆应百出，虽酒吏歌人，皆劳顾盼。乃知高隐名流，原非枯禅腐儒。仆与足下数共晨夕，愈看愈妍，盖如小乔初嫁，雄姿英发时也[②]。无限千秋，正图扬榷[③]，而君家之猿鹤[④]，促君归矣。仆所得大著、大选、佳书、佳扇，充盈箧簏，尚一无琼玖之报[⑤]。而足下又谆谆致语，认仆之拙集为念。仆泥涂劳吏[⑥]，满眼俗物，零星残稿，用纪岁月，不知何以亦邀赏于法眼[⑦]也。

注释：

①萝带、荷巾：高人的服饰。语出屈原《离骚》和《山鬼》篇。

②小乔初嫁，雄姿英发：语出苏轼词《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里用来称赞友人宗定九。

③无限千秋，正图扬榷：许多古今之事，正想和你畅谈。

④“猿鹤”句：疑指宗定九家中有事，促其归去。

⑤尚一无琼玖之报：还没有好东西回赠你。语出《诗经·木瓜》。

⑥泥涂劳吏：职位卑下的小官。

⑦法眼：佛教有“五眼”之说，慧眼和法眼都能洞见实相，仅次于佛眼。通常用来指精深的眼力。

译文：

不见我梅岑友又有两个月了。屡屡打算联系，一时又难以理清思路。考虑到足下高卧东原，隐居生活，很长时间未接触尘世了。突然有一天，兄乘舟行百里之遥，到花灯箫鼓这样的繁华场所看望在下，挥毫题书，饮酒淋漓，衣带斑斑；香尘花雾，荷巾飘拂。于是，足下那惊人的才能，绝伦的潇洒，四处传扬，就是那些酒肆小馆、歌手，也都频频张望，一睹足下的风采。于此可知，隐居的名流，原并非枯坐参禅的愚腐儒生。仆与足下在那几天里晨夕相处，仆越看足下，足下愈发的英伟，正如周瑜，处在小乔初嫁、雄姿英发的时候啊。许多古今往事，正想和足下畅谈，而君家有事，促君归去。仆所得到的大著、大选、佳书、佳扇，堆积如山，却还没有好东西回赠君，而足下又诚心诚意地表示，希望能得到仆的拙集。仆乃职卑位低的小吏，眼中充满的是俗物，零零星星的残稿，用以纪岁月，不知拿什么能使足下慧眼识中？

与郑汝器

孔尚任

题解：

这封信是孔尚任写给友人郑汝器的，内容是描绘了一个节日的场面。

这封信描述了作者在风清月朗的中秋之夜的愉悦心情。此日，佳丽之地金陵，气象一新，热闹非凡。作者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无不是一派欢声笑语、雍和欢快的气氛。街头巷尾飘扬着喜庆的箫鼓乐声。男女老少喜气洋洋，作者深深为之感染，内心油然升起勃勃兴致。于是，他谢绝了王公贵族的邀请，与志同道合者欢聚一室，品尝浓香老酒，试呷清洌名茶。谈天说地，道古论今。恰在此时，又有鹤发银须的老者当众挥毫，一显身手。其书气势奇昂，遒劲有力，古朴浑厚，墨汁淋漓，使作者在节日的兴奋中又揉合了对艺术的陶醉。这是何其难得的一个节日啊，以致他恋恋不舍地写道："从此年年至此日，即年年忆此乐。"

此柬虽短，蕴意却丰。既有场景的描写，又有人物的刻划；既写了世俗的节日之趣，又抒写了士大夫们高雅独特的精神享受。文字颇为生动传神。

（《湖海集》）

原文：

客金陵佳丽之乡①，遇中秋澄清之月。风物太平，人情欢豫②，箫鼓之声，阗③街溢巷，盖与满城童叟，同此一乐者也。

是日尽谢豪贵之召[4]，雅聚高斋，饮藏酒[5]，试名茶，赏鉴古书帖，盖与满座耆英[6]，同此一乐者也。

独是先生冉冉[7]白须，铁臂玉腕，操中山之帚，濡北溟之池[8]，一时虫鱼飞跃，蝌蚪盘旋[9]。令群观者耳目精神，移于商周两汉之年。此一乐谁敢向先生夺取乎？所书之字，大小纵横，不下十数纸。或光我祖庙之宫墙[10]，或表我旧山之贤哲[11]，或标我荒斋，或耀我祖卷[12]。仆何人斯，而此一乐独俾[13]仆一人消受之？记去年有句云："南来得意此中秋。"不意今年之得意又胜去年！未知明年又在何处？从此年年至此日，即年年忆此乐；更年年忆先生之古道高怀，廉顽立儒[14]，与明月清风永无尽境耳。

注释：

①客：客居。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

②风物：指景象。豫：安乐。

③阗：充满。

④"尽谢"句：谢绝所有达官贵人的召请。

⑤高斋：高楼。藏酒：陈年酒。

⑥耆英：年长而有贤德的人。

⑦冉冉：同"苒苒"，指须发浓密。

⑧中山：一名独山，在今安徽宣城县北。帚：此指毛笔，极言其大。濡：蘸。北溟：指北海。北溟之池，极言砚池之大。

⑨"一时"二句：形容所书写的篆书苍老古朴。古有所谓虫鱼书、蝌蚪文。

⑩光：光大。祖庙：指曲阜孔庙。孔尚任系孔子六十四代孙，故云。宫墙：借指殿堂庙宇。

⑪表：表彰。贤哲：孔子。旧山：指曲阜的尼山，孔子出生地。

⑫标：展示。荒斋：对自己书斋的谦称。祖卷：祖传的卷册。

⑬俾：使。

⑭廉顽立懦：谓可使贪婪者变廉洁，懦弱者能自立。语出《孟子·万章下》："顽夫廉，懦夫有立志。"

译文：

客居金陵这样美丽的地方，恰逢中秋月圆之时。风景祥和，人情欢乐，街衢巷里，充满了鼓乐之声，与满城老少，同享此乐。这一天，谢绝了所有达官贵人的召请，与文人高士同聚高楼，畅饮陈年老酒，品饮名茶，鉴赏古代书贴，和满座的年长而有贤德的人同享此乐。

先生与众人不同，飘拂着浓密的白须，臂力过人，用腕精巧，手操像中山一样的毛笔，蘸着像北溟一样的砚池，一时间虫鱼文飞跃，蝌蚪文盘旋。这种苍老古朴的篆书，使旁边观赏的许多人的耳目精神又回到了商周两汉的时代。这一快乐，谁敢向先生夺取呢？所写的字，大小间有，不下十几页。其内容或是光大我孔庙的殿堂庙宇，或是表彰出生于尼山的孔子，或是展示仆的书斋，或是光耀仆祖传的卷册。仆是何人，这一快乐独让仆一人消受吗？记得去年有诗道："南来得意此中秋。"不料今年得意又胜过去年！不知明年又在何处？从此起，年年到今日，年年回忆这一快乐，而且年年回忆先生的古道热肠，高风亮节，使贪婪者变得廉洁，懦弱者能自立，与明月清风相伴，永无尽头。

上座主徐健庵先生书

纳兰性德

题解：

这封信是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于康熙年间中进士后写给考官徐乾学（号健庵）的。

纳兰性德（1655—1685），原名成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大学士明珠的长子。纳兰性德少而聪颖，康熙年间中进士，官一等侍卫。他善于骑马射箭，喜好读书。他所创作的词以小令见长，大多情调感伤，间也有雄浑壮烈之作。他在诗歌创作方面也颇有成就。他一生创作了很多作品，有《纳兰词》、《通志堂集》等，另外他还和徐乾学编刻唐以来说经诸书为《通志堂经解》。

康熙年间，纳兰性德应科举考试，乡试考官为大学士徐乾学，为感谢徐乾学的知遇之恩，纳兰性德写信向徐氏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由于他是以后学身份写信，因此信中客套之语很多，但如果我们将这些东西除去，可以看到，纳兰性德对当时攀师附贵的社会风气是很不满意的，师生之间不讲学术、文章、道德，而是趋利就益。人们拜郡县长吏为师，拜乡试举主为师，凡是有权势禄位的地方都有师，但为师的根本：道德、学术、文章却无人讲求。另外，他还讲到为人要忠诚老实，无论处在什么境地，都要做到忠诚如一，勿欺君，勿自欺。从这封信我们认识到，教师是学术、道德、文章的倡导者与维护者，同时又是社会风气的领先者，须自重而教人。做人要表里如一，始终如一，处处要以诚心自励。

（《通志堂集》卷13）

原文：

某以诠才末学，年未弱冠[①]，出应科举之试，不意获受知于钜公大人，厕名贤。书膀发之日，随诸生后端拜堂下。仰瞻风采，心神肃然。既而屡赐延接，引之函丈之侧，温温乎其貌，谆谆乎其训词，又如日坐春风，令人神怿。由是入而告于亲曰：吾幸得师矣。出而告于友曰：吾幸得师矣。即梦寐之间，欣欣私喜曰：吾真得师矣！

夫师，岂易言哉！古人重在三之谊，并之于君亲，言亲生之，师成之，君用而行之，其恩义一也。然某窃谓师道，至今日亦稍杂矣。古之患，患人不知有师；今之患，患人知有师而究不知有师。夫师者，以学术为吾师也，以文章为吾师也，以道德为吾师也。今之人谩曰：师耳、师耳，于艺则有师，于郡县长吏则有师，于乡试之举主则有师，于省试之举主则有师，甚而权势禄位之所在则亦有师。进而问所谓学术也，文章也，道德也，弟子固不以是求之师，师亦不以是求之弟子。然则师之为师，将仅仅在奉羔、贽雁、纳履、执杖之文也哉[②]。洙泗以上无论已[③]，唐必有昌黎[④]，而后李翱、皇甫湜辈肯事之为师[⑤]。宋必有程朱[⑥]，而后杨时、游酢、黄幹辈肯事之为师[⑦]。夫学术、文章、道德，罕有能兼之者，得其一已可以为师。今先生不止得其一也。文章不逊于昌黎，学术、道德必本于洛闽[⑧]，固兼举其三矣，而又为某乡试之举主，是为师之道无乎不备，而某能不沾沾自喜乎！

先生每进诸弟子于庭，示之以《六经》之微旨[⑨]，润之以诸子百家之芬芳，且勉以立身行已之谊。一日，进诲某曰：为臣贵有勿欺之忠。某退而自思，以为少年新进，未有官守，勿欺在心，何裨于用？先生何乃以责某也？及退而读史，宋寇准年十九登第时[⑩]，崇尚老成，罢遣年少者。或教之增年，准不肯，曰：

吾初进取，何敢欺君。又晏殊童年召试[⑪]，见试题，曰：臣曾有作，乞别命题，虽易构文，不敢欺君。然后知所谓勿欺者，随地可以自尽。先生固因某之少年新进，而亲切诲之也。某即愚不肖，敢不厚自砥砺奋发，以庶几无负大君子之教育哉！承示宋元诸家经解，俱时师所未见，某当晓夜穷研，以副明训。其余诸书，尚望次第以授，俾得卒业焉。

注释：

①弱冠：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因此常以弱冠泛指男子二十岁左右的年纪。

②奉羔、贽雁、纳履、执杖：均出于《礼记·曲礼》。羔，指小羊。羔和雁，是古代卿大夫相见时的礼品。奉羔、贽雁，指卿、大夫相见时携带这些礼物，表示对对方的尊崇。履，鞋；杖，手杖。古人席地而坐，老人出行，必须持杖着履。纳履、执杖，指为老人穿鞋、扶杖，以表示对老人的尊敬。信中所举这四项内容，都是讲古代礼节的。

③洙泗：本指洙、泗二水。古时二水自今山东泗水县北合流西下，至鲁国都城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洙水在北，泗水在南。洙、泗之间，即孔子聚徒讲学之所。后世因以洙泗代称鲁国的文化和孔子的儒学。此处即指孔子的儒学。

④昌黎：指韩愈，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自谓郡望为昌黎，世称韩昌黎。

⑤李翱：唐代散文家、思想家，字习之，曾从韩愈学古文。皇甫湜：唐代文学家，字持正，曾从韩愈学古文，思想倾向与韩愈相近。

⑥程朱：指二程（程颢、程颐）、朱熹。

⑦杨时：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学生，字中立，号龟山。游酢：宋代理学家，二程的学生，字定夫，一字子通，世称

鹰山先生，也称广平先生。黄幹：宋代理学家，朱熹的学生，字直卿，世称勉斋先生。

⑧洛闽：此处指洛学和闽学，也即程朱之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被称为洛学。朱熹晚教于福建，故其学被称为闽学。

⑨《六经》：指《诗》、《书》、《礼》、《易》、《乐》、《春秋》。

⑩寇准：宋代政治家，字平仲。

⑪晏殊：宋代著名词人，字同叔。

译文：

我作为一个被选拔的无才无学的士子，年龄不到二十，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受到大人赏识，得以厕身名贤之中。书榜发放那一天，跟随诸位士子身后，拜见大人于堂下。仰视大人风采，心神为之肃然。既而屡次受到邀请，将我引到您的身旁，态度温和谦善，谆谆诱导，如坐春风之中，令人心旷神怡。由此我入则告诉亲人说：我幸运得到这样的老师。出则告诉朋友说：我幸运得到这样的老师。就是做梦时，也私下窃喜说：我是真正得到了一位老师！

老师，岂是容易说清楚的！古人重视三方面的情谊，将老师和君主、双亲并列，说：双亲生养人们，老师培养人们成才，君主任用人们，使人能尽展才能，这三者对人的恩义都是一样的。可是我私下认为，师道发展到今天，也夹杂进了很多东西，变得不纯粹了。古代担忧人们不知道有老师；如今担忧人们知道有老师，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有老师。老师，在学术上是我的老师，在文章上是我的老师，在道德上是我的老师。如今有人诋毁说：老师，老师，技艺有老师，郡县官吏有老师，乡试考官有老师，省试考官有老师，甚至凡是有权势禄位的地方都有老师。进而问学术、文章、道德，弟子本来就不向老师求教这方面的问

题，老师也不以这些要求弟子。然而老师之为老师，难道只是教会人们相见、敬老的礼节吗？孔子以上就不用说了，唐代必有韩愈这样的人，而后李翱、皇甫湜这些人才肯拜他为师。宋代必有二程、朱熹，而后杨时、游酢、黄幹等人才肯拜他为师。学术、文章、道德三者，很少有人能兼而备之，能占有其中一项就可以成为老师了。如今先生不只是占有其中一项啊。文章丝毫不逊色于韩愈，学术、道德以二程、朱熹为本，本来就是兼有三项，而又是我乡试的考官，因此为师之道没有不具备的，我能不沾沾自喜吗？

先生每次于庭堂之中教导诸位弟子，总是指示《六经》的微言大义，以诸子百家的流风余韵润泽弟子，并以立身处世之义勉励弟子。有一天，先生教诲我说：作为臣子，可贵的是没有欺骗人的想法。我回来后自己思忖，认为我年龄小，又是刚中科举，没有一官半职，不要有欺骗之心这种说法，对我又有何用呢？先生为何以此来要求我呢？等到我阅读史书，史书记载，宋代寇准十九岁登第时，朝廷崇尚年老持重之人，年龄小的要受罢遣，有人劝寇准增加年龄，寇准不肯，说：我刚中科举，怎敢欺君！又记载，晏殊年少时被召考试，看到试题，说：我曾经作过同样的文章，请求另外再命一题。虽然不另外命题更容易写好，但我不敢欺君。这样我才明白所谓不欺骗，是随时随地都要自己注意的。先生就是因为我年龄小，又刚中科举，而亲切教诲我的啊。我即便是愚蠢，没有出息，又怎敢不自我努力，奋发向上，以不辜负先生您的教育啊！您让我阅读的宋元诸家解经之作，都是当今一些儒师没有见过的，我一定不分昼夜，努力钻研，不辜负您的训导。其余的一些书籍，还望先生依次传授给我，以使我完成学业。

与余生书

戴名世

题解：

此信写作时间不详，据推测当在康熙中期。内容是写给一位叫余生的读书人，讨论有关晚明史事，以及一些如何撰写明史的事情。

戴名世（1653—1713），清代文学家，字田有。安徽桐城人。散文长于史传，留心明代史事，访问遗老，考订野史，准备成书。康熙四十一年刊行《南山集》，其中多采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载南明桂王时事。五十七岁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三年后为御史参劾，以“大逆”罪被杀。此案牵连数百人，方孝标已死，亦被戮尸。

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对士人采取了以笼络为主、以打击为辅的策略，明史研究在《南山集》案发生以前，一直未受到官方的直接干涉。以黄宗羲的明史研究为例，他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编《续时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编《行朝录》，康熙三十年（1691年）刊刻《明儒学案》，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编定《明史钞》等，均未受到纠缠和干扰。其他史家，如计六奇于康熙十年（1671年）撰《明季南略》和《明季北略》，邹漪于康熙十八年（1679年）撰《启祯野乘二集》，徐秉义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撰《明末忠烈纪实》，邵念鲁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撰《东南纪事》和《西南纪事》等，都说明康熙五十年（1711年）《南山集》案发生以前，明史研究一直在持续、平稳地发展着。由此可见，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其实更具

体地说就是史学政策）为清初史家的明史研究的兴盛提供了一个外部条件。

这种颇为有利的政治—学术形势，无疑使戴名世撰写明史著作的信心大为增强。他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四处搜集有关明史特别是南明历史的材料，有时真达到了忘我的程度。他在给余生的信中说他曾听到一位僧人自称是明朝永历朝的宦官，知道很多南明朝廷的史事。于是，他就连忙带着纸和笔去拜访这位叫做犁支的僧人（这件事颇使人联想起《左传》所记载的齐国史官南史，在听到齐国权臣崔杼弑君杀史的情况后，无所畏惧地带着史简前往朝廷，要把这一骇人听闻的暴行记录下来。虽然二者的对象及性质不同，但精神还是一致的。这就是为史学而献身的精神），谁知犁支已经走了，不知去向。于是，又赶紧给这位叫余生的朋友写信，让他把自己从犁支那里听到的南明史事写信寄来，以便参考、比较。经过和方孝标写的《滇黔纪闻》加以对照，便发现二者有同有异，各有详略，还有大相悬殊的地方。戴名世的评价是：方孝标的考证颇为精确，而犁支所说又是自己耳闻目睹。总之，二者各有所长，不可偏废。

在信中，戴名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对南明朝廷的敬重和惋惜，他把南明朝同三国时的蜀汉、南宋末的帝昺相提并论，甚至认为南明朝理应具有更高的地位与价值。他说，帝昺在崖州，不过是区区海岛一隅的弹丸之地，旋时又亡；即便这样，史书上还要详细地记载其经过。而南明朝的“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即使和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比较起来，也毫不逊色，所以，南明朝的历史理应被记载的更详细、更真实。但事实却相反，由于天下忌讳太多，人人都避祸而远之，极少有人来写这段历史，即使写了，也无人整理，时间一久，便湮没无闻。而那些故国遗民，也相继死去，这样，国家的成败得失以及忠臣和乱贼的事迹也都烟

消云散，无法流传后世。戴名世为此深感不安，但财力所致，他无力广泛购买大量文献，同时又不能周游天下，四处寻访，故而，明史研究始终难见成果。

这封信可以说是一篇真实感人的史家自传，它不仅生动地叙述了作者搜集史料、寻访文献的曲折和艰辛，也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明史的独立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清廷史学政策的一种反抗和批判），最后还抒发了作者对历史研究的深切热爱。作者对明史的研究是和故国之思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戴名世说“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如果不能表彰忠良，如果不能谴责奸佞，那还要史家干什么呢？戴名世的这种史学观念实在值得后人重视。

（《戴名世集》卷 1）

原文：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历中宦者，为足下道滇黔间事。余闻之，载笔往问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为我书其语来，去年冬乃得读之，稍稍识其大略。而吾乡方学士[1]有《滇黔纪闻》一编，余六七年前尝见之，及是而余购得此书，取犁支所言考之，以证其同异。盖两人之言各有详有略，而亦不无大相悬殊者，传闻之间，必有讹焉。然而学士考据颇为确核，而犁支又得于耳目之所睹记，二者将何所取信哉？

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如弹丸黑子，不踰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2]之在蜀，帝昺[3]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近日方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讳者万端，其或菰芦山泽之间，有厪厪志其梗概，所谓存什一于千百，而其书未出，又无好事者为之掇拾，流传不久，而已荡为清风，化为冷

灰。至于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相继澌尽，而文献无征，凋残零落，使一时成败得失，与夫孤忠效死，乱贼误国，流离播迁之情状，无以示于后世，岂不可叹也哉。

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金匮石室之藏，恐终沦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诸书，缺略不详，毁誉失实。嗟乎！世无子长、孟坚[④]，不可聊且命笔。鄙人无状，窃有志焉，而书籍无从广购，又困于饥寒，衣食日不暇给，惧此事终已废弃，是则有明全盛之书且不得见其成，而又何况于夜郎[⑤]、筇、笮[⑥]、昆明、洱海[⑦]奔窜流亡，区区之轶事乎。前日翰林院购遗书于各州郡，书稍稍集，但自神宗晚节，事涉边疆者，民间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购者，其外颇更有潜德幽光，稗官碑志，记载出于史馆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则亦无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难也！

余夙昔之志，于明史有深痛焉，辄好问当世事，而身所与士大夫接甚少，士大夫亦无有以此为念者，又足迹未尝至四方，以故见闻颇寡，然而此志未尝不时时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来，与余面论其事，则不胜幸甚！

注释：

①方学士：即方孝标。明末清初人。后因牵涉“戴名世《南山集》”案，而被开棺戮尸。

②昭烈：即三国时蜀汉的刘备。

③帝昺：即南宋最后的一位皇帝赵昺。

④子长、孟坚：子长即西汉史家司马迁，著作《史记》；孟坚即东汉史家班固，著作《汉书》。

⑤夜郎：汉有夜郎国，后废国置县。在今贵州省西界。

⑥笮：在今四川茂县地。

⑦洱海：在云南大理县东。

译文：

余生足下：前些时候和尚犁支说他自己是永历时的宦官，曾为足下讲述滇、黔时期的事情。我听说后，携带着笔墨到犁支那里询问，等我到那之后，犁支已经离去，因而让足下给我写信，将这件事情叙述一下。去年冬天才收到，读了之后，稍稍知道了大概。我的家乡方学士撰有《滇黔纪闻》一书，我六七年前曾经见过，等到我买了一本，把犁支所说的拿来加以考证，以便弄清二者的同异之处。大体上，两人所说的各有详有略，但也有大相径庭的地方。传闻之间，肯定有错误失实之处。然而，学士考据的颇为精确详实，而犁支所说又是耳闻目睹得来的，二者之间将如何选择呢？

从前，宋朝灭亡时，区区海岛一隅就如同弹丸黑子，不长时间就已灭亡了，而史书仍然能够详细地记载这件事。而现在像弘光称帝于南京，隆武称帝于闽越，永历称帝于两粤和滇黔，地方数千里，前后十七八年。按照《春秋》的义例，岂能不如昭烈称帝于巴蜀，帝昺残喘于崖州，而致使事迹逐渐湮没无闻。近一段时间，文字的禁忌才开始变得宽松一些，但天下需要避讳的东西仍有成千上万，有的人在菰芦山泽之间，有的人悄悄地记述了这些事情的大概经过，所谓把十分之一的历史保存于千百年之后。但这些史书并没有流传于世，又没有热心的人为之编辑搜集，流行不长时间，就已经荡为清风，化为冷灰。至于那些老将退卒，故家旧臣，遗民父老，都相继死去，这就使得文献无法保存，凋残零落，致使一代兴亡成败，与那些忠臣报国和乱臣误国之事，以及流离失所四处奔波之详情，无法向后人展示，岂不可叹！

有明一代，三百年没有历史。金匮石室所保存的史册，恐怕早晚要散落逸失。而社会上流行出版的那些史书，残缺不全，毁誉失真。嗟乎！世上没有子长、孟坚，不可以轻率写史。我没有

什么才能，只是存有这个志向。然而，无法大量地购买书籍，且又为饥寒交迫所困扰，每天都为吃饭和穿衣发愁，我担心写史一事终将废弃。这样，明代强盛时期的史书尚且写不出来，更何况那些夜郎、筰、笮、昆明、洱海等地的奔窜流亡一类的小小的轶闻逸事呢。前些天翰林院向各州郡收购遗书，史书逐渐汇集起来。但从神宗晚年开始，凡是涉及边疆的，民间都隐没起来不往上交。而除了史官所指名要购买的史书之外，更多的倒是那些潜德幽光，稗官碑志等内容为史馆所没有记载的，而这些都不能呈上，这样，要想写成一代全史，实在是困难啊！

我一直有这个志向，对明史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喜欢询问当时的事情。只是自身与士大夫接触的太少，士大夫又没有写史这个念头。再加上我足迹未尝远涉四方，故而见闻颇少。然而，这个志向却一直保存着。足下如果知道犁支所在那里，能把他找来，和我当面讨论这些事情，那我将不胜欢喜。

与梁质人

储大文

题解：

此信时间不明，是储大文写给梁质人的，主要议论古今人才优劣。

储大文（1665—1743），字六雅，江苏宜兴人。官翰林院编修。大文初以制艺名世，归田后，乃潜心古学，尤究心于地理。故全集十六卷，而论形势者居七卷。凡山川阻隘、边关阨塞，靡不详究。推求古今城郭异地，山川异名，援据史籍，考核详实。当年进退攻守之要，成败得失之由，皆娓娓道来，了如指掌。

康熙年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已逐步走入正轨，社会渐趋稳定。人心不再思变，当然，也更不愿思乱。所以，归顺朝廷，谋求一官半职，便成为当时士人的主流选择。储大文便是其中的一位。储大文一生没有做过什么显赫的大官，终其一世，始终是一个官场上的读书人。

正因为储大文出入官场，对官场险恶和人才秉性，观察的颇为透彻。他在给梁质人的信中，谈到古今人才观的区别。他认为三国时期曹操所推崇的“英雄”并非是真正的人才。真正的人才是那些有学问，对孔孟之道有所研究的人。而现在所推举的人才，甚至连吕布这样的人也不如。这不仅为有识之士所耻笑，而且更为当今那些具有刘备一流才干的人所惋惜。

这封信虽然简短，但词锋锐利，咄咄逼人，对清朝官场上彼此倾轧、排挤人才的丑恶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抨击。此信对当代社

会的人才观念的变革也不无启迪。

（《存研楼文集》卷16）

原文：

昔曹孟德[①]告刘豫州[②]曰："天下英雄惟使君与孤耳。本初[③]之徒不足数也。"荀伯子告王太保曰："天下膏粱惟使君与下官耳。宣明之徒不足数也。"夫孟德所谓"英雄"，伯子所谓"膏粱"，君子不屑道。然且非班第一者，决不妄假人。矧学问渊源，根极周孔，参透贾陈。主者不能博求天下第一流，昌言献之，俾者艾魁磊之士，焜耀班行，廑毛举一二以塞明问。而所举又不敌本初之徒、宣明之徒。则宜海内有识者闻之，戟指而笑，袖手而唫[④]，而惟惧其足之前也。敬修此简以谂当世之为刘豫州、王太保者。

注释：

①曹孟德：即曹操。

②刘豫州：即刘备。

③本初：即吕布。三国时人，武艺过人，但反复无常，后被曹操所获，并杀。

④唫：闭口。

译文：

从前曹孟德对刘豫州说："天下英雄只有你和我。本初这些人不值一提。"荀伯子对王太保说："天下膏粱只有你和我。宣明这些人不值一提。"孟德所谓"英雄"，伯子所谓"膏粱"，君子是不屑一顾的。然而，不是位列第一的人，决不会妄加评论别人。矧学问渊远流长，根源于周公、孔子，并融汇了贾、陈。主

持选拔的官员不能把天下第一流的人才寻找出来，献给朝廷，压制那些光明磊落的人士，混淆黑白，仅仅弄一二个庸才去搪塞明君的垂问。而他们所举荐的人还不如本初、宣明这些人有本事。故而，海内有识之士听说之后，仰头大笑，袖手旁观，只是害怕站到他们跟前。敬修这封信是用来哀叹当今那些像刘豫州、王太保一类的人。

与孙以宁书

方苞

题解：

这封书信时间不明，内容为方苞写给一位叫孙以宁的朋友，说明自己为征君作传的原则和写法。

方苞（1668－1749），清代散文家。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进士，曾因戴名世《南山集》案牵连入狱，后得赦。官礼部侍郎。作文提倡“义法”，为“桐城派”创始人。所作散文，多为经说及书序碑传之属，观点颇为正统。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康熙时期，士人心态已渐趋平和，士人的民族意识，从康熙中后期开始削弱，至乾、嘉时期几致泯灭。这一思想转化过程，大致由以下两种因素促成。其一，具有强烈民族思想的人相继谢世。鼎革之初，一些士人坚守民族气节和忠义伦理，强调夷夏之防，眷怀故国，高蹈不仕，如顾炎武、傅山、王夫之、吕留良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学者，他们的行为和思想，在不同范围内影响和激励着当时的士人。至康熙中后期，这些人带着对故国的情感，甚至是光复故国的期望，赍志以殁。他们的辞世，带走了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最深刻的历史反省精神。其二，随着社会局势的日趋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以及残明势力的绝响，面对清廷已实际统治中国的客观现实，作为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的士人，在淑世济民的抱负和关心“天下生民之休戚”的责任感驱使下回到社会现实中，回到政治舞台中来已成一种趋势。而康熙亲政以后对士人采取的羁縻政策，正为士人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的

转变提供了契机。

正因为如此，康熙时召开的“博学鸿词科”以及“明史馆”，便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吸引了相当数量的饱学之士纷纷入网。他们埋头古籍，不问世事。所谓埋头古籍，并非唯古是从，他们仍然还是带着官方的有色眼睛去挑剔和选择史料。所谓不问世事，是说他们对民族悲剧、社会苦难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但对钦定的圣旨和意图则仍是观颜察色，一律照办。所以，知识分子在这个时候，无论谈论什么话题，都已远离“国是”，而只把眼睛盯在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上面，津津乐道，自以为得意之至。方苞在写给孙以宁的信里，从传记的体例技术角度对自己所写的“征君传”进行了分析和说明。他认为，古往今来，大凡名人、学者传记，不外乎三个方面：或者连篇累牍地叙述他们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渊源，或者列举他们一生所做过的好事，或者讲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影响。方苞认为，这三方面都是征君的小节。如果光记这些内容，那么征君的远大志向就模糊不清了。方苞以司马迁的《史记》为例，说明传记的方法在于必须以传主的身份、功业为尺度去写。比如，司马迁写陆贾，大事小事都写，写萧何则光写治国大事，写张良则仅写有关天下兴亡之大事。征君一辈子做了许多好事，但大部分都是那些普通的平直人士所能做得到的。不足为奇。如果都写这些，那征君的个性就看不出来了。所以，方苞主张举起大端，舍弃小节。但方苞也担心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为征君写的传记太过于简单。故而，他再三说明，好的传记都不在于写事实，而在于写精神。事实越多，精神越少。所以，方苞认为，他把征君的事实写少了，为的是让征君的精神风貌更好地表现出来。

这篇书信是一篇很有价值的史学论文。虽然简短，但却不乏见地。尤其是对传记这种体裁的原则和写法发表了一些与众不同的见解，值得重视，甚至可以说切中中国古代史书的弊端。纪传

体“二十四史”倒是记了不少材料，但却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思想。所以，方苞所提出来的这个重视传主人物的思想特征的观点，对我们今天的历史研究也有启示作用。

（《方苞集》卷6）

原文：

昔归震川[①]尝自恨足迹不出里闬，所见闻无奇节伟行可纪。承命为征君作传，此吾文所托以增重也，敢不竭其愚心。所示群贤论述，皆未得体要。盖其大致，不越三端：或详讲学宗旨及师友渊源，或条举平生义侠之迹，或盛称门墙广大，海内向仰者多。此三者皆征君之末迹也，三者详而征君之志事隐矣。

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②]，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③]《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④]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宋、元诸史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坐此义不讲耳。

征君义侠，舍杨、左之事，皆乡曲自好者所能勉也；其门墙广大，及度时揣己，不敢如孔、孟之拒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论学，则为书甚具；故并弗採著于传上，而虚言其大略。昔欧阳公作《尹师鲁墓志》[⑤]，至以文自辨。而退之之志李元宾，至今有疑其太略者。夫元宾年不及三十，其德未成，业未著，而铭辞有曰：“才高乎当世，而行出乎古人。”则外此尚安有可言者乎？

仆此传出，必有病其太略者。不知往者群览所述，惟务征实，故事愈详，而义愈陿；今详者略，实者虚，而征君所蕴蓄，转似可得之意言之外；他日载之家乘，达于史官，慎毋以彼而易此。惟足下的然昭晰，无惑于群言，是征君之所以赖也，于仆之

文无加损焉。如别有欲商论者，则明以喻之。

注释：

①归震川：即归有光，号震川。明代文学家。有《震川集》。

②陆贾：西汉人。著有《楚汉春秋》。曾以“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守天下”一语劝谏刘邦。

③萧曹：即西汉初年的两位名相萧何和曹参。西汉开国，萧何被刘邦封为功第一。萧何死后，曹参继之，以清静无为著称。

④留侯：即西汉初的张良，张良在辅佐刘邦得天下后，功成身退。

⑤尹师鲁：即尹洙，字师鲁。北宋人。与欧阳修等提倡古文，著有《河南先生集》。

译文：

从前归震川曾经遗憾自己足迹不出闾里，所见所闻没有什么英雄业绩可记。要我为征君作传，这正是我的文章借此以提高身价呀，怎能不尽心竭力。所看到的群贤论著，都没有谈到点子上。大体上，不过三方面：或者详细地叙述讲学宗旨和师友渊源流派，或者侧重于生平行侠仗义的事迹，或者大肆称赞德高望重，海内敬仰者不计其数。这三方面都是征君的小节。这三方面内容多了，征君的志向和事业就被淹没了。

古代精通文章义例的人，所写的事，必定与被写之人的地位与价值相适应。太史公为陆贾作传，不管是奴婢装资，大大小小的事全都写上。如果像萧、曹《世家》那样，列举他们的政务业绩，那么，文字就是增加十倍，也不可能记载的很完备。故而，这个义例曾在《留侯世家》中透露出来：“留侯随便与皇上谈论

的天下事情很多，由于不是关系到天下之所以兴衰存亡的，所以，不必记载下来。”这里明确指示后代那些编写史书的人如何把握虚实详略的方法。宋、元各部史书好像市场上的流水账，使读者难以卒读，就在于不明这个义例方法的缘故。

征君行侠仗义，去掉杨、左这些事，其余的都是乡村那些热心者所能尽力做到的。其门墙广大，但仍时时注意反省自己，不敢像孔子、孟子那样去拒斥孺悲、夷之，非得已也。至于论述学问，则有他写的书籍为证。所以，这些都没有采用写到传记上，而只是概括其大致内容。从前欧阳公写了《尹师鲁墓志》，甚至又写文章来为自己辩解。而退之给李元宾写的墓志，到现在还有人疑它太过简略。李元宾年纪不过三十，其德未成，其业未立，可铭辞上却说：“才能高出当世，而操行超出古人。”既然如此，其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写的传记一旦传出去，必定有人批评它太过于简略。不知道以前那些名家们记述的，过于追求详明，这样，事迹越详细，而见识则越低陋。现在详细的使之简略，凿实的使之淡化，这样，征君（思想中）所蕴含的东西反而可以从言外之意得到。将来一旦载入家史，呈于史官，千万注意不要以彼去易此，足下思路清晰，不为群言所迷惑，正是征君所依靠的，这对于我写的文章没有什么影响。如果另外有需要商量讨论的，请明确告诉我。

答程夔州书

方苞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这是一篇与人论文的书信。方苞认为写作文章不应采用“世俗语言”、“佛氏语”、“讲学语”。他的这种观点后被桐城文人奉为圭臬，反映了“桐城派”的保守性。

方苞在信中首先指出散文里面，惟有“记”这种体裁最难写。因为，“论”、“辩”、“书”、“疏”都有可写之事，而“志”、“传”、“表”、“状”都包含有道德品行。只有“记”则什么也没有，没有骨架，立不起来。既无内容，又无思想。简直就像盖房子画的建筑图纸一样，光能在纸上看到楼台在哪、亭阁在哪，但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所以，韩愈写“记”大都靠弄些事情来渲染气氛和情调，而欧阳修和王安石则大都是弄些义理之类的东西塞进去。至于柳宗元则是在写山水时，模拟人情世态，以便用来打动人。可是柳宗元写的另外几篇“记”，比如《监察使》、《四门助教》等，却都是用了普通人说的日常语言，缺乏精雕细刻和语言锤炼工夫，显得很随便。故而，宋代的文学家大多推宗韩愈，而不怎么重视柳宗元。接着，方苞又说，还有那些为高僧写的传记，用了许多佛教的话，显得不雅致。像柳宗元、苏东坡都有这个毛病。至于钱谦益，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简直不能提他。不光如此，即便是宋代理学家们的讲学语言，也不应该写入文章中。

这封信是一篇独有见地的文学理论文章。不管观点正确与否，起码可以作为一家之说存世，不宜轻易抹杀。所以，在理论问题上，立论偏颇，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关键在于，立论是否确有新解、独见、洞识。所以，读一读这篇文章，可以使人们从另

外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不致于拘泥于大多数人说的话。故而，这篇书信的价值在于启示后人，不要轻信任何一种既定的或现成的或流行的说法。

（《望溪全集》）

原文：

散体文惟记难撰结，论、辩、书、疏有所言之事，志、传、表、状则行谊显然，惟记无质干可立。徒具工筑兴作之程期，殿观楼台之位置，雷同铺序，使览者厌倦，甚无谓也。故昌黎作记，多缘情事为波澜；永叔、介甫则别求义理以寓襟抱。柳子厚惟记山水刻雕众形，能移人之情，至《监察使》、《四门助教》、《武功县丞厅壁》诸记，则皆世俗人语言意思。援古证今，指事措语，每题皆有见成文字，一篇不假思索。是以北宋文家，于唐多称韩、李[①]，而不及柳氏也。

凡为学佛者传记，用佛氏语则不雅，子厚、子瞻皆以兹自瑕。至明，钱谦益[②]则如涕唾之令人跻矣！岂惟佛说，即宋五子[③]讲学口语，亦不宜入散体文。司马氏所谓言不雅驯也。

寄来二作皆不苟作，薙芟[④]数语，乃时人所谓大好者。他日当面析之。此虽小术，失其传者七百年。吾衰甚矣，儿童[⑤]粗知其体要，不幸中道殂。贤其勖哉！

注释：

①韩、李：韩愈、李翱。翱字习之，唐代文学家。曾从韩愈学古文，风格平正谨严。

②钱谦益：清初人，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遗老。诗文在当时有很大影响，但因率先降清，颇为人所轻。

③宋五子：指宋代学者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

④薙芟：删改。

⑤儿童：方苞指自己的儿子。

译文：

散体文章只有记这种体裁不容易写得好，论、辩、书、疏这四类体裁都有可以写的事情，志、传、表、状这四类体裁则非常适合于用来写人的思想品行，只有记这种体裁没有实质性的内容可以支撑起来。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只有工程进度的时间安排，亭台楼阁的各自位置，工作时的具体程序，使看的人感到厌倦，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昌黎用记这种体裁去写东西，大多凭借某情某事为线索；永叔、介甫则从义理这个角度去抒发自己的胸臆和抱负。柳子厚在记中则只是描写山水风景，也寄托有人的情感，至于《监察使》、《四门助教》、《武功县丞厅壁》各篇记，则只不过是用普通人所说的日常话语来写写而已。援古证今，指事会意，每个题目下都有现成的语言，写一篇记几乎是不假思索。所以，北宋的古文大家，对于唐代的文学家大多称道韩愈、李翱，而不提及柳宗元。

凡是记叙学佛者事迹的文章，使用佛教的语言则显得不精致，子厚、子瞻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使自己的文章有些毛病。到了明代，钱谦益的文章则好似口水一样令人呕吐。不光是佛教里面讲经的语言，即便是宋代五子在讲学时用的口头语言，也不应该用来写作散文。司马氏所谓言语不文雅规范就是这个意思。

寄来的两篇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删掉了几句话，正是现今人所说的时髦话。以后有时间可以当面详细分析。这些虽然是雕虫小技，但它失传已经有七百多年了。我已经老了，我儿子对文章的作法也只是肤浅地知道一些大概，不幸的是他年纪轻轻就突然死了。你要努力呀！

上陈大中丞请修明史纲目书

蓝鼎元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主要是蓝鼎元给当权者上书，建议编纂《明史纲目》一书，并对如何研究明史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已的看法。

蓝鼎元（1680－1733），字云锦，号玉霖。福建漳浦人。蓝鼎元喜著书，历史方面有《平台记略》。蓝鼎元喜讲学，尤喜讲经邦治国之事，故对时事最为留心。他有《鹿洲初集》二十卷。集中对西南各省的地理、风俗、人物皆有所记述，详实可信，颇有价值。

从清初开始，编修《明史》就始终是朝野上下的一件大事。本来，新朝为旧朝修史，这是中国历代的一个悠久传统。但到清朝，这个传统却又有另外一番新的含义。因为清朝是从“夷”的身份人主中原的。它虽然夺取了政权，但还没有合法的证明。为了获得这个合法的证明，它就迫切需要汉族知识分子的积极合作，从历史和文化上来证明清朝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这样，清朝修《明史》就面临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是旧朝遗民对新朝的反抗，一方面是汉人知识分子对“外夷”的反抗。为了消除这两方面的政治危机，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声势浩大地为前朝修史。这样。既把汉人知识分子拉拢过来了，又消除了旧朝遗民的心头仇恨。正因为如此，清廷对官修《明史》极为重视，几次三番征诏全国名流学者入馆编修。这个办法的确有效。全国各地的大学问家差不多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这项规模宏大的官修

《明史》工作。

在这种背景下，蓝鼎元写了这封信。但蓝鼎元却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蓝鼎元认为从史学史上看，历代修史从大的方面看，不外出乎两端，一是纪传体，一是编年体。特别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堪称一代巨著，“治乱兴亡，瞭如指掌”，遗憾的是“义例未精，予夺不无失当”。故而，朱熹才又作了《通鉴纲目》，“义精事核”，简直可以和《春秋》相媲美。现在，朝廷在修《明史》时，若能编纂一部类似于《通鉴纲目》的《明史纲目》，那就太好了。所以，蓝鼎元认为，《明史纲目》只有依照《通鉴纲目》的体例、笔法，才能把明代二百多年的大事记述清楚。什么“成祖靖难”、“建文逊国”，什么“英宗北狩”、“南内夺门”、什么“大礼聚讼”、“三案纷争”，什么“客魏造妖”、“缙绅惨毒”，什么“兵虚饷匮”、“盗贼蜂起”等等。只有用纲目体，才能纲举目张，大事清楚，小事不漏。蓝鼎元还说，我虽然有志于此道，但人卑名微，势单力薄，力不从心。如果当今有德高望重、位尊权大的人来做这件事，那我愿意为他赶车、替他削笔、供他驱使，也无所怨言。

这封信写的感人至深，它不做作地坦露了封建时代一位有见识、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对历史研究的关心和热爱。蓝鼎元也做过官，身为官场中人，能对历史研究有如此一份热忱，实在令人感慨不已。相比之下，我们今天的各级官员就差得远了。他们不但不积极支持正常的历史研究工作，反而百般阻挠和压制历史学家去从事史学研究。史学危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这个原因而引起的。所以，这封书信很值得当今那些大权在握的达官显贵们阅读一番、思索一番。

（《鹿洲初集》卷1）

原文：

国有史官，助赏罚者也。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若胜国史尤为殷鉴。史所重在褒贬是非，非止记事、记言作行状、目录已也。是以垂法、戒昭、劝惩，诛乱贼于既死，表芳徽于千载。故曰“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铁钺”。古之史不一家，司马子长创“本纪”“列传”“书”“表”诸体，班氏父子仍之。易“书”为“志”，历代作者自范蔚宗[①]以下，皆祖马班，而史才、史笔远不及矣。涑水司马温公本《春秋》编年之法，辑成《资治通鉴》，治乱典亡瞭如指掌。而义例未精，予夺不无失当。紫阳朱子[②]因之作为《通鉴纲目》。大书以提要，分注以备言，表年著统，起威列终五季，千三百六十年间，义精事核，卓乎可继《春秋》，绍先圣笔削之旨。元儒金仁山断自唐虞为补前编，明宪宗命儒臣商辂[③]等续宋元以成后纪。万历中，渭上南轩又杂采宓羲以来核而可信者，列于前编之首，可谓至详且备。独有明一代阙如也。我皇上弘开史局，命诸臣纂修明史，经历多年，草野愚生，不登馆阁无由披览一二，茫然弗知。其体裁太抵远绍马班，为二十一史之续。窃不自量，欲进一言，以为有明一代纲目，不可不宗紫阳而修，而继之当高帝奠鼎金陵，肇造区夏，天锡智勇，经营弘远，比及仁宣之世，纲举目张，颇称愿治。英宗北狩，南内夺门[④]，社稷宗屆殆哉。岌乎孝宗君臣兢兢业业，海内乂安，为有明列辟之冠。其余不足观矣。阉寺执柄于中，权奸蒙蔽于外。大礼聚讼，三案纷争[⑤]。客魏[⑥]造妖，缙绅惨毒。兵虚饷匮，盗贼蜂起。绵延至于怀宗，则虽有善者无可如何。然身殉社稷，犹不失亡国之正也。若开国继体之初，而有建文逊国之事，尤世运之丁。极否[⑦]攘夺起自一家，忠良殄其噍类。天地晦冥，三纲沦斁。不幸其身多历年所，又不幸其传诸子孙世数久长。使当时附和倡乱反颜事仇之辈得全，其称功颂德文饰其事，

以靖难之名，而二三百年莫敢有冒言正论，抉天理而植纲常，斯亦古今第一恨事也。则有明纲目之作，乌可已乎？二百七十年中，命令之施，纲纪之布，民生国体、安危休戚之所系，不为大书特书，振千秋之衮钺，开万古之聋瞶，有世道人心之责者，其何能不扼腕三叹也。生怀此已久而力不逮志，既苦劳筋饿肤，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明窗静几之下，又以徵信书籍须充栋汗牛。食贫不克，自致每思及此，终夜抚然，恨不得当世有力大君子留心此道者，为之执鞭，供笔削校雠之役。幸际执奉于今中，可谓千载而一时。执事刚方正直，胸境无偏私之累，复当宽大不讳之朝，是是非非无所牵掣，可以《春秋》之直道行之，任抚循闽疆之重，顺风而呼，可谓贫无其力乎？敢请动支无碍钱粮，开馆纂修，广求明代书籍，以备徵信。择淹通有才识、心术醇正之士一二人，与生共事执事。综其大成，补百代之欠缺，丰功伟业与紫阳并不朽矣。执事冰蘖之操，非人所及。每秩满迁官，必将所积羡余呈进。内帑区区，修史之费谅无介怀。以贯朽无用之财，为不朽事业之用，九重闻知，以为所进于上者多也。草野愚生，罔识忌讳，惟执事谅察。

注释：

①范蔚宗：即范晔。南北朝宋人。史学家。著有纪传体《后汉书》。史才、史识俱佳。因涉嫌谋反被杀。

②紫阳朱子：即朱熹。南宋人。理学家。著述甚多，影响极大。有《四书集注》等。

③商辂：明朝中期人。官至兵部尚书。英宗复辟，被诬下狱，斥为民，后复官。有《商文毅公集》。

④英宗北狩，南内夺门：英宗北狩即“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瓦剌攻明，英宗亲征，战败，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东）被俘。南内夺门即“夺门之变”。英宗被俘，兵部

尚书于谦等拥立英宗弟祁钰为帝（即景帝）。次年英宗被释。景泰八年，得宦官曹吉祥、将领石亨、官僚徐有贞等的支持，乘景帝病危，发动政变，夺宫门，复位，废景帝，杀于谦。

⑤大礼聚讼，三案纷争：大礼聚讼指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世宗由藩王继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的尊号。争论三年，追尊兴献王为皇考。因此事而下狱、致死的有一百四十多人。三案是指晚明宫廷中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挺击案是指万历年间，有人闯进太子住地，持棍打死守门太监。时人怀疑为郑贵妃所为。红丸案是指泰昌元年，光宗即位后生重病。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光宗服后即死。时人怀疑是郑贵妃所指使。移宫案是指泰昌元年，光宗死，熹宗立。宦官魏忠贤想利用熹宗年幼，把持朝政，据乾清宫。朝臣杨涟、左光斗等不让他们与熹宗同居一宫，迫使迁至哕鸾宫。

⑥客魏：客即客氏。熹宗乳母。熹宗立，封“奉圣夫人”，与魏忠贤通。崇祯即位，被笞杀。魏即魏忠贤。与客氏交通专权，人称“客魏”。崇祯时被杀。

⑦极否：即《周易》所谓“泰极否来”之意。

译文：

国家设置史官，是为了彰善殚恶。不忘记前代之事，就会成为后世的借鉴。如果是前朝取得的成功经验，那更是应该值得借鉴。史书的作用在于褒贬是非，并不是只为了记载事实、记录言语去编写行状和目录。所以，垂示法度，告戒世人，劝善惩恶，在那些乱臣贼子行将灭亡的时候口诛笔伐，对那些丰功伟绩加以表彰，使之流传千载。因此说，“一个字的褒奖，比华衮还要荣

耀；一个字的贬斥，比铁钺还要严酷。”古代的史书不止一家，司马迁创立“本纪”、“列传”、“书”、“表”各种体例，班氏父子沿用此例，只是把“书”变为“志”，历代史家自范蔚宗以下，都效法司马迁和班固，但史才、史笔远远赶不上马、班，涑水司马温公根据《春秋》编年体例，编纂成《资治通鉴》，治乱兴亡瞭如指掌，只是义例不尽精纯，评价有些失误。紫阳朱子又依据《资治通鉴》而著作了《通鉴纲目》。大字是提纲，用注来记事，用表来记年，起自周威烈王，终止于五代。一千三百六十年的历史，义例精纯，事实详核，完全可以继承《春秋》，并把先圣“笔则笔，削则削”的宗旨发扬光大。元朝的儒生金仁山以唐虞为上限，补为“前编”，明宪宗命令儒臣商辂等人补充宋、元以后的历史，编成“后纪”。万历年间，渭上南轩又杂采伏羲以来较为可信的内容，放在“前编”之首，可以说是既详实又完备。唯独明朝一代历史是个空白。我朝皇帝大开史局，命令诸臣纂修明史，经历了许多年。草野愚民，不进史馆是没有机会披览一二，只能是茫然无知。它的体裁大体上上承马、班，接着“二十一史”写。我不自量力，想提出一个建议，认为明朝一代的历史纲目，不可不依照紫阳来编修，接着应该写高帝在金陵称帝，统一华夏，天生智勇，深谋远虑，和仁宣时代比较起来，纲举目张，可以称作是一代盛世。英宗到北边去出征，宫内却发生了夺门之变。社稷宗庙岌岌可危。有赖于孝宗君臣上下，兢兢业业，海内平安无事，成为明朝各位皇帝之冠。其余的就不值一提了。宦官在宫中把持权力，权贵在外面蒙蔽朝廷。大礼聚讼不决，三案纷争不息。客、魏兴妖作乱，缙绅士人惨遭毒害。兵员减少，军饷匮乏，盗贼四起。延续到怀宗，即便有一些良策也无可奈何。然而，为社稷而牺牲，依然是堂堂正正地亡国。就像开国立业之初，就有建文帝丧国这种事情，尤可见世运之不幸。争权夺利在自己家里发生，忠臣良将惨遭毒手。天地昏昏，三纲不存。

不幸的是，这段历史还要延续许多年，更不幸的是，它还要一代一代地传给子孙。假如当时支持叛乱、反颜事仇的人都活下来，他们就会歌功颂德，百般掩饰这些事，称之为“靖难”之名，而二三百年来，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仗义直言，保护天理而维持纲常，这真是古往今来第一大遗憾啊！这样，明朝纲目的编写，怎可轻率呢？二百七十年里，命令的实施，纲纪的颁布，百姓的生活，国家的体制，安危休戚的关键所在，不给大书特书，举起千秋的斧钺，扫清万古的蒙昧，那些肩负世道人心的责任的人，怎能不扼腕三叹呢？我抱有这个志向已经很久，但力不从心，既苦于劳筋饿肤，不能一天在明窗静几之下安安稳稳地读书，又因为还需要汗牛充栋的史料文献。但我吃饭还成问题，致使我每一想到这件事，常常夜不能寐。真盼望当今之世有能力的大君子来关心这件事，为他执鞭赶车，为他做笔削、校雠的杂役。幸运的是今天遇到了执事，可以说是千载难逢。执事方正刚直，胸襟开阔，不偏一己之私，又生活在当今宽宏大量、没有忌讳的朝代，是是非非没有什么拖累，完全能够以《春秋》的笔法去写史。担任巡抚闽疆这样的重任，顺风一呼，难道能够说是贫弱无力写？请求动支无碍钱粮，开馆纂修，广泛搜集明代书籍文献，以备考订，选择学识渊博并有才能、心术醇正的学者一二个，来和我一起共同为执事服务。综其大成，补充三百年的遗缺，丰功伟业可与紫阳相提并论，同为不朽。执事冰洁一般的操守，不是常人所能够赶得上的。每当秩满迁官之时，总是把积累剩余下来的钱财上交。区区钱财，修史的费用想必也不在话下。用腐朽无用的钱财，来做不朽有用的事业，皇上知道，认为所做的贡献甚多。草野愚民，不知道忌讳，望执事谅察。

上沈心斋先生书

蔡世远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蔡世远向沈心斋谈及他治学的艰辛，以及近来无所上进而有愧于沈心斋对他的栽培和提拔。

蔡世远（1682－1733），字闻之，漳浦人。康熙年间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作品有《二希堂文集》十二卷 。

蔡世远生活的时代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时期。清朝这个时候，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处于一个明显的上升阶段。这样，抛开其他因专制高压带来的巨大灾难不说，知识分子的日子总的来说还是好过一些。蔡世远在信中向沈心斋含蓄地抱怨社会风气不好，文坛上势利之人太多， 很少能有像宋景濂那样的“伯乐”。宋景濂虽身为文坛领袖，但却以接引后学、奖拔年青人为己任，使人如沐春风，如饮甘露。蔡世远说，我虽然生活在穷山僻壤，志大才疏，但也不想就这样在田间陇亩过一辈子，也想有所作为。科考不利，回家时，您能对我有所鼓励，这使我有一种知己之感。但我近来很少长进，这使我倍感惭愧。

蔡世远认为，象宋代的苏轼兄弟那样，多才多艺，年纪青青就擅长应试，样样出色，他是做不到的。尽管如此，但他自己更推崇欧阳修的风格和做法。欧阳修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甚至不敢读韩愈的文章，不光是担心读不懂里面深奥的思想，而且更是害怕会误解甚至曲解韩愈文章里的观点，而只敢去读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那些专为科考士人们所写的庸俗文章。蔡世远表示，他虽然佩服苏氏的才能，但更看重欧阳修的意见。但他又一想，倘若

人这一辈子不努力上进，博得个功名，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岂不太没有价值了吗？再想到回到家里已经五个多月，仍然碌碌无为，实在令人惭愧。像沈心斋这样的名流，多少年轻的士人都想做他的学生而办不到，既然自己能有幸地被他赏识，确实需要努力才行。

这封信写得情真意切，作者既写出了自己的抱负，也分析了自己的弱点。这就是：虽然不安于现状的平庸无为，但又缺乏必要的恒心和毅力。作者能够直面自己身上的不足，这是很难得的。这正是一切读书人共有的通病。读读这封信，可以多少有助于医治当代读书人的浮躁之气，而多培养一些持之以恒的耐心。

（《二希堂文集》卷7）

原文：

六月启行，闻在建宁①停骖甚久，想入朝报命当在八九月之交也。世远以驽劣之才，署斋一年，亲承提命，恳恳然，裁其过而勉其不及。自谓所得者多，非徒文章一事。昔宋景濂四持文衡，好接引后学，士之近之者，谓如大寒加重裘，盛暑濯清风。四方得见者，诧于人以为幸。世远僻处劣陬，才不逮志。然振衣濯足，固不自安于培塿沟渎也。礼闱被放，归宿于三山署中，临行告世远曰："汝今归矣，凡人之役，役于利者。我知汝无是也。而近于义者，不可激也。偶得一第便自偃蹇废弃，我又知无是也。恐溺于古荒举子之业不可为也。"窃念斯言，切中膏肓。但今则更有愧者。世远自少不以治生为急，稍有长物，则蓄参苓以为养亲之资。其余购古书供朝夕玩习，非敢效原宪②之金石歌声、张嘉贞③之不治产业。良以贫富有命，非可力争。且君子志其远者、大者，无暇琐琐及也。今自北上归来，恐负王曾④之志，即卧稾推车，自信不至。役役于利，然欲如曩时之廓落自豪，不可得也。此其对先生之言而自愧者也。苏子瞻兄弟年未二

十，长于应试、制策，古文尤雄伟俊拔。欧阳公未第时，不敢读昌黎之文，惟取当时所号为时文如杨刘者读之。世远凡才末学，鹿鹿鱼鱼，亦尝剽窃经史之绪余以形之笔墨。居恒每羡苏氏之才，而尤以欧公之言自戒若曰：以彼其才，当未第时犹不敢分心于古如此，况我辈哉！然亦时激昂慷慨，谓士子读圣贤书，不蚤抗首扬眉穷古极今，以自附于作者之林，倘终身不得一第，其将默默守此以终耶。吾侪聪明才力远不逮古人，待其将老而图之，复何望哉？今抵家已五闲月，碌碌无就。令君陈莘学先生尝授以有韵之文，而众绪难祛，作辍互乘。中夜自思，恐流为浮休，恂愁刻鹄屠龙而后止，所荒者，岂但制举之业已哉。此又其对先生之言而自愧者也。伏惟先生去欲以诚，求仁以恕，自视学以来，闽中人士至今犹寝食歌思不置，天下之人思欲出其门而不可得。世远顾独蒙知遇，拙工游匠石之门，驽骞邀孙阳之顾，敢不痛自刻责，以庶几无玷门墙哉。戊子公车拟欲先期函来受教，但进止必待尔时方能自决。家君托如天之庇，司铎、罗源、蓝玉霖近在省城，精进有加。世远再拜。

注释：

①建宁：即今福建省建瓯县。

②原宪：春秋时鲁人。孔子弟子。性狷介。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家邑宰。

③张嘉贞：唐朝人。官至中书令。虽贵，不立田园。

④王曾：宋朝人。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正色独立，官风颇佳。

译文：

六月开始动身，听说在建宁停骖时间比较长，揣想入朝复命

的时间应当在八九月之间吧。我这样的平庸之人，署斋一年，亲受教诲，小心翼翼，克服自己的缺点，弥补自己的不足。自己认为收获不小，并非光是文章这一件事。从前宋景濂主持文坛，喜欢提拔那些年轻的学子，读书人一接近他，都说就好像寒冬时节穿了一件温暖的大皮衣，又好像炎热的夏季沐浴在一阵凉风之中。四面八方被他接见的人，都向他人炫耀，认为这是自己的荣幸。我身居穷乡僻壤，志大才疏。然而，振衣濯足，同样不满足于在田间沟渠呆一辈子。礼闱被放，回到三山署中，临走前告诉我说："你今天回去了，一般人所追求的都是利。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然而，要想得到义，就不能急躁。偶尔得到一点，就自满自足，自以为是，我也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但只是担心你沉溺于荒废无用的举子之业上面而无所作为。"我认为这些话，说到点子上了。但是现在还有更令人惭愧的事。我从小就没有把谋生看得多么重要，一有点钱财，就积蓄一点参苓作为赡养父母的资本。其余的都用来购买图书，以供早晚习玩，不敢效仿原宪那样去歌舞声色、张嘉贞那样不治产业。因为贫富自有天命，不能靠人力就可以争取。况且，君子的志向在于追求宏大、高远的目标，也根本没有工夫去考虑这些琐碎的事。今天从北边回来，恐怕辜负了王曾的期望，卧稿推车，没有什么自信，斤斤计较地追求物欲，然而，想要如以前那样坦荡自如，那是做不到了。这是对先生说的话而感到惭愧的。苏子瞻兄弟年纪不到二十岁，就擅长考试、写文章，古文尤其雄伟壮丽。欧阳公没有中举时，不敢读昌黎的文章，只拿当时那些号称为"时文"的文章如杨刘等人的来读。我凡夫俗子，鹿鹿鱼鱼，也曾经从经籍史书上剽窃一些字句来写到文章里。平常总是羡慕苏氏的才华，但更是经常用欧公的话来告诫自己：凭着欧公那样的才能，在没有考中进士之前还不敢去读古文，何况我这样的人呢！但有时候也激昂慷慨，认为读书人学习圣贤书，不早早去发奋努力，博古通今，使自己

能够跻身于作者之林，如果一辈子捞不上一个功名，那么，岂不就将老死荒丘，还有什么指望呢？现在到家已经有五个月了，碌碌无为。令君陈莘学先生曾经教授给我作压韵的文章，但心情不好，时作时停。深夜反思，恐怕难以沉潜深入下去，只能成为照猫画虎或画虎不成反类犬之人。所荒废的又岂只是科举这一件事？这又是对先生所讲的话而感到惭愧的事。想到先生去掉欲念，讲究诚意，追求仁义，实践宽恕，自从视学以来，闽中的读书人至今还在吃饭睡觉时经常提起。天下的读书人想拜在先生门下而没有机会。我却独蒙知遇，就好似笨拙的工匠求学于有名的石匠的门下，迟缓的马匹被孙杨所看中，怎敢不严格要求自己，以免玷污师门的名声呢！本来打算在戊子那天乘公车来拜访先生，但来往必须等到你有适当的时机才行。家君托上天之福，司铎、罗源、蓝玉霖近来在省城，学业提高的很快。世远再拜。

与方望溪先生书①

沈彤

题解：

此信时间待考，内容是沈彤写给方苞的，主要是谈及自己对古书句读的一些见解，并批评了清代刊刻书籍的一些缺点。

沈彤（1688－1752），字冠云，江苏吴江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科，奏赋于夜半，不及成诗，未入选。参修《三礼》及《一统志》，书成，援九品官，耻不仕，以养亲为由，归隐田家。沈彤撰《周官禄田考》三卷，以辨正欧阳修之说。其《果堂集》十二卷，多订正经学之文。

清康熙年间，在一批大学问家，如顾炎武、阎若璩等人的影响和推动下，学界风气为之一变，像明朝那种不究古典，整日空谈心性义理的作法，在清初已不再有市场。学者们纷纷转向了对古籍经书的研读和考辨工作。这个风气一直延续到上百年之久，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蔚为壮观的"乾嘉学派"。

沈彤在这封信中，首先对方苞寄来的新近刊刻的《春秋左氏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必须制订一个凡例，才能从事古书句读的工作。否则的话，就会错误百出。并接着对"句读"二字的字源本义进行了考辨，指出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刻书，大多粗疏，谬误太多。即所谓"非句而句，非读而读"。不当断则断，不当读则读。并分析了古人写书的特点，认为现在的句读与古书的原意相去太远。

这封信的价值在于，它从文献学、考据学的角度对古籍整理提出了一些颇具示范性和规律性的观点，值得今天从事古籍整理

工作的人们的重视。

原文：

蒙示所雕《春秋左传》，命校勘诸老先生所句读。彤持笔研审，将下复休为其不安于心者，多必商定一例，乃可从事句读小学耳。为之亦难间，尝考其说矣，盖何邵公②序《公羊传》始连出“句读”二字。“读”字旧无音，当即群经古注所谓“读若某某”，人读之“读”也。马季长③《长笛赋》又言：察度于句投。注云《说文》训“逗”为止，“投”与“逗”古字通，音“豆”。句之所止也。然则句所止为“投”，音之出为“读”。古未有以“读”为“投”者，亦未有以“投”为句之半者。自宋而后，“通”读于“投”，呼以“豆”音。凡馆阁校书，旁点为句，句中点为读，而“读”遂改为半。句绝之名，立法虽详，然为读不免于繁矣。至近代刊书之句读，尤多意造。有所仿亦非善本，遂致非句而句，非读而读。一开卷而紕缪百出。非读繁之流弊欤？夫古人之书，累字成句，累句成节。节则语势，断句则语势，不皆断故语势断者，句也；势不断而语断，亦句也。语不断微顿焉，然后为读耳。以是知读不可以繁也。今所示《左传句读》亦有近刻之弊。若必求完善，宜先慎其句中之点。句中之点不失，则旁点皆可不失矣。或但用旁点以绝其句，而句中之点尽削之。虽长句亦如之，尤为近古。鄙意如此，其去从伏候裁定，若虑修改烦，但去其太甚者，即日便可毕事。惟明示之别纸数叶，略疏诸君句读之失，并呈正不宣。

注释：

①方望溪：即方苞，字望溪。清乾隆时人。官至礼部左侍郎。为“桐城派”开山，著作有《狱中杂记》、《望溪全

集》。

②何邵公：即何休，字邵公。东汉人。经学家。作《春秋公羊解诂》，世称"何氏学"。又有《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等书。

③马季长：即马融，字季长。东汉人，古文经学家。著《三传异同说》，另注《尚书》、《易》及《老子》、《离骚》等多种书。

译文：

承蒙你送来新刊刻的《春秋左传》，让校勘的老先生加以句读。我拿着笔仔细研读，对于那些拿不准的，必经制订一个凡例，才可以从事句读和文字音韵的研究。做起来很困难，曾经考证其源流，大概汉代的何邵公为《公羊传》作序时，才使用了"句读"这两个字。"读"字本来没有音，可能就是群经古注上所说的"读若某某"，人读之这个"读"。马季长《长笛赋》又说：察度于句投。注云：《说文》训"逗"为止，"投"与"逗"古字相通，音读作"豆"。就是一句话所停止的意思。然而，句子停止称为"投"，读音叫做"读"。自古以来从未有把"读"当作"投"的，也没有把"投"当成一句话的半截的。从宋代以后，"读"相通于"投"，呼为"豆"这个音。大凡馆阁校雠书籍，在旁边圈点作为句，句中圈点作为读，于是，"读"就改为一个句子的一半。句绝的名称，凡例虽然详细，然而句读起来未免太过于繁琐。到了近代刊刻书籍时的句读，臆造的实在太多。有的(刻书)它所依据的本来就不是善本，于是就产生了不该句逗却句逗，不应点读却点读。一打开书，错误百出。岂不是由于句读过于繁琐而产生的弊端吗？古人的书籍，都是积字成句，积句成节。分节依据语势，断句也依据语势。不应断而语势断的，是一句；语势不断而句断的，也是一句。语势不断时，稍微停顿一

下，然后方可以为句读。所以，可知句读不能过于繁琐。现在所送来的《左传句读》，也有近代刊刻书籍的毛病。如果必须要讲究尽善尽美，应该首先谨慎地处理句子中的点逗。句子中的点逗没有错误，那么，句子旁边的点读都能不出错误。或者，光使用句子旁边的句读来断句，而句子中的旁点全部删去。即便长句也是如此处理，这是最接近古人的办法。我的意见是这样，但最后选择取舍还需要等待你的裁定。如果考虑到修改过于麻烦，那么，只须删去那些错误太多的，用不了几天，便可完成这件事。只需在另外的纸上，明确指出各位句读的错误。并呈正不宣。

寄舍弟墨第三书

郑 燮

题解：

这封信是郑燮写给其弟弟的，内容主要是劝说、鼓励弟弟努力成才。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乾隆进士，曾作过山东范县、潍县知县。后弃官归扬州，卖画度日。他出身贫苦，颖悟好学，蔑视权贵，同情人民，赋性旷达，人以为狂。他能诗、工书、善画，世称“三绝”。他主张作诗必须反映社会生活，不同于王士祯的神韵说和沈德潜的格调说。在他的诗里，有许多同情民间疾苦、暴露封建社会黑暗的作品。如画竹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潍县竹枝词》：“绕郭良田万顷赊，大都归并富豪家。可怜北海穷荒地，半娄盐桃又被拏”等，都是反映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诗篇。有《郑板桥全集》。

郑燮是清中叶著名的诗人、书法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画家。在绘画方面，他擅长花卉木石，尤工水墨兰竹。笔墨劲秀，风致潇洒，给人以清新之感。板桥作画，重视对自然的观察。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但他的作品，又并非自然主义的描摹，而是经过精心提炼的。他在一段题词中，记述了自己画竹的情景：“竹馆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浮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固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他对客观事物

既能作深入的观察，又能用高超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这就是他的作品赢得人们赞誉的原因。板桥题画，也颇具特色，他曾有题画竹云："乌纱掷去不为官，囊橐萧萧两袖寒。写取一枝清秀竹，秋风江上作渔竿。"这首诗表达了他无意仕进和清高绝俗的操守，写得十分自然真挚。

在这封信中，郑燮提出：贫家子弟更易成才；对贫家子弟要加体恤。强调"敬师为要"，"子弟复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此最是病处。""二月卖新丝"等四首五言绝句，深刻反映了农夫、蚕妇的酸辛，要儿女读、唱，从小养成同情劳动人民疾苦的情操。

郑燮虽然是一个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但他关心社会，同情民隐，这在当时的社会，是很难得的。

（《郑板桥全集》）

原文：

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不数年间，变富贵为贫贱。有寄人门下者，有饿莩乞丐者；或仅守厥[①]家，不失温饱，而目不识丁。或百中之一亦有发达者，其为文章，必不能沉着痛快，刻骨镂心，为世所传诵。岂非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②]慧乎！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至于延师傅，待同学，不可不慎。吾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纸笔墨砚，吾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川连纸钉仿字薄，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中与之。至阴雨不能即归，辄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佳好衣服，必制新鞋袜来上学堂，一遭泥泞，复制为难矣。夫择师为难，敬师为要。择师不得不审，既择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

复寻其短？吾人一涉宦途，即不能自课其子弟，其所延师，不过一方之秀，未必海内名流，或暗笑其非，或明指其误，为师者既不自安，而教法不能尽心；子弟复持藐忽心而不力于学，此最是病处。不如就师所长，且训吾子弟之不逮。如必不可以，少待来年，更请他师；而年内礼节尊崇，必不可废。

又有五言绝句四首，小儿顺口好读，令吾儿且读且唱，月下坐门槛上，唱与二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便好骗果子吃也。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不得放脚眠，蚊虫獦蚤出。

注释：

①厥：其。
②浚：深。

译文：

富贵人家延请师傅教育子弟，非常关切，但学问有成就的，多在附从读书的穷家的人中产生，而自己的子弟却不行。不过数年间，富贵就变为贫贱；有的寄身于他人门下，有的沦落为饿莩乞丐；有的仅仅能守持其家，不失温饱，但却目不识丁。或许一百人中能有一个发迹的，而他的文章，一定做不到沉着痛快，刻骨铭心，为世人传诵。这难道不是富贵足以愚弄人，而贫贱足以使人立志，增长智慧吗？我虽然是小官，我的儿子却是富贵子弟，其中的成败，我无庸置论；只要能附从智慧子弟有成就，也就是满足了我的心愿了。至于延请师傅，对待同学，不可不谨慎

小心。我儿才六岁，年龄最小，同学中年长的要称作某先生，其次的也应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笔墨纸砚，只要是我们家有的，应不时散发给各位同学。每当见到贫家子弟，寡妇的儿子，求取十几个钱，准备买纸订仿字薄，十天也未做成，就应察明缘故，在无意之中给他。到阴雨天不能回家，要留下他们吃饭；天晚了，可以拿出旧鞋让他们穿去。他们的父母爱护孩子，虽然没有好衣服，必定做新鞋袜让孩子穿上去学堂，一逢道路泥泞，再做就难了。选择老师是难事，尊敬老师是关键，择师不能不审查，确定以后，就应当尊敬他，怎能再指出他的短处？我们一涉身宦海，就不能再教育自己的子弟，所延聘的老师，不过是地方名士，未必是海内名流。有时窃笑其不当，有时公开指出其失误，当师傅的既不能安心，教习的方法就不能尽心；子弟再心持轻忽，不专心求学，这是最大的祸害。不如发挥老师的长处，以补子弟的不足。如若实在不行，可等待来年，再另请他人；但这一年内的礼节，必不可少。

另有五言绝句四首，对小儿十分的顺口好读，让我儿边读边唱，在月下于门槛之上，唱给二太太、两母亲、叔叔、婶娘听，就可骗取果子吃。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耘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不得放脚眠，蚊虫獦蚤出。

寄舍弟墨第四书

郑 燮

题解：

这封信是郑燮写给他弟弟的。内容主要是提出不要羡慕富有，不要同流合污。

这封家书极力赞颂了农民“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的精神，同时也肯定了工人、商人“皆有便民之处”。对那些只想升官发财，没做上官就在乡里为非作歹的读书人则深恶痛绝，劝勉晚辈不要同流合污。

有知识的还需要有德行，单专不红，还不如不专。

（《郑板桥全集》）

原文：

十二月二十六日得家书，知新置田获秋稼五百斛，甚喜。而今而后，堪为农夫以没世[①]矣！要须制碓[②]、制磨、制筛罗簸箕、制大小扫帚、制升斗斛。家中妇女，率诸婢妾，皆令习舂揄蹂簸[③]之事，便是一种靠田园长子孙气象。天寒冰冻时，穷亲戚朋友到门，先泡一大碗炒米送手中，佐以酱姜一小碟，最是暖老温贫之具。暇日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颈而啜之，霜晨雪早，得此周身俱暖。嗟呼！嗟呼！吾其长为农夫以没世乎！我想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④]。农夫上者种百亩田，其次七八十亩，其次五六十亩，皆苦其身，勤其力，耕种收获，以养天下之人。使天下无农夫，举世皆饿死矣。我辈

读书人，入则孝，出则弟，守先待后。得志泽加于农，不得志修身见于世⑤，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今则不然，一捧书本，便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多田产。起手便错走了路头，后来越做越坏，总没有个好结果。其不能发达者，乡里作恶，小头锐面，更不可当⑥。夫束修自好者，岂无其人；经济自期，抗怀⑦千古者，亦所在多有。而好人为坏人所累，遂令我辈开不得口；一开口，人便笑曰："汝辈书生，总是会说，他日居官，便不如此说了。"所以忍气吞声，只提挨人笑骂。工人制器利用，贾人搬有运无。皆有便民之处，而士独于民大不便，无怪乎居于四民之末也！且求居四民之末而亦不可得也！愚兄平生最重农夫。新招佃地人，必须待之以礼。彼称我为主人，我称彼为客户，主客原是对待之义，我何贵而彼何贱乎？要体貌⑧他，要怜悯他；有所借贷，要周全他；不能偿还，要宽让他。尝笑唐人七夕诗，咏牛郎织女，皆作会别可怜之语，殊失命名本旨。织女，衣之源也；牵牛，食之本也。在天星为最贵，天顾重之，而人反不重乎！其务本勤民，呈象昭昭⑨可鉴矣。吾邑妇人，不能织绸织布，然而主中馈⑩，飞针线，犹不失为勤谨。近日颇有听鼓儿词，认斗叶为戏⑪者，风俗荡轶⑫，亟宜戒之。吾家业地虽有三百亩，总是典产，不可久恃。将来须买田二百亩，予兄弟二人，各得百亩足矣，亦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之义也。若再多求，便是占人产业，莫大罪过。天下无田无业多也，我独何人，贪求无厌，穷民将何所措足乎！或曰：世上连阡越陌数百顷有余者，子将奈何？应之曰：他自做他家事，我自做我家事，世道盛则一德遵王，风欲偷则不同为恶⑬，亦板桥之家法也。哥哥字。

注释：

①没世：终生。

②碓：舂米的器具。

③舂揄蹂簸：从事加工谷物的劳动。

④四民：指士、农、工、商。郑板桥在这里以农为天地间第一等人，以士为四民之末。下文言牵牛、织女为天星之最贵者，也是他的卓越创见。

⑤"入则孝"数句：在家孝顺父母，外出尊敬长辈，严守着古代圣王的礼法道义，用来培养后代。得志了，让百姓得到恩惠；不得志，活在世间就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孝""悌"，敬爱兄长，引申为服从长上。"见"同"现"。

⑥"其不能发达者"数句：那些没能发迹的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削尖头厚着脸（到处钻营），更不应该。

⑦束修：不放纵，约束自己。经济：经世济民，治理国家，抗怀：坚持高洁情操。

⑧体貌：相待以礼。

⑨昭昭：光明，明亮。

⑩中馈：妇女在家主持饮食等事。

⑪斗叶为戏：玩叶子戏。叶：叶子戏，古代博戏的一种。

⑫荡轶：放荡不羁。

⑬"世道盛"二句：社会风气昌盛就一心遵守王法，风气败坏时则不同流合污。

译文：

十月二十六日得到家书，知道新置田地秋季收获五百斛，欣喜非常。从今以后，可以终生务农了！必须制碓、磨、筛罗簸箕、大小扫帚、升斗斛这些物件。家中妇女要领着婢妾，都去学习舂揄蹂簸这些加工谷物的事，从而形成一种营造田园、子孙向上的气象。天寒地冻的时候，穷亲戚朋友到门上，先泡一大碗炒米送入手中，拿一小碟酱作佐料。这是最好的暖老温贫的东西。

闲暇时咽碎米饼，煮糊涂粥，双手捧碗，缩着脖力啜，在那寒冷的早晨，全身都会暖和起来。啊！啊！我愿意一生作农夫啊！我认为天下第一等人只能是农夫，而士为四民的末等。最好的农夫种田百亩，其次种田七八十亩，再次的种田五六十亩，他们都吃苦耐劳，耕耘收获，以供养天下人。假如天下没有农夫，大家都将会饿死。我们作为读书人，在家事孝，外出尊敬长者，严守着古代圣王的礼法道义，用来培养后代。得志了，让百姓得到恩惠；不得志，活在世间就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所以又高于农夫一等。而今却不然，一捧书本，就想中举、中进士、作官，如何攫取金钱、造大房屋、置买许多田产。起步就走错了路，后来越做越坏，总是没有好结果。那些没有发迹的人，在乡间为非作歹，削尖头厚着脸皮四处钻营，实不应该。约束自己、洁身自好的，怎会没有？以经邦济民相期许，坚持高尚情操要千古留芳的，也不乏见。但好人被坏人拖累，以致我们开不了口；一开口，人们便笑道："你们这些读书人，就会说话，来日做官后，就不这样说了。"所以，只能忍气吞声，供人笑骂。工人制造器物供人们使用，商人往来运输，以济人需，都有便民的地方。而唯独士人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不便，难怪要居于四民的末等。而且希望居四民的末等也不能得到啊！愚兄平生最看重农夫。新招佃户，必须以礼相待。他们称我们为主人，我们称他们为客户，主客原本是平等的关系，我们为什么高贵？他们为什么低贱？要礼待他们，要怜悯他们；有需要借贷的，要予满足；无法偿还的，要宽让他们。我曾笑唐人的七夕诗，咏牛郎织女，都用相会、分别之类的可怜的语句，大失命题本旨。织女，衣服的来源；牵牛，粮食的所在。他们在天上的星星中地位最高，上天予以重视，而人却反而不重视！那些勤劳的农夫，形象光亮可见。我们家乡的妇女，不会织绸织布，而在家主持饮食，飞针走线，尚不失为勤谨。近来经常听到鼓儿词，说人们玩叶子博戏，放荡

不羁，急应戒绝。我们虽有田三百亩，但总归是典产，不可久持。将来需买田二百亩，给兄弟二人，每人各得百亩足够了，这也是古代一夫受田百亩的道理。如若再想多要，就是占别人的产业，罪过太大了。天下无田无产业的人多了，我们是什么人，贪得无厌，穷人将如何生活呢？有的人说：世上有的人家田连阡陌，多达数百顷，你将怎么办呢？回答道：他做他家的事，我做我家的事，社会风气昌盛就一心遵守王法，风气败坏时则不同流合污，这也是板桥的家法啊！哥哥字。

给四侄钟杰书

陈宏谋

题解：

这封信是陈宏谋为做人的准则事而写给其四侄钟杰的。

陈宏谋（1696—1771），字汝咨，号榕门，广西临桂人。雍正进士，乾隆时历任陕、湘、苏等省巡抚，湖广总督。任职期间兴修农田水利，疏浚河流航道，在陕西提倡植树、养蚕、种山薯，均有成效。官至东阁大学士，后以年老辞官卒。

作者在这封信中对晚辈提出了俭朴、好学、诚恳的为人准则。这些人类共有的美德，在任何时代都不会过时。

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前提。己不正，焉能正人？一室不扫，何以扫天下？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才能走向灿烂的明天。

（《榕门集》）

原文：

其一

京中浮华，须立定主意，不为所染。盖天下惟诚朴为可久耳！吾家世守寒素[①]，岂可忘本？读书见客，事事检点，即学问也。

其二

来京途中，有一刻闲，便当看书，古人游处皆学，不过收放心耳[②]。骄傲奢侈，一点不能沾染。即会客说话，固须周旋，然

不可套语太多，多则涉于油滑而失真矣。

注释：

①寒素：家道清贫朴素。

②收放心：把放纵散漫的心绪约束起来。

译文：

其一

京师乃浮华之地，必须坚定信念，不受影响。大致说来，在世上为人处事只有诚恳朴实可以长久啊！我们家世代清贫朴素，难道能忘本吗？无论是论书还是见客，事事都要检点，这就是学问啊！

其二

来京的途中，有一刻闲暇就应当看书，古人无论出游还是居家，都在学习，不过是把放纵散漫的心绪收束起来。骄傲与奢侈，一点都不能沾染。即使是在会客说话时，本需周旋应付，但不能说太多的套话，多了就会有油滑之嫌、失真之感。

为学一首示子侄

彭端淑

题解：

这封信是彭端淑为求学事而写给其子侄的。

彭端淑，字乐斋，四川丹棱人。雍正进士，由吏部郎中出为肇罗道，不久归里，全心治学。他的诗质实厚重，不为鞶悦之习，文章也是如此。后主讲锦江书院，名重一时，有《白鹤堂诗文集》。彭端淑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

在这篇写给子侄的训示中，作者以四川贫富两和尚朝南海的故事作比喻，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学习中难与易、聪明与平庸的辩证关系，强调学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重要，以勉励子侄刻苦学习，自求上进。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学习固然需要一定的客观条件，但如果不注重主观努力，调动自己的积极性，也不会有什么进步。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客观条件相同，结果却大不一样，此中原因，我们应从主观方面、个人身上去找寻。

（《白鹤堂诗文集》）

原文：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①]而学之，永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

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②。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问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③，何如？”富者曰：“子何恃④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之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⑤也。

注释：

①旦旦：天天。

②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鲁，天性迟笨，反应迟缓。孔子曾评论弟子曾参说：“参也鲁。”（见《论语·先进》）但孔子的道统，最后却是由曾参传下来的。

③南海：指浙江的普陀山，为我国佛教圣地之一。

④恃：凭借。

⑤自力者：善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

译文：

天下事有难易之别吗？如果去做，那么困难就会化为容易；如果不去做，则易事就会变为难事。人们求学有难易之别吗？如果去学习，那么困难就会化为容易；如果不去学，则容易的内容也会转化为难点。我的天资迷忽，不及他人；我的才能低庸，赶

不上别人。但是如果天天去学习，日复一日而不懈怠，到了成功的时候，却也忘却了自己的迷忽与低庸。我的天资聪颖过人，我的才能敏捷过人，但弃而不用，也就与迷忽、低庸没有什么区别。孔子的道统，最后就是由天性迟钝的曾参传下来的。所以，迷忽、低庸与聪颖、敏捷的影响，难道不会有变化吗？

四川的偏远地区有两个和尚，一个十分贫穷，另一个则非常富有。贫僧问富僧道："我打算到南海去，如何？"富僧说："你凭什么去呢？"贫僧答道："我有一瓶一钵就够了。"富僧说："我几年来一直打算买舟顺江而下，至今还未办到，你凭什么前往呢？"到了第二年，贫僧从南海回来，并告诉了富僧，富僧听毕，惭愧不已。四川与南海相距，不知有几千里，富僧不能到，而贫僧却能前去。人们立志，难道还不如四川边远地区的和尚吗？

所以聪明与敏捷，既可依恃而又不可依凭，自持自己聪明、敏捷，却不去好好学习，这是自取失败；昏忽与平庸，既可限制又不可限制，不受昏忽、平庸的限制，努力学习，不知疲倦，这是善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人。

移明史馆帖子一

全祖望

题解：

这封信（大概）写于康熙十八年（1679），明史馆刚刚开张，全祖望向明史纂修官上的一封有关如何编纂《明史·艺文志》的帖子。

全祖望（1705—1755年），清代史学家、文学家，字绍衣，学者称谢山先生。浙江鄞县人。乾隆进士。初为翰林，旋受权贵排斥，辞官归家，专心著述。在学术上推崇黄宗羲，并受万斯同的影响，研治宋末和南明史事，留心乡土文献。所著《鲒埼亭集》，收明清之际的碑传极多，富有史料价值。他续修黄宗羲《宋元学案》，从四十二岁起，前后十年，从不间断。四十五岁起曾七校《水经注》，又三笺《困学纪闻》，对史料考订上有颇多贡献。

从顺治元年（1644）清廷入主中原，至康熙末期戴名世《南山集》案发生和王鸿绪《明史稿》撰成，为清人修撰明史的第一个阶段。在此期间，私家以极大热情从事明史著述的研究，官方也基本完成了《明史》的主要内容。任何学术的发展，都离不开适宜的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清初顺治、康熙两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和官方的统治政策，为明史学的兴盛提供了一定条件。清初在建立和巩固统治秩序的过程中，首要的威胁就是广大人民和残明势力的武装反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统治者不得不将注意力集中于军事镇压上，对思想文化领域的异端思想，尚无暇顾及。因此在顺治一朝和康熙初年，官方的文化政策是相对宽松

的。比如，这一时期所兴的文字狱，不仅在数量上远不及乾隆时期，在处置上也是比较轻的。

在私家修撰明史的同时，官方也迫不急待地动手了。清廷入主中原的第二年（顺治二年）五月，就诏令以内院大学士冯铨等为总裁修撰《明史》。但终顺治一朝，史稿“仅成数帙”。自康熙十八年大规模开设明史馆，官方才真正重视《明史》的修撰。当时，以所征五十名博学鸿儒悉数充明史纂修官，在史馆内外就拟修《明史》的取材、体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广征官私史料，甚至派人到黄宗羲等人家去抄录史料，经过这一系列的准备，于康熙十九年至康熙二十二年，各纂修者拟出了《明史》初稿。

《明史》纂修，自顺治二年至康熙十八年，初无体例之订定。宏博入馆，纷纷呈稿。朱彝尊首先提议；王鸿绪继之，成《史例议》；汤斌有《明史凡例议》及《本纪条例》。馆外则如黄宗羲、吕留良之话《历志》。而“道学”一传，尤为当时争执之焦点。惟《艺文志》不载前代书籍，颇为全祖望所病之，以为古今四部存亡，无可资以考校。然著述浩荡，愈后愈增，考亡证佚，当俟专书，必欲责全史志，转恐贻讥罣漏。黄云眉氏之论也有些道理。然恐未能切中全祖望之心思。全祖望的目的在于求“全”求“备”而不在于求“专”求“细”。全祖望认为“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这是全篇的核心思想。《艺文志》乃一代文化学术之大观，由《艺文志》可知历代文化学术之变迁与演化。一旦断代为志，则千古文化学术之脉胳尽成割裂，不复完整。文化学术之精神何由可见？所以，全祖望耿耿于怀，百般声辩，《艺文志》务必不能断代为之。否则，“一切灭裂殆尽矣。”通观历史，全祖望认为，《艺文志》写的最好的是《汉书》和《隋书》，欧阳修《新唐书》也不错。最无章法义例的是《宋史·艺文志》。全祖望希望明史馆的各位纂修人员能够超越《唐书》、《宋史》而直追

《汉书》、《隋书》。

总之，这封信不仅是一篇有见识的史学论文，而且还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史学史文章。作者对历代史书、史家等典故非常熟悉，信手拈来，详为征引，学识渊博，议论横生。不愧为大家手笔。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虽然身不在史局，但却非常关心明史研究的工作和进程，而且，不避嫌疑地勇于直书，向那些史馆的纂修官直言不讳地提出自己的看法。拳拳史心，实在感人。仅此一端，便可不朽。

（《鲒埼亭集》卷40）

原文：

横云山人撰《明·艺文志稿》，专收有明一代之书，其简净似为可喜。然古人于艺文一门，必综汇历代所有，不以重复繁冗为嫌者，盖古今《四部》之存亡所由见焉。班氏于《春秋》诸《传》，以驺氏之无师、夹氏之无书，尚证诸册，慭古学之失传也。《师旷》六篇，显然为后人因托，不敢轻去，阙所疑也。是以王子邕《家语》之非旧本，师古必注之《汉志》之下，而欧公谓《水经》作于郭璞，正不嫌与《隋志》异同。《汉志》所有，至隋而佚其半，《隋志》所有，至唐而佚其半。其卷数或校前《志》而少，则书之阙可知；或校前《志》而多，即未必伪，要其书之搀改失真可知。汉代以《七略》为本，隋以《七志》、《七录》，唐以《开元书目》，宋以《崇文》、《中兴》两书目，天下图籍至繁，岂无逸出于山林草泽之间，而必以内府所藏核之，防作伪也。世道降而人心坏，虽在翰墨，俱思舞诈，以耸一时。汉之《百两尚书》[1]，宋之《三坟》，在前代已不少，而明尤甚。前辈议明《文渊阁书目》，不详撰人姓氏，不详卷帙，其为荒略，固无可辞。然正、嘉之间，有伪作《正始石经》者，托言中秘所得，而不知其为《书目》之所无，其妄立见，则虽荒略，亦自可

宝矣。即如崔氏《十六国春秋》[2]，晁公武所未见，马氏《通考》已去其目，而有明中叶缀集成书，出于秀水项氏，斯亦不可不详者也。常熟钱尚书言内府尚有吴谢承《后汉书》，其友曾裔云及见之，后为德清方少师取去，斯言吾未之敢信，而阎徵君言，曾见之于太原，为明永乐间刻本，信或有之，必伪书也。萧山毛检讨所引《经典释文》，皆称旧本，又不知其为谁氏之藏也？姚江黄徵君有宋薛居正《五代史》，不戒于火，近人有诡言其书尚在者，及详诘之，则穷矣。年运而往，赝本乘之，徵文不足，徵献不足，后辈之无识者，必相惊以为是羽陵[3]《酉阳》中物也。下走于此，有忧患焉，而不自知其为杞人之固，故窃谓前史之例，有未合者此也。

况《艺文》自宋以后，俱无恙也。刘宋《符瑞》等篇，远溯于周、汉，杨隋《食货》诸作，旁及于梁、陈，古人宏雅不群之材，大都以述旧闻、补逸事为尚。今姑弗及于唐宋以前，而即以完颜蒙古两朝，其登天禄入石渠者，不知几何，弃而不录，得毋为诸史家所笑也？然考《明史·艺文》原志，出自黄徵君俞邵，虽变旧史之例，而于辽、金、元诸卷帙，犹仿宋、隋二《志》之例，附书于后，南宋书籍之未登于史者，亦备列焉。横云又从而去之，而益简矣。今文渊阁前后所修《书目》具在，所当疏通证明匡谬补遗之处，此固秉史笔者之事。秣陵焦氏之书[4]，原为《国史》起见，然其《序》谓以大内之书归之《四部》，而实则与三馆之《目》，全不相符；又其舛戾极多，不可用也。其文渊阁之所无，而见于各家《书目》者，附录于后，此在前史诸《志》固有成例，如汉、唐二《志》，凡为内府所本有而不可以登于正史，或本无而增入者，一一注明于下，以志慎也。倘如横云山人所作，则此等义例，一切灭裂殆尽矣。班氏而后，言《艺文》者，莫善于《隋》，欧公《唐志》亦佳，紊乱而无章者，无若《宋》也。轶《唐》、《宋》而侔《汉》、《隋》，是在史局诸公为

之。

注释：

①《百两尚书》：汉张霸所传百又两篇的《尚书》。《汉书·儒林传》："世所传百两篇者，出东莱张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为数十；又采《左氏传》、《书叙》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数简，文意浅陋。成帝时，求其古文者，霸以能为《百两》征。以中书校之，非是。"

②崔氏《十六国春秋》：《十六国春秋》托名崔鸿作，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及全祖望《答史雪汀书》并言其伪。

③羽陵：羽陵为古代藏书之地，见《穆天子传》。

④秣陵焦氏之书：指焦竑所撰《国史经籍志》。

译文：

横云山人著有《明·艺文志稿》一书，专门收集明朝书籍，其简洁尤其值得称道。然而古人对于"艺文"这一门类，大都汇集历代所有书目，并不嫌其重复繁琐。这是由于古往今来《四部》书目的存亡情况都要从这里被人所了解。班氏在记述《春秋》各《传》时，认为驺氏没有师承渊流，夹氏没有书籍流传，但仍征引各种古籍，深为古代学术的失传而惋惜。《师旷》六篇，显然是后人托名所作，但仍不敢轻易删去，这是为了存疑。所以，王子邕《家语》虽非原书，但师古依然在《汉志》中加以注明。而欧公认为《水经》为郭璞所作，也并不因为与《隋志》记载有什么异同而放弃自己的看法。《汉志》上所记载的，到隋代已经佚失过半；而《隋志》上所记载的，到唐代又佚失过半。其卷数或者比前代《艺文志》所记载的更少，这就看出书籍的佚失

情况；或者卷数比前朝《艺文志》所记载的更多，但也未必就是假的，这样就可以看出书籍的删改失真情况。汉代以《七略》为底本，隋代以《七志》、《七录》为底本，唐代以《开元书目》为底本，宋代以《崇文》、《中兴》两书目为底本。天下的图谱书籍实在太多了，岂能没有从山林草泽之间出现的书籍呢！但必须用内府所藏的书籍目录加以核实查对，为的是防止伪书。世道变迁而人心不古，即便那些身在官府的舞文弄墨之人，也常常弄虚作假，而去制造耸人听闻的轰动效应。汉代（伪造）的《百两尚书》、宋代（伪造）的《三坟》，在前代已经不少，而明代（伪造的）更多。前人批评明朝的《文渊阁书目》，既不写明著者姓名，也不写明著作卷数，其疏陋之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然而，到了正、嘉之间，有伪造《正始石经》的人，宣称他是从中秘得到的，却不知道《书目》上并没有《正始石经》的记载，其荒谬一目了然。不过，它虽然鄙陋，却也值得珍视。即以崔氏《十六国春秋》而言，晁公武没有见过这本书，马氏《通考》也没有记载，可到了明朝中期却被汇集成书，出自于秀水项氏，这也是不可不详细了解的。常熟钱尚书说内府还藏有三国时期吴国谢承的《后汉书》，他的朋友曾裔说他还看见过此书，后来被德清方少师拿去。这些话我实在不敢相信。另外，阎征君说，他曾在太原看见过这部书，是明朝永乐年间的刻本。也许确有这本书，但必定是伪书。萧山毛检讨所引用的《经典释文》，都称为旧本，却不知道旧本是何人的藏书？姚江黄征君有宋朝薛居正的《五代史》，未被火焚，近来有人谎称这部书现在还有，可等到详细地询问他，他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事情一过，赝本紧跟着就出现了。文献不够用，耆旧又不足征。后人没有学问的，必定会惊奇这是羽陵《酉阳》中的东西。写到这里，不能不产生一种忧患之感，但又不至于像忧天的杞人那样慌恐。我只是认为前代史书的体例，还有不完善的地方。

《艺文》从宋代以后，大体不缺。刘宋《符瑞》等志，往上追溯到周、汉两代，杨隋《食货》等志，也包括了梁、陈二朝。古代那些学识渊博的人，大多以记述旧闻、辑补逸事为时尚。今天暂且不说唐宋以前，即以完颜、蒙古两朝为例，那些进入天禄阁、石渠阁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但都弃而不载，这岂不是让众多史家所耻笑吗？然而，考证《明史·艺文》原志，出自于黄征君俞邵，虽对旧史体例有所改变，但对于辽、金、元各卷帙，仍然仿照宋、隋两部《志》的体例，附在书后，南宋书籍没有记述在史书上的，也一一写上了。横云又把它们删去，这就更加简疏了。现在，文渊阁前前后后所修纂的《书目》都在，需要疏通、证明、匡谬、补遗的地方，这都是那些史家们的职责。秣陵焦氏的书，原本为《国史》的一部分，然而它的《序》说把大内之书归并到《四部》，可实际上却与三馆的《书目》完全不合；还有，它的错误很多，不能使用。文渊阁所没有记载的，而见之于各家《书目》的，附录于后，这些在以前史书的各《志》中已经早有成例，如汉、唐二《志》，凡是内府所本有而不可以记录于正史的，或者原来没有而新增加的，一一注明在下面，以便显得谨慎。如果是横云山人所作，那么这类义例，便都会删除殆尽。班氏之后，论述《艺文》的，没有超过《隋》，欧公《唐·志》也不错，杂乱无章的，以《宋》为典型。网罗《唐》、《宋》而媲美《汉》、《隋》的任务，就完全靠史局中的各位来努力完成了。

答和观察书

袁枚

题解：

此封书信，年月不详，难以考订。是袁枚写给一位和观察的官员，讨论德才关系的。

袁枚（1716－1798），清朝文学家、诗人。字子才，号简斋、随园老人，浙江钱塘（今杭州）人。乾隆进士，曾任江宁等地知县。辞官后侨居江宁，筑园林于小仓山，号随园。论诗主张抒写性情，创“性灵说”。对儒家“诗教”表示不满。部分诗篇对汉儒和程朱理学进行评击，并宣称“《六经》尽糟粕”。所作书信颇具特色。有《小仓山房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

清朝进入乾隆时期，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文功武治，均达到可观的水准。史称“乾嘉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是中国封建社会少有的好时光。尽管这一切都是依靠高压和专制而取得的。但绝大多数人对此并无任何自觉意识。甚至包括那些颇有学问和见识的硕学大儒，也沉溺于乐不思蜀的心态之中，对深深隐藏的巨大的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无所察觉。相反，在清朝统治者的文化羁縻政策的网罗下，大批饱学之士都进入了“明史馆”和“四库馆”里，整日埋头于古书典册，皓首穷经，不问世事，对现实矛盾一无所知，虽有个别学者先知先觉，大声疾呼，指出“以理杀人”的黑暗现实，但大多数人仍无动于衷，苟且偷生。

乾嘉时代产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也最有成绩的一个学术流派，史称“乾嘉学派”。“乾嘉学派”的特点是：从书本到书

本，从典籍到典籍，从经典到经典。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整理文献，考订史料。他们拒绝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物，而力求返回到汉学时代，像汉学家们那样去治经考史。这样，乾嘉学人绝大部分都没有什么思想，而只是一些腐儒经生。但袁枚却和这些“专务考索”的人不一样，他有自己的见解，他主张抒发自己的胸臆，他反对依门傍户，人云亦云，他要求独立思考，所以，袁枚对当时占主流地位的考据学风极为不满，对人们不加辨析地迷信《六经》更是深恶痛绝。他依据自己的判断，对千百年来人们深信不疑的圣人教条进行了大胆的质疑和抨击。

袁枚在给和观察的信中，针对“德贵才贱”这种谬论，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才贵德贱。并旁征博引，从事实到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和观察的说法。认为才比德更重要，更有用。袁枚甚至认为“才”是人之为人的本质。人有才才能成其为人，人无才便不能叫做人。人有了才，才能参赞化育，上事国家朝廷，下事黎民百姓；外事君主，内事父母。甚至，人如果没有才，那连地也种不好，连饭也吃不上。既不能做工匠，又不能做农夫；既不能制造器具，又不能种植田地，还整天狂叫“我有德，我有德”，又有什么用！岂非自欺欺人！推而广之，人身上的一切器官无不都有其才的功用。眼睛能看见东西，是目之才；即便看见了罪恶和坏人，那也不是眼睛本身的毛病；即使看到了一些不应该看的东西，那也不是眼睛这种才能的缺陷。同样，嘴能吃东西，是口之才，但却不能因为嘴能辨别是非就说嘴不好，更不能因为嘴吃了一些不该吃的东西，就认为是嘴这种才能的毛病。如果因此而把眼睛挖掉，使之变成瞎子，或因此而把嘴钳起来，使之变成哑巴，那完全是灭绝人性的举动，它也根本不符孔、孟这些圣人的本意。

最后，袁枚慨然说道：当今世上不是没有道德，而是虚伪的道德太多；不是没有才能，而是冒牌的才子太多。所以，问题不

在于贵德而贱才，而在于明辨是非，求其真理，彻底弄清才与德的内在本质和确切含义。

这篇书信是一篇说理透彻，论证周详，议论风趣的好文章。作者立意高远，见解不凡，即便在今日，也称的上是一篇有胆有识的上乘之作。

（《小仓山房文集》卷16）

原文：

邮递中接公手书，读三过，殷然以天下为己任。数年来，得此于上游极寡。第书中称“德为贵，才为贱”。是说也，狂夫阻之。

公而不以天下为己任也，则废才可矣；公而以天下为己任也，则天下事何一非才所为乎？忠于君，德也；而所以忠之者，才也。孝于亲，德也；而所以孝之者，才也。孝而愚，忠而愚，才之不存，而德亦亡。古以天、地、人为三才。天之才，见于风霆；地之才，见于生物；人之才，极尽参赞。其大者为圣贤，为豪杰；其小者为农夫，为工匠。百亩之田，人所同也；或食九人，或食五人，而才见焉。冶埴之事，人所同也；为燕之鏄，为秦之庐，而才见焉。使农一日不食人，工一日不成器；则子不能养其父，弟不能养其兄，而顾嚣嚣然曰：“吾有德，吾有德。”其谁信之！

孔子论成人，以勇艺居先，而以思义授命者次之。论士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称孝称弟者次之。曰：“高阳氏[①]有才子八人。”曰：“才难。”曰：“如有周公[②]之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至战国，纵横变诈，似才之为祸尤烈。故孟子起而辩之曰：“若夫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孟子之意，以为能视者，目之才也；虽察秋毫，不足为目病。而非礼之视，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难辨淄渑，不足为口病。而非礼之

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视非礼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礼而必钳口而噎之；是则罪才贱才之说，而非孔、孟意矣。

《驷》[3]之三篇曰："斯马斯才，"马尚非才不可，而况于人！今天下非无德也，然而有所谓伪德；非无才也，然而有所谓伪才。公与其贵此而贱彼也，毋宁两辨而求其真！枚谨覆。

注释：

①高阳氏：即帝颛顼。黄帝之孙，昌意之子。

②周公：即周公旦，传说周公制礼，曾作《周官》一书。但非今本《周礼》。

③《驷》：即《诗经·鲁颂·驷》。

译文：

从邮递那里接到了公的手书，读过三遍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多年来，因读信而奋发上进者实在太少了。第书中说"德为贵，才为贱"。这一说法，不为狂夫所接受。

公如果不以天下为己任，那么，才能就会浪费；公如果以天下为己任，那么，天下的事情哪一样不需要才能呢？忠于君主，这是德；而之所以能够忠于君主，这就是才。孝顺父母，这是德；而之所以能够孝顺父母，这就是才。孝顺而愚蠢，忠诚而愚笨，如果没有才，而德也会消失。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天之才，表现于风雨雷霆；地之才，表现于生命万物；人之才，表现于参赞化育。其博大者成为圣贤，成为豪杰；其渺小者成为农夫，成为工匠。百亩的田地，人人都是一样的；但有的能养活九个人，有的能养活五个人，这就体现出了才。冶埴这种事情，人人都可以做；但有的能做燕镈，有的能造秦庐，这就体现出了才。假设农夫一天不种地，工人一天不冶炼；那么，儿子不能奉

养他的父亲，弟弟不能奉养他的哥哥，而仍然高谈阔论地说："我有德，我有德。"这话谁会相信呢！

孔子论述人的价值，以武勇技艺为第一位，而以忠义服从为第二位。孔子认为士人以出使四方不辱君命为第一位，而以孝顺父母敬重兄长为第二位。说："高阳氏有八个有才能的儿子。"又说："才最难得"。又说："就好比有周公那样的才能与美德。"如此看来，才能是非常重要的！发展到战国，纵横谋变，似乎是由才能造成的祸患。所以，孟子挺身而出，为之辩护说："即使去做不善的事情，那也并非才能的罪过。"孟子的意思是，认为能够看见东西，是眼睛的才能；虽然能够明察秋毫，也不能说是眼睛的毛病。而不按照礼仪的规范去看东西，同样也不是才能本身的过错。能吃东西，这是口的才能；虽然能够辨析淄渑，也不能算是口的毛病。而不依照礼仪去吃东西，也不是才能本身的过错。如果因为它不按照礼仪去看东西而剜掉它的眼睛使之变成瞎子，如果因为它不按照礼仪去吃东西而钳住它的嘴使之噎死；这都是一种污蔑才能糟蹋才能的说法，而不是孔子和孟子的本来意思。

《駉》的三篇说"斯马斯才"，马尚且需要才能，何况人呢！现在天下并非没有德，只是有所谓虚伪的道德；也并非没有才能，只是有所谓虚伪的才能。公与其推崇道德而贬低才能，还不如把二者辨别清楚而求得一个真理！枚谨覆。

与张司马

袁　枚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袁枚写给一朋友，谈论风水一事。袁枚驳斥了风水应验的说法，认为自古以来，风水应验者甚少。所以，与其把财力都用于厚葬，倒不如为生者多做些好事。

袁枚在信中首先指出风水一事，皆出于无知之徒的迷信，古代的圣人从来不信这些。孔子把他父母合葬在防，王季的坟墓让滦水都给冲刷了，也没有什么不好。袁枚说，现在的人在孝敬父母方面，赶不上古人的万分之一，但对于挥霍钱财进行厚葬，则超过古人十倍不止。更何况从历史上看，厚葬之家很少能够长久兴旺的。袁枚从史书上列举了许多例子，来证明风水之虚妄。从《史记》、《汉书》到《三国志》、《隋书》、《新唐书》。条条在案，不容辩驳。袁枚还特别指出，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倒是对风水之说情有独钟，一说起风水，立刻就将平时高谈阔论的“天理”“人欲”统统抛到了脑后，一字不提，却不知道人生无常原非风水所能决定的。比如，有的是父母得意而子孙穷困，有的是父母长寿而子孙短命。这样的事情实在太多。人活着的时候还无法左右命运，更何况死后变成骷髅就更是无力决定命运。所以，史书所载，风水不应验者居多，而应验者居少。但人们却迷信少的，而忘记多的，这真是不可理解。

这封信是一篇很有份量的破除迷信的文章。值得向现代人推荐。由于种种原因，现在的人们似乎又在重蹈覆辙。以前是迷信领袖能给自己带来幸福，现在是迷信传统能给自己带来安全。反

正，中国人总是要迷信上一种东西才会心安理得。这正是一种民族幼稚病。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民族虽然有了五千年的所谓文明史，其实在骨子里还远未走出蒙昧和野蛮。故而，现代人急需进行一番新文明的洗礼。袁枚这封信，虽写在二百年前，但对于破除今天人们的迷信心理来说，还是有价值的。

（《小仓山房尺牍》）

原文：

足下同不失正，贞不绝俗，古之人欤？古之人也！但有进规于左右者：蕙纕来，道足下治生太急，持筹握算，终日生嗔；又惑于风水之说，扪险探幽，劳瘁靡已，致病体日增，仆窃以为过矣！夫善养生者不窭，善逸生者不殖。鱼门短于养生，故常窘；足下短于逸生，故常病，臧榖亡羊[①]，其失一也，何不分作韦弦之佩[②]耶？青囊[③]一书，皆术者之妄词，古之圣贤，未有闻焉。《周礼》墓大夫[④]无相阴阳之说；孔子问于聊曼父[⑤]之母，即合葬于防；王季[⑥]之墓，为滦水所啮，无损周家气运。元人《就日录》[⑦]云："凡见理明之人，五行鬼神，皆不能拘。"今人仁孝，万不及古人之一，而于葬亲之郑重，则十倍焉。其若是者何哉？为死者之心缓，而为生者之心急故也。此心不可以对天，亦不可以对地。柳仲涂曰："善葬之家必不昌。"其言有至理，足下当深思之。附上历古来风水源流数则，以开足下之惑。自来言《葬经》[⑧]者，不始于郭璞[⑨]。《史记》樗里子[⑩]言："后世当有天子之宫夹我墓。"《汉书》刘向[⑪]奏王氏坟在济南者，树皆交柯连叶，上高出屋，有立石起柳之象。《袁安传》[⑫]：书生指某地曰："葬后世出三公。"孙钟[⑬]遇三少年乞瓜，为指葬地。《三国志》管辂[⑭]过毌邱俭[⑮]坟曰："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孙坚[⑯]祖坟，有五色云蔓延数里。此言阴宅[⑰]风水之始也。吕才[⑱]驳之，司马温公驳之，最为明快。若伊川之驳《葬经》，言"培其本根，而枝

叶自盛”，此非驳之，乃助之也。理学先生，往往惑于风水，将平日义利之辨，一旦抹煞，不知世之父母肥而子孙瘦，父母寿而子孙夭者甚多。在生前一气相感，根本无补于枝叶，而况死后之枯骴乎！汉廷尉吴雄[19]，以人所封之地葬母，人皆言必灭，而子孙贵盛。见《后汉书》。隋文帝曰：“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我不当为天子；若云吉，我弟不当战死。”见《隋书》。宋文潞公[20]穿漯渠，司天者言不利，时仁宗病，后改筑，潞公即命司天者往，乃更言“前穿无害，恐将来有不利”。则改者受罪故耳。见罗氏《识遗》[21]。源乾曜[22]得张说门左之地，村夫为之卜葬，俚斗[23]为之书碑，而泓师知其必贵。《见新唐书》。黄巢[24]李自成[25]之败，俱以掘其祖坟故也，乃唐高祖起兵，亦被长安留守尽发其祖坟，而依然无恙。宋明帝[26]恶萧道成[27]墓有五色云气，暗遣人以铁钉长五六尺者，钉墓四维，以为压胜，而卒于无验。蔡京[28]酷嗜风水，葬其父于杭之临平，以钱塘江为水，越之秦望山为案，似乎大吉矣，而全家灰灭。元龙冈失火，廉希宪[29]谓太常卿田忠良[30]曰：“上都圣上龙飞之地，偶尔失火，慎勿令妄谈地理者有所更移。”凡史册所载，风水之不验者多，验者少。今人信其少者，忘其多者，殊不可解。蔡元定[31]好地理，贬后，人以诗嘲之云：“先生果有尧夫[32]术，何不先言去道州?”宋喻氏《萤雪丛说》：陈同甫驳蔡季通云：“古人皇氏定九州，尚无百官，先有山川，不知何者为靴山，何者为笏山[33]?”朱晦翁在座，低首而不能答。

注释：

①臧縠亡羊：臧，奴隶；縠，小孩。亡羊故事见《庄子·骈拇》。

②韦弦之佩：韦，柔而韧；弦，紧而直。佩带韦弦，以随时自警有所不足。

③青囊：卜筮人盛书之囊，也借指卜筮之术。

④墓大夫：古时掌管邦墓的官。
⑤聊曼父：聊，地名。曼父，人名。即聊人曼父。
⑥王季：季历，古公第三子，文王之父。
⑦《就日录》：元人虞集作。
⑧葬经：即葬书。旧题晋郭璞撰。真伪不可考。
⑨郭璞：字景纯。晋人。好经术，通阴阳、卜筮之术。
⑩樗里子：秦惠王异母弟。滑稽多智，秦人号为"智囊"。
⑪刘向：西汉学者，整理《战国策》等书。
⑫袁安：后汉人，官司徒。
⑬孙钟：后汉人，性孝，以种瓜为业。
⑭管辂：三国魏人，善风角占相之术。
⑮毋邱俭：三国魏人，官尚书郎。
⑯孙坚：三国时人，孙权之父。
⑰阴宅：即墓地。
⑱吕才：唐朝人，贞观时受诏删定阴阳家书，颁布天下。
⑲吴雄：后汉人，官廷尉。
⑳宋文潞公：即文彦博，北宋人。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司马光等私交甚好。
㉑罗氏《识遗》：罗氏即罗璧，宋人。尝考证经史疑义，作《识遗》。
㉒源乾曜：唐人。官至侍中。
㉓俚斗：差役。
㉔黄巢：唐末人，农民义军领袖，建立大齐政权。
㉕李自成：明末农民领袖，建立大顺政权。
㉖宋明帝：好读书，末年好鬼神，多忌讳。
㉗萧道成：齐高帝。博涉经史，善书法。
㉘蔡京：北宋人。官太师。
㉙廉希宪：元朝人。官中书平章政事。为官多有政声。

㉚田忠良：元朝人。善《易》学。

㉛蔡元定：南宋人。曾从学朱熹。

㉜尧夫：即邵雍。北宋哲学家，懂《易》学。

㉝靴山，笏山：古人称可以出贵官子孙的葬地。

译文：

足下随和但不失正派，坚定但不与世孤立。是古代的人吗？是古代的人啊。但也有一些意见想对你说：蕙纕来这里，说足下对生命一事看得太重，算计太细，整天发牢骚；还对风水之说过于迷信，四处探险，过于劳累，致使病情加重。我以为这是不对的。那些善于保养生命的人是不窭的，善于享受生命的人是不去经营的。鱼门不懂于保养生命，故而常常困窘；足下不懂得享受生命，故而常常生病。奴仆和儿童把羊放丢了，结果都是一样的。为什么不佩带韦弦来随时警示自己呢？青囊这类书籍，都是方技术士的胡说八道，古代圣贤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这回事。《周礼》墓大夫也没有说如何辨识阴阳。孔子向聊人曼父的母亲询问，然后把自己母亲同父亲合葬于一地。王季的坟墓，被滦水所冲蚀，但并不影响周朝的气数。元人《就日录》说："凡是深明事理的人，五行和鬼神，都不能对他有所束缚。"如今的人在孝敬父母方面，不到古人的万分之一，但对于为父母举行的葬礼，则超过古人十倍。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死者着想的念头淡漠了，而替生者着想的念头浓厚了。这个念头既不可以对天，也不可以对地。柳仲涂说："过于讲究厚葬的人家，必定不会发达。"这话确实有道理，足下应当认真想一下。寄上自古以来有关风水的一些材料，帮助解开足下的困惑。古来讲《葬经》的人，并不从郭璞开始。《史记》樗里子说："后代肯定有天子的皇宫建在我的坟墓旁边。"《汉书》刘向上奏说王氏在济南的坟墓，树木枝叶连在了一起，高出屋顶，就像石头自立起来、枯柳又发芽一样。

《袁安传》记载：书生指着某个地方说："这个地方作坟墓，后人可以做三公的大官。"孙钟遇到了三个少年要求西瓜吃，为他指出坟墓之地。《三国志》记载，管辂路过毋邱俭的坟墓说："白虎咬着尸体，朱雀痛哭流涕。"孙坚祖先的坟上，有五色云朵飘泊好几里。这些是谈论坟墓风水的开始。吕才的驳斥，司马温公的驳斥，最为有力。像伊川那样驳斥《葬经》的，说什么"把根子扎牢，枝叶就会自然繁茂起来"。这不是驳斥，而是支持风水之说。理学家们往往迷信风水，将平时争论的义利之别统统抹煞，却不知道世界上父母富有而子孙穷困的人，以及父母长寿而子孙短命的人很多。在生前的那些活气，根本不能使枝叶茂盛，更何况死后的那些骨骸呢？汉代廷尉吴雄，在别人的封地上埋葬母亲，人们都说他后代必有大难，但他子孙却既贵又多。这件事见于《后汉书》。隋文帝说："我们家的墓地，如果不好，我就不应该做天子；如果好，我弟弟不应该战死。"这件事又见于《隋书》。宋文潞公开凿漯渠时，主管天象的官员说不吉利，当时仁宗有病，后来改变河道，潞公命令司天官员前去勘探，又改变话头说："上一次开凿没有什么害处，只是恐怕对将来不好。"这样，改变河道的人就受到责骂。这件事见于罗氏《识遗》。源乾曜得到了张说门口左边一块土地，村夫为他占卜埋葬的时间，差役为他书写碑文，泓师预言他必将发迹。这件事见于《新唐书》。黄巢和李自成的失败，都是由于把他们的祖坟挖开了的缘故。可是唐高祖起兵时，也被长安留守把他的祖坟全部挖开，但他却安然无恙。宋明帝忌讳萧道成祖坟上有五色云气，偷偷派人用五六尺长的大铁钉，钉在坟墓的四周，用来压制这股云气，但最后也没有应验。蔡京特别迷信风水，把他父亲埋葬于杭州临平，依靠钱塘江的河水，背靠秦望山，似乎大吉大利了，但全家却被诛连殆尽。元朝的龙冈失火，廉希宪对太常卿田忠良说："上都是皇上发家的地方，偶尔失火，千万不要让谈论地舆之学的人随便议

论什么。”凡是史书上所记载的，风水不灵验的多，应验的少。现在的人却迷信那些很少应验的，而忘记了许多不应验的。真是不可理解。蔡元定喜欢议论地舆，被贬谪后，人们写诗嘲笑他说：“先生如果真有尧夫那样的风水之术的话，为什么不事先就预见自己要去道州呢?”宋喻氏《萤雪丛说》中说：陈同甫反驳蔡季通说：“古人划定九州时，并没有百官，而是先有山川，不知哪一个地方为靴山，哪一个地方为笏山?”朱晦翁也在场，低着头无法回答。

与弟文韶书

卢文弨

题解：

这封信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卢文弨为学业事而写给其弟文韶的。

卢文弨（1717－1795），浙江余姚人，字绍弓，号矶渔，又号檠斋，晚更号弓父，人称抱经先生。乾隆进士。授编修、侍读学士，典广东乡试，旋提督湖南学政。辞官后主讲江南诸书院，潜心于经，尤好校书，曾校定《经典释文》、《逸周书》、《春秋繁露》、《白虎通》、《荀子》、《吕氏春秋》等古籍，镂版行世。又合经史子集三十八种，如《经典释文》的摘字而注，撰成《群书拾补》。并将所校汉唐古籍及自著、札记文集二十种二百六十三卷合为《抱经堂丛书》刊行，所附序跋，多校书所得卓识宏议，且版式雅饬，镌印俱精，为清代丛书佳作。另有《仪礼注疏详校》、《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广雅注》及《抱经堂集》等。

在这封家书中，卢文弨追叙了自己的家世，并回顾了个人艰难的学习经历及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激励幼弟奋发自立，勤奋学习。作者现身说法，语重心长，字里行间饱含着对幼弟的深挚感情和殷切期望。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处贫困之中，不应为其制约，反而要发奋图强，改变生存环境，否则，结果将是一事无成。

（《抱经堂集》）

原文：

愚碌碌在外，不能事二人，以与吾弟相聚。前以弟年尚幼，故未尝有书与吾弟，今弟已十有五年矣，离幼志而即成人在此时也。吾弟兄只二人，比[①]闻吾弟年来多病，殊为忧念。今年已长，当能自为调摄。念吾房恒不利于长子，其成立者每在于次。今吾年三十三，尚无子嗣。虽碌碌于朝，曾[②]不能备吾父母一日之膳，茫无端绪，且渐且惧。吾少时性情直憨不耐委曲，又读书不多，益友亦少。至今不能研求义理[③]之精微补我之阙，绳[④]我之非，诚不能无望于吾弟，吾意中所欲言者，亦不可不为吾弟尽也。

我高曾[⑤]以上，世有隐德[⑥]，年代久远，虽无从详悉其行事，然观其所以命字者，不取美称，而顾[⑦]以"庸"以"呆"自号，则其行盖可想而知矣。昔者吾高祖行之第六房无子，其妾惧或利其赀财[⑧]而求为嗣也，乃诈取他人之子子也[⑨]，后吾宗人知之，相率[⑩]为文以告于祖，明其为异姓也，不许与吾宗齿[⑪]，惧渎[⑫]姓也。然听其妾子之，而不更为立后，示皆不利其所有也。处处如此，可不谓仁至而义尽乎？吾祖少即丧吾曾祖，家徒壁立，不容见寡母之劳瘁，独自走四方，辛勤节啬，尽赎归祖遗之产，无所师授而能自立于学，精于歌诗，所友皆当世知名之士，尽得锺王[⑬]楷法。曩家中尚藏有习字帖一大簏[⑭]，朱墨重迭，大小交互，其勤学如此。吾少时无知识，以为废纸无用而焚之，使吾弟不及见，大恨事也。吾祖尝从人借银若干，其人之出也微[⑮]，执礼与吾祖甚恭，后复折卷弃负[⑯]。吾祖既贫不能偿，感其意，署卷尾[⑰]以示子孙。今其人之子，亦登甲科而为县令矣，吾虽不与其人深交，然未尝于人前言其所出也。栾郤胥原，降在皂隶[⑱]白屋之子，多出公卿。天下事宁有常哉？况有德于吾祖者哉？吾乡一

轻薄子在京，曾以此事见质[19]，吾谢不知。此语若出自吾家，无论非忠厚之道，亦甚违吾祖之意也。父亲积学工文，屡困场屋，然世间得一仕人易，得一通人[20]难，彼徒富贵者，其悉足羡也？吾生时正值家中匮乏之际，四五岁时，祖父母亲抚养之，稍长，于猥贱之事无所不为[21]。尝籴得官米[22]，吾晚从学堂归，恒自舂也。薪有数等，惟庄柴易斯[23]，若松柴栗柴难斯，吾为之故知也。晨起温宿粥一瓯食之，进学堂，归家午饭，或值未炊，即为佐炊[24]，夏间则日昳[25]又归家饭，乞糕铺汤一盂，取馀饭和之以食。物有定价者，常至市买之，此皆吾所甘为。独意有所苦者二：缓债，取租而已。盖吾素不工于语言，故惟此二事为难能也。父亲处馆于外，不能自教子。吾时读书不知门径所从入，好抄书，亦非世间希见之本，徒费日力于此，而不知务乎其所当务也。吾将来虽然富贵，亦必念夙昔艰难，不敢稍自佚乐，况不能养吾父母，而吾顾忍持粱而齿肥[26]乎？曳丝而履缟[27]乎？辛酉来京师，行装萧然，短褐不完，书籍亦不能携。初时借金氏书以读，此时金氏兄弟外任者，分携书卷以出，遂无处可借，又无钱以买书，及今熟读强记，亦恐不能坚牢，况并此无之耶？吾弟当知得书之难，则家中所有零篇断简，皆当宝之，此皆吾祖手所置者，好学人不必整齐书方始可看可读也。

吾旧时妄自期许：若得志必先赒恤宗党之穷者。今即二亲尚不能尽菽水之养[28]，又何能及他人？又何能办他事？谚云：树高千丈，叶落归根。吾之在此，岂遂为北平始迁之祖乎？要必归于杭州矣！吾弟不日即有家室之事[29]，住屋本少，又弃其半，何以相容？弃之甚易，得之甚难？今日欲如吾祖之赎归祖产，岂易言也？诗云："诒厥孙谋，以燕翼子，"[30]又云："我躬不阅，遑恤我后，"[31]此二言者，吾弟奚志哉？[32]吾宗衰微已甚，并黄口[33]儿计之，亦不过三十余人，其中年而无子嗣及贫不能娶者又往往而是。吾力虽不足以振之，而爱护之惟恐其有伤，固情之不能自已

焉者也。人安得尽大圣大贤？孟子谓不中不才，亦宜养之而不宜弃之也[34]。人至清则无徒，假如吾家有庆吊大事，宗族亲党，咸怀嫌怨，至者殊寥寥，其何以备礼而达情乎？自天子以下，皆当合欢心以祝其先，宁云愚不肖者其欢心可不必得也？则敬宗收族[35]之意，乃吾所重望于吾弟者也。

人不可不自立，祖父之贤，不可恃也。所谓甘棠犹爱之[36]，况其子者，固由德之入人者深，亦当子弟不肖未甚，或其时世风犹厚，时不忍于遽弃[37]也。吾家宇安[38]，族之正人，予旧亦爱其教诲饮食之德，族子弟有干犯者，非不能告官惩治，悯而不为，但摈弃之而已，卒亦未尝不复之也。今宇安死未几，而其子不肖，人亦何暇念及其父哉？天下好者难见，丑者易见，亦其势然也，可无惧乎？苏洵作族谱引，言其族之俗，昔美而今不美也，然未尝斥言其人，则言者无伤于忠厚，而见者足以为戒谱。至于死者之失，既不可以追改，而吾明言其人，直书其事，独不虑伤孝子慈孙之意耶？吾弟宜戒之慎之。如近日互争坟地，一则不能保其父之所有而转售，一则必欲夺其父之所予以自利，其将谓宋之祸，宣公成之乎[39]，可慨也已。

吾与弟相隔三千里，会面不知何时。胸中所欲言，犹恨其不能尽也。意绪虽多，总之积德培福之事。德者何？忠厚是也。前人之可法者多矣，吾所言十之一二而已，然可类推也。吾事多，不能常寄信，吾与他人，固不若是之烦言也，弟其思吾意。

注释：

①比：近来。

②曾：却。

③义理：儒家探讨经义、名理的学问。

④绳：纠正。

⑤高曾：高祖和曾祖。

⑥隐德：威重的品德。

⑦顾：仅，只。

⑧或：有人。利：贪图。赀财：即“资财”。赀：“资”的异体字。

⑨前一个“子”，名词。后一个“子”，名词作意动词，意思是“以之为子。”

⑩相率：共同。

⑪齿：并列。

⑫渎：轻慢，不敬。

⑬锺王：三国锺繇和晋王羲之均为著名书法家，合称锺王。

⑭曩：从前。麓：竹条等编成的圆形容器。

⑮出：出身。微：卑微，卑贱。

⑯折卷：毁掉债券。弃负：放弃债权。

⑰署卷尾：在债券的后面记下这件事。

⑱语出《左传》昭公三年。栾、郤、胥、原，晋国旧臣的家族。皂隶：古代的贱役。

⑲见质：询问我。质：质询。

⑳通人：学识渊博的人。

㉑猥贱：污秽，下贱。这里是作者对家务劳动的鄙视的称呼。

㉒籴：买进粮食。官米：政府销售的米。

㉓庄柴：柴火的一种。斯：劈开。

㉔佐炊：帮助做饭。

㉕日昳：日落。

㉖顾：难道。持粱、齿肥：吃美味。齿，用作动词。粱，肥：精美的食品。

㉗曳丝、履缟：指穿着考究。曳：拖。履：踩踏。缟：没有染色的绢。

㉘菽水之养：用清苦的饮食奉养父母。菽：豆子。

㉙家室之事：成婚。

㉚引诗见《诗·大雅·文王有声》，意思是：考虑到子孙，则儿子可以安然无事。诒：遣。厥：其。燕：安。翼：敬。

㉛引诗见《诗·邶风·谷风》，意思是：我自己都不见容，哪里有闲暇去考虑我之后的事情呢？躬：自身。阅：容，遑：闲暇。恤：体恤。

㉜吾弟奚志哉：吾弟以什么作为志向呢？

㉝黄口：本指雏鸟，借指儿童。

㉞《孟子·离娄下》："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

㉟收族：聚集，团结宗族。

㊱典出《诗·召南·甘棠》："芾甘棠，匆剪匆伐，召伯所茇"，蔽芾，繁盛的样子。甘棠：杜梨。召伯：姓姬名奭，周武王的臣子，封地在召（今陕西岐山县西南），故称召伯。茇：在草间居住。

㊲遽弃：骤然抛弃。

㊳宇安：人名，不详。

㊴语出《公羊传·隐公三年》，原文为："宋之祸宣公为之也。"宋宣公传位给其弟而不传其子，导致内乱。

译文：

我忙碌在外，难以分身事从二人，以便和弟弟相聚。以前因弟年龄尚幼，故未曾给你写信。而今你已经十五岁了，由少年转变为成人就在于此时啊。我们弟兄只有两人，近来听说弟弟一年来一直多病，令人担忧，挂念。现今弟已长大，应当有能力自我调摄。念及我们家总是不利于长子，成就一番事业的多为次子，我今年三十三岁了，还没有后代。虽然在朝奉职，却不曾为我们

父母做一天的饭，想起此事我就茫无头绪，惭愧不已。我小时候性情憨直，耐不住委曲，又读书不多，良友也比较少，所以我至今不能研求义理的精微，以弥补自己的不足，纠正自己的错误，这种情形使我不能不寄希望于弟弟你了，我心中所要说的，也不能不为弟弟你倾吐净尽啊。

我们高祖、曾祖父以上，世代都有威重的品德，虽然由于年代久远，我们无从详细了解他们的行为、事迹，但是，从他们的命名来看，不取美称，而仅以"庸"、"呆"等自号，其行为就可想而知了。过去，我们高祖到娶第六房仍没有后代，其妾担心有人贪图资财而求为嗣子，于是诈取他人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后来我们家里的人知道后，共同写信告诉高祖，说明这人是外姓人，不许与我们家族的并排，以免不尊卢姓。虽然如此，高祖听任其妾以之为子，而不再为其立后，以示都不利其所有。处处如此，能不说是仁至而义尽吗？我们高祖少年丧父，家徒四壁，他不忍心其母亲艰辛劳顿，独身闯荡天下，辛勤努力，节衣缩食，将祖上遗产尽数赎回，并且在没有老师讲授的情况下坚持自学，歌诗精通，他的朋友都是当代的知名人士，还学会了著名书法家锺繇、王羲之的楷书。过去我们家中还收藏有习字帖一大篓，红黑相间，大小不等，其勤奋学习就是这样。我小时候不懂事，以为是废纸，没有用处，把他们都烧了，使弟弟难以看到，真是一大憾事。我们高祖曾向一个人借了一些银两，这个人的出身低微，对高祖执礼甚恭，后来又毁掉债券，放弃债权。高祖因家贫无力偿还，为其心意所感动，在债券的后面记下这件事，以传示后代。而今这人的孩子，也考中科举，当上了县令，我虽然没有和这人进行深交，但未曾在人前说出他的出身。栾、郤、胥、原这些晋国旧臣的家族，降为贱役，而平头百姓的孩子许多成为公卿。天下事难道有常规吗？何况是对我们高祖有恩呢？我们乡里有一个轻薄之人在北京，曾就此事询问我，我装作不知道，而予

谢绝。此话若出自我们家，不仅有违忠厚之道，而且也大大忤犯了高祖的意愿。父亲治学刻苦，工于著文，却屡屡科举失败，不过，人世间得到一个科举仕人容易，而要想得到一个学识渊博的人就难了，那些富贵而无学识的人，难道值得羡慕吗？我出生时正值家境艰难，四五岁时，祖父、母亲抚养我，稍稍长大，对于家务劳动这些低贱琐事，无所不为，有时，我们家买一些官米，虽然我从学堂回来的很晚，但经常是由我舂米。薪分几个等级，只有一种叫庄柴的容易劈开，至于松柴、栗柴，则很难劈开，我因经常劈柴，所以知晓。每天早晨，我起床后温一瓯剩粥吃，吃过去学堂读书，午饭回家吃，有时饭未做好，就伸手帮忙，夏天，日落后又回家吃饭，得一盂糕铺汤，与剩饭和在一起吃。市场上货物有定价，我常去购买，十分快乐。而不乐意做的苦差事有两件：延缓债期、收取租子。因为我平素不善于表达，所以只有这两件事做起来十分困难。父亲在外谋生，无暇教导自己的孩子。当时我读书，不知道学习方法，只是喜爱抄书，所抄的也并非世间珍本，这样，白白浪费了光阴，却不明白什么事应当做。我将来即使富贵，也必定会念及往昔的艰难，不敢自我享受，何况不能奉养父母，难道自己忍心吃好的，穿好的吗？辛酉年（1741年）我来到京师，行装简单，衣物很少，书籍也不能携带，起初我向一姓金的人借书阅读，此时金氏兄弟出外任职，于是我无处可借，又没有购买，至今熟读强记，也担心不能牢固，何况仅此而已呢？弟弟应当知晓书来之不易，家中所存的零篇断简，都要珍惜，这都是我们先辈所购置的，喜爱学习的人不必非整齐无缺的书不读。

我过去曾狂妄的自我期许：有朝一日我若得志，必定首先帮助同宗的穷人。而今对父母还不能稍予奉养，又怎能周济他人呢？又怎能办其他事呢？谚语道：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我在北京，难道将成为始迁之祖吗？还是要回归杭州的！弟弟不久就将

成婚，住房本来就少，若又减半，怎么住呢？弃之甚易，得之甚难？今天若打算像祖上那样赎回祖产，难道容易吗？《诗经》道："考虑到孙子，则儿子可以安然无事。"又道："我自己都不见容，哪里有闲暇去考虑我之后的事情呢？"对于这两句话，弟弟以什么作为志向呢？我们家族已经十分衰微，包括孩子在内合计也不过三十余人，中年人无后代和因贫困不能成家的又很多。我虽然无力振兴，但爱护他们，惟恐他们受伤害，心中为这一份激情难以自已。人怎会都是大圣大贤呢？孟子说：不中不才，也应当养而不宜弃啊！人太顾及自己就会没有朋友了。假如我们家有红白大事，宗族亲朋都心中怀怨，很少人到家，怎么来准备行礼仪、表情谊呢？自天子以下，都应当合众人欢心共同敬祖，难道说对才能低下的人就不予礼遇吗？所以，敬宗聚族的意愿，我就寄希望于弟弟你了。

人不可不自立，祖父才贤，不可依恃。所谓杜梨还予喜爱，何况其子呢？用道德来影响他人，作用很大。当此子弟还说的过去，或当时世风犹厚，自不忍遽然舍弃啊！我们家族有一个叫宇安的，乃族中的正人君子，我过去也接受过他的教诲和饮食，族中子弟有干犯的，不是不可以告官惩治，乃怜悯而不愿这样做，只是摈弃罢了，结果最终也不曾有不改过的，今宇安死去还没多长时间，而其子匪为不肖，人们哪有空暇念及其父呢？天下好人难见，坏人易见，时势就是这样，能不令人惧怕吗？苏洵作族谱引言，说其家族风俗，过去好而今不好，但不曾斥责其人，这样，说者不伤及忠厚，而看见的人足以引以为戒。至于死者已去，既不可以复生，我明言其人过失，直书其事，难道不担心伤害了孝子慈孙的心吗？弟弟要切记慎之又慎。比如今日大家互争坟地，一则不能保全其父的所有而转售，一则一定要夺走其父所给以图自利，能说宋国内乱之祸起因于宋宣公吗？真是令人感慨万千。

我们兄弟二人相隔三千里之遥，会面不知在何时，心中的话，难以完全表达。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就是积德培福。德是什么呢？就是忠厚。前人可以效法的，我所说的不过十分之一二。我事务繁杂，不可能经常写信，我给其他人写信，本不像对你一样，弟弟要领会我的意思啊！

上桑弢甫先生书

卢文弨

题解：

这封信写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内容是卢文弨写给桑弢甫，谈论自己过去八年来的求学经历以及自己现在的困窘，并深感自己对不起前辈师长的期望与厚爱。

卢文弨（1717－1795年），清朝校勘学家。字绍弓，号抱经，浙江杭州人。乾隆进士，官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湖南学政。告归后，历主江浙各书院，终身从事校勘工作。以所校勘、注释的经子诸书汇刻为《抱经堂丛书》。并有《抱经堂文集》、《钟山札记》等。

卢文弨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号称“乾嘉盛世”的时期。各方面都达于极盛，各方面也就开始趋于衰败。主导文化学术界的是专务考据的“乾嘉学派”。卢文弨便在这种学术风气影响下，逐渐成为一名有影响的学问家。写这封信的时候，时值卢文弨三十一岁，虽到而立之年，但由于为生计所累，不能专心治学，故无所成就。卢文弨在信中说，八年来，他每到从前学习过的地方，都要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师友同聚的快乐，故而更加惋惜自己无所上进的遗憾。他说，一想到自己年纪一天天地大，但学问却总不见长进，这样如何能够自立于社会呢！接着，卢文弨又对桑弢甫说，您对我期望太大，一见面肯定会问近年来干些什么事、读过什么书、写过什么文章。而这正是我所感到惭愧的。卢文弨埋怨说，他每天都要抄写官书，而且，一天不能少于一千五百字。时间、精力都用到这上面了，根本没有工夫去做学问。卢文

弨又说，古人在贫困时出来做官，都是为了养家糊口，他现在没有力量养家糊口，故而常常郁郁寡欢、闷闷不乐。再加上，他既不会说好听的话，又不会去巴结权贵，故而，了解他的人就很少，这更使他显得孤独痛苦。虽然也有一二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但由于工作所限制，又不能经常往来。所以，卢文弨伤感地说，既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又没有做学问的环境，还没有做学问的朋友来互相切磋，这样一来，怎么能在学问上长进呢？正因为如此，一想到这些，他就感到万分恐惧。不过，卢文弨又表示，尽管如此，他还是挤时间读了一些经、史书籍。他读书的方法是“读经亦兼读史”，把经书和史书合起来同时读。读的时候，先断句，再对勘，同时，也记一些笔记，最后再加以整理。

这封信是一篇很好的学问家自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是怎样从困境中脱颖而出，自学成才的。尽管生活条件、学术条件很差，但一个人只要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会有所成绩。这种治学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有价值的。对于今天，更是如此。

（《抱经堂集》）

原文：

文弨再拜：杨许州至得先生书，蒙示中州游草一帙。喜甚，急欲知道途间事。粗读一过，觉情景了了在目。虎竹年少，诗之工已若是。霖潦弥塗，更唱迭酬兴，不少减有，以知先生之乐也。文弨自闻先生之教，私愿杖履所到，必往从焉。乃不意八年之久，不得一睹。事势阻格，不能自拔。每至昔时讲习之地，思师友聚处之乐，邈不可得，未尝不徘徊叹惋。自伤年日以长，而不能竟其所学，若何而可以自立也。自先生至中州也，道里近，音问可速达。然知先生之于文弨，望之深必将知其近所从事若何，所得力若何，其见于议论文字又若何。而文弨之所大惭正在

于此。昔孔蔑尝言仕有三亡，而子贱独否。文弨今日不幸与孔蔑之言适相似也。缮写官书，计字为率，日当得一千五百。敝敝于此，何暇为学？且古之为贫而仕者，盖将以禄养也。今文弨力不能迎养，是以居常少欢。文弨行能无似无以动人，又不能求当世贤士大夫而与之周旋，孑然寡合，以是益增其孤陋[①]。即有一二志趣相近者，又皆为职事所羁束，不得朝夕见。夫既无为学之时，又为境所累而不能自力于学，更无人焉共勉于学，是则终于失学而已矣。此文弨之所以内省瞿然[②]不能自宁者也。近日略得闲可读书，然不能如古人专读一书之法。读经亦兼读史，先为之分句读，正讹脱。偶有笔记，非其大者，以俟再读，然后求详焉。内府[③]校定经史善本，非力所能购，亦无从假诸友人。至耳目所触，未尝无勃。然于中而欲宣者，而弗工于辞不能达吾意之所欲云，展转移时，旋节销灭。昔欧阳子[④]尝叹言之："不可恃是。"固然矣。然传不传，虽不能自必，独不可籍以自娱乎？其上焉者不可骤几，其次又以为无益而不为，未见计之得也。文弨窃有意于此，而能厉其气使弗馁者，唯先生愿终教之。

注释：

①孤陋：孤独浅陋。

②瞿然：猛然。

③内府：即皇宫。

④欧阳子：欧阳修。北宋文学家。

译文：

文弨再拜：杨许州收到先生的信，让我看了中州游草一篇。高兴的不得了，急着想知道路途上发生的事。粗略地拜读一遍，

感觉到情景历历在目。虎竹年纪小，诗歌的技巧已经这个水平。霖潦弥途，更是唱合迭起，兴致不减，以此可见先生之乐趣。文弨自从得到先生的教导，非常希望能跟随先生。没想到八年之久，竟然不能一见。事势困扰，难以超脱。每次到从前学习的地方，想像老师同学相聚一起的乐趣，已经消失而不可复得了，总是流连忘返，叹息不已。想到岁数越来越大，而不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如此何谈自立！自从先生到了中州，距离近了，音讯可以很快知道。然而，我知道先生对于文弨，因期望太深，故而必将了解我近年来都做了什么事，最下工夫的是什么事，写成的议论文章又是如何。而文弨所惭愧的也正是这些。从前，孔蔑曾经说做官有三种损失，而唯独子贱没有损失。文弨今天不幸与孔蔑的话相类似。缮写官书，每天可写一千五百字。敝敝于此，哪有时间去做学问？况且古人因为贫困而出来做官的，都是为了挣钱养家。现在文弨财力既然不能够养活家人，故而生活中极少欢乐。文弨行为处世不能引人注目，又不能适合当世名人权贵而与奉承，孑孑独立，郁郁寡欢，因而越发显得孤僻。即便有一二个志同道合的人，又都为职务所束缚，不能朝夕见面。既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又为环境所拖累而不能努力求进，更没有人来相互勉励，所以，终于在学问上无所长进。这是文弨之所以内省时感到异常不安的地方。近些日子稍稍有了一点读书的时间，然而不能像古人那样去集中精力专门读一部书。读《六经》的时候也一同读史书。首先是进行句读，订正伪脱。偶尔也写一些笔记，并非重大的问题，以便接着再读，然后获得一个详实的解答。内府校定的经史书籍善本，不是我的力量所能购买的，也没有办法从朋友那里去借。靠平常所记忆的，肯定会有出入。然而心中想要急于表达的，就不讲究词句能不能表达我想要说的内容，时过境迁，马上就烟消云散了。从前欧阳子曾经感叹说：“不能自以为是。”确实如此。然而，能否流传下去，虽然自己不能决定，难

道还不可以借此来自我欣赏吗？上乘的境界很难达到，较低一点的境界又以为没有什么用处而不愿去做，还没有见过一个适当的计策。文弨准备朝这方面努力，而能够对我有所鼓励，不使我泄气的人，只有先生来教导我。

上徐大司空书

汪由敦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汪由敦写给一位叫徐大司空权贵的，请他对汪由敦的老师张先生的著述及遗稿的整理和保存有所关照和帮助，使之不致散佚失传。

汪由敦（？－1758年），字师茗。浙江钱塘人，原籍安徽休宁。雍正二年进士。纂修《明史》。三迁内阁学士，直上书房。乾隆十一年，命在军机处行走。文章典重有体，有学问，读书多。官协办大学士，任尚书，历工、刑、吏诸部。

汪由敦虽是一个官场中人，却颇少势利小人的官僚习气。至少在这封书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待朋友、老师的一片真诚感情。他说，张先生和我虽然是忘年之交，但却是我的老师。我既然得到张先生的赏识，在他死后，就应该尽到学生和朋友的一份责任，帮他照顾遗孤，替他整理和保存书稿和著述文章。汪由敦高度评价张先生的《春秋辨义》一书，认为“实可不朽”，其他古文诗稿也是毕生精神所贯注。可惜的是，却无人整理，恐怕不长时间就会“零落都尽”。如果能让人到他家里抄录一个副本，就可以使张先生的遗著不致遗失。

中国素称“礼义之邦”。这个“礼义”往往最直接最具体地表现在师生关系上和朋友之交上。汪由敦与张先生既是朋友，又是师生。他能做到身在官场，不忘道义；身为官人，不忘友人，实在难得。此等人物今天已不多见矣。所以，读读这篇书信，还

可以使人想起中国古代有这等重情重义的人物，岂不是对今天那些汲汲于名利之途的凡夫俗子以一个小小的教训？

（《松泉集》卷 7）

原文：

启者沧溪张先生旧所草书院三记，前冬已将寄往浙中。因欲觅书家书就碑式寄去，因循至今。伏见部务殷繁，未敢以请。窃思书院奉有御书，后来不患湮没，但闻诸夫子书院之设，本自圣训。而今人但知其为大中丞书院赐额，赐书中丞自请之耳。使终无一言，推明所自，则无异于前中丞之修书院者。反若专有其美与善，则称君之义异矣。行在寓斋，想颇清暇，谨缮原稿呈上，或再加斟酌。觅通家中善书者书之，寄交藩司[1]上石庶来者，得有所考，共喻此意耳。更有请者，张师于老夫子，虽以暮年识面，实则道义中第一知己。山斋主席有始有终。生蒙荐达，殁邺[2]遗孤，朋友之伦，于期为至。其生平著述，如《春秋辨义》一书，实可不朽。老夫子亦向所心许。即其他古文诗稿杂著，皆一生精力所聚。藐诸孤在娠，付托无人，及今不为收录，恐穴鼠壁鱼，零落都尽。《太元》五千文不得俟后世子云矣。昨四月间，其家人来京，知张师北上时嘱其甥刘生经理家事，今尚在其家。乞商之灵皋，托人就其家抄录副本。江苏杨藩司与张师有旧，盖亦留心斯道者，或嘱其给纸笔。俾刘生倩人抄写转寄来京，但得一副本便可。不终放失。至于论定发梓，始俟异日可耳。又闻其家云归榇[3]尚在殡所，盖师母之意欲待遗腹免身，方卜举葬。心苦志坚，思之哽咽。念张师生平行义，由敦辈晚列门徒，未能尽悉。方刘两君弱冠称交，白首无间。窃谓古塘宜为之状，灵皋宜志。诸幽而伐石，以表墓门。必得老夫子一言为重，此郭有道碑文中郎可无愧色者也。二事皆沧溪先生千秋之托，有待于后者。由敦侍后门墙，痛不得为炙鸡絮酒之行，非敢谓此区区者足报知

己于九京。义列在三分，自当然不敢不尽心焉耳。伏惟矜察。

注释:

①藩司：即布政使。明朝始设，清代正式定为总督、巡抚属官。专管一省财赋和人事。

②殁卹：照顾、抚养。

③归榇：棺材。

译文:

启者沧溪张先生以前所写的“书院三记”，前年冬天已经寄到浙中。因为打算找到书法家写好碑文格式一并寄去，故而拖到今天。看到部里公务繁忙，没有敢请教。我心里想书院如果有皇上御笔题写，将来就不必担心会被湮没失散。只是听说各个夫子书院的建立，本来就出自皇上圣谕。但现在的人只知道皇上为大中丞书院赐额，是赐书中丞自己请求的。如果始终无人说明，那么，推寻原因，则同前中丞之修书院一般无二。反而与那种他自己有了美德与善行，则称颂皇上恩德的做法完全相反。我现在在家里，很想趁着清闲有空，把原稿缮写完毕呈上，或者再加以斟酌修饰，找通家中擅长写字的人抄写下来，寄交藩司上任的官员，使之得以有所参考，共同达成这个意愿。还有一件事，张师和老夫子，虽然在垂暮之年才得以相识，实际上却是志同道合的第一知己。山斋主席有始有终。我承蒙推荐，抚恤遗孤，朋友情义，至此为最。其生平著作，如《春秋辨义》一书，为一生精力心血所凝聚，就好像各位遗孤尚在腹胎，托付无人，如果现在不加整理，恐怕为穴鼠壁鱼所损坏，失散殆尽。《太玄经》五千言等不到后世的子云啦。前一段四月间，其家人来到京城，知道张师北上时嘱咐他外甥刘生管理家里事务，现在仍然还在家里。请

求与灵皋商量之后，让人到他家去抄录一个副本。江苏杨藩司与张师素有来往，他也关心这件事，也曾嘱咐给一些纸和笔。等到刘生请人抄写之后，转寄到京师，只需要一个副本就可以了，不致于使之散失。至于修改定稿、发排刊刻，姑且等到将来再说。还听说他家人说归棺还在殡所，这是因为师母的意见是准备等到遗腹子生下来之后，再进行占卜和安葬。心苦志艰，思之哽咽。想到张师一辈子行侠仗义，我辈晚列门徒，未能尽获师训。方、刘两君弱冠称交，长幼不分，亲密无间。我个人认为应该由古塘来写行状，灵皋来写碑志铭。诸幽而伐石，以表墓门。务必得到老夫子一句话，这与郭有道文中郎比起来也毫无愧色。这两件事都是沧溪先生所托付的千秋大事，有待于后人来评说。我侍列门墙，悲痛的不能为炙鸡絮酒之行，不敢说这样一件区区小事就足以报答知己于九泉之下。只是道义在此，自然不敢不尽竭力。伏惟矜察。

与某书

戴　震

题解：

这封信是清代著名思想家戴震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谈到读书立说的宗旨问题，是一封颇能代表戴震思想的书信。

戴震（1723－1777），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出身于贫苦小商人家庭，其父戴弁，以贩贾为业。戴震幼时聪明蕴籍，好学深思。凡所读书，必定每字每句探求含义。由于家境贫寒，他自十八岁起，便教授学童，边教书边学习。乾隆七年（1742），二十岁的戴震结识了婺源名儒江永，并拜为师，学问益进。年近三十，才得补县学生，于是绝志举业，精思著述，境愈困而志弥高。他在三十二岁时，进北京拜访了久以学问著名的钱大昕，谈论竟日，钱氏大惊，目为“天下奇才”，从此，京师名儒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皆闻名造访，于是天下人都知道有位戴震。戴震以自己的学识见解，教授弟子，形成了清代乾嘉时期两大学派之一的皖派，对中国文化影响很大。

雍、乾时期，学术领域中经世思潮因失去其现实意义而趋于沉寂，而此时的经学也已向纯粹考据一路走去，已很少有人在治经的同时思考现实问题，为学术而学术是这一时期经学在整体上的特点。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戴震超然拔出，表现出超越常人的理论勇气，成为这一时期的“思想者”。这主要体现在这么几个方面：其一，批判社会现实；其二，提倡由文字训诂出发探求经书义理；其三，提倡自得之学；其四，提倡“志存闻道”，经世致用。从这封信我们可以看出，戴震认为后世儒生对经书义蕴强

作解释，他们所谓的“理”是杀人的理，他们的学说，是“以理杀人”，这种猛烈抨击现实的精神，在雍乾时期专制极严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戴震还提出，做学问要有自己的见解，要“志存闻道”，经世致用。读书要能提高自己，开启自己的心智，增进自己的智慧，并且要老老实实，把一字一句的含义弄懂，这样才能真正体会到经书所包含的真义。

戴震的这封信给我们很多启示，学习须从基础抓起，一字一句的含义必须弄清，而且要有自得之学，有独立见解。学习知识是为了用之于社会，服务于民众，因此须在体察民情上下功夫。

（《戴东原集》卷9）

原文：

足下制义[①]，直造古人，冠绝一时。夫文无古今之异，闻道之君子其见于言也，皆足以羽翼经传[②]，此存乎识趣者也。而词不纯朴高古，亦不贵，此存乎行文之气体格律者也。因题成文，如造化之生物[③]，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此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④]。汉儒故训有师承[⑤]，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⑥]。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⑦]，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

学以牖吾心知[⑧]，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刚。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学也[⑨]。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宋已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孟子曰：

"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释氏之教亦尔也。君子何以必阔之？孟子阔杨墨[10]，退之阔释老[11]，当其时，孔墨并称[12]，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曰："是圣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阔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呜呼！今之人其亦弗息矣。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矣[13]，更无可救矣。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生而制夫事。古人之学在行事，在通民之欲，体民之情，故学成而民赖以生。后儒冥心求理，其绳以理，严于商韩之法[14]，故学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责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众也。

注释：

①制义：又称制艺，明清科举考试的文字程式，即八股文。

②羽翼：辅助，辅佐。

③造化：自然界的创造者，也指自然。

④依傍：倚靠。

⑤故训：此处指训诂，对古书字句的解释。

⑥凿空：凭空议论，捏造。

⑦的解：正确的解释。

⑧牖：窗，此处引申为开启。

⑨自得：自有所得，有自己的体会。

⑩杨墨：指杨朱、墨翟。杨朱，战国时魏人。提倡重在爱己，不以物累，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的主张。墨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⑪退之：即韩愈，字退之。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释老：指佛祖释迦牟尼和老子。

⑫孔墨：指孔子和墨子。

⑬浸浸：逐渐地、慢慢地。

⑭商韩：指商鞅、韩非。均为法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译文：

您写的八股文，可以和古人媲美，可谓冠盖一时。文章没有什么古今差异，领悟某一道理的君子，将自己的思想用文章表达出来，都足以辅佐经传，这在于有见识旨趣。文辞不纯正朴拙，也不艳丽华贵，这在于有行文的文气格律。按题目写成文章，就像大自然化育的各种生物，五官骸骨都具备，根茎枝叶都茂盛，缺少一点都不完美，这在于有培养造就的方法。在八股文上花费精力，不如在某一经书上花费精力，两者所花费的功夫是相同的，没有说有能力做这件事而没有能力做那件事。治经要先考察文字的含义，其次是顺通文理。我们的志向在于领悟道，一定要卓然独立，不要有倚靠。汉代的儒生在训诂方面有师承，但也有时牵强附会。晋代的人们牵强附会，凭空议论就更多了。宋代的人们则按主观意愿来妄断。因此他们所袭取的多是谬误的东西，而正确的东西多数被他们抛弃了。我们这些人读书，本来就不是要和后来的儒生标立新说，应该平心静气体会经文，有一个字解释得不正确，就必然与它表达的意思有差别，而经书中的道，也就从这里失去了。

学习是为了开启我们的心智，就像饮食可以养育我们的血气一样。即使愚蠢，必定会变得聪明；即使柔弱，必定会变得刚

强。由此可知，学习如果不能增加我们的智慧和勇气，那就不是自得之学。就像饮食如果不能增长我们的血气，就是食而不化一样。君子或许出仕，或许归隐，可以不被重用，只要被重用就一定使天下达到大治。宋以来的儒生，硬是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古圣贤立言的深意，用自己的所谓理强行进行判断，而事情的本末内涵却没有搞清楚，因此失去了道，做事很不协调。孟子说："发自内心，祸害政事，发自政事，祸害事物。"自认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却因他的过错而受到祸害。但到底是谁的过错也不知道，于是毫不怀疑地归结到躬行实践的儒生身上。躬行实践、劝善惩恶，佛教也是这样，君子为什么要驳斥它呢？孟子驳斥杨朱、墨翟，韩愈驳斥佛祖、老子，当时，孔子、墨翟并称，尊崇杨朱、墨翟和尊崇佛祖、老子的人，有的就说："这是圣人，是正道。我们所尊崇的人，是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拯救人心、辅佐治化、天下尊崇、帝王尊崇的人。"然而君子为何要驳斥他们呢？因为愚蠢的人只看到他们的功业而不了解他们的害处，而君子却能深入体察出他们的害处。呜呼，如今的人们也还是不能平息争论啊。圣人之道，使天下之情通达，使人们的想法得到满足，从而天下大治。后来的儒生不知道性情达到细微末节，没有遗憾就是理，他们所谓的理，与残酷的官吏所谓的法相同。残酷的官吏用法杀人，后来的儒生用理杀人，逐渐地舍弃法而只论述理，更是无可救药。圣贤的道德就是他们的行为，而佛祖、老子却另有自己的道德。圣贤的义理就是使事物达到真理，没有遗憾，而后来的儒生却另有内容，与生俱来控制事物。古人的学说，在于行动，在于疏通民众的欲望，在于体察民情，因此学习成功，民众会依赖这些而生存。后来的儒生冥心求理，他们把理作为准绳，比商鞅、韩非的法还要严厉，因此学习成功，却不了解民情，天下从此增多了迂腐的儒生。等到他们责备民众，民众不能辩解，他们自认为真理在他们手里，但天下众多的人都受到他们的祸害。

答郑文用牧书

戴 震

题解：

这封信时间不详，内容是戴震写给朋友，阐述自己的治学主张。戴震认为做学问就应该不求名、不泥古，这样才算合乎道。

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清代著名学者、思想家。他性格孤介，酷爱读书。治学态度严谨，不偏信前人成就，敢于揭露"后儒以理杀人"的残酷。他参与编纂《四库全书》，在馆五年，因过度劳累而病死。

戴震在信中首先强调做人要坚守两条基本原则，一是"不随便"，一是"不抱怨"。但即便是这两条都做到了，也还是不能保证完全不犯错误，也仍然不能减少别人的指责。这些都是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之谈。运用到治学上，就是：既不要过分轻信自己，也不要过分轻信别人。千万不要追求一时的名声，同时也不要企求后世的声誉。关键在于问心无愧，独立思考。那些汲汲名利的人，要么是攻击别人来抬高自己，要么是吹捧名人来显耀自己。二者手段不同，但鄙陋心态毫无二致。戴震说，凡此种种，都不是正人君人所应当干的事。君子的理想是求道。但读书人早已不再求道，只是求名、求利、求官。不论是弄考据的，还是写文章的，都不曾明白道为何物。他们泥古不化，固执己见，沿袭成说，毫无创意。他们一辈子都陷在里面，而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学问。所以，学问是很难做的。最后，戴震强调，不管别人说什么，或是赞成，或是反对，一个真正有志于治学的人，都必须洁身自好，走自己的路，用自己的语言说自己的话。

这封信是一篇思想家的宣言，它使我们看到思想家的内心深处所隐藏着的对真理的热爱和虔诚。不沽名钓誉，不迷信古人。这种精神是古往今来一切大学问家的根本精神。遗憾的是，这种精神正在日渐消失，而被当今社会上的另外一种媚俗精神所代替。这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不加制止的话，中国文化就彻底完了。所以，戴震这封信可以使今人回忆起中国古代所曾有过的优秀事物。

（《戴东原集》）

原文：

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待人，守二字：曰“无憾”。事事欲不苟，犹未能寡耻辱；念念求无憾，犹未能免怨尤。——此数十年得于行事者。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以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①前人以自表襮②，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

今之博雅能文章、善考核者，皆未志乎闻道。徒株守先儒而信之笃，如南北朝人所讥“宁言周、孔③误，莫道郑、服④非”，亦未志乎闻道者也。私智穿凿者，或非尽掊击以自表襮，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或非尽依傍以附骥尾，无鄙陋之心，而失与之等。故学难言也。

好友数人思归，而共讲明正道，不入四者之弊，修辞立诚⑤，以俟后学。其或听或否；或传或坠；或尊信、或非议；述古圣贤之道者，所不计也。

注释：

①掊击：攻击。

②襮：暴露。

③周、孔：周公、孔子。

④郑、服：郑玄、服虔。二人皆为东汉著名经学家。

⑤修辞立诚：出自《易·系辞》："修辞立其诚。"

译文：

在立身方面，要坚守两个字："不苟"；在待人方面，也要坚守两个字："无憾"。每一件事情都严格要求，仍然不能减少犯错误；每一件事情都力求尽善尽美，仍然不能避免人们的怨言。——这是我几十年来从经验中体会出来的。从学问上总结出来的有：不要以别人的观点束缚自己；也不要以自己的观点束缚自己；不追求眼前短时间的名声，也不妄求将来后世的名声。追求虚名的表现，它有两个弊端：要么是通过批评前人来表现自己，要么是凭借依附前人来炫耀自己。二者形式上不同，但阴暗的心理则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君子的理想仅仅在于追求一种道而已。

现在那些知识渊博、会写文章、善于考证的人，都没有把追求道来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仅仅是拘泥于前人的观点，深信不疑，就如同南北朝时代人们所讥讽的那样："宁可说周公、孔子错了，也不能说郑玄、服虔的不对，"这都是没有把追求道作为自己理想的缘故。用自己的主观想像去穿凿附会的人，要么是大肆攻击别人以抬高自己，前人错误的东西流传时间久了，也就成了真理，他们也不知道，只是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使自己一辈子都陷于错误之中。要么是尽力依附前人的门户，毫无怀疑与批

评的眼光与识见。但这两种态度的谬误则是相同的。所以，学问是不可轻易谈论的。

朋友几个人打算回来，一起探讨圣人的大道，避免以方四种流弊，在自己的文章与著作中要体现出对道的追求，以便为后代的学者所效仿。或者赞成或者反对，或者发扬或者批判，或认可或怀疑，这都是理解古代圣人思想的必由之路，无须多说了。

寄内子论教子书

纪　昀

题解：

这封信是纪昀为教子事而写给其妻子的。

纪昀（1724－1805），清河北献县人，字晓岚，号石云、春帆，家世为河间大族。乾隆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以学识为乾隆帝赏识。

此后不久，纪昀的亲家，两淮督运使卢见曾亏空盐款，要被抄家。做侍读学士的纪昀闻讯后，派人用盐和了面，包了少许茶叶送去，暗示因为盐款，家产将被查抄。事发后，纪昀被发配到乌鲁木齐。

后来，纪昀被召回。因他在敬一亭值班时早已翻阅过《永乐大典》，对大典非常熟悉，乾隆乃任命他为《四库全书》的实际总纂。纪昀除审定润饰各部初稿外，又专主经部，贡献最大。他还奉昭撰《四库简明目录》，省略文字，删除存目之书。另有《史通削繁》、《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文集》等。

凭借自己过人的才华，纪昀后任兵部侍郎，迁左都御史、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等，官运亨通。

这封家书，是纪昀写给妻子的。信中将《四戒四宜》列为教子的金科玉律，教子从严，对今人仍有相当的启迪。

（《纪文达公文集》）

原文：

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①之教，责在尔躬②。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受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③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

注释：

①义方：旧时指行为的规矩法度，多指家教。语出《左传·隐公三年》："……爱子，教之以义方。"

②尔躬：你自己。躬，亲自。

③维：句中语助词。

译文：

父母都负有教育子女的责任，现今我住在京师，关于规矩法度的教导，责任在你身上。而妇女的心性，偏爱的居多，却不知教育的方法不当，反而适得其反，徒害无益。方法是什么呢？简单说来有四戒四宜：一戒晚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遵守四戒的同时，还须规定四宜：一宜勤奋读书，二宜尊敬师长，三家爱护众人，四宜慎重饮食。以上八项规则，是教子的金科玉律，你要铭记在心，时常用它们来教育咱们的三个孩子。四戒四宜，虽寥寥数语，但包罗万象，你要细心领会，后辈们完成功业，方法尽在其中啊！言不尽意，容以后再说吧。

训诸子书

纪 昀

题解：

这封信是纪昀写给他的孩子的，内容是训导孩子们勿持傲慢，勿尚奢华。

纪昀从四岁起，一直到老，始终刻苦读书，他曾题过一幅对联，说自己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似蠹鱼”。但他对孩子们，不仅要求他们认真读书，而且还谆谆告诫儿子们“勿持傲慢，勿尚奢华”，恳切叮嘱儿辈要亲身参加农业劳动，认为“将来得为安分农民，便是余之肖子”。在这封信的末尾，作者不仅赞扬“农夫披星戴月，竭全力以养天下之人”，而且喊出了“世无农夫，人皆饿死”这样一个浅显而又深刻的真理。

（《纪文达公文集》）

原文：

余家托赖祖宗积德，始能子孙累代居官，惟我禄秩①最高。自问学业未进，天爵②未修，竟得位居宗伯③，祇恐累代积福，至余发泄尽矣！所以居下位时，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古语不云乎？跻④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⑤，自奉⑥日守节俭，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许杀生。余年过知命，位列尚书，禄寿亦云厚矣，不必再事戒杀修善，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

尝见世禄之家，其盛焉位高势重，生杀予夺[7]，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8]孙，始则狂赌滥嫖，终则卧草乞丐，乃父之尊荣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耸听，吾昔年所购之钱氏旧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闻钱氏子已流为叫化，其父不是曾为显宦者乎？

尔辈睹之，宜作前车之鉴。勿持傲谩，遇贫苦者宜赒恤之，并宜服劳[9]。吾特购粮田百亩，雇工种植，欲使尔等随时学稼，将来得为安分农民，便是余子肖子。纪氏之鬼，永不馁矣[10]！尔等勿谓春耕夏苗、胼手胝足[11]，乃属贱丈夫之事，可知农居四民[12]之首，士为四民之末。农夫披星戴月，竭全力以养天下之人，世无农夫，人皆饿死，乌可[13]贱视之乎？戒之戒之！

注释：

①禄秩：旧时称官吏的薪俸为禄秩。

②天爵：指天赋的善良的德行。

③宗伯：官名，古为六爵之一，执掌后来的礼部的职务，所以后世称礼部尚书为大宗伯或宗伯。

④跻：升、登。

⑤居：安居。用：由、因。兢兢：小心谨慎。

⑥自奉：个人生活享受。

⑦生杀予夺：指掌握生死、赏罚的大权。

⑧若：或。

⑨服劳：从事农作。

⑩这句的意思是：只要诸子克勤克俭，纪氏的家业就可以保全，祖先就能永远享用他们的祭祀。馁：饥饿。

⑪胼手胝足：手掌和足底在劳动中长的老茧。胼胝：老茧。

⑫四民：旧时称士农工商为四民。《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

⑬乌可：怎么可以。

译文：

我们家托庇祖宗所积聚的恩德，方能子孙后代世代做官，其中我的官位薪俸最高。扪心自问，学业没有长进，天赋的善良德行没有修行，竟得以往居礼部尚书，只恐我们家世代所积累的福份，到我这一代要用完了啊！身居低位时，行为不俭，放荡不羁，不修边幅，官位日渐上升，心中的忧虑也日渐积聚。古语不是说了吗？升的越高，陷的愈深。安居常因小心谨慎，个人生活享受常常坚持节俭，不宴客不吃海味，不祭祀不许杀生。我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位列尚书，俸禄、寿命也可以说是很不错了，大可不必再戒杀生、修善行，而今之所以仍然如此，是为了给子孙留着福份罢了。

常常可以看到世代为官的家庭，兴盛时位高权重，生杀予夺，恣意妄为，这是一代的威风。等到他们衰微时，其儿子或孙子，开始时狂赌滥嫖，最终败落成乞丐，其上辈的尊严、荣华哪里去了呢？这并不是我故意危言耸听，我过去所买的钱氏旧宅，今已改作我们的宗祠。近来听说钱氏后代已流落为叫花子，其父不也曾经是显官吗？

你们看到这种情形，应作为前车之鉴。不可傲慢，不可奢华，遇到贫穷的人要予以抚恤、周济，并且要从事农作。我特地购买农田百亩，雇人种植，打算让你们随时学习耕作，将来能够成为安分的农民，便是我的好孩子。只要你们克勤克俭，纪氏的家业就可以保全，祖先就能永远享受他们的祭祀。你们不要以为春耕夏种、手足长茧，是低贱的男人所为，要知道农民为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农夫披星戴月，竭尽全力供养天下众生。世上若无农夫，人们都将饿死了，怎么可以轻视他们呢？万勿如此，万勿如此！

答王西庄

钱大昕

题解：

这封信是清乾隆五十二年（1787 年）著名学者钱大昕在看了著名学者王鸣盛所著《十七史商榷》后写给王鸣盛的。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征，一字及之，号辛楣，又号竹汀居士，晚号潜研老人，嘉定（今上海市嘉定区）人。乾隆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少詹事，山东、浙江、河南等省乡试主、副考官，广东学政等。与修《清一统志》、《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为乾隆所赏识。后归家，主讲钟山、娄东、紫阳诸书院。少时聪敏，辞章为“吴中七子”之冠，治学遍及经史各领域。曾发现古音韵重要规律，对西北史地、年代谱牒、职官氏族及金石铭文均有深入研究，而尤以历史考据成就卓著，所著《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对二十二部正史进行校勘考释、名物训诂，论断精审，与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并称乾嘉三大史学名著。另有《十驾斋养新录》二十卷又《余录》三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潜研堂文集》等，著述宏富，被誉为“一代儒宗”。

乾嘉时期，考据学占领全学界，成为一时显学。这既是外部文化高压政策的结果，也是学术本身发展的必然。由于考据主要是针对前人著述中的错误而发，所以不少学者往往讥议往昔学者欠于考证，从而炫耀自身考证所得，结果流入指责前人、抬高自己，失去了考证古史的主旨。王鸣盛与钱大昕同为嘉定人，且是

钱大昕妻弟，在学术上有很高的造诣，所著《十七史商榷》是其代表作，但他喜欢在著述中讥诮挖苦前人，在讥议往昔学者、抬高自己的风潮中颇有代表性。这是钱大昕所不能同意的。故而在乾隆五十二年《十七史商榷》一书刊刻，王鸣盛写信向他请教时，他写了这封信作答，表达了自己对治学态度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学问是千秋大事，考订前人讹错，决不是为了诋毁前人、抬高自己，而是为了嘉惠后学。在进行学术讨论时，要平允谦和，决不能讥诮嘲讽。对于古人，要有护惜之心，千虑容其有一失。更不能以己虚妄误诋古人，那样会被后人耻笑。从信的内容看，钱大昕语气平和但所讲意思又非常到位，他对当时存在的治学中的一些不良倾向，不是声色俱厉地批评，而是循循善诱地劝导。整个信件从“学问乃千秋事”立论，意境高远，这不仅是一封私人信件，更是一篇治学箴言。

这封信给人们的启示是很深的：其一，做学问的根本目的是嘉惠后学，对学术发展有利，而不是抬高自己。其二，研究问题不能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三，要有挚爱传统的情怀，做古人诤友。其四，要时时自警，决不能误诋古人，贻笑大方。

（《潜研堂文集》卷35）

原文：

得手教，以所撰述于昆山顾氏[①]、秀水朱氏[②]、德清胡氏[③]、长洲何氏间有驳正[④]，恐观者以试诃前哲为咎。

愚以为学问乃千秋事，订讹规过，非以訾毁前人，实以嘉惠后学。但议论须平允，词气须谦和，一事之失，无妨全体之善，不可效宋儒所云“一有差失，则余无足观”耳。郑康成以祭公为叶公[⑤]，不害其为大儒；司马子长以子产为郑公子[⑥]，不害其为良史。言之不足传者，其得失固不足辩，既自命为立言矣，千虑

容有一失，后人或因其言而信之，其贻累于古人者不少。

去其一非，成其百是，古人可作，当乐有诤友，不乐有佞臣也。且其言而诚误耶，吾虽不言，后必有言之者，虽欲掩之，恶得而掩之！所虑者，古人本不误，而吾从而误驳之，此则无损于古人，而适以成吾之妄。王介甫、郑渔仲辈皆坐此病[7]，而后来宜引以为戒者也。《十七史商榷》闻已刊成[8]，或有讹字，且未便刷印，乞将样本寄下。

注释：

①昆山顾氏：指顾炎武。顾炎武是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

②秀水朱氏：指朱彝尊。朱彝尊是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清初著名学者。

③德清胡氏：指胡渭。胡渭是浙江德清人，清初著名考据学家。

④长洲何氏：指何焯。何焯是江苏长洲（今苏州）人。清初著名学者。

⑤郑康成：郑玄，东汉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字康成，著名经学家。

⑥司马子长：司马迁，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字子长，伟大的史学家。

⑦王介甫：王安石，北宋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字介甫。著名政治家、思想家。郑渔仲：郑樵，南宋兴化军莆田（今属福建）人，字渔仲。著名史学家。

⑧《十七史商榷》：书名，王鸣盛著。王鸣盛，字西庄，著名学者。该书对历代正史考校失误，归纳议论，颇有特色。

译文：

来信收到，因为你在自己的著述中对昆山顾炎武、秀水朱彝尊、德清胡渭、长洲何焯的观点和著述间或有批驳辨正，恐怕看到你的著作的人会责怪你攻击前贤。

我认为学问是千秋大事，考订错讹、纠正过失，不是为了诋毁前人，而是为了嘉惠后学。议论必须平允，语气必须谦和。一事之失，并不妨碍全体之善，决不能效仿宋代学者所说的“有一点差错，其余的都不值得再看”。郑玄把祭公当成叶公，并不损害他是大儒；司马迁把子产当成郑公子，也不损害他是良史。言论不足以流传后世的人，其著述的所得所失也就不值得辩论。既然自命为后世立言，那么千虑必须容其有一失。如果因其一失而否定其全部，后世有的人相信了这些话，就会大大贻害古人。

去除、纠正前人的一个过错，是为了成就其全部正确。古人喜欢直言劝告 的诤友，而不喜欢能说会道的佞臣。进一步讲，即便古人言论确实出现了失误，纵然我们不指出来，后世必定有人会指出来。即使想替古人遮掩，又怎么能遮掩得住呢！我所担心的是，古人本来没有过错，而我们却错误地批评了古人，这不但无损于古人，反而恰恰证明了我们的虚妄。王安石、郑樵这些人都是犯了这种错误，这都是后来者应当引以为戒的。听说《十七史商榷》已经刊刻，有的地方有讹字，不便于立即印行。乞将样本寄下。

与许孝廉庆宗书

姚鼐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姚鼐写给许庆宗的，对其所著《世室考》一书作了评论，并鼓励许庆宗继续努力，必有大成。

姚鼐（1732—1815 年），清朝散文家。字姬传，一字梦榖，室名惜抱轩，或称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乾隆进士，官刑部郎中，记名御史。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四十年。治学以经为主，兼及子史、诗文。为“桐城派”主要作家。主张文章必须以“考据”、“词章”为手段，来阐述儒家“义理”；并以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同时，提倡从模拟古文的“格律声色”入手，进而模拟其“神理气味”。作品多为书序、碑传之属。有《惜抱轩全集》、《古文辞类纂》。

姚鼐在信中首先高度评价了许庆宗写的《世室考》一书，认为它旁征博引，考证详实，实为一有价值之著作。姚鼐认为，当今社会世风日下，人人束书不观，谁还去做学问？即便做学问，也是弄一些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俗学。故而，能够稍微流览一点古人的笺证注疏之学的人已经很难得了，更何况深思熟虑、刻苦钻研要写出《世室考》这部书的人就更是难乎其难了。接着，姚鼐又鼓励许庆宗，二十出头就已经做出这等成绩，超出了当今那些有名望的学界前辈，倘若继续努力，不断提高，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那成就便不可限量了。随后，姚鼐又对古代经学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古今悬隔太远，研究礼乐制度的人，不但在汉代以后众说纷纭，即便在周秦时代也是莫衷一是。

故而，必须小心从事。

这封信对当时文坛上的学人之间的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使我们看到，虽然清朝中后期社会上是百病丛生，文化学术愈呈江河日下之状，但毕竟还有那么一些人在孜孜不倦地探求学理。同时，也有一些学术大家能够不倚老卖老，对青年学子多有赞誉，予以宣扬。此为正常的学人之关系。所以，这封信对今天学界盛行的拜金风气和庸俗世态是一个绝好的对照。

（《惜抱轩文集》卷6）

原文：

正月行过敝邑，幸得见。温然君子之容，心窃异其非恒士矣。车马发后，取所著《世室考》读之，何其博洽辨达也。三月，鼐来江宁①，携入行笥，重绎执卷，敬欢累日。士牵于俗学，略能留意古笺注者了不易得，况精思若此者乎。年二十许所进已踰世耆宿，进而不止，至耆宿之年绝出尚可量哉？何时当复见？当复亟有示教者，不至于审辨所说当，不必学有精博踰足下，或与足下比者乃可决之。仆浅学盖不任此。仆牿识文句之末而已。《曾子问》②篇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足下欲伸己说以当七庙为句，此非愚见所安。大抵古今之隔远矣。议礼者非特汉以后不可合，虽周人之言亦或舛牙。必欲衷于一是，故难也。又内载朱子③说，不应书名二者。幸亟酌之原本附还。千万自爱。不具。

注释：

①江宁：即今江苏南京。

②《曾子问》：是《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三礼”之一，亦为“十三经”之一。成书于西汉初期，是一部有关古代礼制的论文集。

③朱子：即朱熹。

译文：

正月份路过我这里，幸而得见一面。温温然有君子风度，心里惊叹你不是长寿之人。车马离开后，拿出你所写的《世室考》拜读，又惊叹你的博学多识。三月份，我来到江宁，携入行笥，重新翻阅大作，好几天都叹服不止。读书人热衷于俗学，稍微能了解一下古人的注疏之学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何况精研深思到这种程度呢？年龄不过二十出头，学术水平已经超过了当今那些名家。接着再继续努力，到了老年其水平岂可限量呢？什么时候再见面？如果再有承教的，不必审核辨析所说的，也不要学问精纯渊博能超过足下，或者与足下相提并论才可以判断。我学识浅薄，力不能及，只能认识一些文字而已。《曾子问》篇究竟是七庙还是五庙，无一定之见。足下打算立足自己的学说以“当七庙”为句，这不是我的愚见所能同意的。因为古今相隔太远了。讨论礼的人非但汉代以后不能一致，即便是周代人的话也是互相矛盾。必须要折衷于一是，实在是太难了。又，内载朱子说，不应该写两个书名。覂酌的原本还给你。千万珍重。不具。

与史余村

章学诚

题解：

这封信是著名史学理论家章学诚因考辨戴震学术问题，受到世人指责而写给史余村的。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人。他少年时多病，读书很迟钝，但不离纸笔，嗜好博览众书，尤其特别喜爱史学。二十岁以后，便决心在史学上发展自己。后寓居京师，师事内阁学士朱筠。朱筠家多藏书，好宾客，一时名流学者如戴震、钱大昕、任大椿、汪辉祖、邵晋涵、周永年、洪亮吉等多出入其门。章学诚也因而得与他们结交，特别是邵晋涵，成为章学诚一生的至友。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中进士。此后毕生从事著述和讲学。先后主讲定武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文正书院。著述甚丰，尤以《文史通义》名垂后世。

章学诚生活在汉学鼎盛的乾嘉之世。学者们倡导以音韵训诂、名物考据为通经之要；末流学者，更以训诂考据、博闻强识为高，视为治学第一要义。他不满意这种脱离实际的学风，继承黄宗羲、万斯同等浙东学派的治学精神，强调经世致用，反对知古而不知今，反对埋头故纸堆中。由于他的言论不合时好，故而不被人理解，人们都视他为“怪物”。

当时，戴震是学术界的一流人物，是乾嘉时期难得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但戴震的学术旨趣在当时并不为人所了解，多数人将其看作考据的高峰。章学诚评论戴震，在当时掀起轩然大波，与

之争辩者不少。即便在今天的学术界，人们对章学诚评戴震仍有不同的意见，或褒或贬，莫衷一是。章学诚的这封信，就是辩解自己心迹的，希望洗去人们对自己的误解。乾隆三十一年(1766)，章学诚第一次往谒戴震，相互论学，之后论学不断。章学诚感到当时的人们对戴震的学术旨趣知之不多，毅然肩负起评定戴氏学术地位的任务。从章学诚在很多地方的言论看，他对戴震褒大于贬，肯定多于否定。就这封信看，章学诚主要批评了戴震“心术不正”，因为戴震抨击程朱理学，而章学诚确有替朱熹辩护的倾向。可以说，章氏的批评并不完全对，因为戴氏的突出贡献之一就是抨击宋明理学，但章氏的批评又决不是时人所认为的门户之见。章氏治学，最厌恶树立门户，他批评戴震，也只能说是不同观点的讨论，是正常的学术争辩。

该信对我们的启发是，无论什么时候，心术必须正当，做学问、做人，都是如此。做学问要达到文如其人，做人要言行一致。同时还要不惧权威，要敢于向权威挑战，只有这样，学术才能发展，社会才能前进。

（《章学诚遗书·佚篇》）

原文：

文章经世之业，立言亦期有补于世，否则古人著述已厌其多，岂容更益简编，撑床叠架哉。仆于学有未至，或文于理有未足耳。若谓著述文字，尚有名心胜气，有若文人相轻者然，则十年以来无此累矣。仆与邵先生书[①]，有论戴东原语[②]，偶举为辞，非庄论也。邵先生正辞厉气，为戴辨诬，其意不忘死友，真古人之用心，惜其犹未达也。

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浅者勤学而暗于识，深者成家而不通方，皆深痼之病，不可救药者也。有如戴东原氏，非古今无其偶者，而乾隆年间，未尝有其学识。是以三四十年中人，皆视以

为光怪陆离，而莫能名其为何等学。誉者既非其真，毁者亦失其实，强作解事而中断之者，亦未有以定其是也。仆为邵先生言："戴氏学识，虽未通方，而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可惜者，心术不正，学者要须慎别择尔。"邵先生深以仆为知言。仆自为世道计，别有专编，辩论深细，此时未可举以示人，恐惊一时之耳目也。夫知之如是深切，而来书辨戴，犹恐仆惑浮言，是未审矣。仆答书颇申委曲，仆无私心胜气，世道人心所系，名教大义所关，盖有不得已于中者，非好辨也。

仆尝以告后进，仆于学业文辞，不知于古有合与否，惟尺寸可自信者，生来从无贰言歧说，心之所见，口之所言，笔之所书，千变万化，无不出于一律。著世命世，廷对飏言，科举进身，上书干谒，同志述怀，以至于与初学者言，答鄙夫问，或庄或谐，或详或略，或浅或深，言有万殊，理无二致，自谓学问之中，即此亦可辨人心术。而窃怪今之议学问者，往往不求心术，不知将以何者为学为问，而所为学与问者，又将何所用也。戴氏好阚宋学[3]，其说亦岂无因，然以世儒推重宋人躬行实践，谓其无以异于释老[4]，则其平日言行相违，于此正可见也。由其笔著之书，证其口腾之说，不啻相为矛盾[5]，即以对甲之言，证之辨乙之语，亦多不似一人。岂亦因佛氏有口语之诫，故戴氏力作狡诡，以示不类释迦邪？仆谓人当问其果类圣贤君子否耳，由兼求退，高明沉潜，从入之途，古人已不一致，皆以圣贤君子为准可也。必斤斤而摘其如何近释，如何似老，不知释老亦人，其间亦有不能与圣人尽异者。宋儒于同志中所见有歧，辄以释老相为诋毁，此正宋人之病。戴氏力阚宋人，而自度践履万不能及，乃并诋其躬行实践，以为释老所同，是宋儒流弊，尚恐有伪君子，而戴亦反，直甘为真小人矣。戴氏著于文者尚且如是，何况腾口欺人，遗厉至今，方未艾耶！仆著书无他长，辩论学术精微，实有离朱辨色[7]，师旷审音之妙[8]。近则能于学问文章，别择心术邪

正。然所见既深，所言必少所可，而所以见怪于世人者亦必益多，故辨戴诸说，不欲遽为今人所知也。

注释：

①邵先生：指邵晋涵，著名史学家，章学诚的至交。

②戴东原：指戴震，字东原，清代著名思想家。

③阚：评击、排斥。

④释：释氏，即佛教。老：此处代指老庄之学。

⑤不啻：不仅。

⑥释迦：释迦牟尼，佛教鼻祖，此处代指佛教。

⑦离朱：传说中的人物，见于《慎子》，以明察秋毫著称。

⑧师旷：春秋时期著名乐师。

译文：

文章是经世的事业，立言也要有补于世道，不然的话，古人的著述已有很多了，哪里还容许再增加篇章、叠床架屋呢！我在治学上有很多方面还未精熟，有的文章尝不能充分表达思想。若说著述文字，还有名利之心、争胜之气，就像文人相轻那一套一样，那么十余年来，我已不受此累了。我在给邵晋涵的信中，有谈论戴震的话，只不过偶而谈到，并非严肃的论断。邵晋涵义正辞严，为戴震辩诬，他不能忘怀死去的朋友，真有古人君子之心，只可惜他并未通晓我的意思。

近三四十年，学者风气是，浅薄的人勤于学习但见识不够，深入的人能够成家但无法贯通，都是痼疾顽症，不能救药的。比如戴震，并不是古今没有人能和他比肩，但在乾隆年间，还未有人有其学识。因此这三四十年中的学者，都将其学问看得奇异纷呈，但又不能名其为何学。赞誉他的人未能得其学问之真，诋毁

他的人也失其真实，断章取义、强作解释的人，也未能定其是非。我对邵晋涵说："戴震的学识，虽然未能贯穿，但成家实出诸人之上。所可惜的是，心术不正。学者必须慎加别择。"邵晋涵深深认为我的话是知人之言。我考虑到世风人心，另有专门文章，进行深入仔细地辩论，此时不能拿出来让人们阅读，恐怕惊扰人们耳目。你对此事了解很深，来信为戴震分辩，还怕我被浮言所迷惑，这是不清楚前因后果。我在回信中将个中原委讲述一遍，我没有自私之心，没有争胜之气，因事关世道人心、名教大义，有不得已的因素在其中，不是我喜欢争辩啊。

我曾告诉后生，我的学业文辞，不知是否与古人相合，只有一点可以自信，那就是平生从无贰言歧说。心之所见，口之所言，笔之所书，千变万化，全都是一个标准。著经世文章，朝廷对策，科举考试，上书奏请，与志同道合者述怀，甚至于与和初学者谈话，答村夫野民所问，有的庄重，有的恢谐，有的详细，有的简略，有的浅显，有的深奥，言语纵有千万不同，但理无二致。自已曾说，学问之中，就是这也可分辨出人的心术。我私下感到奇异，如今谈论学问的人，往往不讲心术，不知道该将什么当作学问，而从事学问的人，又不知它有什么用。戴震喜好驳斥宋学，其说也不能说没有原因，可是世上儒生推重宋人躬行实践，说宋学与佛教、老庄之学没有两样，那么他们平日所说与所做就要矛盾，从这里就能看出来。用他所写的著作和他平日的谈论相比证，不仅相互矛盾，即便是将其对甲说的话和对乙的辩词相比证，也多数不像出自一人。难道这也是因为佛教有不多说妄言的戒律，所以戴震力作狡辩，以表示与释迦不同吗？我认为人们应当问一问他是否真的与圣贤君子一样。因进求退，明智潜心，治学门经，古人也不一样，只要都以圣贤君子为标准就可以了。只是斤斤计较，指摘其如何与佛教相近、如何与老庄相似，不清楚释迦、老子也是人，这中间也有和圣人相同的地方。宋人

在同行中有分歧意见，就用释迦、老子相互攻击，这正是宋人的毛病。戴震着力攻击宋人，自忖在躬行实践方面赶不上他们，因此连宋人的躬行实践也一并攻击，认为他们与释迦、老子相同。即便是宋儒有种种流弊，还恐怕有伪君子出现，而戴震反其道行之，真是甘心做真小人了。戴震在著作中尚且如此，便何况夸口欺人，流传至今，方兴未艾呢！我著书立说，没有其它长处，但辩论学术精微，确实有离朱分辨颜色、师旷审定音律那样高妙的境界，近来则能在学问文章方面，分别心术邪正。由于所见深刻，曲高和寡，说出来的话多不和时尚。因此见怪于世人的地方一定有很多。也正因为此，辩论戴震学说的各种见解，不想马上就让现在的人知道。

与董公常书

崔 述

题解：

这封信是清乾隆41年（1776年）著名史学家崔述写给他的朋友董公常的。信中讲述治学体会与自身遭遇，感人至深。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河北大名人。五、六岁时，就跟从父亲学习。其父对其管教甚严，市井之言，游荡之行，根本不让其接近。十一岁，应童子试，受到县令赏识。十四岁，试于府，太守朱公煐以国士待之，补弟子员。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中举人，曾任福建罗源县知县，调任上杭县，再任罗源县知县。因不愿与奸徒为伍，弃官归家。

崔述一生穷困潦倒，但他却锐意于古史古籍的辨伪撰述工作，他少年时博览群书，后集中力量攻读“六经”，发现六经传注与经书本文相互矛盾之处很多，遂在三十岁时立志著一部大书，以纠正伪书之附会，众说之谬妄。他不把解释经书的注释文字和经书原文混为一谈，不把诸子著作和解释经书的注释文字混杂在一起，他以儒家经典为指归，驳正其他解释，对古史古籍进行了一系列考辨工作，写出了《考信录》一书。崔述所做的工作，与乾嘉时期成为显学的考据学呼应。只是他的治学，受刘知几影响很大，以疑古相标榜，敢于抛弃旧说，另立新论，不抱残守缺，不泥古不化，这是他超越乾嘉诸老的地方。由于崔述大半生都在穷乡僻壤的家乡度过，因而他的学说在当时不为人所注意。近代以来，经顾颉刚先生彰扬，崔述的成就才为人所知，并同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近代疑古风气的发展。

崔述专意于学问，家中境况极为悲惨，中年以后，贫病交

加。该信因是写给老友的，所以披肝沥胆，吐露真情，让我们看到了他凄怆的生活。信中向朋友述说了自己的治学经历，批评了后人对经书的谬解，讲述了自己独学无友、无人问难的孤寂心情，并披露了自己凄惨的家境。整封信充满感情，语言真挚，读后真让人感觉凄楚。同时，该信对我们也有很大启发，那就是：在学习中要认真阅读原著，认真领悟原著真意，决不可轻信别人的理解，更不能人云亦云。干什么事情都要能够耐得住寂寞，要学会在逆境中奋进。

（《崔东壁遗书·无闻集》）

原文：

乙酉之秋[①]，得于京邸晨夕过从[②]，畅论书史者数月。岁终握别，至今十有二年。每读书有会心处，辄屈指私计可与语此者惟广平栗太初及我公常先生二人。而太初往矣，先生又无由接坐一谈。兴言及此，真令人读书之兴索然欲尽矣！

往述幼时喜涉览，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于几前。既泛滥无所归[③]，又性善忘，过时都不复省忆，近三十岁始渐自悔，专求之于《六经》[④]，不敢他有所及。日积月累，似若有得，乃知秦、汉以来传注之言往往与经牴牾[⑤]，不足深信。如炎帝本与黄帝同时[⑥]，太皞在其后[⑦]，而世以为伏羲即太皞[⑧]，神农即炎帝[⑨]。稷、契皆在帝喾之后百数十年[⑩]，而世以为高辛氏之子[⑪]。周公本因成王谅阴而摄政[⑫]，而世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平王本畏楚偪而戍申、吕[⑬]，而世以为私其舅家。周本三正并行[⑭]，而世乃杂取传记夏正之文为周不改月之证。周本郊遂用彻[⑮]，采邑用助[⑯]，而世乃因孟子“虽周亦助”之言谓彻亦画为井，亦以中为公田。推此而求，不可悉举。要皆不肯细读经文，过信传注百家之言，故致舛误。不知先生以为然耶，否耶？旧尝阅一小说，载孔子适陈时有“采桑女”及“樵夫”诗二首，鄙俚不可入

口；且曰："按此即今七言绝句；而世儒谓始于柏梁[17]，不学之过也。"阅至此，不觉失声大笑。呜呼，今世所传战国、秦、汉之书托名于圣人者岂有以异于此乎！特以其传既久，学者遂不敢议。而今乃欲据《六经》以正其失，求其不掩耳而疾走不可得也。以此闭口，不敢与人谈及经史。安得与先生重聚数月而一证其十余年来之所得哉？

今岁偶至郡城数日，闲行入书院中，得遇胡君名光四者，问之知为及门高弟；因询近况，乃知令郎已长，能读父书，负笈从游者甚众[18]，先生杜门不出，日惟与门人讲诵，不觉欣然为之破颜。士不能展所学于天下，因当成就后学，作如是事。若述者，其学固无可取，而亦绝无人相问难者；少年才俊，皆高视阔步，一揖犹以为浼[19]，一问犹以为辱，安得有所谓负笈从游之怪事乎！间有一二来者，皆初学无所解，得一补诸生即都飏去[20]。读书虽有所得，而环顾四壁茫然无可语者。亦可为之长太息矣！

前在京师时，先生方刻印章，文曰："四可堂主人"。问其说，云："余有亲可养，有子可教，有田可耕，有书可读，余何为仆仆于京师者！"今尊大人虽捐馆[21]，其三可者固自在。而述本无祖遗田产；又值洪波毁室，先人所遗书荡然无存，至无容膝所，依人庑下。辛卯之春[22]，先君见背[23]，今惟家母在堂，差为康健，而禄养色养又都不能[24]。一二年来，增患目疾，翻阅尽废。年垂四十矣，而一介子女杳然不闻消息，家贫不能畜妾。四者无一可焉。夜中就枕，怛然无人生之乐，不觉其泪之濡衾也。

久不与人通书，适会此便，不觉一泻欲尽。然书写良艰，落笔时所裁割者尚多，幸为心照。如遇北风，惠以德音为望。率此侑候近祉，不宣。晚弟崔述顿首。

注释：

①乙酉：干支纪年，为乾隆三十年，公元1765年。

②过从：来往。

③泛滥：水漫溢横流为泛滥，此处指博览。

④《六经》：儒家经典，即《诗经》、《尚书》、《三礼》、《周易》、《乐经》、《春秋》六部书。

⑤传注：解释经义的文字。牴牾：矛盾。

⑥炎帝：传说中上古姜姓部落首领。曾与黄帝战于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被打败。黄帝：传说中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曾打败炎帝和蚩尤。

⑦太皞：传说中古代东夷族首领。亦作太皓。

⑧伏羲：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一作宓羲、包牺、庖牺、伏戏，又称牺皇、皇羲。

⑨神农：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

⑩稷：后稷，古代周族的始祖。契，传说中商的始祖。帝喾之子，母为简狄。帝喾：传说中古代部族首领，号高辛氏。

⑪高辛氏：即帝喾

⑫周公：西周初年政治家，成王时摄政。谅阴：居丧，又作谅闇。

⑬楚：楚国。申：古国名，姜姓。西周末年曾联合犬戎攻周，后拥立周平王。吕：古国名，姜姓，春秋初年为楚国所灭。

⑭三正：指夏、商、周的历法。夏代建寅，以农历正月一日为一年之始，商代建丑，以农历十二月为正月。周代建子，以农历十一月为正月。

⑮彻：周代的田税制度。十一而税，谓之彻。孟子认为周人百亩而彻。

⑯助：殷人的赋税制度。孟子认为殷人七十而助。周人实行井田制，八家共井，公田在中间，农夫助公田之耕为助。

⑰柏梁：即柏梁体，七言古诗的一种。相传汉武帝筑柏梁台，并在其上与群臣赋七言诗。每句用韵，后世模仿其体，称柏梁体。

⑱负笈：笈，书箱，背着书箱求学。

⑲浼：污染。

⑳诸生：此处指明清时经省各级考试录取入府、州、县学的人，称生员，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名目，统称诸生。

㉑捐馆：去世。

㉒辛卯：干支纪年，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

㉓先君见背：(我的) 父亲去世。

㉔禄养色养：指物质上和精神上奉养。

译文：

乾隆30年（1765）秋，我们在京城府邸晨夕相见，畅谈书史数月，年底握别，至今已十二年了。每当我读书时有所体会，就扳着手指心想能与我谈论这种体会的只有广平栗太初和公常先生您了。然而，太初已去世了，和您又不能促膝而谈，每想到这些，真让人连读书的兴趣都没有了。

我幼时喜欢博涉群书，山经、地志、权谋、术数之书常杂陈在桌前。广泛涉猎而又没有主旨，加上忘性很大，读过之后便都记不起来，快到三十岁时才渐感后悔，遂专心攻读《六经》，不敢再读其它书了。日积月累，似有所得，知道秦汉以来注经之书往往与经书本身相互矛盾，决不能深信不疑。比如炎帝本来和黄帝同时，太皞生在其后，而世间却认为伏羲即太皞，神农即炎帝。稷、契都生在帝喾之后一百多年，而世间却认为他们是高辛氏之子。周公本来是因为周成王居丧而摄政的，而世间认为成王只活了十三岁。周平王本来是害怕楚国的威胁而让申侯、吕侯成

边，但世间却认为他偏心舅家。在历法上，周本来是夏、商、周三正并用，而世间却杂取传记中夏历之文，证明周不改月。在田赋制度上，周本来是郊遂用彻，采邑用助，而世间却引用孟子“虽周亦助”这句话，认为彻也是画地为井田，亦把中间的一块地当作公田。如此等等，不能遍举。这些都是因为不能细读经文，过分相信传注百家之言而导致的错误。不知您认为是对呢、还是错？过去曾读一小说，上面记载孔子到陈国时曾作有“采桑女”及“樵夫”二首诗，诗句鄙俚不能读；书中有一按语：“按：这就是今天的七言绝句；世间儒生认为七言诗起于柏梁体，是不学导致的过错。”读到这里，不觉失声大笑。呜呼！如今世上流传的托名于圣人的战国、秦、汉时期的书籍，和这又有什么两样！只不过它们流传的时间长了，学者们都不敢讨论罢了。如今我想根据《六经》来校正他们的失误，但却寻找不到一个理解我、听到我的主张不掩耳而走的人。因此我闭上嘴，不敢再和人们谈及经史，多么想与你重聚数月，来证实我十余年来的研究所得啊！

今年偶而到郡城去了几天，闲时走到书院中，遇到胡光四。经过询问，才知道他是您的及门高弟。于是问到您的近况，知道令郎已长大，能读父书。到您那里求学的人很多，您闭门不出，日日与学生们讲经论道，我听后非常高兴。士人不能把自己所学的东西用之于社会，当然就要成就后学、培养学生。像我这样，学到的东西本来就无可取之处，也没有一个人向我问难。年轻而又有才能的，都昂首阔步而行，作一下揖都认为是受了屈辱，问一个问题便以为受了污辱，哪里还有负笈求学这样的怪事呢！偶有一、二位来求学者，都是初学，一无所知，能补个诸生也就离去了。读书虽有所得，但环顾四壁，没有一个可与谈论的人，让人不禁发出长长的叹息！

以前在京城时，您曾刻一印章，叫做“四可堂主人”。问您

有什么说法，您回答说："我有父母可以奉养，有儿子可以教诲，有田地可以耕种，有书本可以阅读。我何苦在京城忙碌！"如今令尊大人虽然去世，但另外"三可"仍在。而我，本来就没有祖上遗下的田产，又被大水冲毁了家园，祖上留下的书籍也荡然无存，以至于无处容身，依居别人家中。乾隆36年（1771）春，我的父亲去世，如今只有家母尚在，但身体不好，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不能很好地奉养她老人家。近一二年来，我又患了眼病，连书都不能读了。我已年届四十，可连一个子女都没有。家中贫困，无法纳妾。"四可"我连一个都不占呀。晚上躺在床上，痛苦忧伤，感到人生没有任何乐趣，想着想着，不觉泪湿衾被。

许久不与别人通信，适此机会，不觉一泻如注。然而我写字已很困难，落笔时涂抹裁割的地方很多，所幸我们能心心相照。如遇北风，祈盼有佳音吹来。至此，问近好，不一一述说。

晚弟崔述顿首。

与桂未谷论慎憤二字说书

王念孙

题解：

这封信是王念孙就如何解释慎、憤二字而写给桂馥（号未谷）的。

王念孙（1744—1832），字怀祖，号石臞，江苏高邮人。他年幼好学，十岁就读完了十三经，并旁及史书，乾隆南巡，以大臣之子的身份奉迎，赐举人。后中乾隆乙未进士，选庶吉士，后任工部主事。嘉庆间出为永定河道，以河堤漫口罢官，很快又授山东运河道，在任六年复调永定河道，已而永定河水复溢，王念孙引咎休致。

王念孙曾就学于戴震，受声音文字训诂之业，并用十年时间注释《广雅》，成《广雅疏证》十卷。其中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扩充于《尔雅》、《说文》，无所不达。另有《读书杂志》等著作。

王念孙和他的儿子王引之，在清代汉学领域内的成就，被推为登峰造极，阮元曾说："高邮王氏一家之学，海内无匹。"他们是皖派学术的中坚，是清代汉学家中正统派传人，从顾炎武、戴震到王念孙，无论思想体系多么不同，学术成就各有差异，但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治学信念：通过古音以求经之本义。王念孙在文字音韵学上的成就，被誉为汉学家的高峰。

王念孙在这封写给当时著名学者桂馥的信中，虽然只讨论了两个字，但他旁征博引，信手拈来，立论使人信服。虽然我们感

觉他所讨论的问题太专业化，但我们仍能从中受到不少启发，做学问要博通众书，要善于用联系的眼光看待事物，并从事物的互相转化中看到事物的联系和区别。

（《读书杂志》）

原文：

承示《广雅》慎愤也①，慎为愦之误，《文选·幽通赋》周贾盪而贡愤兮②，愤亦为愦之误。念孙按，愦有溃乱之义，曹大家训愦为愦是也。亦有恐惧之义，《广雅》训忕慎为愦是也。欲知《广雅》愦字之义，当于忕、慎二字求之。《说文》忕③，愓也，《春秋国语》曰④，于其心忕然。郑注《易》云⑤，愓，惧也。是忕为恐惧之义。《广雅》慎，恐也。是慎亦有恐惧之义。《方言》蛩烘⑥，战栗也，荆吴曰蛩烘，蛩烘又恐也。《广雅》鬾恐烘畏，恐惧也，鬾慎忌畏，恐也；忕慎，愦也，转相训释，而其义自明。愦、恐、蛩、烘，声近而义同也。若改慎为愦，则与忕字之义不类。《广韵》忕意慎忕也⑦，此尤足证慎字之不误。又按愦字亦有溃乱之义，是以庆郑言，乱气狡愦。是以曹大家⑧、孟康皆训愦为乱字，通作愦。《荀子·强国篇》下比周贲，溃以离上。《韩诗外传》作贲⑨，是贲与溃同义。《说文》愦，懑也，懑，烦也、烦亦乱也。李奇注《汉书》叙传云，愦，懑也，是愦与懑亦同义，似无烦改愦为愦也。

注释：

①《广雅》：中国古代字书，三国魏张揖撰。原三卷，共18150字，体例篇目依《尔雅》，释义多沿用同义相释的方法。

②《文选·幽通赋》：《文选》，即《昭明文选》，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幽通赋》，班固所作。

③《说文》：即《说文解字》，中国古代著名字书，东汉许慎撰。

④《春秋国语》：即《国语》，先秦时史书。

⑤郑注《易》：即郑玄注《周易》。

⑥《方言》：汉代扬雄撰，中国古代字书。

⑦《广韵》：中国古代韵书。宋陈彭年、邱雍等人据《切韵》系统的韵书增订而成。

⑧曹大家：即班昭，班固的妹妹，因嫁于曹世叔，所以人称曹大家或曹世叔妻。

⑨《韩诗外传》：书名，汉韩婴撰。

译文：

承蒙让我看《广雅》中慎、愤二字。慎为愦之误，《文选·幽通赋》中有一句"周贾盪而贡愤兮"，愤也是愦之误。据我考察，愦有溃乱的意思，曹大家把忲训释为愦就是这个意思。愦也有恐惧的含义，《广雅》把忲、慎二字训释为愦就是这个含义。要想知道《广雅》中愦字的含义，必须从忲、慎这二个字上寻求。《说文解字》中说：忲，是惕的意思，《春秋国语》中说："于其心忲然。"郑玄注《周易》说：惕，是惧的意思。由此可知忲就是恐惧的意思。《广雅》中说：慎，是恐的意思。由此可知慎也有恐惧的含义。《方言》中说，蛩烘，战栗的意思，荆吴地区叫蛩烘，恐烘又有恐惧的含义。《广雅》中说：戁恐烘畏，是恐惧的意思；戁慎忌畏，也是恐惧的意思；忲慎又是愦，转相训解，含义就非常明白了。愦、恐、蛩、烘，声相近而义相同，如果把慎字改为愤，则与忲字的含义不同。《广韵》中说：忲的意思就是慎忲，这足以证明慎字没有错。再进一步考察，

愦字也有溃乱之义，因此庆郑说“乱气狡愦”。因此曹大家、孟康都将愦训释为乱，乱与愦通。《荀子·强国篇》中说：“下比周贲，溃以离上”。《韩诗外传》中作贲，可见贲与溃意义相同。《说文解字》中说，愦是懑，懑是烦、烦也乱。李奇注《汉书》叙传说：愦是懑的意思，由此可知愦和懑也是意思相同，似乎没有必要将愦改为愤。

论 园

吴锡麒

题解：

这是一封怀念亡妻的情书。

吴锡麒（1746—1818），清代文学家。字圣征，号谷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是乾隆进士，曾任祭酒之职。后在扬州、安定等书院讲学。工诗词曲，精骈文。与邵齐焘、洪亮吉、刘星炜、袁枚、孙星衍、孔广森、曾燠并称为八家。著有《有正味斋集》。

首起数句，以极寻常的语言，叙述极悲痛之事，更增添了悲痛情感的深度，真的痛苦是无需言语修饰的。数十年厮守，也许习以为常到无视其存在与否的人，突然不见，那种孤独和失落感又是多么令人惶惶难安啊。恰在此时，前人那悼亡的诗句又不期而至，它不但不能给人以丝毫的安慰，相反，使人产生“千古固同”的“伤心”事，偏偏被我遇到的痛伤之感。文字简短而蕴意丰富，语言平淡但情感真挚。

（《有正味斋集》）

原文：

仆归里后，内子[①]已自病危，乃不数日间，遽然化去[②]。以数十年同艰共苦者，而目中忽无此人，觉“蒙楚”一诗[③]，字字皆为我辈画出泪痕，方知此种伤心，固自同于千古。特仆不幸，适然覯之[④]，惨惨何已！

注释：

①内子：妻子。

②化去：死的委婉说法。

③“蒙楚”一诗：指《诗经·唐风·葛生》中有句云：“葛生蒙楚，蔹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这是一首悼念亡妻的诗。

④适然觏之：恰恰遇到了它（指亡妻之痛）。

译文：

我回归故里后，妻子已经病危，此后不几天就突然去世。几十年风雨同舟，而今目中忽无此人，觉“蒙楚”这一首诗，字字都是为我这样的人刻划泪痕，方知这种伤心，自古以来即无异样。我太不幸了，恰恰遇到了亡妻之痛，真是惨不忍睹！

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一

洪亮吉

题解：

这封信是洪亮吉就秦所置三十六郡问题写给时任詹事府少詹事的钱大昕的。洪亮吉就地理问题曾与钱大昕进行讨论，书信往还颇多，这是其中的第一封信。

洪亮吉（1746—1809），初名莲，又名礼吉，字君直，又字稚存，号北江，晚号更生。江苏常州人。他诞生在一个没落官僚士大夫之家。五岁丧父，依赖外祖母的帮助，过着粗衣淡食、近同佣工的生活。他聪敏过人，自幼好学，才华出众，受到塾师及同学的赞扬。但由于家贫，一度支付不起塾银，被迫退出私塾，并喊出这样的心声："牧群羊，牧群豕，孤儿宁愿读书死。君不见，三尺孤儿亦人子。"强烈要求读书、谴责社会不平的悲愤跃然纸上。洪亮吉当过塾师，做过幕僚。礼部会试，几度失意，曾在京师天桥借酒浇愁。后中了一甲二名进士。观其一生，失意者多，得意者少。也正因生活贫困，使他对一般百姓有较多了解，对社会有较深刻的认识。

洪亮吉是一位饱学之士，他研究的领域宽阔，涉及经学、哲学、史学、地理学、方志学、人口学与社会学诸方面。在史学方面，他最精历史地理，著有《十六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等。他多次与当时著名史学家钱大昕讨论历史地理问题。在这封信里，洪亮吉明确提出不赞成秦设置三十六郡之说。当时，钱大昕是力主秦三十六郡之说的。钱大昕是一位以考证著称的史学家，他严密的考证使得秦三十六郡之说有不可动摇之势。洪亮吉

也精于考证，他追本溯源、旁征博引，指出钱大昕所论不当之处，可谓精细严密。秦置郡是三十六还是四十，这个问题至今仍无定论，但学术研究的意义并非只是将答案给出，它本身所体现的求真致用精神才是最重要的。

（《卷施阁文甲集》卷10）

原文：

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其目见裴骃《史记集解》①，而《晋书·地理志》因之②。尝以为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汉书·地理志》本秦京师为内史③，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颜注云④："京畿所统，特号内史，言其在内，以别于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内本无内史，而以数不足，强牵合之。此则裴骃之妄矣。宋刘攽又谓秦三十六郡无鄣郡⑤，今考《地理志》"丹阳郡"下班注云："故鄣郡"⑥。而刘昭注司马彪《郡国志》则明言丹阳郡⑦，即秦鄣郡。且于故鄣县下注秦鄣郡所治。以迄《图经》、《吴地志》等无不然⑧，而以为秦无鄣郡，则刘攽之妄矣。至阁下以为楚汉之际所置，此约略之词，亦嫌无明据也。亮吉以为秦三十六郡，当以《史记》、《汉书·地理志》为证。盖与其信裴骃，不若信马迁、班固、应劭诸人之说为是也⑨。今细校《地理志》⑩，秦郡自河东至长沙共三十四郡⑪，皆见于班固原注中，他若黔中郡⑫，见《史记·楚世家》；郯郡⑬，见《汉书·高祖本纪》及《地理志》。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郯郡秦置⑭，汉高改为东海郡⑮。《御览》引《十道纪》⑯，海州东海郡，秦为薛郡地⑰，后分薛郡为郯。汉改郯为东海郡。郯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纪》亦薛郡、郯郡连书。盖薛郡入汉为鲁国，郯郡入汉为东海郡，细核《地理志》自明。是则秦有郯郡之明证也。而前人考秦三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阁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为即在三十六郡

内[18]，则益不敢为然。盖秦分三十六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则在三十三年，相距尚八年，必不预为计及明矣。又既数及桂林等三郡，则闽中一郡置[19]，又在三郡之前，不宜反漏。若统行数入，即除内史外及鄣郯二郡，不计外，亦与三十六之数不符，恐即如阁下言，亦当虑前后失据耳。况秦制天下为四十郡，除内史外，其名皆见于《史记》、《汉书》，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为增减。裴骃之过，惟以内史足三十六之数，而不知有郯郡。阁下则又欲并四十郡为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刘攽之邪说，既又知其不安，则以为置在楚汉之际，且又并闽中郡，削之以附会当日成数。亮吉恐皆不足以传信，而启后人之惑也，用敢论及之。

注释：

①裴骃《史记集解》：裴骃，字龙驹，南朝宋人。《史记集解》是其汇集众家之说为《史记》做注的力作。

②《晋书》：唐初房玄龄等人监修而成，130卷，记两晋及十六国史事。

③《汉书》：东汉班固撰，120卷，记西汉一朝史事。内史：古政区名，秦京畿附近由内史治理，即以官名为名，不称郡。

④小颜注：小颜，指颜师古；注，指《汉书》注。

⑤刘攽：北宋史学家，字贡父，曾助司马光修《资治通鉴》。鄣郡：郡名，楚汉之际置，一说秦置，治所在故鄣，即今浙江安吉西北。

⑥《地理志》：指《汉书·地理志》。丹阳郡：郡名，西汉元狩二年改鄣郡置。

⑦刘昭：南朝梁人，采集众家东汉史异同，为范晔《后汉书》作注。因范书无志，遂取司马彪《续汉书》八志相

补，并作注。司马彪《郡国志》：司马彪，西晋人，撰《续汉书》八十卷。《郡国志》即司马彪所撰《续汉书》中的志。

⑧《图经》：书名，北宋李宗谔撰。《吴地志》：书名，唐陆广微撰。

⑨马迁：指司马迁。西汉人，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作者。班固：东汉人，伟大的史学家，《汉书》的作者。应劭：东汉人，史学家，著有《汉官仪》、《风俗通》等。

⑩《地理志》：指《汉书·地理志》。

⑪河东：郡名，秦置，治所在安邑，即今山西夏县西北。长沙：郡名，秦置，治所在临湘，即今长沙市。

⑫黔中郡：郡名，秦代治所在临沅，即今湖南常德市。

⑬郯郡：秦置，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

⑭魏收《地形志》：魏收，北齐史学家，著有《魏书》。《地形志》即《魏书》中的志。

⑮东海郡：郡名，秦置，楚汉之际也称郯郡，治所在今山东郯城北。

⑯《御览》：指《太平御览》。

⑰薛郡：郡名，秦置，治所在今山东曲阜。

⑱桂林：郡名，治所在今广西桂平西南。南海：郡名，治所在今广东番禺。象郡：郡名，治所有两说，一为今越南广南，一说为今广西崇左。

⑲闽中：郡名，治所在今福州。

译文：

秦把天下分为三十六个郡，这个数目见于裴骃的《史记集解》，《晋书·地理志》承袭了这一说法。我曾经认为这一说法不对，如今经过考察，愈加感到这一说法有问题。《汉书·地理志》

上说，“秦的都城为内史，把天下分为三十六郡。”颜师古的《汉书》注说：“京畿统制之地，特称内史，言其在京畿附近，以区别于诸郡守。”这说明三十六郡内没有内史，因为数目不够，强将内史扯进来，这是裴骃的荒谬。宋代刘攽又说秦的三十六郡中没有鄣郡。如今考察《汉书·地理志》，“丹阳郡”下班固的注说：“过去的鄣郡。”而刘昭为司马彪的《续汉书·郡国志》作注，明确地说丹阳郡就是秦的鄣郡，并且在“故鄣县”下注说：“秦鄣郡管辖。”一直到《图经》、《吴地志》等，都是这种说法。认为秦没有鄣郡，这是刘攽的荒谬之处。直到您认为鄣郡为楚汉之际所置，这只是大略的说法，也显得没有明确根据。我认为秦三十六郡，应当以《史记》、《汉书·地理志》为准。与其相信裴马因，不如相信司马迁、班固、应劭这些人。如今仔细校勘《地理志》。秦郡从河东郡到长沙郡，三十四郡都见于班固的原注中，其它像黔中郡，见于《史记·楚世家》，郯郡见于《汉书·高祖本纪》及《地理志》，而魏收《魏书·地形志》也说郯郡是秦时设置，汉高祖时改为东海郡。《太平御览》引《十道纪》说，海州东海郡，秦时是薛郡的地盘，后分薛郡为郯，汉时改郯为东海郡。郯郡是从薛郡中分出的，所以《汉书·高祖本纪》也就薛郡、郯郡连书。薛郡入汉后为鲁国，郯郡入汉后为东海郡。仔细考察《汉书·地理志》自会明了。这是秦有郯郡的明证，但前人考证秦三十六郡，都没有说到这个，究竟是为什么呢？至于您又认为桂林、南海、象郡就在三十六郡之内，则我更加认为不然。秦分三十六郡在秦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的设置则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相距八年时间，很明显不会是预先考虑在内的。再者，既然讲到桂林等三郡，那么闽中郡的设置在三郡之前，不应该漏掉，既便统统将以上所提算在内，除掉内史及鄣、郯二郡不计，也和三十六郡之数不符。这恐怕就像您所说的，也有前后失去凭依的地方，何况秦分天下为四十郡，除内史以外，它们的名称都

见于《史记》、《汉书》，因此唐以前的地理书都沿用《史记》、《汉书》的说法，没有故意增加或减少。裴骃的过错，只在于用内史充三十六之数，而不知道有郯郡。您又想把四十郡并为三十六郡，所以不得不引用刘攽的邪说，既而又觉得不对，于是认为设置在楚汉之际，并又把闽中郡削去，以附会当时的成数。我害怕这些都不足以传信于后，还会使后人更加迷惑，故而斗胆论及。

与友人论古文书

阮　元

题解：

这封信是阮元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主要是讨论了文章的发展演变。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江苏仪征人。乾隆己酉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大考第一，超擢少詹事，历詹事、内阁学士、户、礼、兵、工诸部侍郎；浙江、江西、河南巡抚；漕运、两湖、两广、云贵总督，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兵部；督山东、浙江学政。嘉庆、道光时两充会试总裁。观其一生，历任政府封疆大吏。

阮元为政，识大体，顾大局。他曾在两广增建炮台，筹海防，禁鸦片。当时英国人已相当跋扈，用兵船护卫商船，入海口滋事。阮元封其商船，停其贸易，对方无奈，只得撤出兵船。阮元在两广总督任内，英国兵船未敢再犯粤洋。阮元任官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每到一地必兴学教士，如在浙江立诂经精舍，在广东立学海堂，选拔人才，学风大振。他论学宗旨在于实事求是，自经史、小学、历算、舆地、金石、辞章，无所不包，学识渊博，自成一家。

阮元研究问题善于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在这封信中，阮元就用历史的方法论述了今人文章与古人文章的不同。他非常推崇两汉文章，认为两汉文章体裁和谐规整、文气渊源博雅，既无激切率直之言，又无矫饰虚伪之病。而今人文章因受八股文影响，只仿效那些对做八股有用的古人文章，结果是不堪卒读。他还分

析了文章与子史的分流过程，提示人们读书要认真读序，以明了书籍取材的范围。由此我们感到，无论是写文章，还是干其它事情，都不可一味模仿古人，要明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任务，任何事情只有创新才有发展。

（《研经室三集》卷 2）

原文：

读足下之文，精微峻洁，具有渊源，甚善甚善。顾蒙来问，谨陈陋识焉。

元谓古人于籀史奇字[①]，始称古文，至于属辞成篇，则曰文章。故班孟坚曰："武宣之世，崇礼官，考文章。"[②]又曰："雍容揄扬，著于后嗣，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③]是故两汉文章，著于班、范[④]，体制和正[⑤]，气息渊雅，不为激音，不为客气。若云后代之文有能盛于两汉者，虽愚者亦知其不能矣。近代古文名家，徒为科名时艺之累[⑥]，于古人之文有益时艺者始兢趋之。元尝取以置之两《汉书》中[⑦]，诵之拟之，淄渑不能同其味[⑧]，宫徵不能一其声[⑨]。体气各殊，弗可强已。若谓前人拙朴不及后人，反复思之，亦未敢以为然也。夫势穷者必变，情弊者务新。文家矫厉，每求相胜，其间转变，实在昌黎[⑩]。昌黎之文，矫《文选》之流弊而已[⑪]。昭明选序，体例甚明，后人读之，苦不加意。选序之法，于经、子、史三家不加甄录[⑫]，为其以立意纪事为本，非沉思翰藻之比也。今之为古文者，以彼所弃为我所取，立意之外，惟有纪事，是乃子史正流，终与文章有别。千年坠绪，无人敢言，偶一论之，闻者掩耳。非聪颖特达、深思好问如足下者，元未尝少为指画也。呜呼！修塗具在，源委远分，古人可作，谁与归欤。惟足下审之。

注释：

①籀史奇字：籀为我国古代书体之一，又称籀文。宋翟耆年撰《籀史》一书，其书采录金石遗文，各为论说，多用篆籀。汉王莽时有六体书，其一曰古文，其二曰奇字。奇字亦为篆籀。

②班孟坚：即班固，东汉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著有《汉书》。

③同风：风格相同。

④班、范：班固、范晔。范晔为东晋南朝时著名历史学家，写有《后汉书》。

⑤体制：此处指诗文的体裁。

⑥时艺：又称制艺、制义，指明清科举考试时的八股文。

⑦两《汉书》：指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

⑧淄渑：二水名，都在山东省。相传二水味异，合则难辨，惟春秋时齐国易牙能辨之。后以此比喻合则难辨之物。

⑨宫徵：古代，宫、商、角、徵、羽为五音，宫、徵音调不同。

⑩昌黎：指韩愈，韩愈常以郡望自称，故时人称其韩昌黎。

⑪《文选》：总集名，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选，又称《昭明文选》。选录自先秦至梁的诗文辞赋。

⑫经、子、史三家：古代图书分类，用经、史、子、集四部囊括所有图书。经为经书，子为诸子书，史为史书。

译文：

读您的文章，深感精细隐微、深刻平直，渊源有自，甚好甚好！承蒙您写信询问，谨将我的浅陋看法陈述如下。

我认为，古人对于篆籀奇字，才称作古文，至于将辞句连缀成篇章，则称作文章。班固说："武帝、宣帝时代，崇尚礼官，考核文章。"又说："雍容华贵，抑扬顿挫，著称于后代，大汉的文章显然与三代风格相同。"因此西汉和东汉的文章，都收录在班固的《汉书》和范晔的《后汉书》里。体裁和谐规整，文气渊深博雅，不做激切率直之论，不为言行矫虚之说。如果说后代的文章有能像两汉那样兴盛的，即便是愚蠢的人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近代以古文名家的人，为科举八股所带累，对古人文章中有益于八股文的趋之若骛。我曾将他们的文章取来放到《汉书》、《后汉书》中，诵读模拟，结果就像淄水和渑水，味道不相同，犹如宫音和徵音，音调不一致。体裁文气不相同，不可强拉硬扯。你说前人在文章的朴拙上不如后人，我反复思量，也不敢同意这种看法。发展到穷尽的形势必然要变化，产生了弊端的事物必然要革新。文章家矫正弊端，每每要压倒对方，其间的转变，实际上从韩愈开始。韩愈的文章，不过是力矫《文选》的流弊而已。《昭明文选》的序，体例很明了，后人在阅读时没有留意。《文选》选文的方法是：对经、史、子三家不加选录，因为它们以立意记事为根本，不属于构思文采这一类。如今写作古文的人，把他人抛弃的取来，立意之外，只有记事，于是子、史终于与文章有了分别。千年来发展的统绪，无人敢说，偶而论述到，听的人也会捂住耳朵。如果不是有你这样聪明通达、深思好问的人，我也不会稍作指点。呜呼！书籍具在，本末远分，谁能追迹古人呢？请您细心考察。

与祝子常书

李兆洛

题解：

这封信是李兆洛为人品事而写给祝子常的。

李兆洛（1769—1841），字申耆，晚号养一老人，江苏阳湖（今常州）人。嘉庆十年进士，曾官安徽凤台知县。晚年主讲江阴暨阳书院达二十年。精通音韵、史地、考据、历算之学，是清代著名文学家、地理学家。论文提倡骈散合一，在思想内容上则要求"读圣贤之遗经，寻求其义类，以自抒其所得"。对桐城派的散文也颇为推崇。著有《养一斋文集》、《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历代地理沿革图》、《历代纪元编》等，并选有《骈体文钞》行世。

在这封给好友祝子常的信中，作者极力称赞他的人品和文品，并以躬行素志、不屑于争世俗虚名共勉。全信虽仅百余字，但语言凝炼精警，无论写人还是评文，寥寥数语，皆能画龙点睛，言简意赅。

（《养一斋文集》）。

原文：

足下立身行己，抗心古人，所处有断限，不自容其非，亦不肯容人非[①]；所著作皆俊杰廉悍，作作出芒焰[②]。未见深于情而不靡如足下也[③]！人生何必时俗喜，何必鬼神怜[④]？但得一二快处，倾泻肺腑，发摅瑰奇，亦足豪耳[⑤]。

诸葛武侯《诫甥书》曰："志当存高远，弃凝滞，忍屈伸，去细碎，使庶几之情，揭然有所存。"⑥倘亦吾侪座右铭乎⑦？

注释：

①抗：匹敌。断限：准则，原则。

②作作：光芒四射的样子。

③靡：淫靡。

④怜：怜悯。

⑤快处：读了使人称快的地方（指文字）。发摅：发抒，表示。

⑥诸葛武侯：即诸葛亮（181—234），三国时蜀国政治家、军事家，曾被封为武乡侯。

⑦倘：或许。侪：同辈，同类的人。

译文：

足下立身修行，与古人匹敌，处事有原则，不容许自己有误，也不肯容人有误；著作都是书写俊杰廉悍之类的，光芒四射。我未见有像足下这样重情而又不淫靡的！人生何必庸俗快活，何必怜悯鬼神？只要能得到一两篇使人称快的文章，倾吐内心的思虑，抒发瑰奇，也就足以自豪了。

诸葛亮在《戒甥书》中说："志向要高远，抛弃凝滞，忍受顺逆，舍去细碎部分，使几许感情，昭然存在。"或许这也是我们的座右铭吗？

与沈聚亭

龚未斋

题解：

此信时间不详。内容是龚未斋写给一位叫沈聚亭的朋友，诉说自己生存的艰难，并对人情世故作了犀利的分析，认为自己只凭良心作事，不管别人怎么看。所以，对于那些无知之徒的笑骂，一概置之不理。

龚未斋，会稽人。生活于乾嘉时代，以“师爷”终其一生。龚未斋是一个郁郁不得志，迫而为幕，却能清贫自守、洁身自爱、通于事理的人。文笔颇佳，有见识。著作有《雪鸿轩尺牍》。

龚未斋在信中，首先剖析了自己的性格。他说，他已经六十岁了，辛苦了一辈子，也知道自己应该轻松一下了。但既然出了横祸，就必须反躬自身，多加思考，不能文过饰非。但别人如果要求全责备的话，那也由他去。龚未斋说，他虽然出身清贫，但却有一个好的家传遗风，那就是洁身自爱，不贪便宜，靠本事吃饭。所以，他出为幕僚，也只是为了弄口饭吃，并不想招来什么意外灾祸。因为他看到周围那些一度发迹起来的人，不过十年，高楼大厦就变成了废墟。甚至有的断子绝孙，后世无人。岂不可叹可惊可怕！龚未斋说，有鉴于此，他决不贪脏枉法，只拿自己的俸禄，除此之外，一文钱也不多要。对于那些文章，一个字也不敢大意疏忽。闭门不出，与世无争。尽管如此勤奋认真，但却始终不能时来运转，岂非命运使然？龚未斋也坦率地承认，喜欢享受，不愿干活；乐意给别人以恩惠，不愿意得罪人，这是人之常情，他也不能免俗。他自认为自己是一个平常的人，不愿冒险

去独立于世，招人怨诽。但如果有人故意捣乱，对他肆意攻讦，他也不与计较。最后，龚未斋说，拿他这种性格，早就应该脱离宦海，回归家园。只是贫无粮田，故而只能委曲求全。

这封信是一篇好文章，好就好在它把一个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和灵魂给写出来了。在社会的最下层，不但有农民，有乞丐，有妓女，而且也有文人和儒生。他们虽有一技之长，但却手无缚鸡之力，只能忍受社会的压榨和官僚的污辱。为了生活，而寄人篱下，为人作刀笔吏。在专制制度下，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命运。古代如此，今天亦然。所以，读读这封书信，可以使我们对自己今天的现实处境有一个清醒的认识，而不要陶醉于"盛世"的连篇鬼话。龚未斋的信就好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古往今来一切正直知识分子的不幸命运。仅就此点而言，此文大可值得一读。

（《雪鸿轩尺牍》）

原文：

屡枉高轩，得奉榘诲[①]，所以哀衰朽而示迷途者，语切情殷，自非大兄大人戚谊之深，岂肯缠绵若此！篆腑铭心[②]，笔何能喻！

人生六十曰衰，弟又备尝辛苦，岂不知自保精神？至横逆之来，君子犹且自反，弟何人斯，而敢自文其过？惟迂拙之性，未能自竞，求全之毁，欲免无由。既承知己关情，敢不备陈梗概！

弟少孤失学，不能自奋于功名，而清正传家，亦尚知守身自爱。祇以菽水无资，不得不远游佣值。然而以幕救贫，非以贾祸。见吾乡之业于斯者，不知凡几，高门大厦，不十稔而墟矣！令子文孙[③]，不再传而止矣！悖入者，必悖出；积恶者，必馀殃。而素餐[④]负德，谋事不忠者，亦居其半！有鉴于此，能无惧

乎？是以鹤料[⑤]之外，一介不求；案牍之中，一字无忽。足不出户庭，而人亦不谋面，有居处数年，而不知提刀之为谁者，盖三十年如一日也。

然而全家飘泊，后嗣稽迟，岂非其才识所限，时势所极，丛过集尤，日积月累，而不自知者之所报乎？

若更侈然自放，漫不经心，则神伺其庭，鬼瞰其室，将见报应之酷烈，有不止于此者矣！夫恶劳而喜逸，市恩而避怨，谐世之方也。弟亦庸庸者流，岂能矫然立异，甘心为众怨之归？观过知仁，亦当原谅。

而谤之者不以为居心谿刻[⑥]，有意苛求；则以为形人之短，炫己之长。不知才拙事繁，正虑改过未遑，岂敢复为苛刻？至形短炫长，微特而可自炫，且所为长者亦卑也。

弟虽鄙陋，尚能于一歌一咏，别寻生趣，何肯屑屑于人！倘有不知者唾我骂我，概不与较。《山海经》曰："山膏[⑦]如豚，厥性善骂。"《国策》曰："夜行者自信不为盗，不能使狗无吠。"弟固无如之何，故亦不值一言与较也！

虽然，众人醉而我独醒，其不容于时也宜矣！次乎因人成事，托业已卑，亟应归卧故园，脱离荆棘。而负郭无田，箪瓢莫继，不得不与人世暂作周旋。大兄大人爱我之深，必能鉴我苦衷，非敢谓良言逆耳，知过勿改也！

注释：

①榘诲：榘，规则，法度。意谓很有雅致地教诲。

②篆腑铭心：意谓感激之深。

③令子文孙：令、文，皆美好之意。

④素餐：不劳而食。

⑤鹤料：唐代幕府官俸菲薄，谓之鹤料。后多用来泛称官吏的俸禄。

⑥谿刻：即刻薄。
⑦山青：神话中的兽名。

译文：

劳你多次大驾，得以聆听雅致的教诲，为的是同情我的衰老和对我的困惑的开导。语重心长，如果不是兄长情义深厚，怎么会如此恳切呢！感激之情，难以笔述。

人这一生到了六十岁就称作衰老，我又备尝艰辛，怎能不知道要保养自己的身心呢？至遇横逆以来，君子还要反躬自身，我算个什么人呢，竟敢文过饰非，掩饰自己的过错？只是我这迂腐的性格，不能够过于好强，所以，求全之毁，也是难以避免的。既然承蒙你的关心，我岂敢不详细地诉说一番！

我自幼失学，不能够向功名上努力进取，但家里素有的清廉正派的传统，也足以使我知道洁身自爱。只是由于生活没有着落，才不得不出门为人做事挣钱。然而是为了靠做幕僚来养家糊口，而并不是为了招引祸患。看见我们乡里干这行的，不知道有多少人，高门大厦，不到十年就成了废墟。截止到子孙一代，就不再下去了！非法获得的东西，也必定会被他人非法拿走；作恶多端的人，必然恶贯满盈。而那些不劳而食，有负德义，谋事不忠的人，也有很多。看到这些，能不害怕吗？故以俸禄之外，一文不求，案牍之中，一字不错。我足不出户，与人也不接触，有的人在这住了好几年，还不知道文章是谁写的。这是因为三十年如一日啊。

然而全家漂泊，孩子晚生，难道不是由我能力所限，环境所限，所有的过错，日积月累，而我又毫无自觉意识所导致的吗？

如果更加放纵随便，漫不经心，那么，神将注意到你的家，鬼将盯住你的门，那时，报应的惨重，还有不限于这些的。大凡厌恶干活而喜欢享受，小恩小惠而消除仇怨，这都是处世的技

巧。我也是凡夫俗子，怎么能够矫然独立，甘心成为众矢之的呢？观过知仁，也是应当原谅的。

那些诽谤的人却不认为居心刻薄，故意苛求。拿别人的缺点，来炫耀自己的优点。不知道我才能低陋，事务繁多，想改错还来不及，哪里还敢去苛刻别人呢？至于去说别人的短处，来炫耀自己的长处，不但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可供炫耀，即便一技之长也是比较低下的。

我虽然平庸，但也能在一歌一咏中，获得乐趣，何必要用小事去求人！如果有不理解我的人唾弃我责骂我，一概不与计较。《山海经》说："山膏这种动物就像猪一样，它的天性就是喜欢骂人。"《国策》说："走夜路的人相信自己不去偷东西，但却不能不听狗乱叫。"我不管怎样，是不同这些人一较长短的。

虽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但也因此而不合乎时宜！何况寄人篱下，所做的工作就已经卑下，更是应当赶紧返回家乡，脱离苦海。只是由于无田无房，衣食不继，还不得不与人与世打交道。兄长爱我之深，必定能明白我的苦衷。我不敢说这是良言逆耳，知过不改啊！

与林少穆兵备书

陈寿祺

题解：

这封信函是陈寿祺于道光二年十二月（1823 年 1 月）为社会改革事而写给林则徐的。

陈寿祺（1771—1843）与林则徐同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是清代著名的汉学家，曾在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讲学 20 多年。陈、林二人早年即有往还。

清王朝演续至嘉道间，官场黑暗腐败。社会风气因之大坏。官僚们追逐私利，盗窃国家财产和盘剥民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履行职责的情况更是比比皆是。乾隆的宠臣和珅占用土地约 8000 顷，是全国耕地面积的 1/800，道光年间的琦善的占地，比和珅还多 3 倍；大学士曹振镛由于严守“多磕头，少说话”的当官要诀而成了乾、嘉、道三朝元老且位极人臣。通过科考当上了官僚的士人，就改变了自己的身份，被纳入官僚体系，在政权与人民对立成为定势的情况下，这些后考上者要么很快被排斥出权力机构，要么成为政治橱窗中的装饰，更多的人则是附合于强大的旧势力。

在这种社会形势下，作为被排斥出统治机构之外的清明士人陈寿祺，他与在权力圈中出污泥而不染的林则徐，针对当时社会风气败坏问题有着强烈的共同语言。信中提及养廉需节约用度，节用在于精减人员，对于为官不俭之辈予以了猛烈的抨击，并进而涉及科考取士制度改革等问题。

这封友人之间的往还书函，涉及的内容是我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吏治与社会风气败坏。陈寿祺在信中提出改变现状的方法是由教育入手，这种见解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中难见成效，但从今天的意义上看，还是颇有借鉴意义的。

社会风气的好坏与吏治息息相关，这是古往今来人们都能明白的道理，如何使官吏廉洁，吏治清明，可以说是历朝历代人们孜孜以求的目标。虽然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但是，总体看来，从教育入手提高官吏的素质乃至全体国民的素质，似乎是较为切实的治本要法。

在今天的社会里，官即是公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思想是普遍共有的认识和行为准则，但仍有个别害群之马，他们的官僚主义思想严重，以至贪污受贿，败坏社会风气。对于这些人，我们除了表示出正常的义愤之外，还应当从提高整个国民素质入手。

（《左海文集》卷5）

原文：

少穆仁兄阁下：长至后二日得手札，存问殷拳，奖饰逾量，感恧交并。伏悉驺从已于嘉平之初驰赴淮海，臣川舟辑，非鸿才何以当诸，然圣眷非常，旦夕膺申甫蕃宣之寄，喁喁仰望者，岂独一方之民耶？

承示裁汰陋规，洗手奉职，贤者所为，非流俗可与语。盖养廉在节用，节用在省人，此服官持己之要，敬服何已！来教言吾乡近日科名中多幸获之士，则相奉而行险；衣冠中多不检之流，则相奉而合污。所论最切中时弊。寿祺比者憎兹多口，反躬循省，固由平日褊衷戆直，不能容物所招，惟有内讼自修而已，岂

敢尤人？顷与大府商榷取士之法，先访举学行，而后考察文艺，此于书院行之，诚不易之道，且亦张清恪[①]始创鳌峰[②]之旧章也。乃事甫发檄揭示，而不学者已谤议纷纷。人情狃于苟安，难与虑始，殆可浩叹！然有志之士，未尝不闻风而兴起，其谤议者皆妄庸人，失所侥幸，不便其私，故耳，此复何足置辩，所患寿祺德薄学荒，恐孤当事兴贤育才之盛心耳。毁誉之私非所忧喜，望阁下有以启其愚，而教所不逮，幸甚，幸甚。

注释：

①张清恪：鳌峰书院创始人。

②鳌峰：福州鳌峰书院。

译文：

少穆仁兄阁下：长至后二日得到您的手札，问候至为殷切，对在下极予推崇，感激之余，不胜惭愧之至。阁下从嘉平之初驰赴淮海，臣川舟楫，不是大才的人怎能担此重任？目前阁下圣眷非常，颇受重用，对您寄予厚望的，又非一方之民。

来函谈及裁汰陋规，勤俭供职，贤者的行为，并非世俗之人可与言及。养廉在于节约用度，节用在于精减机构，这是为官持正的关键，对此在下钦佩敬服。来函语及我省近来科考中多有一些侥幸考中的士子，他们相奉行险；士绅中多有一些行为不俭的人，他们同流合污。此论最为切中时弊。我过去厌人多言，修身反省，这当然是由于自己平日里褊衷戆直，不能容人，只有自我修练，怎敢指责旁人？我曾与他人商讨取士的方法，提出先访察学行如何，而后考察文艺，这在书院实行，确为不易之道，且也是张清恪始创鳌峰书院的旧有章程，谁曾想事情刚刚进行，而无学行的人已议论纷纷。人情惯于苟安，很难与他们商讨创业，令

人叹息！但一些有志之士，未尝不闻风而起，其私下议论的人都是妄言的庸人，失去侥幸考中的希望，不得乘其私图，故而如此，不足评论，我担心因为德薄学荒，而使先贤育才的人受到打击。个人的荣辱不值得计较、考虑，望阁下多多帮助，以补在下的不足，幸甚，幸甚。

题解：

这是道光十四年（1834年）令朱为弼为水手聚众械斗而写给两江总督陶澍及江苏巡抚林则徐的。

朱为弼（1771—1840年），字右甫，号椒堂，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他是陶澍、林则徐的宣南诗社诗友，时任漕运总督。

陶澍（1779—1839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林则徐在京官时期便与他结识，他们与朱为弼等是宣南诗社诗友。后陶为两江总督，林为江苏巡抚，二人共事四年，魏源称他们"志同道合，相得无间。"

嘉道时期，中国社会不仅盐、铁、河、吏治败坏严重，而且伴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腐败，社会问题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恶化，演变成综合性的顽症痼疾。其表现之一即为械斗。

"械斗"一词，在《辞源》中被定义为双方持械相斗。中国械斗之风源不可考，参加者或数十人，或千百人，后果严重，影响及于人们的生命财产，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形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弊病。

清朝历代皇帝对械斗问题都十分重视，他们三令五申，试图扼制械斗之风。道光皇帝继位后，亦力图变革求治，推出新的法律条文，但此风终未停息。

朱为弼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是指山东东昌府境内济州帮水手聚

致陶制军林中丞书

朱为弼

题解：

这是道光十四年（1834 年）冬朱为弼为水手聚众械斗而写给两江总督陶澍及江苏巡抚林则徐的。

朱为弼（1771—1840 年），字右甫，号椒堂，浙江平湖人。嘉庆十年（1805 年）进士。他是陶澍、林则徐的宣南诗社诗友，时任漕运总督。

陶澍（1779—1839 年），字子霖，号云汀，湖南安化人。嘉庆七年（1802 年）进士，官至两江总督。鸦片战争前夕著名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林则徐在京官时期便与他结识，他们与朱为弼等是宣南诗社诗友。后陶为两江总督，林为江苏巡抚，二人共事四年，魏源称他们“志同道合，相得无间。”

嘉道时期，中国社会不仅盐、铁、河、吏诸政积弊深重，而且伴随着清王朝的日渐腐败，社会问题在原来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恶化，演变成综合性的顽症痼疾。其表现之一即为械斗。

“械斗”一词，在《辞海》中被定义为双方持械相斗。中国械斗之风源不可考，参加者或数十人，或千百人，后果严重，影响及于人们的生命财产、生产生活和社会治安，形成不容忽视的社会弊病。

清朝历代皇帝对械斗问题都十分重视，他们三令五申，试图扼制械斗之风。道光皇帝继位后，还力图变革求治，推出新的法律条文，但此风终未停息。

朱为弼在这封信中所说的是指山东东昌府境内庐州帮水手聚

众械斗一案，这次械斗造成十多人丧命，致粮船所过的地方，不时有折体断肢漂流水面。水手械斗直接影响到了清王朝政府的生命线——漕运的安全，因此，朱为弼等人十分重视，主张严治罪犯，以正风气。这一观点是出自乱世用重典的考虑。

社会治安的好坏是一个社会是否稳定的重要标志，同时，它又直接影响到了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因此，能否处理好这一问题，关系重大。

（《茮声馆文集》卷 4）

原文：

敬启者，前准苏松粮道详及苏府汪守禀称："因庐州二帮水手滋事[①]，请调水次一节，实因该水手等结怨已深，难以防范，于办漕诸多未便，必须调兑方为妥善"等因。侍思此事，既于办漕掣肘，自不得不量为变通。鄙意必得将道光三年[②]奏案陈明，并将现在棘手之处，宛转陈请，或可仰邀恩准。至查水手一节，即于年内盘验首帮时，随即核对水手年貌，搜查军器，以后各帮拟请，侍饬令地方官会同运弁于水次，先行查明水手年貌、籍贯，注明册内，并搜查军器，务期认真，不得奉行故事。查对明确，即将原册详送侍处，以便盘验时核对，如有姓名、年貌不符者，惟该管运弁是问，并一面札各粮道、总运一体稽察。至水手沿途滋事，如抢夺、酗酒、打架，该运弁立时送地方重责，枷号河干，倘犯命盗重案，一经讯明，概由就近督抚恭请王命正法，枭首示众，如此认真从严办理，庶此等顽梗之徒，或可稍知儆畏，所谓火烈民望而畏之，想卓见定不以为谬也。惟冀钧裁酌夺外，附上原奏稿一件，应如何具奏，即祈速示为祷。

注释：

①林则徐道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折片中称："臣接阅邸

抄，钦奉上谕：'……近日山东东昌府境内庐州帮水手聚众械斗一案，致毙数十余命之多，且粮船所过地方，时有折体断肢漂流水面，皆由水手戕害所致。……'"见《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90页。

②道光三年：1823年。

译文：

敬启者，前准苏松粮道详及苏府汪太守禀称："因为庐州二帮水手滋生是非，请调水次一节，实因该水手等结怨已深，难以防范，对于举办漕运十分不便，必须实行调兑方可妥善处理"等因。在下细思此事，既然对办理漕运多有掣肘，自然不能不量为变通。我认为必须将道光三年（1823年）奏案陈明，并将现今颇为棘手的地方，婉转陈请，或许能得到恩准。至于缉查水手一节，即可在年内盘验首帮时，随同核对水手年龄、相貌，搜查军器，以后各帮如有请示，可传令地方官会同运河兵弁于水次，先行查明水手年龄、相貌、籍贯，在册内注明，并搜查军器，务必认真办事，不得敷衍搪塞。查对明确后，即将原册详送侍处，必须在盘验时核对，如有姓名、年龄、相貌不符的，拿该处负责的兵弁是问，并一面札令各粮道、总运一体稽查。至于水手沿途滋事，如抢夺、酗酒、打架等，该运河兵弁立即送至地方重加责罚，枷号河干，倘若犯有命案、盗案等重案，一经讯明，概由就近的督抚恭请王命予以正法，枭首示众，这样从严认真办理，或许可以使这些顽梗狂徒，稍有畏惧之心，所谓火大后人们一看即生畏心，想来二位大人高见，一定会赞成的。除请二位大人裁夺外，还附上原奏稿一件，应如何上奏，请迅速指示。

与成君瓘书

俞正燮

题解：

这封信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俞正燮为石鼓文事而写给成君瓘的学术信件。

俞正燮（1775~1840），字理初，安徽黟县人。他是道光举人，1833年会试未中。1839年为江苏学政，并掌教江阴惜阴书院，致力于经义，于史学、诸子、天文、地理、舆地、医理、释典、道藏等无不探究。其考据学上承江永、戴震，而有所扩展。与同里汪文台齐名。主张经世致用，提倡男女平等。已刊著述有《癸巳类稿》15卷，《癸巳存稿》15卷，积一生治学成果，为俞氏学问的荟萃，从它论证之广、征引之富、考订之精，可以看出他学问的博大精深，“汉学家”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他是当之无愧的。另有《校补海国纪闻》、《宋会要辑本》，已毁于兵火。曾纂修《黟县志》、《两湖通志》。

石鼓文，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在石块鼓形的石头上，每块各刻四言诗一首，内容为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因此也称猎碣。石刻书体为秦始皇统一文字前的大篆，即籀文，历来对其书法评价很高。其制作时代，唐人以为在周文王或周宣王时，宋人始提出秦始皇以前之说，经近代和今人研究公认为是秦刻石，但仍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诸说。石刻原在天兴（今宝鸡）三畤原，唐初被发现，杜甫、韦应物、韩愈等有诗篇咏，现十石文字大多剥泐，其中一石文字全部荡然无存，原石藏北京故宫博物馆。

嘉道时期，正是清代学风的转变时期，即汉学发生分裂的过程。因为：一、汉学末流，斤斤于字句的考证，纷纭于难以究诘的名物制度，渐趋顾琐浮泛，引起当时一部分学者的不满，方东树的《汉学商克》一书，虽有矫枉过正的地方，但对于汉学的流弊，却说得淋漓尽致。二、清中叶之后，清廷政治日渐腐败，统治力量亦逐渐削弱，兼以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尖锐化，整个政权走上没落的途径，因为客观形势的变化，遂使一些较有见解的学者把眼光转移到经世致用之学；而西方学术的传入，更令当时的知识界，耳目为之一新。俞正燮正是这一时期的人物，他的治学，与纯粹汉学家有所不同，而显示出上述的转化倾向。

在这封信中，俞正燮对石鼓文的来历进行了深入地考证，其中有些结论在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也有一些错误之处，这是当时研究条件局限所致。

历史学的两大功能之一即是为现实服务。历史学如若不能为现实服务，那么，他将失去存在的价值，将会为社会所遗弃。研究者不去思考现实存在的课题，而一心投入在他的研究的小圈圈里，在象牙塔中打转，其所研究的成果，当然难以起到为现实服务的作用。

（《癸巳类稿》）

原文：

两接手书，深铭教益。石鼓得示李彪一语[①]，奚翅千金也[②]。近石鼓有汇考，唐以来文章，搜罗尽矣。求周鼓证据，丝毫不可得，尝读石鼓见存字，以薛尚功所摹勘之[③]，有曰：“日惟丙申”，有曰“公谓天子”，有曰“天子来”，有曰“嗣王”，有曰：“吴人怜悯”。寻石鼓始见书传者，《后汉书·邓骘传》注及《元和郡县志》载苏勖语[④]，此后韦韩诗，兴会议论，乃仰椽虚构也，

谓为周宣王时物，史籀写[5]，则《说文》所载籀文确与石鼓不同[6]。鼓曰："嗣王"，曰"公"，可言成王时[7]，然既曰"公谓天子"，"天子来"，属周公成王矣。鼓又言"嗣王"，"嗣王"当何指？又谓文王制鼓[8]，成王刻文，又或以漆书刓及，有同秦权字[9]，谓是秦鼓，均与"天子"、"嗣王"、"公"不合。检《续汉书·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注引汉辛氏《三秦记》[10]，有石鼓山，将有兵，此山则鸣。山在今凤翔县西南。辛氏不言石鼓有文。今有文十鼓，实出古陈仓地，其地在今宝鸡县南二十里，知当辛氏作记后，在汉以后、唐以前，早不过曹魏，迟不过隋。马定国以为宇文周时物，姚氏残语。则南宋温彦威传其说，后元刘仁本亦从之。而其文《中州集》、《金史》俱不载[11]，其意则可推也。大统十一年为东魏武定三年，为梁大同十一年。《魏书·静帝纪》是年十月有乙未[12]，《梁书·武帝纪》是年十一月有乙未[13]，盖南北大小尽殊。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也。《周书·文帝纪》大统十一年冬十月[14]，大阅于白水[15]，遂狩于岐阳[16]，遂事在十一月朔可也，然不得"嗣王"义。又十三年十一月，狩岐阳，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狩于岐阳，十二月壬午，至自岐阳。二十六日无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幸岐阳，十二月丁丑，至自岐阳，三十四日内无丙申。至大统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奉魏太子登陇刻石，不由岐州。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赟巡抚西土[17]，三月己卯，皇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明著太子，不得谓之"嗣王"。汪君师韩则以为大象中补刻，"天子"指天元[18]，"嗣王"谓静帝，则杨氏执政矣。今检李彪表云，礼田岐阳，先皇之义也。表在宣武时。上检《世祖太武纪》，则表文合，鼓文字皆合。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盖吴反[19]。十一月诏西平公寇提及尚书乙拔讨之，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幸周屋，诛叛民，军次陈仓，诛散关氏，还幸雍城，田于岐山之阳。乙拔等破吴，吴遁走。三月，车驾旋轸。八月，吴死，传首京师。则

鼓曰“丙申”，溯周至之事也；云“天子来”，世祖也；云“嗣王”，谓五年太子晃副理万机、总统百揆也；云“公”，谓天子西平公也；云“吴人怜悯”，宋人雍、梁二州兵屯境上，助盖吴者遁也。《世祖纪》云：始光二年，初造新字千余。《周书·黎景熙传》亦言魏太武字义颇与许氏有异。今检石鼓文非籀文，又与《说文》异，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行已二十年。推石鼓为太武时物，其地合，其人合，其事合，其日合，其字画合。阁下一言，胜马生万余言矣。

承示伏墓考证，彼称临济镇在章丘东北三十里，今邹平城在济水北，即宋移治济阳废城。适足资笑耳。南宋绍兴时，资阳李知几作《续博物志》，言漯水北有伏生墓[20]，汲有太公泉、太公庙[21]，皆本《水经》[22]。王文简《香祖笔记》谓伏墓非漯水[23]，乃獭水。太公在鄗不在汲，李石附会可笑。是文简不检《水经》。岂知伏墓考证，谓《水经》漯水即今獭之更荒谬哉！住汲县，读朱竹垞兼隐斋石鼓文拓本联句[24]，翻石鼓考阅之，又过太公庙看晋碑，忆《香祖笔记》兼及伏生，牵连奉告。此去辉县，有苏门百泉之胜，日对佳山水，披览语录讲章，阁下时时念我，当为抚掌也。丁卯十二月朔，汲县望京台寓舍寄。

注释：

①石鼓：即石鼓文。唐初在凤翔三畤原出土十块石头，均鼓形，上刻籀文（大篆）四言诗，每块十首为一组，发现时文字已残缺不全，其内容及刻石时代众说纷纭。唐代张怀瓘等认为是周宣王大狩所作，宋代程大昌等断为周成王时所作，郑樵因其文往往与秦器相合，又指为秦刻。金代马定国认为是北周时之物。近人考证定为秦刻，叙述当时贵族田猎游乐生活。

李彪：北魏时人，曾任中书博士、秘书监等职，以强颜直

谏、擅长史学著名。

②翅：同啻，仅，只。

③薛尚功：宋代人，善古篆，尤好钟鼎。著有《钟鼎彝器款识》、《钟鼎篆韵》。

④《后汉书》：书名，记载东汉的历史，南朝宋人范晔所作。《元和郡县志》：书名，是现存最早的古代总地志，唐代李吉甫作。

⑤史籀：西周宣王时的史官，曾作大篆十五篇，称为《史籀篇》。

⑥《说文》：即《说文解字》，东汉许慎编。

⑦成王：即周成王。

⑧文王：即周文王。

⑨秦权：秦的度量衡。

⑩《续汉书》书名，西晋司马彪撰，记载东汉的历史。《三秦记》：书名，作者姓辛，名字不详。

⑪《中州集》：书名，金人元好问编。《金史》书名，元代脱脱主持编定。

⑫《魏书》：书名，北齐魏收撰。

⑬《梁书》：书名，唐代姚思廉撰。

⑭《周书》：即《北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持编写。

⑮白水：水名，在今山西晋城境内。

⑯岐阳：地名，治所在今凤翔县南。

⑰皇太子赟：即宇文赟，后为周宣帝。

⑱天元：即宇文赟。

⑲盖吴：北魏卢水胡人。太平真君六年率领起义。

⑳漯水：水名，一作漯川，故道自今河南浚县西南别黄河东北流经濮阳、范县及山东莘县、聊城、临邑、滨县等县境入海。

㉑汲：地名，即今河南汲县（现为卫辉）。

㉒《水经》：书名，我国第一部记述河道水系的专著。

㉓王文简：即王士祯，清代学者。

㉔朱竹垞：即朱彝尊，号竹垞，清代学者。

译文：

两次接到来信，教益深铭在心。有关石鼓文的问题，您向我出示了李彪的一句话，真是一语千金啊。最近有关石鼓问题有《汇考》，唐以来的文章，全都搜罗完了，但有关周鼓的证据，一丝一毫都没有。曾经读石鼓上存留的字，用薛尚功的摹本进行校勘，结果有的说“日惟丙申”，有的说“公谓天子”，有的说“天子来”，有的说“嗣王”，有的说“吴王怜悯”。考察石鼓最早见于书传记载，是《后汉书》“邓骘传”的注以及《元和郡县志》所载苏勖的话，此后韦韩的诗，随兴议论，都是凭空虚构的。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的器物，文字是史籀写的，但《说文解字》中所记载的籀文，确实和石鼓上面的不一样。石鼓上说“嗣王”、说“公”，可以知道说的是周成王时的事。可是又说“公谓天子”、“天子来”，又当归于周公、周成王。鼓上又说“嗣王”，“嗣王”指的是什么呢？又说周文王制鼓，周成王刻文。有的人又根据漆书削刻的文字和秦权上的字相同，说这是秦鼓，但都和“天子”、“嗣王”、“公”不相符合。翻检《续汉书·郡国志》“右扶风陈仓”条注文引汉代辛氏编撰的《三秦记》，上面记载有石鼓山，将要有军队打仗时，此山就发出鸣叫，此山在今凤翔县西南。辛氏没有说石鼓上有文字。如今有文字的十个鼓，实际上是出自古陈仓地带，其地在今宝鸡县南二十里。由此可知当在辛氏记载石鼓山之后，在汉以后、唐以前，最早不会超过曹魏，最迟不会超过隋。马定国认为这是宇文周时期的器物，所记为姚氏残语。于是南宋温彦威传其说，后来元代刘仁本也相信这一说法。

但上面的文字，《中州集》、《金史》都没有记载，而大意则可推出来。大统十一年是东魏武定三年，是梁大同十一年。《魏书·静帝纪》记载这一年十月有乙未，《梁书·武帝纪》记载这一年十一月有乙未，南北大小完全不同。梁十一月乙未朔，魏十月乙未晦，十一月丙申朔。《周书·文帝纪》记载大统十一年冬十月大阅兵于白水，接着在岐阳狩猎，这事发生在十一月朔是对的，但仍找不到"嗣王"的含义。另外又有记载，十三年十一月，在岐阳打猎，保定元年十一月丁巳，在岐阳打猎，十二月壬午到达岐阳，二十六天时间内没有丙申。天和三年十一月甲辰，巡幸岐阳，十二月丁丑，到达岐阳，三十四天时间内没有丙申。到大统十三年夏五月，周太祖敬奉魏太子登陇山刻石，不从岐州路过。建德二年二月，下诏皇太子宇文赟巡抚西方，三月己卯，皇太子在岐州捕获两头白鹿。此处明确记载太子，没有称为"嗣王"。汪师韩则认为是大象年间补刻的，"天子"指的是天元皇帝，"嗣王"指的是周静帝，但此时杨氏已把持政权了。如今翻检李彪的奏表上说：依礼在岐阳打猎是先皇之义。上表是在宣武帝时。向上翻检《魏书·世祖太武纪》，则表文相合，鼓文字都相合。太平真君六年九月，杏城胡人盖吴反叛，十一月下诏西平公寇提和尚书乙拔讨伐盖吴，车驾西征。七年二月丙申，皇上巡幸周至，诛杀叛民，军队驻扎在陈仓，诛杀散关氐人，回来时到雍城，在岐山之阳打猎。乙拔等人攻破盖吴，盖吴逃走。三月，车驾又征，八月，盖吴死去，将其头颅传至京城。鼓上说"丙申"，就是追溯周至这件事，说"天子来"，指的就是世祖太武帝，说"嗣王"，指的是五年太子拓跋晃帮助日理万机、总统百揆。说"公"，指西平公寇提。说"吴人怜悯"，指的是宋人雍州、梁州的军队驻扎在边境上，帮助盖吴逃走。《魏书·世祖纪》上说：始光二年，造了一千余个新字。《周书·黎景熙传》也说魏太武帝所造字义颇与许慎的不同。今考察石鼓文，不是籀文，又与《说文

解字》不同。自始光二年至太平真君七年，新字已实行了二十年。推断石鼓为太武帝时的器物，地点相合，人物相合，事件相合，日期相合，字划相合。您一句话超过了马定国一万句。

承蒙让我看伏生墓考证，彼为称赏临济镇在章丘东北三十里，如今邹平城在济水北，就是宋移治济阳废城，这些都只供笑谈罢了。南宋绍兴年间，资阳人李知几作《续博物志》，说漯水北有伏生墓，汲郡有太公泉、太公庙，都是依据《水经》。王士祯《香祖笔记》说伏生墓没在漯水，而是獭水，太公在鄗而不是在汲，认为李知几穿凿附会，可笑之至。这是王士祯没有翻阅《水经》。他哪里知道，考证伏生墓所在地，认为《水经》中的漯水就是今天的獭水，更是荒谬。我住在汲县，读朱彝尊兼隐斋石鼓文拓本联句，翻阅石鼓考，又到太公庙看晋碑，想起《香祖笔记》中的记载涉及到伏生，一并告知。从这里到辉县，有苏门山百泉这样的名胜，每天面对明山秀水，披览语录讲章，您时时挂念我，我感到万分高兴。丁卯十二月朔，寄自汲县望京台寓舍。

书赠王汝霖

包世臣

题解：

这封信是包世臣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二月写给王汝霖的。

包世臣（1775—1855），字慎伯，安徽泾县人，泾县在汉代称为安吴，故而人们又称他包安吴。他出身清贫，父亲以教蒙馆为业。他十二岁时曾随父远游。在读书方面，他特别勤苦，凡书必讽诵千百遍。而且，在十三四岁时，就慷慨激昂，要立奇功于天下。但是，他一生都未考中进士，只能依人做幕僚。他想为统治者出谋画策，但此时的统治阶级已腐朽透顶，他不但不能立功自见，反而一再被谗。于是他遍游各地，了解到很多民间疾苦，并结交了朱珪、段玉裁、钱坫、李兆洛、姚鼐、张惠言、恽敬、汪喜孙、龚自珍等文人学者。见识愈来愈广。晚年，他定居金陵，太平天国于此建都，他与汪士铎、梅曾亮一起被天王洪秀全尊为“三老”。包世臣是清代著名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他生当近代史开端之际，怵于当时的内忧外患，亟思有所改革。在思想上，他上承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同时与魏源、龚自珍等彼此唱和，推动了嘉道之间学风的转变。

包世臣满怀报国之心，但一生不得志，才能无处施展，但他并不悲观失望。他在与王汝霖的这封信中，就阐明了自己的人生态度：自立自强。他认为人最大的担忧就是不能自立、无以自立。在动荡的社会中，在时毁时誉的风潮中，人又该怎么办呢？

他认为应当荣辱不惊。当别人赞誉自己时，自己确有可赞誉之处，当别人诋毁自己时，自己并没有那些过错。问心无愧，也就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了。仕途通达，便要奋力进取，仕途闭塞，也决不贻恨后悔，只要做到这些，无论处在什么环境下，你都会悠然自得。由这封信我们可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自立自强，问心无愧，都是我们必须信奉的人生信条。

（《包世臣全集·小倦游阁集》卷 3）

原文：

人患无以自立[①]，得丧定于命，非人为之所能增损也。不以得丧累其心，独处以右为师，群居择善而执，受于天者，虽有厚薄之殊，积之久，要皆足以自立。至于不虞之誉[②]，求全之毁，自古叹之。誉至则必求所以实其言，毁至反诸吾身而无可指实，既不疚于心，何病人言哉？语云：“争名者于朝”[③]。争名之地，败行尤易。唯自安义分，事贤友仁，不改求己之素[④]。通无妨于进取，塞不至于贻悔，斯无入而不自得矣[⑤]。

沐阳雨亭王君[⑥]，将赴京兆试，过扬州，介虚谷张君存予于湖上。扬州右称尘土之乡[⑦]，予侨此十余年，二君观之以为染尘土者几何耶？张君学识过侪辈[⑧]，而盛称王君，不知其人视其友。予荒落已甚，无以答王君之意，只此求自立之心，则廿年前所证盟于大兴朱文正公者[⑨]，今犹未能自弃，故述以为赠。王君幸无以为悠悠常论也[⑩]！嘉庆廿二年二月廿二日包世臣书。

注释：

①患：担心，担忧。

②虞：意料，预料。

③朝：朝廷，又指官府所在地。

④素：真情。

⑤自得：悠然自得，得意。

⑥雨亭王君：指王汝霖，字雨亭。

⑦尘土：风尘世俗。

⑧俦：同类。

⑨大兴朱文正公：指朱珪。朱珪，字石君，号南崖，晚号盘陀老人。直隶大兴人。有著作《知足斋文集》等。

⑩常：永远的，固定的。

译文：

人最大的担忧就是不能自立。得失是命中注定的，不是人自身的力量所能增损的。不把得失放在心上，独处时以古为师，群居时择善而从。老天爷赐于每个人的东西，虽然有厚薄之分，但积聚的时间长了，都能达到自立。至于那些没有想到的赞誉，要求完美无缺而进行的诋毁，从古以来，人们都很有感叹。赞誉来了，一定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与之相符的东西；诋毁来了，反求自身，发现这些诋毁全无实据。既然问心无愧，何必担心别人说什么呢？俗语说："争名逐利的人在官府中。"争名逐利的地方，特别容易败坏品行。唯有安分守己，和有才能的人共事，和仁爱的人交朋友，不改变自我修养的真情。仕途通达，无妨立功进取；仕途闭塞，不至贻恨后悔。这样，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会悠然自得。

沐阳王汝霖先生，要去京城参加科举考试，从扬州路过，经张虚谷先生介绍，结识于湖上。扬州自古以来，被称为风尘世俗之地，我侨居此地十多年，两位先生看看，认为我沾染了多少风尘世俗？张先生学识在同辈人之上，却盛赞王先生，不了解一个

人，就看一看他所结识的朋友。我非常慌张窘迫，感到没办法回答王先生的美意，只在此将自立之意表述出来，那么二十年前在大兴朱筠先生面前的誓盟，如今还没有抛弃，所以表述出来赠给您。王先生千万不要将此作为千古不变的永恒论断！嘉庆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包世臣书。

复汪孟慈

王　筠

题解：

此信年份不明，是王筠对友人汪孟慈来信的回复。涉及两事，一是汪孟慈所托给王筠的有关灵悬的著作，一是王筠对汪孟慈为人处世的劝谏和忠告。

王筠（1784—1854 年）字贯山，号篆友。山东安丘人。官知县。少喜篆籀，博涉经史，尤长于《说文》。著《说文释例》二十卷。《释例》云："即许书而释其条例，犹杜元凯之于《春秋》也。"又著《说文句读》三十卷。王筠治《说文》之学，近三十年。其书独辟门径，折衷一是，不依傍于人。论者以为许氏之功臣、桂（馥）段（玉裁）之劲敌。还著有《说文系传校录》三十卷 、《文字蒙求》四卷等书。

清朝发展到后期，即人们所谓的"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各种危机此起彼伏。除了少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能够"睁眼看世界"外，绝大部分士人依然沉浸在对古老文化的陶醉之中，得意忘形，不知反思。这些士人把做学问，即"小学"或"考据学"视为安身立命的上乘境界。

王筠在信中首先谈了朋友所托灵悬的著作手稿一事，以及有关灵悬家里的一些情况，说明自己由于家里管教太严，就好像被束缚起来的牛一样，没有事情不能随便到外面去，故而，对灵悬的事情帮不上忙，并深感遗憾。

其次，王筠又对汪孟慈的为人处世的行为秉性作了一些中肯

的评价。认为汪孟慈“取人太宽，而责人太备。”取人太宽，凡人有一点小小的才能也想结交；责人太备，即便是知己之交也有一定的界限。这两方面需要分开，否则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

这封信写的情真意切，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朋友”一词的理解与今人大相径庭。古人认为“朋友”是道义之交、是学问之交，今人认为“朋友”是利益之交、是实惠之交。所以，古人只会去帮助朋友，而今人则只会去利用朋友。古人只要求自己去为朋友去做一些事情，今人则只要求朋友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境界高下，立判可见。故而，王筠这封信出于朋友之义而对汪孟慈提出的劝告，对今天那些已不明“朋友”本义的人来说，勿宁是一次极好的启蒙。

（《清诒堂文集》）

原文：

四月十六日，忽接来教两函。承示诸硕学姓字，兼以灵悬[①]著述谆嘱。夙仰先生友谊綦笃，于此尤信，此伦之所恃以不绝也。令人感激欲涕。

十七日执绋刘庄年刺史家。（与月汀选拔殿试[②]两次同年，询之自知其详。）其人善篆籀摹印[③]，舍侄妇翁也。灵悬之弟，亦在是有专司。而弟又以三四舍弟皆赴科试，无人侍奉家君，匆匆而返，未得面言，谆嘱友人以尊意相告。而友人曰：“近皆放旷，不以诗书为业，吾必告之，然成否未可必。”而灵悬之子，年逾弱冠，不辨菽麦，诚恐此事便已，夜台不瞑耳。弟之在家也，如被縻之牛。家君性严急，无事不得他出。去灵悬家七十余里，又素无深交，况也永叹而已。

弟承垂青，屡以古谊相敦切，爱我之厚，感何可言！然受此厚意，不敢不有以报也。窃见先生，取人太宽，而责人太备。夫取人宽，则毫毛丝粟之才无不储也；责人备，则身性命之交自有

属也。两者理虽同源，而各有当；苟并而求之一夫，则其弊立见；惟以为己之法御之，斯可兼收其益，而两袪其弊矣。先生力行古谊，是以献其狂言，惟采纳焉。

两孝子事，理当在意，惟居乡知交少耳，已致书许云桥先生求之。数年前云桥先生致书家君，言其《舆地书》已付刊，刊成当相寄，乃至今未见。先生高才捷足，已快先睹耶？

注释：

①灵悬：曹元询字灵悬，安邱人。汪孟慈尝谓其文通武达，经世之才。

②殿试：科举制度中皇帝对会试取录的贡士在殿廷上亲发策问的考试，也叫廷试。

③篆籀摹印：即刻字。

译文：

四月十六日，忽然接到两封信。告知各位博学之士的姓名，并将灵悬著作一事嘱托于我。我素来敬仰先生古道热肠，由此事更加深信不疑。这正是道德之所以代代相传的原因。令人感激欲涕。

十七日执绋于刘庄年刺史家。（与月汀在选拔殿试时两次同年，一问自然就会知道详情。）这个人擅长篆籀摹印，是我侄女的妇翁。灵悬的弟弟，也在是有专司。而我又因为三四个弟弟都去参加科举考试，没有人侍奉家父，便匆匆返回，没有来得及当面给您讲，曾嘱托朋友把您的意思告诉我。朋友说："近来放荡不拘，不专心致志于读书。我肯定要说，但是否有效果则不得而知"。而灵悬的儿子，年龄已有二十出头，不辨菽麦，我担心这件事就此了结，夜台肯定不会瞑目。我现在在家，就像被拴绑住

的牛。家父性情严厉，没有事情不得随意外出。到灵悬家有七十多里路，再加上向来没有深交，也只能感叹而已。

我承蒙您的厚爱，常常以古人道德来要求我，对我的关心之深，使人感动。然而，受到如此厚爱，不敢不有所报答。我看先生，结交人太过宽泛，而批评人又过于严厉。结交人太宽，则一点小小的才能也会喜欢；批评人太严，则心心相印的知交也难以苟同。二者道理是一样的，而各有自己的尺度。如果把二者硬性放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它的缺陷就一下子看出来了。只有以对待自己的原则去处理，才能既得到二者的优点，又可去掉二者的弊端。先生身体力行古人道义，故而把我的愚见谈出来，以求先生能够采用。

两位孝子的事情，我自会尽心。只是我因居住在乡下，朋友比较少，已经给许云桥先生写信，请他帮忙。几年前云桥先生给家父写信说，他的《舆地书》已经刊刻付印，印出以后会寄来，但到现在也没有见到。先生高才捷足，是否已经先睹为快了？

致陈寿祺

林则徐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三年正月（1833年2月至3月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有感于清政府办理漕运、救灾不力而写给陈寿祺的。

林则徐（1785—1850），福建侯官（今福州）人。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诶村老人。嘉庆进士。中年，他与龚自珍、魏源等人组成经世致用派，在漕运、水利、吏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主张。1838年，他在湖广总督任上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12月底，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销烟，次年任两广总督。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受投降派诬害，被革职充军新疆。1846年被重新起用，历任陕甘总督、云贵总督，先后镇压了西北、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1850年，他再次出任钦差大臣，驰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途中病死。

陈寿祺（1771—1843），又名恭甫，字介祥，又字苇仁，号梅修、左海，福建侯官人。嘉庆四年（1799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晚主讲泉州清源书院、福州鳌峰书院二十余年。清代著名汉学家。林则徐早年与之即有过从。

19世纪30年代的清王朝，康乾盛世已如过眼浮云，封建政权有似一个百岁老翁，行将走到历史的尽头；道光年间，百弊丛生。运河自隋代开通以来，成为我国南粮北运、南北交通的水上要道，但由于历代统治阶级的无能及战争等影响，以至运河长期失修，堵塞现象十分严重，这极大影响了漕运的进行，再如灾

荒，我国是一个灾荒频仍的国度，而又以清代为甚。清代的灾荒种类，主要有水、旱、震、风、虫、疫、雹、霜、雪、火等，其中水、旱灾次数最多，危害也最大。类似问题，不胜枚举。

漕运、灾荒这类问题的出现，由来已久，这与封建王朝不注重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有关。

林则徐一向注重漕运、水利事业，并将之提到与吏治相提并论的高度。他认为南粮北运，关键在于疏浚运河，确保清政府的粮食生命线的畅通，以解燃眉之急。为了挑挖江苏境内徒阳运河段，他制定了《颁发挑挖徒阳运河新定章程十八条》，针对过去存在的问题如“有多无实，”“工多偷减，费倍虚糜，”“旷误索扰”等问题，采取了相应措施，以期“剔除积弊，工旧实用，项不虚糜”。

与此同时，林则徐一向重视中国的水利事业，这是其农业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他在清廷任职期间，积极主张兴修水利，以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增强抵御灾荒的能力。林则徐曾专门写过《畿辅水利议》。主张在京津一带的低地修水利，以期改良土地，增加粮食生产，从根本上改变自六朝隋唐以来南粮北运、南重北轻的局面，并进而解决漕运上的弊病和浪费问题。林则徐在江苏一带长期为官，对江苏的水利建设多有贡献。在疏浚三江水道、挑挖白茆河道、兴建宝山县海塘等工程上，他竭尽全力，成绩卓著。对于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大难题的黄河水患，林则徐认为，它的治理应与其它江河湖泊联系起来予以考虑。这种通盘考虑全国的水利事业，将有利于问题的根本解决。

林则徐在1833年写给陈寿祺的这封私信，洋洋千言，内容涉及清政府经济方面的两大问题：漕运、水利。对此，他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封信对反映林则徐关切民生的经济思想，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林则徐这位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人们对之津津乐

道的是虎门销烟、向西方学习，而对其经济活动则未予深悉。其实，林则徐的早期政绩主要即体现在经济领域，这也是他青云直上的重要原因。

作为政治家，如若不关心有关人们生计的经济问题，他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位真正的政治家。

（《云左山房文集》抄本）

原文：

恭甫老前辈大人阁下：奉别已三载，前后惠书，积至数寸，而裁报阙如，若非河海之量，安能保其无他，复不吝教诲如是，铭心汗背，匪可言喻。

则徐庚寅[①]之秋，自都至楚，明年春移汴梁，其秋再移江淮，办灾未毕，谬领宣防，辞不获已。去春载奉抚吴之命，以得离河上为幸，然吴中凋敝之余，谈者鲜不以为畏途，以芷林[②]之敏练，犹复知难而退，况贱子乎？受事甫半月，即以监临文闱，移驻白下。河事孔亟，淮、扬告灾，未待撤帘，驰往抚视。是冬始返吴下，未几而兵差至矣，仆仆从事，迄今未能少休。突既不黔，炊又无米，劳累之余，精力日以消沮，心绪日以恶劳。每欲伸纸一抒胸臆，自非数行可了，而他冗辄复间之，中缀之后，便不能续，至今案头零笺，即有奉报之书未及终幅者，不敢复达于左右也。来教期许殷切，且多忧时感事之语，知名山中无时不以苍生系念，钦佩奚似。

则徐见近年以来，吏之与民愈不能以恩义相结，人心日以不靖。如陈连、黄番婆等之事，固在意中，而仅见诸海外之隅，犹为不幸中之幸耳。台变明知不能推久，事起之际，鄙意总以内地之米为忧，致当事书，谓除截留江、浙漕米海运赴闽之外，别无他策，而江苏有搭漕二十万石，乃于漕运之外，补还旧岁年额者，尤可挹注。昨奉谕旨，因此间距闽较远，故仅浙漕十万，而

苏漕不准截留。此外江西及浙中购买之米，未知果能如议否？则徐已将上海之船尽数封雇，派水师将领押往乍浦协运，未知浙米果于何日兑上商船，如或迟延，恐望梅终难止渴也。近来江、浙漕运已成不治之症，定例冬兑冬开者，今春兑夏开，天庾正供，尚复如是，则泛舟之役可知。然犹愈于无，或人心因之少定耳。海东遭此蹂躏之后，西成东作，想各愆期。比接乡书，又闻台米到省，果非讹传欤？新节东渡，专办善后，能不迁就为久远计，则非旦夕可毕。闻水沙连地广而腴，若乘此兵力厚集之时，似可清理，但不知果有格碍或转生他患否？新节能除情面、任谤怨，亦近今所难，若再虚怀延访，谅可收群策之效。则徐愧不能有益于乡里，但祝岁事顺成，安靖为福耳。

江苏之病，更比吾闽为难治者，以“局面太大，积重难返”二语尽之。自道光三年[3]至今，总未得一大好年岁，而钱漕之重，势不能如汤文正之请减赋，故一年累似一年。江北连岁水灾，更不可问，如洪泽湖蓄淮济运，即以敌黄，在前人可谓夺造化之巧。自河底淤高，而御坝永不能启，洪湖之水，涓滴不入于黄，则惟导之归江。而港汊纡回，运河吃重，高邮四坝，无岁不开，下河七州县，无岁而不鱼鳖！黠者告荒包赈，健者逃荒横索，皆虎狼也，惟老病之人，则以沟壑为归已计耳。官斯土者，岂无人心？但可为民食计，亦未尝不竭其思力。其如处处如是，岁岁如是，赈恤之请于朝者，无可更如，捐输之劝于乡者，亦已屡次，智勇俱困，为之奈何！

则徐窃不自量，谓欲救江、淮之困，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以今之黄河，于淮涸出洪泽湖以为帝藉。江、浙之漕米，可以稍轻，而运费遂有所从出。于张秋划南北岸，分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艘。漕既无误，河亦可治，江、淮之间，民困可苏矣。尝谓古之善治河者如神禹，禹之治河，固非后人所可思议，若汉之王景[4]，非不可学者。何以王景治河，由千人海之后，史

册中不闻河患者千六百年？大抵南行非河之性，故屡治而屡为患耳。则徐久欲将此意上陈，而非常之论，正不独为黎民所惧，近日都中物议，以则徐为议论炫长者，且此议必为风水之说所阻，明知不行，不敢饶舌。缘来教询以河事及江、淮之民困何由苏，故不禁纵笔及之。伏望启所未知，匡所不逮，曷胜感祷！

孙文靖公墓志，出自巨手，其嗣君以书丹属，则徐辞不获已，公冗未清，尚未搦管。而阖中入祀名宦之请，已奉特旨允行，其嗣君遂欲添叙入文，自应寄烦大笔补入，庶机杼不致参差。惟其葬期在四月十三，刻石约须一月，祈即添叙寄至则徐处，能于二月中旬递到，自无不及。抑闻江左名士，颇有以此文为稍长者，在老前辈与文靖至契，惟恐言之不详，但其事迹过多，是否尚可酌删？乞裁示及之。莱臧亦附一函，统祈察入。

客冬美文大兄过苏，曾于肆中购有《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嘱为转托云锦号寄回，其信其书，均于过身之后，由无锡曾大令着人送到，知专为寄书而设，无甚要事。则徐侍添手信，亦复有稽代寄为罪，兹统祈检收。

注释：

①庚寅：1830年。
②芷林：指程祖洛。
③道光三年：1823年。
④王景：东汉水利专家。

译文：

恭甫老前辈大人阁下：我们分别已历三载，期间您惠赐大函多封，而我未曾复函。如若您无容人的海量，怎能保证没有其它想法呢？而您不吝笔墨，反复教诲，令我为之汗颜，感动万分，

不可言喻。

我从1830年秋由京都到湖北，次年抵河南汴梁，当年秋天又赴江苏办理救灾，事尚未毕，被提升为东河河道总督，难辞其任。去年春天，我受命为江苏巡抚，私下庆幸卸去治河重担，但是江苏凋敝的情形，谈论者很少没有以为是艰难的事情，以程祖洛的机敏干练，尚且知难而退，何况在下呢？受命刚半月，即奔赴江宁监临江南乡试文闱。治河之事孔亟，江淮一带又发生灾变，故未等乡试结束，即飞驰江苏。当年冬，我才回到苏巡任上，不久，又生兵事，在下忙忙碌碌，至今未尝稍稍休息。从仕途上讲我可以说是官星似火，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累之余，精力不济，心情大坏。每于此时我即欲手书一封给您，一抒胸臆，无奈了了数语难以言明，其间繁杂琐事又接踵而至，中辍之后，即难再续。至今案头的未竟书笺，即有写与您的，不敢再续就致奉。来函对我期望甚殷，而且多有忧国忧民的话语，于此可知先生您无时无刻不以苍生为念，令人钦佩之至。

则徐见近年以来，官吏与民众越来越难以恩义相结，以至人心日以不靖平。如陈连、黄番婆等人起事，固然在意料之中，而仅仅出现于海外之隅，且为不幸中的幸事。台变明知不能持久，事起之际，鄙意总是担心内地粮米，并为此致书当事者，指出除截留江苏、浙江的漕米海运赴闽外，别无他策。而江苏有搭漕米20万石，如能于正漕之外补还往年欠额，尤可挹注。前奉谕旨，因为此间距离福建较远，故仅准动用浙漕10万石，而苏漕不准截留。此外江西及浙江中部所购买的米粮，不知果真能如议否？我已将上海的船只全数封雇，派水师将领前往乍浦协运，不知浙米于何日才能兑入商船，如有迟延，我担心望梅终难止渴。近来江、浙漕运已成不治之症，定例冬兑冬开的，而今却变成春兑夏开，京都皇上正供，尚且如此，则其它可想而知。话又说回来，有毕竟胜于无，或许人心因此少有安定，也未可知。海东一带遭

此蹂躏之后，西成东作，想各已愆期。最近接到家乡来书，又听说台米到省，果真不是以讹传讹吧？新节东渡，专办善后，如若能够做到为长远大计不迁就塞责，则非短期所能奏效。听说水沙连地广且肥腴，若能乘此兵力厚集的时候，似可清理整治，但不知是否有什么妨碍，或转生其它祸害？新节能抛除情面，任凭谤怨，也是近年来难能可贵的。如能再注意虚怀延访，谅可收群策的效果。则徐自愧不能为乡里做事，只能祝愿诸事顺遂，安靖为福。

江苏的弊病，比我们福建更难救治，一言以蔽之，即“局面太大，积重难返”。自道光三年（1823 年）至今，总计无一丰年，而钱漕重负，势必不能如同汤文正那样请减赋税，所以年复一年，累累相加。江北连年的水灾，更不可问，如洪泽湖蓄淮济运，即用以敌黄，在前人而言可以说是夺造化之巧。自河底淤高，而御坝永不能启用，洪湖的水，涓滴不入于黄河，这样只能导引入长江。但港汊纡回，运河吃紧，高邮四坝，无岁不开口，河下游七州县，无岁不受灾侵！狡黠之辈借荒欠包揽赈灾，强健之辈逃荒勒索，都是虎狼之人，只有老弱病残，则只能葬身沟壑。地方为官之人，难道没有人心吗？但能为民争食，也未尝不竭尽全力。但是，处处如此，岁岁如此，请求朝廷赈恤的，无以复加，规劝乡里富户捐输的，也是屡屡进行，智勇俱困，徒唤奈何？

则徐私心不自量力，认为要解救江淮水患，必须改黄河于山东入海，而当今黄河，于淮河涸出洪泽湖以为帝藉。江浙的漕米，可以稍稍减轻，而运费遂有出处，而于张秋划南北岸，分别建造南北运船，隔岸转输。这样，漕运既不受阻，河亦可治，江淮之间，民困可苏。人们常说古代善于治河的是大禹，大禹治河，固然是后人难以思议的，而东汉的王景，并非不可效法，为何王景治黄河，由千入海之后，史籍中 1600 年不闻水患呢？大

致说来，南行非黄河之性，所以虽然屡屡治理，而水患不断。则徐久欲将此打算上陈朝廷，而非常之论，正不仅为黎民百姓所惧怕，即近来京都物议，认为我高谈阔论，而且这一主张定为风水之说所阻，心知难行，不敢多言。因您大函中问及治河之事及江淮民困如何消解，故禁不住触及此事。万望开启无知之辈，以统一认识，则不胜万分感谢之至。

孙文靖公的墓志，出自巨匠之手，其后人以书丹相托，我推辞不下，公事未了，还没下笔，而阖中入祀名宦的请求，已奉特旨允行，其后人遂打算添叙入文，自应寄送有劳您的大驾补入，这样方不致有什么参差，只是其葬期在四月十三日，刻碑约需一月，请您另就寄至在下处，若能在二月中旬邮到，则不会误事。听说江左名士，颇有人认为此文稍长，就老前辈您与文靖关系至深，唯恐有所遗露，但因其事亦过多，不知可否酌删？请您裁决。莱藏也附有一函，并请察示。

去年冬天美文兄过苏，曾于书肆中购得《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叮嘱转托云锦号寄回，其信及书，均于过身之后，由无锡的曾大令差人送到，知其去为寄书而设，没有什么大事。则徐添附信函，也又有稽代寄的罪过，兹请一并查收。

致莲友

林则徐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九年三月十八日（1838 年 5 月 1 日）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因鸦片一事而写给莲友的。

1838 年 12 月 26 日，林则徐奉旨抵京，次日起，道光帝接连召见八次，商讨禁烟方案。31 日，受命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1839 年 1 月 8 日，林则徐离京南下。他沿途探访广东鸦片流毒情形，征询禁烟意见，密令逮捕重要烟犯。3 月 10 日，林则徐抵达广州，18 日，召集十三行商人宣布谕帖，命各国烟贩限期呈缴鸦片。他还招致麦德辉等四人入幕，翻译英文《广州周报》，了解外情动态。并开始组织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译后辑成《四洲志》一书。4 月，林则徐出赴虎门，查验收缴趸船烟箱。上面提到的《致莲友》一函，就是此后不久的事。

林则徐在鸦片问题上一向是坚定的严禁论者。此前的 1838 年 6 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厉禁鸦片，严塞漏卮。道光帝特命各省将军、督抚各抒己见，妥筹章程。此时的林则徐正值湖广总督任上，他奏陈禁烟方策六条，坚决支持黄爵滋严禁主张。并身体力行，在湖北实行。当年 8 月，湖广禁烟初告成效，林则徐亲督焚毁汉阳、江夏缴获的烟枪。11 月初，他又上奏剖陈银贵钱贱和鸦片流毒日广的原因，全面驳斥反禁烟派谬论，重申严禁主张。

在《致莲友》信中，林则徐指出，要禁绝鸦片，必须捣其要害。外夷从事鸦片走私，外示嚣张，内心则十分怯弱。而且除了

鸦片贸易，还有许多正当买卖可做。因此，在林则徐看来，只要能晓其利害，一面施以压力，相信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这里，林则徐对禁烟的前景是乐观的，充满了信心。至于民间吸食鸦片问题，及禁烟会影响关税一节，林则徐仍以为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应当承认，林则徐的上述认识在当时的情势下是有道理的。

值得注意的是，林则徐在信中提及西人的医术胜过内地。中西医在今天看来是各有其长，可以互补。在当时的中国，文化态势上是封闭型的，西人在中国人眼里是蛮夷之辈，难望项背。所以，对其医学，很久之后还未予相信。林则徐作为开眼看世界的近代中国第一人，他率先信任西医，充分显示了他的过人之处。

本信就其性质而论属于友人信函一类，信中充分显示了虎门销烟前夕林则徐的临战心态——坦然，且充满自信。

林则徐一方面坚定地同西方人作斗争，试图除去鸦片烟毒，另一方面又对西人医术予以充分肯定。这种具有理性色彩的认识，是十分可取的。在100多年后的今天，也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这一点。

正如太阳给地球带来了光明的同时也带来了阴影一样，任何事物都是两面的，一分为二是最科学的认识方法。

（《林文忠公手札》）

原文：

莲友先生足下：昨接披惠翰，拳拳注念，溢于楮墨之间。并承寄示粤东闻见各条，语必精详，事皆确实，非足下澄怀达识，博采周谘，不能知之如是其深，言之如是其切，而非逾恒关爱，亦不肯倾吐肝膈，指示无遗。感佩之怀，曷能言喻？

弟岭南初到，人地生疏，但既奉使而来，不敢因循了事。此地为夷船麇集，其所带来禁物，久与员弁、兵役一气呵成，而汉奸之以此为业者，更不可以数计。若非捣其要害，势难杜绝来

源。到省后察看夷情，外似桀骜，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遂致养痈之患日积日深，岂知彼从六万里外远涉经商，主客之形、众寡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决。即其船坚炮利，亦只能取胜于外洋，而不能施伎于内港。粤省重重门户，天险可凭，且其贸易多年，实为利市三倍，即除却鸦片一项，专做正经买卖，彼亦断不肯舍此马头！弟看澈此层，即将此中利害剀切晓谕，一面断其接济，严禁私售，兹洋面各趸船，皆情愿呈缴烟土。弟亲驻虎门海口，已验收一万四千余箱，此外尚有数船，总以收尽为止。虽其中不无波折，而大局均尚恭顺，非竟不可范围者。

至所示之铁头老鼠，系名查顿[①]，盘踞夷楼者数十年，于弟将到之时，闻有查拿风声，业经逃回该国矣。夷人之医术所以胜于内地者，其人病死，则斫其尸而观其脏腑，以察其所以不治之故。如十四年律劳卑[②]惊悸胆破而死，及斫尸乃知之。往时汉民每有上夷楼就医者，近来彼亦自秘其术，不甚肯为医治矣。

来教又以查办鸦片，关税不免暂绌。此一节弟先已面奏，已蒙宵旰鉴原。尤喜关部豫公[③]最顾大局，渠前往苏州织造，与之共事，恰值灾年免税，渠甚乐从，此次商办夷务，更为公尔忘私，是以弟尚能得手也。

民间吸食之风，几于口有同嗜，种种情状，诚如来示所云。然民有秉彝，大抵天良不昧，弟所发告示，多有见而泪下者。现在分举绅耆，广为劝戒，并设局数处，施药缴枪，悔过者宥其前愆，怙恶者治以重法，劝惩并用，以期咸与维新，所刊告示、章程，附尘察览，即希是正为荷！

承嘱于闽中说项之处，兹已沏就常芝阁廉访一书，并以附上，即烦足下代为面致，谅可有成。再，旧秋尚有见寄一缄，邮递纡回，未经接到。其戒烟必效方，则已于荫士大兄信中寄来，并以附及。专此布复，藉候安祺，并问文郎慧吉不一。

弟林则徐顿首

注释：

①查顿：英国鸦片烟贩。

②律劳卑：英国驻华商务总监督。

③豫公：即豫堃，字厚庵，满族，时任粤海关监督。

译文：

莲友先生足下：前接您的大函，文中拳拳之意，流畅于楮墨之间。信中还附寄有粤东见闻几条，语言精详，事情确实，若非足下澄怀达识，博采广纳，当不能知晓如此之深，言谈如此切中利害关键。而且，若非您尽心关照，也就不会倾心相告，一无所遗。对您的感激之情，难道是语言可以表达的吗？

弟初到岭南，人地生疏，但因为既然奉命而来，自然不可因循敷衍。此地为夷船麇集所在，它们携带禁品——鸦片，长期与员弁、兵役狼狈为奸，而操此业的汉奸更是不可数计。所以，如若不击其要害，势必难以杜绝来源，弟到省城广州后察看夷情，看出他们貌似桀骜，内心则非常胆怯。朝廷上下一向担心边衅之开，以至养痈遗患，愈积愈深。岂知他们从六万里外的地方来华经商，主客地位之形，众寡力量之别，故然是一般人都能看出的事。即使他们有坚船利炮的长处，也只能在外洋取胜，却难以在内港地带逞凶。广州重重门户，有天险可以依凭，而且西人来华贸易多年，获利丰厚，即使除去鸦片一项，去做正当生意，他们也断然不肯舍去。弟看透了这一点，故将此中利害剀切晓示，一面断绝他们的一切接济，严禁私下售卖。这样，使停泊在海上的趸船，都心甘情愿呈缴鸦片。弟亲临虎门海口，目前已验收14000余箱鸦片，此外还有数船未交，总之力求力收方可结束，虽然其中不无波折，但大局还算顺利，可以控制。

至于大函中所说的铁头老鼠，名叫查顿，他盘踞夷楼数十年，在弟将到广州的时候，听到有查拿的风声，业已逃回英国。夷人的医术之所以胜过内地，是因为他们遇到人死去，就剖尸观察其脏腑，以观察身亡的原因。如1834年律劳卑因惊悸胆破而死，他们就是剖尸而知。过去华民每每有上夷楼就医的，近来他们也藏而不示其医术，不大乐意医治病人。

来函又提及查办鸦片会影响到关税这一问题。此事弟已面奏朝廷，并蒙首肯。尤其令人高兴的是，海关监督豫堃公最顾大局，他前曾任职苏州织造，我们二人相处共事，恰逢灾年免税，他最为乐意从命，此次商办夷务，更是公而忘私，以至弟办事尚称便利。

民间吸食鸦片的风气，几乎人人都有相同的嗜好，种种情形，诚与来函所言相同，但民有秉彝，大概天良未泯，弟的所发告示，有许多人见到以后为之流泪。现在已分别推举乡绅老辈，广泛劝戒，并设立戒烟局几处，广施药物，以促使人们戒烟缴枪，悔过自新的宽宥其前错，既往不咎，继续犯法作恶的施以重法，总之是劝戒、惩治二法并用，以期咸与维新。弟所刊发的告示、章程，附函请您察看浏览，并望批评指正。

承蒙嘱托于闽中说项一处，兹已手书就常芝阁廉访一书，一并附上，有劳足下代为面致，谅可有成。再，去年秋天还有来函一封，邮寄辗转，未能收到。其戒烟必效方，则已于荫士长兄信中寄来，一并附入。特此为复，藉以问安，并向侯文郎慧吉，弟林则徐顿首。

上林制军言西商脚私书

姚 莹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中旬（1836 年 2 月初）姚莹为江西盐政状况写给林则徐的。

姚莹（1785—1853），安徽桐城人。字石甫，一字明叔，号展和，晚号幸翁。嘉庆进士，他与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同属经世致用派分子，对社会上的盐、漕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鸦片战争前夕，他已注意时事，尽力搜购外国图书。鸦片战争中，他任台湾道，奋力击退侵台英军。《南京条约》签订后，被投降派等诬为"冒功欺罔"，贬置四川，此后，他更知努力寻求抵抗外国侵略之策，所著《康辖纪行》就是明证。咸丰初，授湖北武昌盐法道，旋擢广西、湖南按察使，参预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清代盐政，基本上可以说是沿袭着前代的专商引岸制。其内容是：签商以引，划界运销，按引征课。重要的环节在运销，即从盐场将食盐运往划了界的盐区销售。由于某些盐销区划分的不合理，清廷又僵守成规，很少变通，所以才出现了食盐运销中的舍近求远、舍贱买贵，以及岸界巍然不动的怪现象。在这种怪现象的背后，自然就生发出了一系列难于解决的问题：首先是盐销区边远地界因距离远而盐价昂贵以至贫民无力买盐；其次是由于盐销区划分的不合理，产盐和销盐之地出现供求不平衡的矛盾。

清代盐课的征收分为场课与引课，场课是对盐的生产者的课税，引课是对盐的销卖者的课税。其征收方式十分烦琐，存在的问题十分复杂，如场课、引课除正项征收外，还有一些杂项的征

收。杂项的名目极为繁多，是以各种名义逐渐增加起来的。而且各盐区的杂项名目也各不相同。如长芦盐区的杂项就有铜斤脚价、河工银等20项，两淮盐区的杂项款目更多达50余种。

如果说，正杂课银的不断加征，已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那么，官吏中饱下的浮费泛滥，对盐政就更加有害了。因为正杂课银是有数可稽的，它的不断加征，在一定程度上有裨于财政；而各种浮费陋规，则是无数可稽的，白花花的银子都落入了私人的腰包，只能喂肥一帮大大小小的、贪得无厌的劣吏。

姚莹作为地主阶级清明官吏，出于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在这封致友人信中力主改革盐政，减轻浮费，以恤商代替病商，从而保证盐课的完纳。

盐是人类生存所不可一日缺少的必需品，包以洁白晶莹之质，具有杀菌消毒之功，没有它，人们的健康将难以维持，人们的生活将是淡然无味。可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时代中，它承受着说不清的历史染污，带来了千百万人民无穷的嗟怨。

历史证明，无百年不弊之洁，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改革是涤刷积弊的良药。

（《东溟文后集》卷6）

原文：

莹于本月四日接护运篆[①]，今已旬日。两淮公事繁重，本多未谙，逐节讲求，未易得其要领。大约运商疲乏，当恤其隐情；票贩散漫，当约以纪律。场产各有丰亏，可以相对调剂；岸销每形短绌，必须严缉透私。而其中情变万端，虑有所穷，势有所格，惟在得人经理，乃地越数省，人逾百族，在官任使，既无如汗贤员，诸商亦无如许得力之人分置场岸。盖大计则关乎国用，而言利实尽于锱铢，利在则争趋，利亡则不顾，以视州郡之可以法齐理喻者，情形又有不同。前者盐法敝坏，帑尽课悬，自改制

以来，云汀宫保与陶泉都转②大力斡旋，同心宏济，乃得五年全运，四届奏销，商本渐盈，库贮充足，成法粗定，人心稍安。宪台复运以精思、益求美备，莹可随事仰承训迪，庶免愆尤耳。

昨见江西来信，知江船夹私一案，搜获子店帐簿，讯有端倪，张守已禀宪辕，请从严办。窃以江船夹私，本干例禁，既已获破严办，减宜微闻，张守欲因此延及岸商，则过矣。盖商盐一上江船，成本巨万悬于船户之手，虽有商厮押运，而形势孤单，恐怀不测，船户沿途收私盐卖，亦无敢如何，惟求包内引盐无缺，或少缺，即为大幸，断无通同使带脚私，自碍纲盐之理。及至江岸，则文武官人俱在，船户始有畏忌，交起盐包，心虚情亏，虑恐岸商家丁及管仓之人收盐挑剔，不免难予规费，此乃相沿数十年之陋习，不特岸商知之，即扬商明知而任听，因虑船户之以包盐为规费也。故水脚每引比楚盐加倍六钱。夫江西路近于楚，而水脚反多者，正为此耳。如其可裁，扬商何肯甘心加价乎？计无复之而出于此，此其苦衷，亦可悯矣。船户贪心不足，水脚既尽，复带脚私，即以私盐变价为交盐，规费所称九十三两者，即此费；千引千包者，亦即此费也。故谓岸商知之而不能禁，则可乃谓以此牟利，岂其然哉！计西省额盐二十七万有奇，每年行销不过二十万，而商人岸费几四十万两，利少而费重，扬商苦之，皆欲避而趋楚。每纲派运，运使格外体恤，而江船户犹不愿装西盐，每届写雇，各商亦格外津贴。此其病皆由岸费之重使然，费何以重，由盐数少，故摊派多也，张守不察乎？此乃以为岸商罪，诚恐岸商涣散而扬商益以裹足，然则此举，以恤商疏引之初心，转为病商绌课之敝政矣。惟治船户以应得之罪而勿问岸商，情事始平，大局保全非细。

俞运使月来病势，初服镇江李生方颇效，顷乃变为泄泻，殊觉支难，实堪忧虑，并以附闻③。

注释：

①林则徐道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俞陶泉都转请病假两月，委姚石甫代理"。姚莹《中复堂全集》附录姚濬昌所作年谱道光十五年乙未条，亦云："十一月护理运司篆"。故到任当为十二月四日。

②俞德渊，字陶泉。

③林则徐道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日记："晡时接姚石甫书，知俞陶泉都转于二十日酉刻逝世。"本函当作于报计书之前，《东溟文后集》刻本所署日期为"丙申三月"，误。

译文：

我于本月四日护理运司篆，至今已有十天。两淮的公事繁重，本来就多不熟悉，逐节讲求，不易把握要领。大致说来，运商疲乏力竭，应当体恤其隐情；而票贩散漫无序，当以纪律加以约束。盐场产量有多有少，可以适时调节；各岸销引每每缺绌，必须严行缉拿走私，而其中事物变化多端，顾虑其有穷尽，为形势所制约，故关键在于经营用人得当，乃至地跨数省，人过百族，既然没有此等贤员，诸商也就没有此等得力人员分置场岸。盐政大计关系到国家用度，论及财利必计算至一点一滴，财利所在即争逐所在，而各州郡又因治理公允与否，情形各不相同。此前盐法败坏，帑尽课悬，自改革以来，云汀宫保和陶泉都转尽力斡旋，同心协力，和衷共济，以至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五年全运，四届奏销，商人资本日渐充盈，库府贮藏十分充足，成法粗定，人心稍安。宪台阁下又精心筹划，精益求精，在下自可随时听从吩咐，以免有误。

昨天收到江西来信，了解到江西船只夹私一案，搜取子店的帐簿，讯明大概情形，张守已禀明宪辕，请示严办。在我看来，

江西船只夹带走私，触犯条例、禁令，既然已经破获严办，诚宜微闻，张守打算借此惩治引岸盐商，就不应该了。因为岸商的盐一装上江西船只，巨额财富控制在船户手中，虽然有盐商所雇人员押运，但势单力孤，唯恐发生不测，所以即使船户沿途收私盐卖，也不敢有所反对，只求包内引盐不受损失，或少受损失，就算是最好的结果了，断不致合伙夹带走私，自碍细盐。等到了江西，文武官员都身临现场，船户始有畏忌之心，交出盐包，做贼心虚，担心岸商家丁和管仓人员收盐时挑剔，难免会给予规费，这是数十年相沿的陋习，不仅岸商知晓，就是扬商明知也听之任之，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船户以包盐作规费。所以，水脚费每引比湖北船只加价六钱。江西比湖北路近，而水脚费反而更多，正是由此而来。如果这一项开支可以裁减，扬商怎会心甘情愿加价呢？无计可施，而只能出此下策，他们的内心苦衷令人同情。船户贪心不足，既收取水脚费；还另带脚私，即以私盐变价为交盐，规费所称93两的，即指此项费用；千引千包，也是指此项费用。所以说，岸商知道这一情况却不能禁止，那么，说他们借此牟利，难道是这样么？总计江西省额盐共27万两有余，而每年行销不过20万两，商人岸费则几乎有40万两，利少费重，因此扬商叫苦不已，都打算避而赴湖北。每细盐派运之时，运筹使格外体恤，而江西船户还不情愿装运江西引盐，每至征雇时，各商也格外予以津贴。此中的问题都是由于岸费沉重所致，而岸费负担沉重的原因是由于盐的数量少，所以摊派随之增多，张守对此不了解吗？如将夹私作为岸商的罪过，我担心岸商会因此涣散，扬商会更为裹足不前，所以这一举动，以体恤盐商疏通盐引的初衷，转而成为病商绌课的敝政了。只有将此作为船户应得之罪而予惩罚，对岸商则不予追究，事情才能摆平，大局可以保全无虞。

俞德渊运筹使最近以来的病情，起初服用镇江李生的方药，颇为见效，但不久就变为泄泻，病势颇危，令人担忧，这里一并告知。

答人问关内侯

龚自珍

题解：

这是龚自珍与人讨论关内侯制度的一封复信。

龚自珍（1792～1841），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瑟人，号定庵，一名巩祚。他自幼受汉学熏染，曾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又师从刘逢禄，接受今文经学的观点方法。1829年中进士，历官礼部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两年后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对清朝统治下的腐败局面十分不满，予以了猛烈的抨击。他还主张移民实边，开发西北，保卫边疆，并支持林则徐禁烟，抵御外侮。龚自珍对许多问题探讨注意其发展变革，因而在历史观方面具有变易和进化的观点。哲学上持“性无善无不善”论，既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也反对荀子的“性恶”论。晚年，他受佛教天台宗影响颇大。

关于“关内侯”，是一个爵位名。秦汉时置，为二十等爵位的第十九级，位在彻（通）侯之次。一般封有食邑多少户，有按规定户数征收租税之权。南北朝时滥用，仅成为爵位的一种品级。俞正燮著《癸巳类稿》，该书卷十一“关内侯说”有详细说明。

在这封信中，龚自珍继承柳宗元《封建论》中的法家思想传统，用分封制与郡县制长期斗争的大量历史事实，论证了废分封、行郡县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他总结历史上地主阶级专政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认为秦汉以来所实行的没有封地的关内侯制度是防止分裂割据、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的有效措施。这反

映了他主张统一、反对分裂的进步政治主场。但他过分夸大关内侯制度的作用，说它可以“为万世法”，能使“国家万年”，却是他的唯心史观。

知古以察今，鉴往以知来，这是历史学的重要功能。正确运用历史知识，将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龚自珍全集》）

原文：

汉有大善之制一，为万世法，关内侯是矣。

汉既用秦之郡县[1]，又兼慕周之封建[2]，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乎禹之九州[3]，是以大乱繁兴[4]。

封建似文家法，郡县似质家法[5]，天不两立。天不两立，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明矣。然且相持低仰徘徊二千余年，而后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后大定。

关内侯者，汉之虚爵也。虚爵如何？其人揖让乎汉天子之朝，其汤沐邑[6]之入，稍稍厚乎汉相公卿。无社稷之祭，无兵权，无自辟官属。虽有百主父偃、贾谊、晁错之谋，无所用。汉待功臣尽如此，无韩、彭[7]矣；待宗室尽如此，无吴、楚七国[8]矣。后世待将如此，无唐方镇矣；待宗室如此，无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唐宋之待宰辅文臣也，位之以王公侯伯开国子[9]，冠之以姬周大国名号，食邑数千户，而不生杀其户，留其人于京师，而无尺土以嬗其子孙。有怨者乎？无有。子孙且无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

龚自珍曰：唐宋待宰辅法，汉关内侯法也，惜乎其犹多鲁、卫、莱、莒、荆、申之名之扰扰也[10]。我圣祖仁皇帝既平吴、耿大逆[11]，虽元功亲王，毕留京师；大制大势皆定，宗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奉恩将军[12]，凡九等，皆拨予之以直隶及关东之田，以抵古人之汤沐邑。以汉制准之，则关内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

下，至于恩骑尉[13]，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无官受世职单俸，有官受双俸；其世数，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以是为差。以汉制准之，亦皆关内侯也。

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14]，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15]。然则宣王[16]之世，郑伯[17]何以又出封？夫支孽尽封，则国祚愈长，愈窒碍难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尽封，则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尽封，必速亡；不尽封，则子颓、子带[18]之伦，伺肘腋以怨，非上策也。如皆获虚爵，如汉关内侯，则皆受恩，皆受制。

我朝之制，除开国功王，袭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为王、为贝勒[19]，则皆降等以袭，以世次为差；以世次为差，至四品闲散[20]而止，则不受田矣。是恩与制皆善，国家万年，京师数数营造王府、贝勒府耳，无所窒碍，超越二千载，最平允易行者也。

注释：

①郡县：指郡县制。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实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推行郡县制度，废除世袭的分封制，把全国分成郡和县，郡守、县令都由朝廷任命。这是适应当时封建中央集权需要的政权组织形式。

②封建：这里说的“封建”不是指今天说的封建社会，而是周代及以前奴隶制时代所实行的“封国土，建诸侯”的分封制。它是在奴隶制经济基础上与宗法血缘关系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③九州：中国的代称。

④大乱繁兴：汉高祖刘邦统一中国后，基本上继续了秦的郡县制，有力地打击和削弱了在楚汉战争中分封的异姓王，

粉碎了他们的叛乱。但他错误地总结历史经验，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后来同姓王依势割据，起兵叛乱，即下文说的“吴楚七国之乱”。这里龚自珍指出，汉朝由于没有彻底取消分封制，所以造成叛乱频起。

⑤文家法，质家法：龚自珍在《古史钩沉论四》认为：“质家尊贤先异姓，文家亲亲先同姓。”所以他在这里说，封建类似文家法，郡县类似质家法。

⑥汤沐邑：周朝的一种制度。诸侯朝见天子，天子赐以京城附近的供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地，后来改为发给封地的赋税供享用。

⑦韩、彭：即韩信、彭越。

⑧吴、楚七国：汉景帝时的吴、楚、赵、胶东、胶西、济南、淄川七个诸侯国。

⑨开国子：子，古代爵位名称，指公、侯、伯、子、男等爵位中的子爵。南北朝至唐宋有开国子或开国县子之称。

⑩鲁、卫、莱、莒、荆、申：周朝诸侯国的国名。

⑪圣祖仁皇帝：即指康熙皇帝。吴、耿大逆：指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事件。

⑫奉恩将军：封爵名。清代宗室封爵自亲王起分九等，奉恩将军为最低一等。

⑬恩骑尉：清代封爵名，相当于七品官阶。

⑭文、武、成、康：即西周初年的文王、武王、成王、康王。支子：即庶子。在宗法社会中，嫡妻生的次子以下及妾的儿子，都称为支子。母弟：同母弟弟，胞弟。

⑮昭穆：即周昭王、周穆王。

⑯宣王：周宣王。

⑰郑伯：即郑桓公，周宣王的弟弟，被周宣王封于郑国。

⑱子颓，子带：周朝人，子颓是周惠王的兄弟，子带是周襄

王的兄弟。他们两人都曾起兵叛乱，最后兵败被杀。

⑲贝勒：清代用来封宗室和蒙古外藩的爵号，位次于亲王和郡王。

⑳四口闲散：清代称没有封爵的皇族宗室为闲散。乾隆四十七年，规定闲散宗室一律给予四品官的顶带，以示与普通旗人区别。

译文：

汉朝有一种很好的制度，为历代所效法沿用，这就是关内侯制度。

汉朝既沿用了秦朝的郡县制，又同时兼用周朝的封建制。封建制的诸侯国和郡县制的郡县互相交错，并存在中国的大地上，因此经常发生大叛乱。

封建制度好像文家法，郡县制好像质家法，这两种互相对立的制度，是不能同时并存的。既然不能同时并存，究竟哪个要废弃，哪个要确立呢？社会发展必然有一个趋向，趋于废除封建制，趋于统一，这是很明显的。然而这两种制度相持不下，反复斗争延续二千多年，然后才毅然地确定下来。到什么时候才确定下来的呢？到我朝时才最后完全确定下来。

关内侯是汉朝一种虚有其名的爵号，这个虚爵是怎样的呢？关内侯这些人能上朝廷朝见天子，他们的封建赋税收入稍为比汉朝的公卿高一点。他们没有像国君那样设祭社稷的特权，没有兵权，也无权自己任用官吏。这样，即使有很多像主父偃、贾谊、晁错那样的人的谋略，也用不着了。如果汉朝对待功臣完全用这套方法，那就没有韩信、彭越的叛乱发生了；对待宗室完全这样，也没有吴楚七国的叛乱了。如果后代的皇帝对待将帅都采用这套方法，就没有唐朝藩镇割据的事件发生了；对待宗室都采取这套方法，就没有明朝的燕王和朱宸濠的事件发生了。唐朝和宋

朝对待宰相文臣的方法是最好不过的了，把他们摆在王公侯伯开国子的地位上，安上姬周大国的名号，封给他们几千户的食邑，而不给他们生杀大权，把他们留在京城，但是又没有一点土地可以传留给他们的子孙。这样有埋怨的人吗？没有。子孙尚且没有埋怨的，何况自己得到很大利益的人，就更没有埋怨的了。

龚自珍说：唐朝和宋朝对待宰相的方法，就是汉朝关内侯的一套，可惜仍然多保留了鲁、卫、莱、莒、荆、申这些周代诸侯国的名号，造成了混乱。我朝康熙皇帝平定了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后，即使是立了大功的亲王，也都全要留在京城里；大的制度，大的局势已经安定下来了，宗室中自亲王以下，到奉恩将军，一共有九等，都拨给他们直隶和关东的田地，相当于古人的供斋戒沐浴用的封地的赋税。用汉朝的制度衡量它，就是关内侯了。功臣从一等公以下，到恩骑尉，一共有二十六等，二十六等的人，都发给他们薪俸，没有官职的得到世袭单俸，有官职的得到双俸。承袭的次数，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以下逐渐递减。用汉朝的制度衡量它，也都是关内侯了。

我朝以前的三千年，都没有固定的制度，自从周朝以来已经是这样的了。周朝的制度，文、武、成、康王的时代，庶子、胞弟都得到封地，昭、穆王以后的庶子胞弟就没有封地了。可是周宣王时代，凭什么封兄弟为郑伯？其实庶子全部都给封地，那么国家越长久就越难以行得通。庶子都给封地，国家是容纳不了的；庶子不全部给封地，那么守祖业的庶子、胞弟就会有埋怨。所以，庶子全部给封地，国家一定很快灭亡；不全部给封地，就会有子颓、子带之类的人，在朝廷附近等待时机发泄愤怨，这都不是上策。假如他们都得到虚爵，像汉朝关内侯那样，他们就都得到恩惠，都受到制约了。

我朝的制度，除了开国有功诸王能够世袭王位之外，代代承袭帝位的君主都封庶了，胞弟为亲王，为贝勒，又都降一等而承

袭，每一代依次递减；每代都这样的依次递减，一直减到四品闲散为止，就不再得到田地了。这样的恩赐和制度都很好，国家能千秋万代长存，京城里只不过是经常建造些亲王府、贝勒府罢了，没有什么碍事，这是二千年来最恰当最易行的了。

与人笺五

龚自珍

题解：

这是一封龚自珍与人讨论人才问题的信。

清廷用人极为腐败，不分贤愚，只论资格。龚自珍身为一个礼部主事的“微官”，在他看来，真不过是鸡肋。龚自珍是阅世深，掌故熟，深谙统治阶级内部生活规律的人，他眼见朝政日非，自己难以实现生平抱负，心中不满可想而知。为此，龚自珍愤笔疾书道：“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统治阶级敲响了警钟。

这封论述人才问题的信，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龚自珍对当时清王朝推行儒家的用人路线——重用无德无才的儒生，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非常蔑视这类儒生，斥骂他们是“缚草为形，实之腐肉”，并指出他们在未来大变革的风暴中，终必化为沙泥，成为废物。

作者在信中描述了人才的千差万别，认为人才的培养是由时代和客观环境造成的，这在客观上是对孔丘的“生而知之”的唯心论先验论的批判，反映了他的朴素的唯物论思想。但是，他强调的是“主上”和士大夫的作用，还认为“因其性情之近”而有所不同，根本看不到社会实践的重大意义，这却是他的唯心史观的表现。

重视人才与否，是一个社会盛衰的标志之一。社会要发展，就必须加强培养人才工作，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龚自珍全集》）

原文：

手教言者[①]是也。人才如其面[②]，岂不然？岂不然？此正人才所以绝胜。彼其时，何时欤？主上优闲，海宇平康，山川清淑，家世久长，人心皆定，士大夫以暇日养子弟之性情，既养之于家，国人又养之于国，天胎地息[③]，以深以安，于是各因其性情之近，而人才成。

高者成峰陵，碓者成川流，娴者成阡陌，幽者成蹊迳，驶者成泷湍，险者成峒谷，平者成原陆，纯者成人民，驳者成鳞角，怪者成精魅，和者成参苓，华者成梅芝，戾者成棘刺，朴者成稻桑，毒者成砒附[④]，重者成钟彝，英者成珠玉，润者成云霞，闲者成丘垤，拙者成嵔嵬[⑤]，皆天地国家之所养也，日月之所煦也，山川之所咻也。

将日月之光，久于照而少休欤？将山川之气，久于施而少浮[⑥]欤？遂乃缚草为形，实之腐肉，教之拜起，以充满于朝市[⑦]。风且起[⑧]，一旦荒忽飞扬，化而为沙泥。子列子有言：君子化猿化鹤，小人化虫化沙[⑨]。等化乎？然而猿鹤似贤矣。噫戏！噫戏！

注释：

①手教言者：这里指来信所说的话。

②如其面：好像人的面孔，各有不同。

③天胎地息：指环境的培养助长。胎：孕育。息：生长。

④毒：刚烈。砒附：砒霜和附子。砒霜是三氧化二砷的俗称，有剧毒。附子，是植物乌头的侧根，有毒，经炮制后可治水肿等症。

⑤嵔嵬：险峻崎岖的山路。

⑥这里用“少休”、“少浮”是龚自珍暗喻“衰世”到来。

⑦“遂乃缚草为形”四句：这是龚自珍对清王朝推行儒家用人路线的抨击，是本文的中心思想。

⑧风且起：暗指社会将有大变革。

⑨“君子化猿化鹤”二句：《列子》里没有这句话。葛洪《抱朴子》说：“周穆王南征，三军之众，一朝尽化，君子为猿为鹤，小人为虫为沙。作者可能本此。龚自珍这里所说的“君子”是指那些有贤德的人才，即地主阶级革新派；“小人”是指上述的“缚草为形，实之腐肉”那类人。

译文：

来信所谈是正确的。人的才能、品德和性格就像人的面孔一样，各有不同。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不是这样吗？这正是人才众多的原因。那人才众多的时代，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主上安闲，天下太平康乐，山河秀丽，家世久远相传，人心安定，士大夫利用安闲的时间培养子弟的性情，既在家里培养，又得到社会的培养，天地环境使他们获得养育和助长，使他们性情深厚而稳定。于是各人因性情所接近，便形成各种人才。

出众的像崇山峻岭，勤奋的像大河流水，文雅的像田间阡陌，幽静的像深山小道，急躁的像急水飞流，阴险的像山洞峡谷，宽坦的像大地平原，纯洁的像普通百性，驳杂的像走兽动物，机灵的像妖精鬼怪，和善的像人参茯苓，美好的像芝兰梅花，暴戾的像荆条棘刺，素朴的像禾稻桑树，刚烈的像砒霜附子，庄重的像钟鼎祭器，精粹的像珍珠宝玉，柔和的像天上云霞，闲散的像沙丘土堆，低劣的像崎岖山路。这些都是天地所养育，国家所培养，日月光辉所照耀，山河气势所嘘拂而造成的。

日月的光辉是否因为照射得长久而稍微停止片刻？山河的气势是否因为嘘拂得太长久而暂时飘浮离开？于是就有用草绑扎成

人形，里面塞满烂肉的出来，教它们学会礼节，并让它们在社会上到处活动。然而一旦急风骤起，就会把它们卷到遥远的天边，化成沙泥。列子说：“君子化成猿猴和仙鹤，小人化为昆虫和沙泥。”这同样是变化吧？然而化为猿鹤似乎好一些。呵！呵！

致邓传密

魏　源

题解：

这封信是魏源在道光二年（1822 年）冬写给邓传密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二人的交往及为人处事。

魏源（1794～1857），湖南邵阳人。原名远达，字默深。道光进士。曾任内阁中书。他与龚自珍都曾师从刘逢禄学习《公羊春秋》，二人同属主张经世致用的今文经学派，故有龚魏之称，二人齐名。鸦片战争前，他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并助两江总督陶澍筹办漕运、水利诸事。鸦片战争后，魏源于 1841 年入两江总督裕谦幕，直接参加浙东抗英斗争。之后，他先后著有《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1853 年，魏源任江苏高邮知州，倡办团练，组织地主武装，对抗太平天国，晚年弃官学佛，整理著述，病死于杭州。

邓传密（1796～?），字守之，号少白，一名尚玺，书法名家邓石如（完白山人）之子，安徽怀宁人，他与魏源、龚自珍关系甚笃。

由于魏源与邓传密交谊深厚，故彼此之间皆能肝胆相照。在这封友人信中，他盛赞邓传密对待友人交往久远而不忽略其人的文貌，责人过处而不忽略细微之处，且有诲人不倦的精神与品质，因而称之为诚恳勤勉的君子。对待朋友十分的真诚，这是魏源一生的行为准则。在当时那种阿谀奉承、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和相互猜忌、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成风的时代，能如此真诚待

人，的确是颇为不易的事情。

（《魏源集》）

原文：

守之仁弟足下：两接手书，具稔动履安和，甚慰悃念。

前书谓源与挹之[①]退有后言，方切悚惧。昨札则已释前疑，而止谓词貌之间，不甚亲洽。夫舍其大而责其细，宽其重而就其轻，是故人之恕也；交久而不略其文貌，责过而不忽于细微，是故人之周也。源素性粗疏，动多尤悔，故人知之，岂自今日。然在他人，则将以为不足责备而置之，自非直谅肫[②]勤之君子，其尚肯齿诸朋友之列，而规诲不倦乎。近与挹之讲习切磋，颇知自反，尚望时赐良药，以针以砭，不致遐弃，以全始爱。《诗》云："无我恶兮，不寁故也。"[③]明春入都面晤，乃谒其愚。前接秋舫[④]书，言足下受定公[⑤]之托，颇不容易，未知日内光景何如？定公正月即可抵京否？日内闭户作何工夫？念念。天寒惟珍重一切不宣。

源顿首[⑥]

注释：

①挹之：即杨承注。

②肫：诚恳。

③"无我"二句：见《诗经·郑风·遵大路》。寁：通"接"。

④秋舫：即陈沆（1785～1826），湖北蕲春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 年）状元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与魏源交往甚笃，一生致力词章，著有《简学斋诗存》、《诗比兴笺》、《白石山馆遗稿》等。

⑤定公：即龚自珍。

⑥该信末尾未注明日期，根据有关材料考证，这封信应写于道光二年（1822年）冬。

译文：

守之仁弟足下：先后两次收到您的来信，对您的生活情况都已知晓，大大缓解了我的烦躁、焦急的情绪。

第一封信说我与杨承注复有后话，令我大为惊惧。而最近这一封信则已释前疑，而只是说我们在言谈情绪之间，不太亲密罢了。舍弃其大要而责备细微之处，即舍重就轻，这是老朋友的宽恕；交往久远而不忽略其文貌，责备其过错而不忽略细微之处，这是老朋友的周详。我平素做事粗疏，有许多值得后悔之处，老朋友知道这事，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然而，就他人而言，则将会认为不值责备而置之不理，如不是性格坦率，诚恳勤勉的君子，怎会肯去排列各位朋友的差别，诲人不倦呢？近来我与杨承注往来讲习切磋，颇知自我反省，尚望您多赐良药，针砭过处，不致置之不理，以全始爱。《诗经》上说："你不要因憎恶我，便不接近故人。"明年春天我将进京，到时候我们再面谈，以竭尽我的愚笨。前曾接到陈沆的来信，说足下受龚自珍的托付，颇为不易，不知近来情况如何？自珍明年正月可以抵达北京吗？近来闲时做什么？甚念，甚念。天气寒冷，还望多多珍重，一切不宜。

魏源顿首

致龚定庵

魏　源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23年1月8日）魏源为学术及为人处事等而写给龚自珍的。

魏源与龚自珍都曾师从刘逢禄学习古今文经，二人同属今文经学派，再加上他们的学术造诣极深，故常常相互切磋。

魏、龚二人不仅是学术上的朋友，而且还是生活上的密友。魏源不喜官场应酬，故对一些礼节性的往还，颇为厌烦，但他对龚自珍的态度却大不相同，龚自珍到他家里，就如同在自己家中，二人一见面，高谈阔论，十分亲密。

当然，魏、龚二人也有一些不同之处，就是魏源为人处事相对谨慎小心一些，而龚自珍则狂放喜交，可谓是狂生。综其性格、处事特点，为狂、傲、豪放、广交、善辩、好戏骂人、不修边幅，因此触忌甚多，为世人不容。下面仅举几例，以为佐证。

狂：嘉庆某年朝考，试题为《正大光明殿》，试后有几位部郎小聚，偶然论及试题的难度，及忘了韵脚。正当他们仰首凝思时，自珍说："长林丰草，禽兽所居。"诬君至此等地步，其狂可知。

傲：自珍遇见达官贵人，往往以自昵相加。

豪放：自珍喜欢赌博，往往是倾家荡产，但仍颇为自负。以至有人赋诗道："嗤他阳向术非工，古意沉酣射覆中。保必樗蒲须担石，神仙妙手本空空。"其豪放不俗至此。

喜交：自珍出身官僚世家，乃道光时的著名公子之一。他交

往很杂，宗室贵人，名士缁流，伧侩博徒，无不往来。自珍平日里出门则日夜不归，到寓则宾朋满座，人称“无事忙”。

善辩：自珍喜欢与人辩驳，遇事必旁征博引，以伸己说。柴萼说：每过酒铺，四座寂然，惟闻定庵声震邻屋。

好戏骂人：自珍一次与人同游陶然亭，某王孙粗犷不识文，提议联句赋诗，并首先出上句道：柳暗花明三月天，自珍应下句道：太夫人移步出堂前，王孙大笑道：我们赋诗，或七言或五言，而你却成八字，为什么？自珍说：你这是在赋诗吗？如若赋诗，我必定以五、七言相应。

不修边幅：自珍平日里不喜修饰，所穿衣服，十年不换，有时甚至几天不洗脸。

由于自珍为人如此，以至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其中道光二年（1822年），流言蜚语相加其身，屡见诗词。

魏源作为龚自珍的挚友，他在这封致友人信中不仅通报了自己的情况，而且还语重心长地指出：自珍在酒席谈论时，未能择地、择人、择言，深恐有失，希望他痛下决心，予以改正；否则，后悔无及。后来的事实是，自珍在北京无法容身，被迫返乡教书，正中预言。从这封信中既可以看到魏源对朋友情深义重，态度诚恳，又可以看出封建社会末期官场的黑暗及下层官员的苦恼。

待人以诚是因人而言的，对于朋友当然要事之以诚，否则就称不上是朋友。而对予其他人，魏源不屑与其往来，这种高洁风范，令人推崇。

（《魏源集》）

原文：

定庵仁兄先生左右：别后到此[①]，曾寄一函，想经入览，至

今未获教言，日夜如结[②]。南中竹报，想已接得，未审行止何如[③]？念念。

守之[④]近过府考，日内想有定局，虽无得失可言，然一系念之事也。

源近日身体如常，日与学生辈讲解经义，欲得程瑶田[⑤]先生《丧服足征录》（在《通艺录》中）一查，敬恳兄向胡竹村[⑥]或刘申受[⑦]先生两处代借寄来，约两旬奉还，或汪孟慈[⑧]处借之亦可，（付执甫处寄来）。至祷至感。

近日作何工夫？有新作，祈示一读，便中总望常赐教言为幸。谨此奉布，即清著安，唯自爱不宣。

再者，近闻兄酒席谈论，尚有未能择言者，有未能择人者。夫促膝之言，与广庭异；密友之争，与酬酢异，苟不择地而施，则于明哲保身之义，深恐有失，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承吾兄教爱，不啻手足，故率而诤之。然此事要须痛自惩创，不然结习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后所及悔也。又白。

前弟与挹之[⑨]俱有致守之信，不审收到否？浩常[⑩]先生仍在尊寓否？均此致意。

廿七日源顿首上[⑪]

注释：

①到此：指抵古北口。

②结：打结，这里指牵挂、挂念。

③行止何如：该年九月二十八日，龚自珍南方住宅——其父丽正的苏松兵备道署起火，此时正考虑是否南下，故魏源有此问。

④守之：邓传密字。

⑤程瑶田：1725 年生，1814 年卒。字易畴，安徽歙县人。著名经学家，著有《通艺录》。

⑥胡竹村：1782年生，1849年卒。也即胡培翚，字载屏，号竹村，安徽绩溪人。官户部主事，后曾主讲于钟山、惜阴、泾州等书院。

⑦刘申受：1776年生，1829年卒。也即刘逢禄，字申受，号申甫，江苏阳湖人。著名的今文经学家。

⑧汪孟慈：1786年生，1849年卒。也即汪喜孙，著名文学家汪中之子。著有《孤儿编》、《从政录》等多种。

⑨柂之：杨芳长子承注之号。龚自珍、魏源与杨芳关系密切。

⑩浩堂：即徐浩堂。

⑪廿七日：指道光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23年1月8日），时魏源正在古北口直隶提督杨芳任所。

译文：

定庵仁兄先生左右：自从我们分别后，我来到古北口，曾给您去函一封，想来业已收到，但至今尚未得到复信，令人日夜牵挂。南方所报消息，料想您已接到，不知您下一步作何打算？至念，至念。

邓传密最近府考得过，不日即有确切结果。虽然这事谈不上有什么得失，但毕竟是一件令人挂念的事。

我最近身体一如平常，每天与学生们讲解经义，想得到程瑶田先生的《丧服足征录》（在《通艺录》中），以便查阅，恳请仁兄向胡竹村或刘申受先生代借邮来，大约用两旬即为奉还，或向汪孟慈处借来也可以（付执甫处寄来）。拜托，非常感谢。

近来忙什么？有新作，请让在下一读。方便的话，还望常常指教，实为幸事。谨在此告知，并请著安，唯自爱自重。

再，近来听说仁兄在酒席间谈论，还有谈话不注意之处，对谁都是如此。促膝谈心的话，与大庭广众时不同；密友之间的争

论，与往来应酬有差别；如不有所选择，随意行事，则与明哲保身的道理不合，我非常担心您会吃亏，而不仅仅是德性出毛病的问题。承仁兄见爱，有如手足，故而出言坦率，规劝仁兄。此事您必须痛下决心，予以改正；否则，长期养成的习惯非一日能改，酒后狂放非醒来后悔所能弥补的。再次告及。

此前我与杨承注都曾给邓传密去信，不知收到了没有？徐浩堂先生还在您那里吗？在此一并致意。

二十七日魏源首上

上林少穆中丞书

张际亮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四年（1834 年）张际亮为自身遭遇事而写给林则徐的。

张际亮（1799—1843），字亨甫，福建建宁人。诗人。

张际亮所生活的 19 世纪上半叶，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同时代的知识界精英人物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等，大都是带着矛盾、彷徨的心情走过了坎坷乃至迷茫的路。在龚自珍看来，当时的社会是“将萎之华，惨于槁木”，“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他预言：天将大乱，暴风雨就要来了。龚自珍五次参加会试，都未能金榜题名，后虽挤进官场，但又不为腐败的清廷所容，晚年带着怀才不遇的郁抑，辞官南归，不久即暴死丹阳。魏源与龚自珍命运相似，也是科场五次失意，官场倍遭排挤，甚而他所著的《海国图志》，亦未能在华夏大地上植根生长，而只能到东瀛岛国绽蕊开放，这种历史的遗憾，连日本人都为之扼腕叹息。晚年，魏源竟陷入了佛学的泥潭。至于林则徐、姚莹等，虽为清帝竭尽愚忠，但在官场上仍蒙冤受屈，倍遭磨难。

张际亮一生仅有四十余年，他早年读书，试图科场得中，学而优则仕。后出游四方，报考京兆，但荐而被黜，不为人用。其怀才不遇的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在致林则徐的这封友人信中，张际亮叙说了自己不愿委屈俯就、奉迎巴结，及安身立命的思想，展示了自己高洁的人生观。

人生的道路有千条，人生的追求也因人而有所不同。有的人

为了追求一世浮华，卑躬屈膝，苟且偷生，完全丧失了应有的人格。也有人不为一时的荣华而迁就，出污泥而不染，志向高洁，洁身自好，这种人拥有一个完整的人格。“千差有路”四字，即可以概括种种人生。其实，静心细思，我们又怎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呢？今朝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猥猥琐琐，玷污自己的人格呢？再则，以一世的浮华，较诸千秋事业，孰得孰失呢？

（《张享甫全集》卷3）

原文：

少穆先生大人阁下：去秋八月拜谒吴门，饮食周恤，礼遇重叠，感何可言。复惠齿芬，资之粤游，以十月杪抵广州，即日谒见厚山宫保[①]，并代呈《石斋先生文集》等件，辱宫保晋接，奖许逾分。但粤中情形，数年以来，全非昔比。云麓观察本同乡，老成知己，到日即留寓署中，然时势实难，亦无可奈何。盖合宫保、观察之力，计其归装，犹不满入赀所需之数。幸亮南游时，本不作十成奢望，且少读诗书，颇知义命，人之爱名节，谁不知我？再三之读，亦不为也。但昔丁亥[②]、戊子[③]间，尝受光泽何焕奎比部四百金之助，而入赀未成，此处诸公亦皆有所助，若复不成，类于不信，何以为人？是以中夜踌躇，难为断决耳。然反复以思，自古英俊人才，起家于小吏、走卒者多矣，时会之至，本天定轨，天命人事，顺逆倏然。与其怀刺千渴，泛眼奴隶，何如厕卑官以代乞食？其奔走伺候，犹是奉朝廷宪典，不能以士行指摘也。且孔子不尝为乘田，柳下不尝为士师乎？苟其有益于人，信不在大，咏北门之忧，思西方之遇，自古诗人慨之矣。然又非今日所敢出此也。

兹以某月某日归抵江西，暂返里门，半月行复出矣。生非木石，岂不乐母兄妻子团圆一室，况十年倦游，半生负气，而甘为

道涂之仆仆，触风尘之扰扰哉？然而不得已矣，命耳！本应早肃启奉谢，缘所向不得志，举笔则百忧纷集，非所以达于巨大长德，故遂迟迟至兹也。然感慨仍不能已，昔同甫之狂，见容于未子；龙溪之诞，不弃于阳明，愿执事为文公、文成而已。

在广州刻近诗一卷，敬似附呈，幸赐鉴定，即请钧安。

注释：

①指卢坤。

②丁亥：一八二七年。

③戊子：一八二八年。

译文：

少穆先生大人阁下：去年秋天八月份前往拜会，饮食招待十分周详，礼遇尤隆，万分感谢。您又惠赠路费，资送广东，我十月份到广州，随即拜见卢坤宫保，并代呈《石斋先生文集》等，承蒙宫保接见，谬奖过当。但观广东情形，数年以来，已今非昔比。云麓观察便本是我们同乡，为人老成持重，我到后即留寓署中，但因时势艰难，也无可奈何。合计宫保、观察的实力，计其归装，尚不满入赀所需数目。幸亏我南游时，本没有十成奢望，而且少时读书，颇知义理天命，注重名节，谁不知晓？非份之事，我不会做。此前的1827—1828年间，曾受何焕奎资助400两银子，但入赀未成，此处诸公也都有资助，若再不成，类于不信，何以为人？所以深夜思虑，难以决断。但经过反复考虑之后，我认识到自古英俊的人才，起家于小官、走卒的多得很，时运变幻本无定规，天命人事还是顺其自然的好。与其央求很多人帮助，受人冷眼，何如厕身低位以度此生？那些奔走官场、地位低下的人，还是奉行朝廷宪典，不能以士行指责。况且孔子不也

曾为乘田之事，柳下不也曾为士师吗？如果它能有益于人，信不在大，咏唱北门的忧虑，思念西方际遇，自古诗人都为之感慨。当然，这又不是今天所敢如此行事的。

某月某日我归抵江西，暂返里门，半月后复出。人非草木石头，怎会不喜欢父母兄弟妻子儿女共处生活？何况十年漫游已令人疲倦，半生负气奔波了，能甘心再奔忙道上，饱受风尘侵扰吗？但是事已如此，身不由已，此是命啊！我本来应该早早写信致谢，但因生不得志，伏下写信则百忧纷集，词难达意，无法达于巨人长德，所以迟至今日，但感慨难以自抑，过去同甫狂放，而为朱子所容；龙溪怪诞，不为王阳明所弃，但愿您能成为文公、文成。

我在广州刊刻近来所写的诗一卷，随函附入，敬请您不吝赐教，问安。

复林少穆廉访书

齐彦槐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三年（1823 年）秋齐彦槐为办赈事而写给林则徐的。

齐彦槐，字梅麓，安徽婺源人，嘉道年间的西算家。嘉庆十九年（1814 年）他在金匮县知县任上，办赈颇有成效。

清代，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政治腐败、战祸频繁、御灾物质条件的不足等原因，灾害频仍。为了救灾，清朝时期所采取的措施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官方社会保障系统，即建立仓储制度，如设立常平仓、社仓、义仓等；设善堂，此外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救灾措施，主要有蠲缓、救赈等。二是非官方社会保障系统，即民间义赈与教会的慈善事业。

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民间力量的有限，再加以人口急剧膨胀而土地开垦的速度难以满足需要，这一切都导致清代灾荒不断，政府救灾乏策，民众辗转死亡于沟壑。

清代，灾荒的影响是巨大的。这首先表现在经济衰退方面，即人口减少，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及农业生产的凋敝；其次为政治腐败，灾荒大大加剧了清廷的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这一沉重的财政压力，清廷大开捐例，所卖官职越来越多，吏治终至不可救药。第三是社会动荡。灾荒使民众远走他乡，迁移异地谋生便成了一条重要出路，从而引起社会大动荡。

林则徐作为道光朝封疆大吏，对救灾问题十分关切。为此，他特致书救灾甚为得力的齐彦槐，商讨、征询应对方策。

齐彦槐在复函中指出，江苏各地救灾有三法：一为平市价，二是平粜，三是禁米出境。这三种方法，都非善策，正确的救灾方法是劝民买米。

值得注意的是，齐彦槐在这封致友人信件中所提出的劝民买米主张，不是实行强迫政策，而是依照经济规律，用付利息等方法诱导，进行宏观控制，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救灾也不例外。依照经济规律办事，往往可以事半功倍、效果极佳，否则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而一无所获、徒害无利。

（《见闻续笔》卷3）

原文：

少穆先生廉访阁下：接奉手书，猥以彦槐所呈忧旱诸诗及《金邑捐赈录》为尚有可取，嘉许过当，至不敢承。复承询及前书劝民买米之说，反复推求，必得一当，仰见大君子虚怀善诱、乐取人善之盛心，而忧国如家，爱民若子，益为苍生幸也。

今岁水灾，为江苏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之苦，较甲戌[1]之旱为尤甚，荒政之办，固不待言。顾近来州县办灾，类有三法：一曰饬市平价，二曰谕民平粜，三曰禁米出境而已。愚窃以为此三法者，皆非法也。物价之低昂，视乎物产之多寡，当米谷充足之时，虽有奸商百计钻营，求增一分之价而不得；当米谷匮乏之日，虽有贤吏多方劝导，求减一分之价而不能。理有固然，无足怪者。州县一勒市平价，势必强者搬运，弱者深藏，而外来之商闻声而却步，其患将至于无米。宋王觌所谓"物价不待甚贵为害，而甚贱亦为害"者，此也。常平[2]之设，所以平市价也，然限于功令，粜三存七，其数无几。距城远者不能为升勺之米而来，贫民之沾惠者益寡。而当平粜谷仓之时，市廛之市，必闭而不出，岂惟不出，且勾通奸胥蠹役，设法以入之。故仓谷粜毕，

而市价复昂。社仓[3]设于各乡，所以济常平也。而迩来社仓，经理不得其人，大都有名无实。一邑之中，有义仓[4]者甚少，而义仓但赡本族，不及旁人。若殷实有田之家，终岁之计皆在于米，遇米价贵，虑无不早粜者，而欲责其买米平粜，此正来教所云："除官办之外，虽荐绅，有不愿为者"矣。至于禁米出境，尤非通达治体者所宜言。春秋之世，列国兵争，而葵丘之盟[5]，犹日无遏籴，况今天下一家，又近在封疆数百里之内，一遇荒歉，遂使商贾不通，穷乡绝食如之何，其可也？且一县禁米出境，所以断米去路也，不知县县禁米出境，即所以绝米来路。一县之米，终不足一县之食，禁之出境，亦复何益？徒授胥役索诈之柄，开奸民抢夺之端。故愚以为，此三法者，皆非法也。

夫州县亲民之官，即不能转移风气，使民务勤俭，少讼狱，耕三余一，多所蓄积于平时，而临事筹之，亦当为数月久远之谋，不可作目前苟且之计。再四思维，计惟有劝民买米一策，犹可彼善于此。辱承垂问，敬为阁下陈之。

夫利之所在，趋者必多。凶年饥岁，百货不行，惟米粮贸迁，其利可操券而得，而富民所以不敢远出者，盖畏关津迟留、需索之苦，城邑乡镇堵截抢夺之虞耳。今使采买三千石以上者，中丞予之执照，一千石以上者，监司予之执照，愿往者十有三四矣。典商一岁之息，多不过一分四厘。今使采买一次，除资本运费之外，予以典商半岁之息，愿往者十有七八矣。或一人而请一照，或数人共请一照，随请随给，不使稍有时日之需，照内注明某县采办平粜米商某某，约买米若干石，以免弊漏。采买已毕，饬取所在州县回照，载明米石、米价实数，以杜浮欺。米一到县，即将两照呈缴，报明脚费，官为核算无异，加息七厘，视与市廛时价相去几何而斟酌增减，即传集米牙，分散城乡各铺户，铺户兑价而后受米。其销卖地，予息三厘，或同时所到之米，买地不同，价有参差，以适中者为率；或同地所买之米，买时不

同，价有贵贱，则后至者量加，官为随时出示定价。外来之米，卖与铺户者，照铺户入价，不得以其异商而减少；本地之米，卖与散户者照铺户出价，不得以其豪右而增多，惟请照采买之米，立簿稽核，不得运贩他方；外来之米，去留听其自便。如此则市价平而人心亦平矣，一人采买获利，继起采买者必多，而采买之家，挟赀重往，源源不绝，一石之银，可收数石之米，则地方的粮食自充，商贩之事，兼得惠济之名，则富民之捐赈亦乐，此彦槐曩者在金邑办灾、劝民买米之大略也。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惟鉴察。至宋悦研先生所云："吴下米舟，来者颇多，欲仿长中丞抚吴故事，借籴截米，平粜后归款。"此固非常之恩，纵三郡一州二十八县之灾黎，未必能遍及，然多此数十万米于民间，终有益无损。惟事归官办，不能不经胥役之手，是在区画尽善耳。附呈拙诗二首，伏乞教定。诸惟为国珍重，不宣。

注释：

①甲戌：1814 年。

②常平：即常平仓，这类仓储的特点是由督抚总理，道、司监督，各府、州、县官及佐贰具体经办，实行各级交叉管理的体制。平粜是常平仓最基本的职能，"常平"一词即由此而来。

③社仓：由民间自办，设于乡村。

④义仓：由民间自办，设于市镇。

⑤葵丘之盟：齐桓公建立霸权后，于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 651 年）在葵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境内）邀集鲁、宋、卫、郑、许、曹等国相会结盟，规定不可壅塞水源，不能阻碍各地粮食流通，不可改换嫡子，不可随便杀死大夫，要尊贤育才，选拔贤士，不让士世袭官职，同盟的都要言

归予好。

译文：

少穆先生廉访阁下：来函已收到，信中提及彦槐所呈送的忧旱诸诗及《金邑捐赈录》尚有可取之处，嘉许过当，不敢承当。又承蒙问及前函所提的劝民买米主张，反复研究，认为必有一得，于此可见大君子的虚怀若谷、谆谆善诱、乐取人善的用心的强烈，而忧国如家，爱民若子，也是苍生大幸。

今年的水灾，为江苏省数十年来所未有。民间遭受的痛苦，较甲戌年大旱更为严重，举办荒政，自不待言。近来各州县办理救灾事宜，大致有三种办法：一是平抑市价，二是下令平粜，三乃禁止米粮出境，在下认为这三种办法皆非合宜。物价的高低，在于物产的多寡，当粮食充足的时候，即使有奸商百计钻营，谋求增加一点点粮价都不可能，等到粮食匮乏的时候，即使有贤吏多方劝导，谋求减低一点点粮价也属不易，道理就是如此，没有什么奇怪的。若州县一下令平抑物价，势必导致强者搬运粮食，弱者深藏不露，而外来客商闻风却步，其祸患将至于无粮的地步。宋代王觌所说的“物价不仅仅昂贵为害，低贱也是祸害”，即是指此而言。常平仓的设立，是用以平抑市价的，但限于功令，粜三存七，可谓杯水车薪，于事无济。距离城镇远的人不可能为点滴粮食而来，贫民因此受惠甚微，而当平粜仓谷的时候，城里市场必然闭而不开，不仅不开市卖粮，反而勾结奸吏蠹役，设法屯入。以至仓谷粜毕，而市价又再次上扬。设于各乡的社仓，是用来弥补常平仓的不足的。但社仓由于经营不得其人，故向来都是有名无实。一邑之中，有义仓的很少，而且义仓只局限于本族，不及旁人。至于家境殷实的有田富户，经年考虑的都是粮食，若遇粮价上扬，无不早早粜出，而要责令他们买米平粜，正如您来函所说：“除官方之外，虽受荐士绅也有不乐意的”。至

于禁止米粮出境，尤其不是通达治体的人所宜说的。春秋时期，各国征战，而有葵丘之盟，仍是日无遏籴。何况现今天下一家，又近在数百里封疆范围之内，一遇荒歉，即致商贾不通，如若穷乡绝食怎么办？能这样吗？而且一地禁米出境，是断米出路，不知各地都禁米出境，乃是断绝粮食的来路。一地的粮食，终究不足食用，禁止出境，又有什么益处呢？白白给奸猾胥吏勒索敲诈创造机会，开启奸民抢夺之端。所以，我认为，上述三种救灾方法，都不可取。

州县爱民的官吏，即使不能从根本上转变风气，也应该使民众勤俭节约，减少讼狱，耕三余一，在平日里多多积蓄，而遇到灾荒需要筹划，也应当谋划久远，不可苟且塞责，敷衍了事。经过再三考虑，只有劝民买米一策最为切实可行。承蒙您不耻下问，特向您陈述如下：

有利的地方，前往者必多。灾荒年月，百货难销，只有粮食贸易，其利润可稳操胜券，而富商之所以不敢远出贸易，大概是畏惧关卡滞留、勒索，担心城邑乡镇堵截抢夺。今特下令，来买三千石以上粮食的，中丞予以执照；采买一千石以上粮食的，监司予以执照，这样，愿意前往的就占十分之三四了。典当商规定一两银子一年利息不过一分四厘。而今天令采买一次，除资本运费之外，给予典当商半年的利息，这样，愿往的人就会上升到十分之七八了，或一人请领一照，或数人共领一照，随报随给，不误时日，照内注明某县采办平粜米商某某，大约买米若干石，以免舞弊偷漏。采买完毕，饬令收取所在州县回照，并载明米石、米价实数，以免浮报欺蒙。米一运到县里，即令将两照呈缴，报清运费，官府为其核算无误，加息七厘；依据市场时价变化而酌予增减，即召集米行，将米粮分散到城乡各铺户，铺户依价交款后运走米粮。至于销售，予以利息三厘，或同时运到的米粮，因采买地不同而价格参差，则取其中；或采买地相同，因采买时间

不同而价格有异，则后到者依量加价，官府随时出示定价。外地的米，卖与铺户，照铺户买入价交付，不得因其为外地客商而减价少付；本地的米，卖与散户，照铺户卖出价支付，不得因其为当地豪强而予加价。只是领照采买的米，立簿稽核，不得运往他地；而外来的米粮，则来去自由。这样，市价平稳，人心亦平静如水。一人采买获利后，继之采买的人必然增多，而采买人家，挟款来往，源源不断，官府以一石米的银子，可收数石的米。这样，则地方粮食自然充裕。商贩之事，还兼获惠济施恩名声。让富民捐赈则也就会乐于从命。这就是我过去在金邑办理救灾、劝民买米的大概情形。

在下的愚见，是否得当，还望鉴察。至于宋悦研先生所说："江苏运米船只，来往颇多，打算仿效长中丞任江苏巡抚时的旧事，借钱截买，平粜后还款。"这固然是非常的恩遇，纵使三郡一州二十八县的受灾黎民，未必都能施及，但民间获取这几十万石米粮，终究是有益无害。只是事归官办，不能不通过胥役办理，所以必须尽心办理，以尽其善。附呈拙诗三首，请赐教。为国珍重、不宣。

上江苏林中丞书

邹鸣鹤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三年（1833年）邹鸣鹤为江苏大治写给林则徐的。

邹鸣鹤，字钟泉，江苏无锡人。道光二年（1822年）进士。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任开封知府。是年河失祥符，林则徐折回东河效力，和他有所交往。

1832年3月24日，林则徐在河南旧河厅查验料垛之际，接到补授江苏巡抚的谕令。林在江苏任过按察使、布政使，地方上水旱频仍，经济残破、官场腐败、民生凋敝，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

在林则徐看来，江苏农村的凋敝，一方面与天灾有关，此外，地方上的“莠民”和贪官酷吏，也脱不了干系。林则徐对此极为生气，以致每每听到贪赃枉法之事，经常要大发脾气。为了克制自己的下急性格，他曾手书“制怒”的匾额，悬于听事堂上。

凭着自己刚直不阿的锐气，林则徐上任伊始即致力于采米救灾，并迅速将盗决南河的奸民拿获归案。接着，他立即着手处理焦头烂额的钱漕事务。林则徐明白，漕政已是不治之症，积重难返，如若严饬紧催，无异于剜肉补疮，但为了保证天庾正供，他只好先计一时，竭力筹办新漕，劝戒兼施，取得了一定成绩。

林则徐以报国忧民之心，在江苏巡抚任内，躬亲任事，和两江总督陶澍、漕运总督朱为弼等反复磋商，剔除弊端，立定章

程，限制州县浮收和旗丁勒索，规定闸坝人夫用费，派遣精干官员验漕督运，以保证漕运的畅通。

处理灾区善后是林则徐面临的又一大务。他心绪纷乱地度过1832年，迎来的却是更加艰难的饥岁凶年。接二连三的天灾，使生计日蹙，人们朝夕不饱，鸠形鹄面。面对这一局势，林则徐决计缓征江南漕赋，拨发赈银，以苏民困。他用精明干练的手腕，维持了江苏摇摇欲堕的漕务和赈务。

邹鸣鹤在这封友人信中，首先列举了江苏的困难情形，继之展示了林则徐的治绩卓越，最后说明了自己治水的尽力。这封信的价值在于向人们证明了林则徐是一位爱国爱民的能吏。

林则徐为治理江苏，寝不能寐，饭仅一盂，可谓是鞠躬尽瘁，用尽了心血。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吏都能做到的，难道20世纪90年代的我们就不能做到么？

（《世忠堂文集》卷2）

原文：

连奉手谕，仰荷勖以靖恭，期以远大，每一展读，如亲侍函文于灵岩峰下也。惟是苏省气象，大不如前，江北苦水，江南苦雨，饥馑荐臻，力已难继，加以兵差之添费，盐务之积重，黄运两河之多故，百端丛集，触目疮痍。执事之莅苏也，承梓庭先生[①]后，易海忠介[②]严峻，而济之以周文襄[③]干略，持之以汤文正公平。查囤积则市价减，劝捐输则民食继，恤流亡则积困拯，禁游治则正用充。其余造士、恤刑、缉匪诸善政，体务乎其大，而条理必贯；功既乎其实，而流弊先弥。鹤虽去乡里远，而得之亲串口传同志笔述者，已大彰明较若是。或者不察，乃以为抚治规模，不如陈臬时之兴利除弊卓著成效；又或以漕务受兑较迟，淮、徐饥民纷集为言。不如陈臬则亲其条目，抚治贵持其大纲，体制本自不同，况当此万端棘手之会，受兑迟而不误，饥民困而

复苏，当事者已不知费几许焦思，劳几许擘画，始能于万难之下，获保万全。曲突徙薪其虑远，五丁开道其勇倍，固非门外人所能喻此苦心大力也。鹤素不贡谀，而于执事之苦心大力，切近情理，实以亲炙之于豫者，确信之于吴，惟闻抚循一载以来，寝不能寐，饭仅一盂，明知种福无穷，彼苍必为默佑，而事烦食少，窃为天下苍生深虑之。鹤履河壖载余矣，荷各大府推诚相与，尚无贻误。护篆以来，用历八厅，于旧险、新险、暗险各处，脚踏几遍，面询无遗，心志之余，加以笔述，此后不致茫无畔岸而兰阳埽工八十余段，已新易五十余段，去岁盘根尚固，本年春厢加高，入伏已涨水数次，大溜陈注，竟少惊动，以常理论之，工新且固，本年可望安全，此则可据实以告者。鹤自念性迂才绌，谬荷执事推奖谆谆，然待以国士惟有尽一分心力，即以报一分知遇，有防无防之议，静以俟之天时，克己尽瘁之心，迫以课之清夜而已。至济上言别时，蒙询江乡治略，嗣复屡承下问，鹤非石欲效刍荛，实以赴豫十载中，返里仅数月，情形屡易，传闻恐讹，既不肯以泛泛敷陈，又虑所答非所当务，徒益空言，无裨实治，是以默默至今。执事知我有素，庶几俯鉴愚忱，不加深责尔。谨上。

注释：

①前任江苏巡抚程祖洛。

②明代海瑞。

③明代周忱。

译文：

连接大函，仰荷勗以靖恭，以远大相期许，每一奉读，有如亲侍函于灵岩峰下一样。只是江苏情形，已大不如前，江北之水

灾频仍，江南淫雨绵绵，饥馑遍地，力已难继，再加上兵差需要、盐务积重难返，黄、运两河多变故，真可谓是百端丛集、触目疮痍。阁下莅临江苏承前任巡抚程祖洛之后，变易像海瑞那样的严峻作风，用周忱那样的干练相济助，保持汤文正那样的公平。检查囤积居奇，市价因此下减；劝令捐输，民众得以有食；抚恤流亡，使积困得以拯救；禁止游治，使公家正用得以充实。其它造士、恤刑、缉匪各项善政，体务其大，条理必贯；功务其实，流弊先弥。我虽然离开江苏老家很远了，而从亲朋口述、志同道合者笔述中得知，已十分的明晓。有些不明情形的人，认为抚治规模不如陈臬时期兴利除弊，成效卓著；还有人说漕务受兑较迟，淮、徐一带饥民丛集，岂不知陈臬是注重技节，而大治贵在提纲携领，治法本不相同，何况值此万端束手之时，能使受兑迟而不误，饥民因而复苏。当事人已不知道耗费了多少心血，几经筹划，方能在万分困难的情况下，获保万全。曲突徙薪，思虑深远，五丁开道，勇气百倍，这本不是外面人所能明白其中的艰辛的。我为人处事，向来不阿谀奉承。但对您竭尽心机，切近情理，实以亲炙于豫，确信江苏的事为实，只是听说您提任江苏巡抚一年以来，寝不能寐，饭量亦极少，明知种福无穷，苍生必为您默默祝福，但事杂食少，私下里为天下苍生忧虑。我治河已有年余，承蒙众人诚心相待，倒也没有什么差迟，任职以来，巡视八厅，在旧险、新险、暗险各处，认真察看，面询无遗，一面用心记，一面笔录，此后当不致茫无所知。兰阳埽工 80 余段，目前已更易 50 余段，去年盘根高固的地方，今年春上又予加高，入伏已来虽涨水多次，但大堤稳固，稳如泰山。就常理而言，工程新而不出什么毛病，当年的安全可得无虞，这里据实向您报告，我自以为性理愚拙，谬承您过誉特甚并谆谆教导，但作为国士只有尽自己的能力，以报知遇之恩，有防无防的议论，只能静俟天时，克己尽瘁之心，夜里自我审查反省罢了，在济上分别

时，承蒙您闻及家乡江苏治理方略，此后您又多次不耻下问，我并非不愿效劳，实在是在河南十年其间，回乡仅几个月，情形一再变幻，传闻唯恐不实，我既不肯用泛泛之言敷衍了事，又担心答非所问，徒费空言，于事无补，以至到今天方才回复。您对我早有了解，万望体谅，不加深责。谨上。

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书

程超万

题解：

这封信是道光十六年（1836 年）春程超万为营田植稻事而写给林则徐的。

信中所提及的《畿辅水利》一文，是林则徐的力作。在该文中，他主张在京津一带的低地修水利，以期改良土地，增加粮食生产，从根本上改变自六朝隋唐以来南粮北运、南重北轻的局面，并进而解决漕运上的弊病和浪费问题。林则徐坚持“劭农重谷”，提出“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他指出，京、津一带的水利问题解决了，化害为利，化害河为益河，稻谷产量自会加增，这样，“上以裕国，下以便民”，“漕弊不禁自除”。因此，他在列举的十二项工作中，“首胪水田，利益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林则徐选择京、津一带作为试点兴水利，改良土壤，优化农产品结构，并企图在京、津一带取得成绩后，“推广各省，普享乐利”。他之所以这样做，“专尚宜今，冀于裕国便民至计”。林则徐的这一主张，成为后来北方开展水利事业的先声，对其后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有筚路蓝缕之功。

程超万在这封友人信中指出，在北方营田植移应注意以下四个问题：一是改变人们的传统习惯，并预先筹备经费；二是注意农时，解决改种与农食的短期冲突；三是召募南方人为种稻艺师，解决技术指导问题；四是要极力倡导，主管部门必须灵活变通，以收实效。最后，信中又提及种稻所必须解决的水源问题，

指出北方雨水的季节分布不均，需有地下水源方可。

农业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产业，又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关键所在，以农业为基础，大力发展农业，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的第一需要。我国农业分布的一大特点是北轻南重，所以，要提高农业水平，解决人民的生存，在北方地区发展生产、改良作物就变得尤为重要了。林则徐、程超万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实属难能可贵。

（《皇朝经世文续编》卷39，《户政》一一，《屯垦》。）

原文：

窃超万见闻浅陋，幸荷甄陶，昨谒白门，重承矩诲。仰惟大人建节江南，开孟渎、刘河等处水利，又觅早稻种于楚、闽，给民栽植，一岁两获，无利不兴，固已福贻百世矣。兹因超服阕将北行，示以《畿辅水利》[1]，并谕入觐匪遥，将面求经理兹事，以足北储，以苏南土。此伊尹任天下之重，希文先天下而忧也。敬读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编，旷若发矇，窃谓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伏念冀、兖诸州，三代本为授井分田之地，讵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玉丰各邑，四郊现有开田种稻之乡，岂利于此而不利于彼？诚能成怡贤亲王未竟之业，俾虞徐克验其言，是禹、稷复见于世矣。惟是非常之原，世俗所骇，晏安已久，破格为难。以鄙见计之，似尚有宜预筹者。沟洫井堰；工费浩繁，若待司农议款，恐格而不行，宜预筹者一。圻效如有旷土，无论在官在民，俱可随时开垦，若以民地营民田，每岁获麦之后，即种秋粮，其时不能稍缓，惟秋粮既收，二麦未种之时，稍有二三旬之暇，将俟此时营之，则垦田无几，将随时营之，则民食有妨，宜预筹者二。农师必召南人，如以旷土开作官屯，即使为世佃亦可，否则作何安插？抑或募玉田、磁州等处种稻之农，风土略

同，往来较便，宜预筹者三。天下事，非权不行，以天使督理营田，权不谓轻，而要莫重于封疆，内外协谐，措画自易，万一各持意见，不免阻挠。雍正间营田至七千顷，至怡贤亲王身后，以朱文端贤相，而涣号不行于牧令，致弃前功。乾隆中再次营田，亦以督臣奏南北风气不能强同中止，前事有明征矣。窃谓必得首岳之任，宽以岁月，使州县各营其地，或劝民自营，或借帑为营，或募富户代营，无钦差供亿之烦，则事不扰，有黜陟劝威之责，则功必成，宜预筹者四。超计夏初当赴北平，傥得再依仁宇，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敬于所示《简要事宜》，妄参管见，仰冀鸿裁，伏维钧鉴。

〔附记〕后余官畿辅八年，知营田之所以难行于北者，由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稻田过时则无用，而干粮则过时可种，五月雨则五月种，六月雨则六月种，皆可丰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后雨多，无岁不然，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宜泄之处，斯可营稻田耳。文忠[2]初锐意以为己任，阅此禀深然之，因未奏请。

注释：

①林则徐道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日记："桂丹盟过此，以《北直水利书》嘱其校勘。"

②文忠：林则徐。

译文：

在下孤陋寡闻，有幸承您开导，昨谒白门，又承蒙您大力启发。大人您为官江南，开发孟渎、刘河等处水利，又觅取早稻在湖北、福建一带种植，让人民栽种，一年两收，大兴其利，当然是造福后代，功过千秋。只因我服阕已过期，将要北上，您将自

己的大作《畿辅水利》拿给我看，并说自己入觐为期不远，将当面向皇帝要求经营此事，以充足北方的储备，而舒解南方的压力，这是伊尹身任天下的重担，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我拜读了您所赠的《畿辅水利丛书》及四案诸编，大受启发，私下认为天下的大计，尽在其中。冀、兖数州，三代时本是井田制实行的地区，本宜于古代而不宜于当今，玉丰各邑，四郊现有开田种稻的地方，难道这个地区可行而另一地区就行不通吗？果能成就怡贤亲王未竟之业，实现其先前的预言，这真正是禹、稷再世了，只是非同寻常的计划，为世俗所惊骇，晏安已久，破除常规极为困难。以鄙人所见，似应当预先筹备。沟恤井堰，工程需费浩繁，如若等待司农讨论拨款，恐怕是困难重重，这是需要预先筹备的问题之一。圻郊如有空旷的土地，无论是官方或者是民间，都可以随时开垦，如若以民地经营，每年麦收之后，即种秋粮，农时不能有误，只有在秋粮已收，来年的麦子未种的时候，有二三十天的空暇，等到这个时候经营，则垦田已所余无几；如若随时营种，则会有碍民食，这是需要预先筹备的第二个问题。农艺师必须招收南方人，如在空旷的土地上开官屯，即使是招人长期佃种也可以，否则如何安插？或者是招募玉田、磁州等地种稻的农民，风土习惯大致相同，往来较为便捷，这是应该预先筹备的第三个问题。天下的事，没有权力就行不通，由朝廷派员督理营田，权力可谓不轻，而更重要的是重于封疆，内外和谐，这样，筹划起来自然是十分容易，万一各持意见，就不免阻力重重。雍正年间，营田开发了七千顷，而到怡贤亲王之后，以朱文端贤相负责，政令涣散，很难执行，以至前功尽弃。乾隆中叶，再次实行营田，也因督臣上奏北气南风不能强使相同而中止。前事可作明证，在下认为必须责有专成，并宽以时限，使各州县自己经营，或劝民自营，或借款经营，或招募富户代为经营，没有钦差供奉的侵扰，那么事无妨碍，专理人员权力专一，大功必成无

疑，这是应该预先筹备的第四个问题。我估计在初夏时节当赴北平，如能再依仁宇，为之效劳，再好不过，对您所示《简要事宜》，在下斗胆表示看法，万望您多加肯否，不吝赐教。

〔附记〕：我在畿辅为官八年，方知在北方营田困难的原因所在，乃是由于三月份没有雨水可供下秧，四月份无雨插秧，稻田误时就不能种了，而旱地作物仍可过时而种，五月份有雨就在五月种植，六月份有雨就在六月份种植，都可以取得丰收。北方省份六月份以前雨水很少，之后则雨量很大，每年都是如此，所以，必须选择那些四季都有泉水而且又有排泄处的地方，才可营田植稻。林则徐起初决心办理此事，阅读此禀请深以为然，故而未予奏请。

后 记（一）

杜甫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春望》）元好问诗："青灯一杯酒，千里故人书。"（《得纬文兄书》）其渴求家书的心情是如此的迫切，得到故人书后的心情是那样的快慰，这是为何？因为"相见无期，唯是书疏可以当面。"（蔡邕：《独断》。）亦即通常所道的"见书如见人"、"见字如面"。

书信一词，古人多称曰"书"。明吴讷《文章辨体》称："按昔臣僚敷奏，朋旧往复，皆总曰书。近世臣僚上言，名为表奏，唯朋旧之间，则曰书而已。""信"字本无书信之意，有之，始于唐。如李绅《端州江亭得家书》道："开拆远书何事喜，数行家信抵千金。"

书信有许多别称，常见者为简、笺、札、牍、贴、函、疏、启、尺牍等。书信写于竹简之上，叫简，笺；写于木版上，叫札、牍；写于素帛上，叫贴；书信的封套，叫函；疏者，通也，疏通己意谓之疏；启者，开也，《尚书·说命》道："启乃心，沃朕心"；至于尺牍的得名，那是因为写信所用的本板约一尺左右。

书信从先秦时期发展到前清时期，由于社会交往频繁，使之更为流行、普及。书信之作，不仅见诸别集者比比皆是，而且辑为专集者也较前代为多。从说言上来讲，有些家书完全采用口语，之乎者也之类，荡涤净尽，仿佛是在耳提面命，这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色。

清代的书信，有别于其它文体，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十分真实而宝贵的历史资料，大可以见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人情世态，小可以见一个人的思想、性格。此外，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时人的

许多美好品质，诸如爱国忧民、廉洁奉公、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刻苦自励、勇于任事、临难不苟、尊师重道、严于治学等。基于上述考虑，我们通过认真甄别，修成是书。

参与本书写作的有王记录、雷戈兄与我，我们依次各负责三分之一的任务，最后由我通稿成书。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以至是书在选材、翻译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不足之处还有望方家匡正。

苏全有

1998年元月于

河南师大

后　记

80年代初，当我们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对中国古今名人书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种兴趣的产生，与其说是想从其中吸收多少精神养分，补充空虚的心灵，倒不如说是为了实用。因为那时候正值青春年少、多情善感，想对恩师说上几句话，想对父母聊上几句，尤其是想对同学朋友表表衷肠，苦于囊中无物。大白话又觉得失天之骄子的身份，华丽词藻、寓意深远的文字又制造不出，自然就想到了“偷”学先人。记得《傅雷家书》曾是“偷”得最多的书。

后来我们都进入了出版部门，从事编辑出版工作，渐渐地我们觉得如果将历代中国人的书信代表作汇编成册，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对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大有益处。经过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策划编撰了《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这套书。本套书基本上依时间顺序加以编排，分成秦汉魏晋卷、隋唐卷、两宋卷、金元卷、明卷、前清卷和晚清卷。从严格意义上讲，民国时期的书信应该单独出一卷，但由于种种原因，只编到晚清，诚为憾事。

这套书的每卷主编是王小方负责秦汉魏晋，李维新负责隋唐，郑强胜负责两宋，任崇岳负责金元，王瑞平负责明代，苏全有负责清代。在此，我们对每卷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敬佩。最后，还要感谢张正武先生、人民日报出版社的方鸣先生，没有他们的支持，本套书是不可能这么快问世的。

耿相新　郑强胜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中国历代名人书信大系　前清卷
作者=苏全有主编
页数=437
SS号=12145990
DX号=
出版日期=2000.1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答程夔州书&方苞
上陈大中丞请修明史纲目书&蓝鼎元
上沈心斋先生书&蔡世远
与方望溪先生书&沈彤
寄舍弟墨第三书&郑燮
寄舍弟墨第四书&郑燮
给四侄钟杰书&陈宏谋
为学一首示子侄&彭端淑
移明史馆帖子一&全祖望
答和观察书&袁枚
与张司马&袁枚
与弟文韶书&卢文弨
上桑弢甫先生书&卢文昭
上徐大司空书&汪由敦
与某书&戴震
答郑文用牧书&戴震
寄内子论教子书&纪昀
训诸子书&纪昀
答王西庄&钱大昕
与许孝廉庆宗书&姚鼐
与史余村&章学诚
与董公常书&崔述
与桂未谷论慎愤二字说书&王念孙
论园&吴锡麒
与钱少詹论地理书一&洪亮吉
与友人论古文书&阮元
与祝子常书&李兆洛
与沈聚亭&龚未斋
与林少穆兵备书&陈寿祺
致陶制军林中丞书&朱为弼